

香港反送中運動左翼敗北的系譜：
翻譯、轉型與邊界

蘇哲安 (Jon Solomon)

唐山出版社

香港反送中運動左翼敗北的系譜：翻譯、轉型與邊界／
蘇哲安 (Jon Solomon) 著
-- 台北市：唐山出版：正港資訊文化發行，2022.02
254面；21 x 15 公分
ISBN：978-986-307-202-7 (平裝)

1. 社會運動 2. 政治運動 3. 左派 4. 香港特別行政區
541.45

110017260

香港反送中運動左翼敗北的系譜：翻譯、轉型與邊界

作者 蘇哲安 (Jon Solomon)

編輯 賀卓恆

封面設計 吳國強

出版 唐山出版社 | Tonsan Publications Inc.

106019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B1

Tel：02-2363-3072

Fax：02-2363-9735

tonsan@ms37.hinet.net

Facebook 粉絲專頁：唐山書店／唐山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號：05878385 戶名：唐山出版社

發行 正港資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6020 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64號B1

Tel：02-2366-1376

Fax：02-2363-9735

出版日期 2022年2月

定價 380元

法西斯主義並不是一次針對革命勢力崛起的反應，而是一場延遲的逆轉 (counterrevolution)，專門寄生於反資左派的弱點或敗北。

多士卡諾 (Toscano 2020)

因此，當柏林 (Isaiah Berlin) 著名地指出，討論自由的合理方式只有消極 (negative) 與積極 (positive) 兩種類型，他其實就是將一次政治敗北複製到概念的層次上。這樣一來，敗北就被自然化。根據斯齊諾 (Quentin Skinner)，我們被「迷住才相信，我們知識傳統繼承的思考方式 (例如有關自由的概念)，就是唯一的思考方式」，而這種信念於是就限制了我們的政治想像。然而，歷史研究的任務就是要針對自由相關的思考展開去自然化 (denaturalize)，讓我們自覺意識到當下價值與概念可能性的組合並不是必然的，更不是不言自明的最佳選項。

古勒維奇 (Gourevitch 2015: 19)

話說從頭，就得從敗北說起。凡是想要瞭解當代批判思潮就必須從這點事實出發。

柯西彥 (Keucheyan 2014: 7)

日本資本主義以及與它催生的宇野弘藏的批判理論相關的辯論給我們的啟發，在於教我們去承認我們才勉強剛剛開始去思考那又高尚、又變態、被稱為「資本」的抽象性。正因為資本自身構成了我們的認知架構的出發點，它才能預期我們的展望並打敗我們的努力。

沃克 (G. Walker 2016: 193)

Cet ouvrage a bénéficié du soutien financier du Centre de Recherches
Plurilingues et Multidisciplinaires (EA4418) de l'Université Paris Nanterre.

本著作蒙受巴黎第十大學多語跨科研究中心的贊助。

目次

序言一	楊凱麟
碎裂、喧囂、觸底與逆亂	i - v
序言二	黎明、何式凝
香港女性主義的敗北	vi - xlv
香港反送中左翼敗北的系譜：翻譯、轉型與邊界	蘇哲安 著
第一章：邊界與敗北	1 - 35
一道前線	
「超越邊界」真的就是進步嗎？	
是不是左派沒那麼重要？	
資本的外部性	
文化研究與去馬的過程	
歷史成見、外部性與世界圖式	
左派的敗北	
第二章：香港界址	37 - 74
運動的翻譯：回歸邊界	
題外話：國際團結與現代性翻譯體制	
定居殖民主義與「香港界址」	
香港藝術創作中的邊界	

第三章：翻譯的生命政治……………75 – 87

回歸邊界與翻譯的生命政治
語言、解殖與「中文運動」

第四章：聲音、收編與左翼的失語…………… 89 – 128

主權慾望
宗教戰爭
「顏色革命」
新自由主義
數位轉型
詮釋學侷限與失語問題的再思考
性別與失語

結語：一場加速主義的政治運動？轉型之後呢？…………… 129 – 151

整體性與橫向自主
「牆」國與核心問題意識
非轉型主張
雙重國家
中文書寫
資本主義下一轉型：朝向武裝、私有化超級生命體的誕生

附錄：轉型、翻譯與區域佈署……………153 – 172

轉型，翻譯與區域佈署
連續性的梯度
轉型學與西方的意義

致謝……………173

參考書目…………… 175 – 197

序言一

碎裂、喧囂、觸底與逆亂

楊凱麟

思想與實踐從來緊密糾結，卻絕非單線粗牙的想什麼做什麼，而是永恆「介於二」的恐怖展示。蘇哲安總是懂得如何以書寫(而且是犀利思辯的中文書寫)來證成思想糾纏實踐，或反之，或非此非彼，的殘酷遊戲。一本書就是一具戰爭機器。

這本書的火線橫掃香港反送中(反修例)運動所滋生的論述雷池，由近十五年來掀起的政治抗爭入手，繞經蓬勃的在地左翼論爭、反思與轉向，蘇哲安豎立一門嶄新的劃界系譜學，綿密彈道鎖定的是界線、翻譯與主體性三個概念所交錯激生的基進問題場域。一切思考、論證與批判都必須回到這個問題場域中重新誕生出來，一方面使得後殖、邊界、政治經濟學、身分政治與語言的複雜衝突與征戰獲得嶄新的觀看視域，另一方面也藉此奠立了由界線、翻譯與主體性所交纏共生的思想平面。

在香港這個政治學「噪點」上，界線比任何時刻都更成為思

想與實踐的尖銳問題。對於話語中固執回返的中西、南北、左右、中港、內外、解殖保殖、本土建制、遷徙定居……，各種界線的生死判教簡直無所不在與無所不是，當然，也因而無所在與無所是。劃界並不是單純的指出界線，而是使得正反直逆不再服務於任何一的形式對立，弔詭地「介 / 界於二」。因此，尋覓「界線在哪裡？」與質問「界線是什麼？」並不真正成為思想的關鍵問題，或者不如說，問題不在任何已固著或被預設的疆界，更非此疆界的表面抹除或忽視，反而是重新促使各種細微界線的創造性顯現與誕生，無窮地激活了界限「小知覺」的敏感與警覺。這是對多樣化世界的微分與再差異化，是任意兩種最小值 dx 與 dy 的動態頡頏與特異性的持續重估。簡言之，思想就是投身於系譜學製圖所再激活的活體世界，而界線則因為總是一再地被思想所逾越而重新誕生在他方。界線僅因其涉及的「域外」與來自域外的力量而存在，而劃界，不是直線，而是各種異質力量的無窮摺曲運動，「比最遠更遠」摺入「比最近更近」……

作為抗爭中的活性界面，不論香港願不願意都已經成為一種「界線經驗」，但比較不(只)是因為香港蟄居於犬牙交錯的地緣政治奇點，亦不太只是其殖民與經濟歷史的複雜身世，而更是因為其允許了一種基進思想的獨特可能，不是因為香港的過去或現在，而是透過其一再觸底(越界)與逆亂(摺曲)的政治處境所可能折射的未來思想。

香港「成為『前線』的原因，正是因為劃界實踐(bordering practices) 早已構成了當下全球政治局勢的核心。」(1-2)香港座落為極特異的「概念性時空」，這並不是說香港成為一個抽象化的概念，剛好相反，在批判性論述的火網交織下，思想運動在此重軍布署，一切可思與非思的極性操演一再短兵相接，內外左右南北都因「強辯證」而在系譜學的賭注中成為可反覆逆轉的基進

運動。摺曲，並因此促成了「不可能的鄰近性」，一再翻迭出指向未來的思想潛能。這個因「歧義」(mésententes)迅猛的政治時刻命名為香港，即使是其「左翼的敗北」，仍然無可迴避地成為系譜學凝視下的界線經驗。

想要界定當前一再加速的詭譎政治局勢無比困難，因為所有語言都立即面臨自身急速與固著的危機，都可能再度蹈入某種定居殖民或共謀殖民的網羅。作為一種劃界實踐的介質，話語的地位從來無法固著與一勞永逸，其正如同界線一樣，具有任意性與移動性，而且正是語言的能動性與潛能必須在劃界中顯現。用蘇哲安的話來說，「凡是語言皆為翻譯」(107)，即使(特別)是語言內部的自為翻譯。當代基進思想不可或缺的外部性正是在翻譯行動中一再被摺入其中，而主體性就是此一(再)翻譯 / 摺曲的操作，但不再是為了班雅明的純粹語言，不是任何形式的一或另一，而是「介於二」，為了在語言自身實現一種等同於劃界的系譜學重估。確切的說，語言自身的劃界實踐(翻譯)並不(只)是不同語言之間的溝通與交換，而是「在語言的內部總是早已存在著不可思考的外部與異者，總是因為有自身的外部性而有語言的可能。這個陌異性的揭露並不只存在於譯文之中，而且早已內建在原文本身的創造性構成。」¹

系譜學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批判性意義，除了尼采式的價值重估，蘇哲安的用法更是傅柯意義下的，「不從我們所是的形式來推斷什麼是我們所不可能做或認識之物，而是從致使我們是我們所是的偶然性中提取不再是、不再做或不再思我們所是、所做或所思的可能性。」²系譜學離不開其所投射的開放性未來，對「我

1 楊凱麟，〈可譯性與虛擬性：班雅明的德勒茲時刻〉，發表於「翻譯德勒茲：德勒茲思想的翻譯、轉化與創造」會議，中研院文哲所主辦，2019/10/04, 05。

2 Foucault, Michel. « 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 ? »,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V, Paris : Gallimard, 1994, 574.

們自身」賦予一種批判性的生產潛能，不是為了強化任何「所是、所做與所思」，而是從中顛覆性地轉向，催逼出不可或缺的「陌異性」，其並不是無關的外部，而正是必須被摺入為主體性的必要部位，也是劃界實踐所欲引入的視域更新。蘇哲安使得這樣的批判實踐來自一切界線形式的無止境摧毀與更新，而透過語言的內外翻譯，或話語的「流變 - 可譯」，在一切既有意義與已決界線中催逼出一種系譜學式的「譯者 - 主體性」，其以「域外總是敗北的形式」成為界線經驗本身。³「邊界的問題之所以是個基本的政治課題的原因，就是因為它被內嵌於所有的社會關係。原則上這就牽涉到每一個地方乃至每一個個體自我構成過程中，劃界實踐具有不可繞過的悖論特質」（141）。2019年前後的香港，正處於這種光影明滅的激烈翻譯時刻，「形式的一」被重新鬆動、瓦解，讓位給「介於二」的流變。這正是布朗肖在談及翻譯時，明確以系譜學方法提出的說明：「原作從來不是不動的，而語言中某一時刻所包含著的所有未來，語言中意指或召喚一種另類、有時極危險的所有另類狀態，都在文學作品的莊嚴偏航中獲得確認。翻譯連結到這種流變，它『翻譯』並完成這種流變。翻譯僅僅因為佔有這樣的運動和這樣的生命，才是可能的。」⁴

在愈來愈激烈的抗爭中，香港以其積累的動能闖入了獨特的翻譯時刻，四處嗆呼著「不規則的熱鬧狀態」（83），無數異質力量麇集在這個幽微的歷史開敞，它允許了系譜學翻譯的介入，劃界成為主體性建構的必要條件。不論「香港人」與否，一切都如黃建宏在《潛殖》中所倡議，「嘗試在沒有邊際的渾沌中想像並

3 「語言既非真理亦非時間，既非永恆亦非人，而是域外總是敗北(défaite)的形式。」法文的 défaire (défaite 的原形動詞) 有拆除、打亂、失敗等意，傅柯的意思應是指形式總是「被拆除、瓦解」，這裡為回應本書書名，譯為「敗北」。Foucault, Michel. « La pensée du dehors », in Dits et écrits, vol. 1, Paris : Gallimard, 1994, 539.

4 Blanchot, Maurice. « Traduire », in L'amitié, Paris : Gallimard, 1971, 71.

建構出球莖般的『渾沌 - 身體』[……]偵測或感受到『邊界上的自己』。」⁵界線的嶄新誕生與主體的問題化重構成為系譜學凝視下的僅餘生命，而且勢將無可轉圜無可迴避地成為「我們自身」的批判存有論。

在這個艱難的界線時刻裡，亦在當代政治的臨床與批判中，我們各自在自身的轉型實踐中流變 - 香港人。而這意謂什麼？蘇哲安的答覆乾脆而堅定：變成一名劃界實踐的高明譯者。

編按：此篇序言是根據2020年11月初六萬五千字的草稿而撰寫。

5 黃建宏，《潛殖絮語》，台北：宣言製作工作室，2019年，6。

序言二

香港女權的敗北

黎明、何式凝

引言

自 2019 年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下文簡稱反修例運動或反送中運動)開始以來,「女權 L 去咗邊?」¹ 這句質問三不五時便會在網路平台和社交媒體上出現。尤其當有女性遭遇警方暴力的時候,各種網民和意見領袖便會開始大罵「女權 L 去咗邊?」,鞭笞女權主義者在運動中的「無所作為」。² 那麼女權主義者是否

1 原文「女權撚去咗邊?」「撚」在粵語中是指男性生殖器官,用於輕蔑的表達。可以直譯為「女權屌去哪兒了?」

2 本文中的「女權」主義者泛指廣義上關心性/別議題的群體,在香港網民對此的習慣稱呼是「女權」,很多針對這個群體的劃界行為也使用的是「女權」一詞。考慮到「女性主義」一詞在台灣語境下有更豐富的意指,本文選擇沿用「女權」這一稱呼指代香港的這個群體。當然女權主義者並不能被視為一個整體,但是在這場運動中以女權主義者身份開發出的聲音是具有一定特徵和一致性的,因而文章選擇用女權主義統稱這一類聲音。筆者本身也被包含在這一指稱中成為反思的對象。如有朋友認為自己不同於本文所涉及的女權主義者並因此感到被有關「敗北」的批判冒犯,筆者對此向您表達真摯的歉意,並希望有幸能夠在公共空間聽到您不一樣的聲音。

真的在這場運動中「無所作為」呢?這場運動要求女權主義者做出的「貢獻」是什麼?女權主義者又是如何回應運動主流聲音對其的要求呢?在《香港反送中運動中左翼敗北的系譜》一書裡,作者蘇哲安寫了很多「反資左派」的弱點或「敗北」之處。「反資左派」,一般而言,是進步思想的代言,香港的女權派別大致也被歸入其中。蘇哲安不但指出這種「進步思想」代言的弱點,還宣布它的徹底失敗——究竟是「進步」路徑本身的失敗,還是徒有「進步」的虛名?筆者作為女權主義者,如何看見香港反修例運動呈現出來的女權敗北?香港女權主義者的敗北,是否也是左翼敗北的一個實例?本文希望通過分析香港女權主義者在運動中的處境及其在關鍵議題上的選擇,對他們的敗北做一個速寫——他們不僅認可了運動的劃界實踐,以效益主義的策略捲入運動並被運動反向牽制,更積極地參與在話語空間規管與劃界實踐的前線。而女權主義者這樣的回應與參與,在筆者看來,正正坐實了自己的「敗北」,甚至參與製造了一個使得自我批判與運動轉化都難以發生的空間。

「女權」在反修例運動中的處境

香港女權主義者在反修例運動中似乎一直處於一種不被看見的狀態,儘管他們也有過數次短暫聚光燈下的「巔峰時刻」,例如由數名女權主義學者發起的「香港媽媽反送中集會」(2019年6月14日和7月5日)以及平等機會婦女聯席發起的「反送中#MeToo集會」(2019年8月28日)。然而這樣的光輝稍縱即逝得來又不留絲毫痕跡。「反送中#MeToo集會」3萬人聚集中環渣打花園共同聲討警方性暴力所帶來的感動還未在女權主義者的群體中消散,短短兩周後(2019年9月15日),支持運動的香港藝人卓韻芝在路上被路過警員比中指的新聞就又引來了網上此起彼伏的「女權 L

去咗邊？」。2020年8月31日，一名孕婦在警員的行動中被拉倒並噴射胡椒噴霧，9月6日，一名12歲女童在旺角被警察撲倒騎身而受傷，這兩個事件再次引爆了針對女權的圍剿和「召喚」。作為回應，有女權主義者於9月7日在《立場新聞》發佈文章力證女權主義者自上世紀80年代起就一直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並非「只是有興趣爭取女性的權益，對其他人的公義無甚興趣。」（蔡玉萍，郭子盈 2020）。彷彿是用行動呼應該文章，12個性別平權團體於9月11日和逾百區議員聯署「強烈譴責警方……濫用武力壓制女童、孕婦及女性市民」（蘋果日報 2020）。聯署中雖有提到聯合國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卻沒有嘗試論證在拉倒孕婦、武力壓制女童的事件中如何存在「基於性別的暴力對待」，只是簡略提到警方在去年的行動中曾涉嫌使用針對女性抗爭者的性暴力（團體 / 議員 / 個人致警務處處長公開信 2020），但這並不是該聯署在譴責的事件。性別平權團體在該聯署中的存在更像是在以女權的名義附議一個「民主運動」的訴求。或許在未來女權再次被網民質疑去了哪兒的時候，這歷史的一頁將可以出現在女權主義者新的一篇回應文章中，成為「女權在民主運動中從未缺席」的又一鐵證，然後再次被無視。

當運動的主流聲音用「女權 L 去咗邊？」來召喚女權主義者的時候，是在質疑女權只顧爭取女性權益卻對其他人的公義不聞不問嗎？顯然不是。以上例子中人們問「女權 L 去咗邊」的時候，當事人都是女性而不是所謂的「其他人」，這種質疑的聲音分明是在說：「女性受到不公待遇，女權怎麼還不出來做你們的份內事？」有趣的是發出這種質疑的人往往正是蔡、郭一文中所說的對女權及其工作「無知、無視」的人（蔡玉萍，郭子盈 2020）。那麼，既然這個運動的主流聲音對女權一向「無知、無視」也不關心，為何突然又會召喚女權來做事呢？他們認為的「你們女權應該做的事情」是什麼呢？更加有趣的是，女權主義者以文章和行

動所作出的回應和網民針對女權的召喚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答非所問。一方在問「女性遭遇警暴時女權怎麼不做自己的份內事？」另一方卻在回答「女權在民主運動中從未缺席。」暫且不論孕婦遭警察拉倒等事件和女權議題的關係，難道參與在香港主流社會認知的「民主運動」中才是女權的份內事？還是女權主義者需要證明自己是這場「民主運動」的一員才能有推動女權議題的正當性？究竟是真的捉錯用神、答非所問，還是透過鷄同鴨講的表象，我們可以看見這一問一答背後有著心照不宣的潛台詞？女權主義者在這場運動中的處境為何如此尷尬？他們對運動的附和與參與又是為何如此的急切和不敢怠慢呢？

民粹神話與劃界實踐

要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首先需要直面運動的民粹色彩及其運作方式。這場運動的民粹傾向已被不少觀察者留意並討論過（Lo 2019；黎明 2020a；Sheng and Xiao 2019；趙蒙賜 2019；Lam-Knott 2020），但尚未提供系統的分析。卡索尤（Maria Esperansa Casullo）雖然沒有討論香港的個案，但她在「民粹主義與迷思」中提到的民粹敘事框架（2020）可以幫助我們深入理解在這場反修例運動中，**劃界實踐**（Bordering practices）及其**自然化**（Naturalization）的政治意味是什麼。

劃界實踐，就是劃出邊界的動作與論述，即通過分門別類來劃分人群、地理實體、各種空間、時間以及所有的社會類別，從而創造出各種新的主體、意識形態和現實。舉例來說，儘管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且語言的使用呈現多元混雜的狀態，「香港人」和「粵語」卻在運動的論述中越來越呈現出與「大陸人」和「普通話」對立的敵我之分。香港文化評論人鄧正健更是撰文主張，操粵語的群體和操普通話的群體之間存在族群的邊界，而操普通話的人

士在知道另一方不歡迎自己的前提下不應該對這道邊界「自出自入」(鄧正健 2020)。**自然化**則將民粹主義的深化論述成現實中的必須，甚至視之為真理。例如，有觀察者便在其文章(Lam-Knott 2020)中提到一些抗爭者深信民粹主義是維持反修例運動的必要條件。翻譯了墨菲(Chantal Mouffe 2018)的《寫給左翼民粹主義》(For a Left Populism)一書的東京藝術大學博士生楊天帥更在一篇有關他譯作的訪問(忞尚 2019)中提到：「我覺得，香港人有幾仇恨呢個政權，就幾仇恨這個政權係最好(我覺得，香港人有多仇恨這個政權就多仇恨這個政權，這樣是最好的)。」而這篇訪問的副標題是「政治敵人與民粹必要」。

正義與邪惡，我方與敵方的劃界是在時刻進行著的，今天被劃為我方的人不一定明天還能被劃入這個陣營。這種劃界也是有等級之分的，雖然有時可以戰略性地納入我方陣營，「左膠」³、「女權」、支持運動的「大陸人」等這類群體卻隨時可以被視為不夠純正、忠誠的存在而被劃出去。透過種種劃界實踐，這場反修例運動創造了一個充滿民粹色彩的神話，以及一對典型的民粹主義神話角色——英雄與仇敵(Casullo 2020a)。卡素尤指出民粹主義有雙重英雄(Dual hero)，即「正港人民」(Authentic people)以及「人民拯救者」(Redeemer)。站在雙重英雄對立面的則是雙重仇敵(Dual villain)，分為「外部的敵人」(External villain)和「內部的叛徒」(Internal traitor)。

先來講一講人民和人民拯救者這一對雙重英雄。在民粹神話中，人民終將得勝，正義終將得以彰顯，因為仇敵代表了邪惡，而邪惡必將得到懲罰。人民的勝利即正義，雖然人們未必說得出怎樣才叫勝利，但對這神話的敘事卻是深信不疑的(Casullo 2020a)。基於這個敘述框架，在香港反修例運動中，人民就是經常出現在

3 香港流行的政治術語，大意指脫離現實只談理想的左翼分子。

口號中的「香港人」，它是一個空洞的能指(Empty signifier)(Laclau 2005)，即一個沒有具體內容的語言符號。我們都會在日常用語中使用「香港人」這個語言符號，但它所具體指稱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對象，其內容是模糊不清甚至可以是空洞的。我們可以看見一個具體的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他/她無法代表「香港人」，我們無法說「香港人」就是他/她這樣的，總有一些我們理想中「香港人」的元素不體現在這個具體的個人身上。人民拯救者在香港的運動中可以包含很多不同的角色——「學生」、「年輕人」、「抗爭者」、「勇武」……他們是最前線的人民拯救者，扮演與仇敵直接對抗的角色，是最受推崇謳歌的拯救者，這些角色也都是空洞的能指。還有一些個人雖然不算入以上的類別，但也可以爭做拯救者，例如學者、意見領袖，以及所有不辭辛勞為運動發光發熱的人，哪怕只是短暫的瞬間，他們都可以爭取扮演這個角色，最重要的是他們能全心全意把自己的論述、才能、技術、資源為「人民」發聲，讓全世界看到「香港人」是對抗強權、無畏無懼的英雄。所有拯救者在敘事中的目的都是要拯救「香港人」。

當我們借用這個民粹敘事框架進一步審視，就會發現這樣的神話敘事同時也是殘酷的。熟悉英雄敘事的人多少都知道，英雄時常也是悲劇的主角。是英雄的悲情故事打動了人們，才會被視為英雄。在反修例運動中，更多時候，大家期待卻又未能明言的，或不知所以但必然走向的，是悲情纏繞的情緒。拯救人民的英雄必須走向悲劇的結局(如被捕、流亡)，這樣他們才永遠是這個神話故事的光輝角色。但拯救者的悲劇在反修例運動的神話敘述中只能算是向終極悲劇助推的動力，終極的悲劇是屬於人民自身的悲劇，即被香港法學學者戴耀廷(2020)自然化為「香港宿命」的「攞炒」⁴——不僅是中港「攞炒」，更可以上升到國際「攞炒」(黃之

4 粵語，即同歸於盡之意。

鋒 2020；陳倩兒 2020)。可是神話中的人民又必然得勝，於是這種人民悲劇的宿命又被加入了重生性甚至狂歡性的元素，例如以「鳳凰重生」的方式令香港「重光」的鳳凰涅槃式攪炒(Phoenixism) (我要攪炒 2020)，以及以酒神的「醉狂」境界「置諸死地而後生」的酒神式攪炒(許寶強 2019)。如此一來，儘管香港民粹神話中的人民有著悲劇的宿命，但這宿命並不是神話故事的終局，死後重生的勝利曙光才是。人民(「香港人」)也因走過「死蔭的幽谷」⁵而具有了超越性，成為比具體的個人更永恆更具有決定性的英雄。像「香港人」一樣同屬空洞能指的那些人民拯救者——例如「年輕人」、「學生」、「抗爭者」、「勇武派」等——只要不具體到個人，同樣可以提供和人民一樣的重生與永恆的想象。但是，可以具體到有名有姓的個人的那種英雄由於不具有重生能力，現實在他們身上也很難提供重生的想象空間——一旦流亡便可能終生流亡——注定只能成為成就人民重生之神話的工具人。被反覆稱為一場無領袖運動(Leaderless movement)⁶的反修例運動，並非真的沒有領袖，而是有一個集體意義上的空洞的領袖，他們具體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正在拯救「香港人」。而我們所有人的任務則是「必須要保護年輕人和勇武派」，所有在此之外的任務都是次要的(Ho 2019a)，必須要做些什麼才能贖我們虧欠了英雄的罪。於是人民的重生與勝利神話為具體的個人帶來的不是一種賦權，而是一種帶有道德屬性的義務以及未能履行該義務的焦慮。運動通過民粹的神話敘事形成了一個高度工具化的場域，想要被劃在界內就必須成為對運動「有用」的工具。任何人都可以「香港人」、「年輕人」、「抗爭者」的名義來對他人進行道

5 取自《聖經》詩篇 23:4。

6 目前記錄中最早使用無領袖抗爭這個名稱的是 Simson Garfinkel (2003)。在反修例運動之前，紐約時報(Buckley and Ramzy 2014)曾用這個詞形容同樣發生在香港的雨傘運動，這個形容也曾出現在李立峯與陳韜文(2018)的著作中。使用該詞形容反修例運動的目前最早可以追溯到南華早報 2019 年 6 月 23 日的報道(Su and Ting 2019)。

德綁架和劃界實踐，只要沒有在當下以「人民」需要的方式為「人民的最終勝利」做出貢獻，隨時都可能被劃到更低的等級成為有罪者或是劃在界外成為仇敵，哪怕曾經做出過貢獻也不能成為免罪金牌。

接著就來看看作為雙重英雄對立面的雙重仇敵——外部的敵人和內部的叛徒。顯而易見的外敵就是北京、香港政府以及他們的支持者(例如藍絲⁷、香港警察)。外敵的邪惡與非正義屬性不容置疑、罄竹難書，雙重英雄(人民和人民的拯救者)的共同任務就是要揭開外敵的真面目，曝光他們的罪惡，團結一致打敗他們，讓人民所受的痛苦得到補償。但更加需要警惕的是內部的叛徒，他們不但沒有與人民站在一起槍口一致對外，竟還長他人志氣滅自家威風，指出人民自身的問題，批判運動和運動中的英雄。這些害群之馬隱藏在人民之中十分危險，人民要勝利就必須從運動中把他們除去，讓人民的聲音和共同意志得以彰顯。有些人比其他更容易面臨被當叛徒劃到界外的危機，例如女權主義者，因為運動中存在的各種性別議題(例如針對警嫂的性攻擊，使用恐同用語抗議警務處長等)可能會引來他們的批判(黎明 2019 2020b)，這類批判將被視為叛徒的罪證。但這並不意味著其他人的處境就是安全的，哪怕是鞠躬盡瘁的「英雄」也可能飛來橫禍遭受叛徒的禮遇，例如在生日用了美心蛋糕慶生而捱轟的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文維廣 2020)⁸，或是撰文核查有關美國大選假消息而遭責難的前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張崑陽(已流亡離港)(林勵 2020)⁹。

在民粹神話中，敵意是由義怒(Righteous anger)驅動的，這種

7 即親政府親建制的人士。

8 美心集團在運動中被視為反運動親建制的「藍店」，因而被呼籲抵制。

9 這些假消息皆為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謠傳另一總統候選人拜登選舉造假。

敵意不但有「正義感」為其正當性背書，也是推動運動的重要力量(Casullo 2020a 2020b)——人民越憤怒就越有力量，證明人民沒有放棄，願意繼續排除萬難且越戰越勇。但是，這種由義怒驅動的敵意卻並不需要考量「正義」究竟具有哪些內涵並以此為依據決定對誰行駛敵意。香港大學病毒學專家袁國勇於《明報》和龍振邦博士聯名發表的一篇文章(袁國勇 & 龍振邦 2020)中聲稱：「武漢新冠狀病毒乃中國人劣質文化之產物，濫捕濫食野生動物、不人道對待動物、不尊重生命，為滿足各種欲望而繼續食野味，中國人陋習劣根才是病毒之源。」蘇哲安指出其「民族劣根性」的論述帶有殖民種族主義的色彩，發起聯署希望香港大學譴責此類言論並對自身殖民史查究建檔(蘇哲安 2020a)。由於運動中主流的聲音將中國/中國人視為要分割的外敵，可謂樂見此類「民族劣根性」的言論，蘇哲安立刻成為敵意的標靶(馮晞乾 2020a 2020b 2020c)。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本文筆者之一僅僅轉發了他的貼文，就被運動中頗活躍的一名意見領袖，香港城市研究學者黃宇軒(Sampson Wong)公開稱為「邪惡的敵人」。可見，這種敵意及其背後的「正義」都是具有高度靈活性的，可以被順手塑造成打擊他人的武器，卡素尤(Casullo 2020b)稱其為「靈活的敵意」(Flexibility of antagonism)。這種敵意也可以個人化(Personalization of antagonism)，以攻擊個人作為對抗仇敵的手法。這樣，一場運動可以隨時找到新的敵人、新的攻擊對象，讓人民維持敵意，不忘記對敵人的仇恨，甚至通過散播仇恨來讓運動得以按照預定的方向延續。民粹的運動是一場戰爭，任何被視為在阻礙人民戰勝仇敵的人都是叛徒，必須以正義之名與之決裂。

通過以上對民粹神話和劃界實踐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反修例運動形成了一個具有鮮明特質的公共空間。這個空間有三大特點：第一，劃界實踐無處不在：界綫也可以相當靈活，任何人都有著被踢出人民隊伍的危機；第二，高度工具化：任何人可以空

洞的集體名義要求他人為運動做出貢獻，被要求者只能通過成為有用的工具才能維持在界內的資格；第三，強制性團結：運動中主流的聲音具有強制性，偏離這個主流的聲音很有可能被劃為敵人，但主流所代表的「正義」具有難以捉摸的靈活性，使得批判成為危險度極高的行為。現在讓我們回到之前在「女權在反修例運動中的處境」一節提出的問題：從來不關心女權議題的網民為何突然會召喚女權主義者呢？他們需要女權主義者貢獻什麼呢？為何網民質問「女性遭遇警暴時女權怎麼不做自己的份內事」時，女權主義者卻在回答「女權在民主運動中從未缺席」？女權主義者對運動的附和與參與又為何如此的急切和不敢怠慢？答案似乎已經呼之欲出了。

網民並非因為突然關心女權議題而召喚女權主義者，他們甚至可能並不知道什麼才是女權議題，只是簡單將事件涉及女性等同於女權議題，正如蔡、郭一文(2020)中所說，這是「把女性所遭遇的不公義外判給女性主義者」。這樣的召喚是因為民粹的運動需要維持對敵人的憤怒和仇恨，而孕婦被拉倒、女童被武力壓制正是可以生產這種憤怒和仇恨的契機。網民認定涉及女性的事件就是女權的議題，於是運動的名義要求女權主義者為之貢獻。女權主義者當然不能單純以糾正網民對女權議題的曲解來做出貢獻，因為這不僅不能幫忙延續對仇敵的憤怒，甚至可能令「人民」的正義形象受損，導致針對女權主義者的敵意。在這樣的召喚之上懸掛的是一把劃界的利劍，威脅著將對方劃出人民的範圍。而這把劃界的利劍並不是只有在召喚女權主義者的時候才懸掛在他們頭上。就像毛時代的「知識分子」雖然不屬於敵人，但之於「人民群眾」只是末流的「臭老九」，女權主義者之於反修例運動的「人民」也處於類似的邊緣地位，「女權 L」這樣的稱呼就是這種邊緣地位的明證。文革時期的知識分子隨時可能因為「知識越多越反動」招致「人民」的敵意，同樣的，反修例運動中的女權主義者

也隨時可能因為「離地」、「左膠」、「唱衰運動」¹⁰ 喪失邊界內的資格。當網民質問「女權 L 去咗邊」時，真正的潛台詞是「你們這些末流的女權 L 該為運動貢獻的時候卻看不見你們的身影，看來是時候把你們劃出去。」這是一種劃界的威脅，也可能同時表達了一種劃界的判定，即不管你們之後有沒有出來做事，我們已經覺得你們不可靠，應該被劃去更邊緣的位置甚至直接踢出界。在這樣的潛台詞之下，女權主義者乍看下鷄同鴨講的回應——「女權在民主運動中從未缺席」——就變得相當耐人尋味了，因為它正是在回應這種劃界的威脅或判定。女權主義者的回應彷彿在說：「我們一直在為民主運動做貢獻，只是你們沒留意，我們是不應該被劃出界的。」而之後 12 個性別平權團體參與到聯署之中的行動也彷彿在回應：「雖然這很難說是女權議題，但我們仍然以性別平權團體的身份參與支持了，希望這次你們留意到。」正是這種隨時被劃出界的危機以及隨時成為敵意對象的處境，使得女權主義者們以言行展現出一種對運動急切的附和與參與。可惜，「知識分子」在毛時代無法通過勞改和表忠來脫離「臭老九」的處境，女權主義者也無法通過積極附和與參與運動來脫離自己「女權 L」的邊緣地位。他們奮力的參與注定會被無視，並在一次又一次針對他們的召喚中被他們重申，繼而再被無視。周而復始，不斷重演。

以上的討論并非想要徹底否定民粹的運動策略為左翼所運用以致推動社會轉化的潛力，只是批判地呈現出這種民粹策略目前在香港反修例運動中的面貌，以及女權主義者在其中的處境。之所以要花大量的篇幅書寫民粹神話和劃界實踐，是因為要觀察和理解女權主義者在運動中的各種選擇與策略，就必須將觀察的眼光置於其所身處的處境之中，正如必須要在劃界實踐的危機處境

10 粵語，即說壞話使目標名聲受損的意思。

裏，我們才能理解為何女權主義者會用「女權在民主運動中從未缺席」來回應「女權 L 去咗邊」的質疑。

女權主義者的參與策略

除了以上討論中提到的力證自己在民主運動中的參與，或是提供不了女權主義的論述也要以性平團體的名義表達支持，女權主義者在反修例運動中的參與策略還呈現出一個值得留意的特徵，那就是筆者稱之為**女權公司化**(Feminism Incorporated)的現象。公司化即以公司的方式運作，其邏輯建基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與關係，具有工具化(Instrumentalization)的特點。工具化來自一種窄化的關於目的實現的認知，即，將注意力集中在效益的最大化，而在這個過程中目標本身往往無法被批判地檢視，被如何提升效益這樣的考量所取代。

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擔任榮譽副研究員的台灣女性主義神學學者陳文珊(2020)¹¹ 可謂將這種工具化的取態在其觀點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在一篇於女權群體中流傳甚廣的文章中，陳提到了父權社會中女權運動的策略選擇，她寫道：「反送中運動中的女權運動者並不選擇突顯抗爭暴力或粗口等議題……是他們意識到父權壓迫在香港的處境下，至為迫切且著力最深的所在，是警察及背後的不具代表性的政治體制。」她還特別將之與黑人女權運動作了類比：「這點會否恰恰如同黑人婦女運動不同於白人婦女，認為在其處境下父權壓迫的核心是種族主義，而非家庭，因而，拒絕『左膠』地團結在空洞的『姐妹情誼』旗幟下？」

首先，黑人女權運動的發展並不存在一條單一的路徑，並不

11 陳文珊的背景跨越香港、台灣、女權主義和神學等多個界別，這也意味著其觀點所帶有的特質有可能不僅僅反映在香港女權主義的界別。

像陳所簡化的那樣有一個一致性的策略選擇——1974年成立的康比河公社(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明確質疑了黑人男性與父權體制的合謀，並在其宣言(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中批判了當時女權運動對黑人女性的忽視(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1978)；1979年黑人女權作家米歇爾·華利斯(Michele Wallace)則在其書中對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m)和黑人團體中的性別歧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Wallace 1979)；各類主張的發生時間不同，採取的路徑也不同。再者，如果只看黑人女權運動對其以降之女權運動的啓發，其突出的貢獻是提出了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尤其是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社會階級與父權的交叉(Collins 1990 2019)。但是，陳將這一切解讀為黑人女權主義者們拒絕「左膠」並在策略上作出了「優先順序」的選擇。「左膠」在香港的政治語境下多有離地、不切實際、一味強調政治正確之意，因而黑人女權主義者的抗爭在陳眼中成了懂得區分優先順序的一種務實表現，而非對當時由黑人民族主義或白人中產階級主導的團結以及反種族主義運動中的性別宰制(Gender domination)現象的反叛與抨擊。陳不止徹底簡化了黑人女權運動的歷史，更是用當下香港主流的政治術語(左膠)和意識形態强行消費了這段歷史，將其剝皮去骨，挪為己用。難怪她使用了這樣的例子來反駁筆者之一的何式凝關於反修例運動中父權問題的批判(佳奇 2020)，卻完全沒有發現上個世紀黑人女權主義所批判的社會運動中的「團結」以及對權力交叉性的忽視，正正與2020年的香港女權主義者在運動中的處境產生了歷史性的呼應，而何式凝的批判某種意義上正是在嘗試讓類似黑人女權運動這樣的批判與轉化延續到香港。這種「看不見」的狀態本身就展現了工具化的取態如何將視野窄化，聚焦在所謂效益之上。

陳繼而談到：「如何詳細辨視反送中運動對更大範圍父權體制的影響，進而採取女性主義運動策略，積極介入干預，預防父

權的反控，並使其正面總體效益極大化，需要引入女性主義社會運動理論的視野，並結合田野實證研究。」在她看來，女權主義在運動中需要達致一個總體效益極大化的目標，而引入女權主義社會運動的理論視野和田野實證研究都是為這種目標服務的，這樣典型效益主義的口吻令她聽起來更像是一間名叫「女權主義公司」的執行總裁，正在討論公司的市場融資與產品投放問題。這樣一來，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陳會在文中提出：「關心性別平權的女權運動者」，不該聚焦在批判運動的父權面向，「真正該聚焦的【是】……『這場長達一年的反送中運動會否有可能，在哪些層面，對香港父權文化或社會體制產生長遠的、結構性的影響』？」從公司執行總裁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借殼上市」(Reverse takeover)的策略——透過將資金注入已上市的公司，獲得一定的控股權，使得原本未上市之公司的資產得以上市。因此，在陳的女權主義運動策略中，對「香港父權文化或社會體制產生長遠的、結構性的影響」的主體竟不是女權主義運動，而是香港反修例運動。反修例運動在她的論述中成了女權主義要借來上市的殼，而上市正是資本市場效益極大化的不二之選。

從這個借殼上市的策略出發，我們也更容易理解女權主義學者蔡玉萍(2019)為何會反覆強調運動擴大了女性公共參與的機會，並以此駁斥何式凝的一篇關於女權主義者在運動中失語的文章(Ho 2019a)。借殼上市往往需要借用市值較低的上市公司，這樣才能以較低的成本實現上市融資。蔡眼中無領袖且為女性公共參與提供了巨大空間的這場運動，正是一個市值較低、可以低成本注資的上市公司。因為女權主義者積極動員各類女性(母親、師奶等)發掘自己身份的政治資本，她們大量參與到運動中就像是「女權主義公司」對運動這個殼的注資。按照市場邏輯，借運動上市之後，「女權主義公司」原本的資產就更容易升值，使得女權主義在市場上的影響力提升。像針對女性的性暴力這樣的議題原本乏

人問津，一旦借運動的殼上市之後，譴責警察性暴力的口號便史無前例地召集到了3萬人的集會，這在香港女權主義運動的歷史上雖不敢說絕後，但肯定是空前的。所以從上市策略的角度我們可以推論，對於「女權主義公司」，女權主義者哪裏是失語，根本是發出了史無前例的洪亮之音，這一貢獻絕不能被抹殺。

至於參與者是否只是關心警察的性暴力，以及反警察性暴力空前盛況與運動中針對警嫂的性攻擊的並存是否值得反思，這對以效益極大化為目標的「女權主義公司」來說並不是優先要考量的東西。用陳文珊(2020)的話來說就是：「退一萬步來講，在香港長期的父權體制下，反送中運動的抗議出現粗口及色情的文化再現，一點也不稀奇。相反地，沒有這些現象才真正是奇蹟！」不知這間「女權主義公司」是否忘記了，女權主義對我們的貢獻與啓示，並不在於發現如何游刃有餘地在既定社會規則中行走獲利的方法，而是在於揭示出父權壓迫在不同社會情景中如何演化，如何以多樣的形態呈現，如何和不同的權力結構交叉。但現在，在這種「借殼上市」、效益至上的策略下，市場的規則和限制是既定的前設，是上市公司必須接受的遊戲規則，否則就無法繼續在市場中融資。相比之下，何式凝對運動父權面向的質疑就彷彿指出市場規範對「女權主義公司」的根本限制，呼籲人們看到借殼上市的弊端，這對公司來說當然是反市場、反效益和不懂得分清優先次序的表現。從中我們也可以窺見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在香港女權論述中的深深植根。

「女權主義公司」表面看似發展興旺，實則隱藏著深深的危機。首先，是市場的規限。如果融資這種效益至上的策略成為首選，在進入市場才能融資的情況下，市場的邏輯和邊界就成爲了一種必須接受的前設。也就是說，「女權主義公司」所能動員的女權和性別議題，必須以運動所處的市場為邊界。因爲公司借殼

的是運動，在運動的市場以外，公司是很難融資的。這也就是爲什麼我們會看到，一些運動支持者會去香港 #MeToo 第一人呂麗瑤¹²的臉書，質問她作爲性騷擾受害者爲何沒有爲遭受警察性暴力的抗爭者發聲；而抗議警方性暴力的很多人則並不覺得針對警嫂進行性攻擊有什麼問題。女權主義者對這類狀況也避而不談。¹³ 上市公司以市場為融資場所，這就決定了像「反送中 #MeToo 集會」這樣的行動，雖可令「女權主義公司」資產瞬間以幾何數增值，卻幾乎不可能對 #MeToo 和性暴力議題本身帶來實質的推動，最多只是在特定的範圍內令特定的女性有了多一些的發言權(這值得認可卻遠遠不夠)。如果你是被性騷擾的女警或是警嫂，又如果你遭到的是運動同路人的性騷擾，那這場集會恐怕不會讓更多人看見你的遭遇並爲你鳴不平。歸根到底，我們只是在女權議題所關涉的人群中又劃出了一條新的界綫，只有在界綫內的人被界綫外的人性騷擾時，才會有可能得到支持。這種局部賦權還具有明顯的時效性，當運動最終平息，或當警察性暴力不再成爲運動當下的焦點，這樣的局部賦權也會衰落或失效，就好像上市公司的市值會暴漲也會蒸發一樣。

其次，是不存在的控股權。借殼上市的「女權主義公司」真的能通過動員女性大量參與運動這樣的注資方式，來獲得「運動」這個殼的控股權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就像我們之前探討過的那樣，女權主義者雖然動員了很多女性參與運動，還完成了「反送中 #MeToo 集會」這樣的歷史最高融資，她們仍然時刻面臨著被劃界的利劍切割出去的危機。陳文珊(2020)所說的「積極介入干預」運動事實上並沒有發生的跡象，發生的只是蔡玉萍(2019)奉為圭臬的「女性的大規模參與」，而這些大量參與的女性只在象

12 香港跨欄運動員，首位參與 #MeToo 運動的香港公眾人物。她的揭發引來大量網民到她的面書謾罵攻擊。

13 筆者之一的黎明曾公開談論有關警嫂的議題，詳見她的文章(黎明，2019)。

徵的層面是「女權主義公司」對運動的注資，事實上她們並不真的是屬於公司的資本，也不以公司馬首是瞻，即她們再多的參與也不會為「女權主義公司」換來對運動的控股權。參與的女性也並非都是通過女權主義者的動員才加入運動，她們也未必對女權主義有興趣。更何況，蔡玉萍等人的調查(Choi et al. 2020)曾發現香港本土主義活躍分子認為性別不平等與參加本土抗爭無關。女權主義者在民粹敘事的運動中要取得所謂的「控股權」，唯一的途徑就是積極參與到對「人民」之定義的話語權爭奪中。如果能夠轉化運動主流聲音(其實是具有右傾色彩的聲音)對「人民」的定義，為討論注入女權主義的批判，至少在短暫的時間裏，女權主義者之於運動可能會具有有限度的「控股權」，當然，這絕不如這句話所描繪的那樣簡單。但是，目前看來，女權主義者們表現出的是積極迎合運動中關於人民/仇敵、拯救者/叛徒這樣的劃界，像陳文珊(2020)一樣，對運動主流視「警察及背後的不具代表性的政治體制」為優先對抗的仇敵的論述照單全收，或是像蔡玉萍、郭子盈(2020)一樣用歷數 80 年代以降香港女權參與民主運動的履歷來向運動證明自己在界內的資格。可見，牢牢掌握控制權的從來就不是女權主義，而是本被當作殼借來上市的運動。

最後，是女權議題的工具化和女權主體的喪失。正因為控股權不在女權主義手裏卻在運動手裏，一場「女權主義公司」兢兢業業籌措的借殼上市，預期中的 Reverse takeover 並沒有發生，發生的是「反向借殼」，我們暫且稱之為 Reversed reverse takeover——本想收購對方卻被對方反噬。原本被女權主義者視為擴大影響力的工具——反修例運動，卻反向預設了女權議題的版圖，使得女權議題反過來成為了幫助運動擴大影響力、增添進步性的工具。當然，兩者可以是互相幫助互相利用的狀態，但我們需要看見的是，在這種貌似「合資」的生產關係中，兩者間的權力關係究竟以何種方式呈現。在反修例運動中，女權的議題時常是被迫妥協

的，女權主義者並不能暢所欲言地去推動女權議題，只能以服務於運動的方式來發言，彷彿女權議題只有在服務於運動的前提下才具有正當性。女權主義者或許也能夠意識到自身之於運動的工具性，以及受制於運動的尷尬處境，卻選擇去擁抱自己被反向借殼的現實和注定無所作為的前景，轉而將女權主義的責任和核心關懷寄托在了幻想的未來以及參與運動的大眾身上。例如，陳文珊(2020)就表示，女權主義者要提出的更深刻的問題應該是：「當那些勇武的港女離開了街頭，會否因對性/別有著不同於既往的新體認，成為未來香港女權運動的生力軍，勇於去挑戰、翻轉父權體制?!」女權運動和女權主義者在這樣的論述中徹底被架空了，反修例運動及其參與者成為了唯一的政治主體。似乎在她眼中，自己這一代女權主義者已經不具有主體性，只能寄期望於想象的主體來代其發出對父權體制的衝擊和挑戰。對於一間「女權主義公司」來說，衝擊和翻轉父權體制，永遠是在未來由他人來做的事，因為公司在當下的優先任務，永遠只能是融資和保護隨時會蒸發的市值。

女權主義者的話語空間

以上關於女權公司化的分析揭示的是這種所謂效益至上策略的陷阱與危機。除此之外，女權主義者還面臨話語空間的縮小。這種話語空間的縮小首先當然和民粹神話對話語權的全面掌控有關。香港女權主義者應已十分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原本就邊緣的位置，在這場反修例運動中更加被邊緣化——對抗政府對抗警暴對抗北京被視為最首要的運動目標，其他議題相對沒有那麼重要，且都在分散這一目標的資源與注意力(Ho 2019a)。處於更邊緣的位置如果只是意味著更加無人問津，那還不算特別嚴重，可惜現實是只要有人膽敢公開批判運動被右傾民粹主導的問題，立刻會

遭受迎頭痛擊。

一、來自右翼本土派的攻擊

2020年2月，新冠疫情在香港日趨嚴峻，由於政府一開始不願封關，支持運動的光榮冰室公開表示以封餐廳的「關」，即不接待說普通話的人士(台灣朋友除外)。與此同時全港有近百家店鋪實施了同類的拒絕接待政策(侯彩琳 2020)。筆者之一的黎明曾與先生鍾一諾合寫一篇短評發表在權威醫學期刊《刺針》(The Lancet)，呼籲重視民間公共衛生措施中的反陸情緒(Anti-Chinese sentiment)(Chung & Li 2020)。筆者至今仍記得書寫時如何小心翼翼，盡量選擇最溫和的用詞，避免讓人產生批判運動的印象，這種自我審查的心態本就側面反映出女權主義者在公共空間中的如履薄冰。誰知仍舊一石激起千層浪，筆者立刻被網民和各路意見領袖指罵「大陸雞」¹⁴、「VaChina」¹⁵、「綠茶婊」¹⁶、「學棍」¹⁷、「女權L」……筆者的臉書一度被此類謾罵攻陷，並有人匿名寫信去筆者工作的學系要求解雇筆者，信中強調聲稱筆者婚前的性生活不夠檢點。筆者的先生則沒有遇到這麼猛烈的性攻擊和針對專業背景的攻擊，最多只是被罵「藍絲」。

女性和女權主義者的身份在運動中成為被重點攻擊的對象，這個現象並不鮮見。對運動出現反陸現象的反思(黎明 2020c 2020d)，對運動父權面向及勇武至上意識形態的批判(Ho 2019a 2019b)，以及在蘇哲安批評袁國勇事件上拒絕與蘇割席(黎明

14 因為黎明出生在上海，於2008年到香港學習生活。大陸雞就是指來自大陸的妓女/婊子。

15 一指 Chinese vagina，與大陸雞意思相近；另一含義是 A vagina with a very large population，即到訪人數眾多的陰道，和蕩婦意思相近。

16 是源自大陸網路的用語，意指表面人畜無害實則工於心計的婊子。

17 即假裝有知識實則誤人子弟的人，或是仗著自己的學術權威為非作歹的人。

2020e)，這些發聲都使得兩位筆者得到本土派人士的特別「青睞」。右翼本土派意見領袖盧斯達便撰寫多篇文章稱筆者「打擊運動道德高地」、「沉迷自抬身價」(盧斯達 2020a)，是「心高氣傲的學界綠茶」(盧斯達 2020b)和「中國殖民者的知識界同路人」(盧斯達 2020c)。盧認為蘇哲安、兩位筆者以及黎明的先生鍾一諾對運動的「叛亂」，是「左翼在王座上的最後掙扎」，並藉此向所有「左翼」(當然包括女權主義者)放話：「反送中之後，其實左翼和自由派再不喜歡，都要選擇是不是要一往無前變成黎明何式凝。」(盧斯達 2020b)。這無疑對左翼和女權主義者來說是一種公然的威脅，也是女權主義者話語空間縮小的明證。這種針對左翼和女權主義者的污名化與威脅，和「女權L去咗邊」一樣屬於劃界的暴力，都是在為民粹神話中的「人民」定義邊界，並以針對仇敵的敵意強化邊界內的團結。

這些右翼本土派的大肆攻擊和公然威脅，竟也得到不少女權主義者的點讚和轉發，說明參與這種劃界暴力的不僅是運動中反女權或是对女權不甚了解的人，還有在這運動中處境岌岌可危的女權主義者們自己。女權主義者話語空間的縮小也絕不只是來自右翼本土派的攻擊，同樣來自女權主義者自身。

二、女權主義者對話語空間的規管

在反修例運動中的性別議題上，女權學者蔡玉萍與筆者之一的何式凝有著非常不同的視角，這種差異在一篇南華早報的訪談中可見一斑(Carvalho 2019)。在這篇報道中，蔡相信運動為女性提供了多於以往的參與機會，而這些經驗必會為她們賦權，使得她們感覺自己在社會中有所立足(I think all these experiences will certainly empower women, and make them feel they have a stake in society)。何在該訪談中主要指出的是運動具有男性化和父權的一

面，例如女性的性、性別和身體在運動中成為更易被攻擊的對象，而何自己就曾因天水圍事件經歷過此類暴力。¹⁸

這樣觀點上的差異其實並不奇怪，體現出的是雙方很不同的觀看角度。一個運動可以具有相當男性化和父權的特質，又同時為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參與機會。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凱瑟琳·貝露(Kathleen Belew 2018)就在她的著作 *Bring the War Home: The White Power Movement and Paramilitary America* (《將戰爭帶回家：白權運動與準軍事美國》)中指出過，女性的參與和貢獻對極右翼的發展居功至偉，雖然厭女和性別歧視在白人權力至上運動中也可謂十分突出。

原本這兩種不同的觀點可以互相補充互相借鑒，然而蔡卻在另一篇文章「『香港反送中運動很父權？』— 回應何式凝教授」中徹底取消了何的觀察視角(蔡玉萍 2019)。在將雙方觀點並置時，蔡首先對何的觀點進行了簡化和曲解：「我認為運動見證了女性的大規模參與，有助對女性公共參與的充權；但何教授則認為反送中運動是『男性化』及『父權』。」根據訪談內容(Carvalho 2019)，何的原話可以直譯為「這是一場男性化的也很父權的運動(It's been a masculine movement and very patriarchal)」。這和蔡所轉述的「反送中運動是『男性化』及『父權』(The movement is masculinization and patriarchy)」有著微妙但重要的差別。「運動是父權的(The movement is patriarchal)」和「運動是父權(The movement is patriarchy)」，一字之差有著天壤之別。後者沒有準確

18 2019年8月5日凌晨，一名少女在天水圍被警方逮捕時以走光的方式被當眾抬走(王譯揚等 2019)，何式凝當日與多人及多個團體(包括婦女團體)一起到天水圍警署發起聲援。聲援開始不久警察抓捕了約70人，此時網上突然出現謠傳，聲稱何在現場叫眾人站在原地任警察抓捕，何因而被網民稱為陷害義士被捕的「甲級戰犯」(<https://lihkg.com/thread/1418511/page/1>)。關於此事，何式凝自己的陳述發佈在 Discover Society (Ho 2019b)。

傳達何的原意，而是令人產生了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何式凝把運動等同於父權本身。「運動是父權」這樣的轉述在蔡的文中出現不止一次，但至今為止何所有的訪談和文章中都沒有出現過「運動是父權」這樣的表述。如此一來，問題就被引到了另一方向——究竟什麼才是父權？父權的定義是什麼？於是蔡開始在下文中探討父權的定義，並且認為何沒有用「嚴謹的理論分析框架及充足的論證」對待這個「嚴謹的問題」。

筆者關心的是，這樣的話語會為女權主義者的發言空間帶來怎樣的影響。這種近似概念偷換的轉述在話語空間中產生了一種收窄的效果，即，批評運動父權面向的聲音有機會被視為「把運動等同於父權本身」。這意味著，如果你批評運動中的父權現象，但同時不能像蔡一樣做48個訪問，不能像她一樣在英國社會學家希薇亞·沃爾比(Sylvia Walby 1989)的理論基礎上發展出一套四個維度的父權模型，你就是沒有嚴謹地對待「父權之定義為何」這個重大問題。¹⁹「運動是父權」是一個被建構的標靶，被安置在了何的身上，也可能被安置在任何其他提出類似批判的人身上。有嚴謹的定義固然值得肯定，但何式凝是在什麼背景下被批評沒有嚴謹的理論框架呢？這樣的批評只是建基於何在南華早報採訪(Carvalho 2019)中短短幾句話的回應，以及何在 GenderIT.org 的一篇反思性評論(Ho 2019a)，並非是在評論何的一篇學術期刊文章或是專題書籍。

蔡對何的另一個批評是認為她沒有進行充足的論證，然而何真正的觀點和論述在蔡的批評中是被隱沒的，從未進行過詳細的討論。例如她指何式凝對暴力「一刀切【地】批評」，但她是怎樣得出這個判斷的呢？蔡只以「據我觀察」一筆帶過，卻闡述了她

19 關於希薇亞·沃爾比(Sylvia Walby)提出的模型及其背後所代表的知識論、方法論體系存在的問題，學界對此是有所批判的，篇幅關係筆者暫且按下不表。

自己的不同意見：「我認為國家暴力和示威者的暴力反抗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因為兩者間存在著巨大的權力及武力不對等。」至此，讀者只能根據蔡的觀點在想象中逆向推導何的觀點——國家暴力和示威者暴力是等同的——但是何並沒有表達過這樣的觀點，甚至在自己文中重點提及來自國家的暴力是促使運動激進化的原因之一(Ho 2019a)。在自身論述被隱去的狀態下，何被呈現出一種不能區分制度化暴力與運動暴力的形象，這與她一直以來的學術路徑和立場是不相符的，但是這樣的形象卻可以使何作為學者的專業性也一並取消。²⁰ 雖然蔡之後有提及何觀察的一些例子，包括警嫂受到的性攻擊，大陸背景女士(疑似性工作者)在屯門公園被當眾羞辱，以及何親身經歷的天水圍事件，但也沒有提及何怎樣理解這些例子，卻再次將話題轉回了父權的定義：「但問題是，是不是這些行為的存在就足以判下『運動是父權』的結論？」筆者確實不知道怎樣才能判斷「運動是父權」，何也從未做出這樣的結論，哪怕是蔡的四維度模型也判斷不了這個偽命題。

女權主義者如果要對這場運動的父權面向提出批判，需要符合哪些條件呢？從蔡的文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三大門檻：1) 嚴謹的理論框架，2) 田野調查，3) 充足論證。充足論證這一點筆者是認同的，但如果原作者的論證在轉述中被隱藏甚至曲解，那再充足恐怕也沒有什麼用。理論框架和田野調查涉及到方法論與知識論層面的爭議，在此筆者沒有機會詳述，只想提出兩個問題：1) 如果一個女權主義者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對運動的父權面向進行觀察、反思和批判，是否她的發言就是無效的？2) 如果不是，我們可以從她的發言中獲得什麼？如果每一次批判和反思都需要以田野調查為前提(不清楚 48 這個數字屬不屬於門檻之一)，還必須提出完整的理論框架，知識生產的權威必然是被壟斷到部分人手中的——

20 此處強調的是蔡的論述方式造成的效果，而非強調蔡本人的動機意圖。

只有符合這些要求的人，他們的觀看視角和聲音才有資格進入公共空間，否則就會遭到取消。有趣的是，為何蔡玉萍在取消何式凝個人經驗的有效性時，就不需要拿出田野調查的精神去了解對方具體經歷了什麼呢？為何陳文珊(2020)沒有做過田野調查就可以發表她對運動的觀點卻不會被取消發言呢？如果這樣的高標準只被運用在何式凝和其他批評運動父權現象的女權主義者身上，這樣的雙重標準究竟是在為誰服務？

除了蔡的三大門檻，想要發表對運動的批判，還有其他的條件要符合。筆者之一的黎明(2020b)曾對運動中出現用「Faggot」²¹ 一詞攻擊警務處處長的事件提出過反思。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講師，同為性小眾的曹文傑(2020)隨即發文表示：「示威者使用歧視性或隱含貶抑小眾的字詞來羞辱警察，歸根究柢都是對公義的一種渴求，即使過程中有意無意延續和 / 或強化了貶抑小眾的論述。」他接著道：「我們可以徹底地不同意這種會強化恐同論述的手段，同時書寫評論時努力用文字表達理解，明白那份對尊嚴與公義的追求，以及被長期打壓與迫害下有怨無路訴的憤慨和怨恨。」

曹的論述具有典型的民粹神話色彩，即「抗爭者」代表追求正義的「人民」或「人民的拯救者」，在此前提之下，一切錯誤都值得被理解和原諒並放在「即使」後面。如果要發表對運動的不同意見，除了符合蔡的三大門檻，看來還需要「努力用文字表達理解」。曹也和蔡一樣隱去了對方實際表達的內容，致使讀者只能依靠他提出的建議來逆向推導原作者的表達，於是同樣產生了一個虛假的印象——原作者沒有表達對抗爭者的理解，不明白抗爭者對公義的追求——這同樣是在原文中找不到依據的。黎明曾於 2019 年 6 月 12 日與多人共同發起絕食明志行動，絕食 90 小

21 針對同志的侮辱性用詞。

時後不適送院(立場新聞 2019)，可見這樣的參與仍舊換取不了對運動表達反思的空間。

曹最後總結道：「好的社會學評論，至少在當前香港哀鴻遍野下的社會學評論，需要兼顧事情與心情……對社會運動保持恆常的批判固然重要，給予行動者足夠的同理，以此增加對方接收批評的能力也是不可忽略的功夫。……只說理不談情的評論會很容易被誤讀成對受害者的譴責，結果會進一步與行動者的『心』疏遠。」並在文章末尾加上了 #Connection_before_correction 的標籤。短短幾句話，在完全沒有呈現和審視過黎明具體表達的情況下，通過讀者的聯想，為其文蓋上了「不是好的社會學評論」的印章。在具體書寫內容被省略的情況下，黎明在讀者的聯想中呈現出一個遠離「人民」、不同情「人民」的形象，雖然曹以主張非暴力溝通聞名，但在民粹神話的語境下，這樣的話語意味著和攻擊性語言一樣暴力的劃界實踐。²²

筆者之一的黎明仍然記得自己來港後第一次被啓發使用性別的視角批判地觀看運動，是源於 2014 年在網上讀到的一篇時事短評(女同學社 2014)。文章對佔中運動的口號將爭取民主比喻為「長男香港」與「長女民主」的婚禮做出了批判，直指這是將異性戀婚姻家庭的角色延伸到公民行動上，體現了一種異性戀霸權式的「狹隘民主想象」。是這篇文章開啓了筆者身為女權主義者的批判之路，令人慚愧的是，筆者在批評恐同口號時的措辭口吻遠不及這篇短評直接和犀利。而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在 6 年後教導筆者寫作需要「兼顧事情與心情」才能寫出「好的社會學評論」的曹文傑。這樣的弔詭表現出的是，女權主義者的批判性書寫可以如何在民粹神話的全面掌管下被妥協。

22 暴力的是這種話語呈現的劃界實踐，而非說話者本人。

連結先於指正(#Connection_before_correction)，這幾個字也高度概括了民粹運動中女權主義者的處境與行動宗旨。曹發佈在臉書的原帖得到了不少點讚與轉發，其中不乏女權主義者。他所提出的 #Connection_before_correction 這一口號也被多人沿用，其中一位香港知名女權學者²³在其臉書貼文中表明自己是受曹的啓發，並提出：「無論是什麼 L²⁴，記住要 be water，不割席，放下 L 的堅硬屬性，做柔軟、溫暖和深入的 V²⁵。」民粹神話中的團結再一次被高舉，看似對女性的性徵使用溢美之詞，實則將「抗爭者」面前的所有人與女性陰柔特質緊緊捆綁在了一起。為何這樣的勸諭不會放在勇武抗爭者身上，也不會用在使用恐同話語的抗爭者身上，卻只用在對運動提出批判的人身上？為什麼提出批判的人就不再屬於可以被豁免的「抗爭者」，而突然被分派了具有本質化(Essentialized)傾向的性別特質與性別角色？「人民」是一個性別化的概念，這一點在其話語中得到了凸顯。

即便同為女權主義者，劃界的暴力依然在實行著，用各樣的名目將「抗爭者」不愛聽，「人民」不想聽的聲音取消，甚至在女權主義者內部進一步劃出他者。另一位香港知名女權學者²⁶在筆者轉發了蘇哲安的一篇文章(蘇哲安 2020b)之後，於自己的臉書發帖中暗示筆者(或許也包括蘇哲安)令性別研究和女權主義「成爲笑柄」。這樣的話語正是在將筆者放置在被劃界的利劍之下，也與右翼本土派對蘇哲安以及筆者所行使的劃界暴力形成了耐人尋味的呼應，其作用絕不會僅限於發帖者的友人範圍。右翼本土派意見領袖盧斯達曾在臉書上公開表示「【何式凝】唔只影衰香港人亦影衰其他非何式凝類型的女性主義者」。

23 其發帖設置為友人可見，因而我們不便透露其身份。

24 即然，男性生殖器。

25 即 Vagina，女性生殖器。

26 其發帖設置為友人可見，因而我們不便透露其身份。

「影衰」這個粵語口語表達的意思是「好的人被不好的人拖累，使得好的人形象受損」，從中我們可以再次窺見民粹神話的劃界運作。無獨有偶，臉書上可以找到一個名叫「何式凝不代表我」的專頁，專頁發起人明確表示自己女權主義者的身份並宣佈與何式凝切割，也為這種劃界暴力做了一個殘酷的注腳。

縱觀以上各女權主義者的發言，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女權主義者如果要發表對運動的批判，她必須有嚴謹的理論框架，進行田野調查，提供充足論證，還要努力用文字表達對抗爭者的理解。她不能割席，但卻隨時可以被割席，更要成為「柔軟、溫暖和深入的V」。而所有這些標準的評判都是靈活而模糊的，只會重點施加在提出了異議的人身上。以上所有針對兩位筆者的「討論」，如果還能算是討論的話，都沒有基於原作者的觀點和論述本身，甚至將其隱沒，以引發聯想的方式生產出暗示。這樣的討論，效果並不在於聽見和理解批判運動的聲音，而是將其取消。為什麼要取消？取消是以誰為服務對象？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不管動機為何——個人動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樣的話語和劃界實踐所帶來的效果：取消了值得關注探討的現象，或是延遲其被正視的時機；維護了運動的進步性，遮蓋了運動與女權主義者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與右翼本土派的聲音形成共謀。女權主義批判者的聲音要不被取消地進入運動的話語空間，還要不因此被劃出界外，其難度遠勝駱駝穿過針眼，所以天國注定不是他們的。²⁷

在一次次被忽視被追打被召喚又被遺忘的過程中，女權主義者們仿佛經歷著一場無盡的家暴，卻不斷更努力地向父權家長或伴侶證明自己在家中的價值。對於經歷家暴的個體來說，家暴並非只是關於肢體暴力，更是形成了一種強制性支配(Coercive control)(Stark 2007)。女權主義者們或許在現實層面上沒有面對家暴經

27 源自《聖經》馬太福音 19：24。

歷者所面對的那種切身的生存危機，但他們會面臨網絡言語的暴力以及被從運動中切割出去的劃界暴力，這事實上是一種身份危機——喪失「人民」、「人民拯救者」和「同路人」身份的危機。在這樣的危機下，他們中有些人內化了運動的捆綁式或強制性團結(Coercive solidarity)(何式凝 2019；Ho 2020)，將劃界的暴力延伸到了和他們意見不一致的女權主義者身上。

女權主義的中心關懷始終圍繞著權力關係，不僅關注外在強制性(Coercive)的權力關係，也關注內化了(Internalized)的權力關係。而筆者所經歷和觀察到的，是女權主義者與強制性權力機制的共謀。看見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強制性權力正是警察(Police)這個概念的核心。因而我們看見的是一種自相矛盾的情狀——人們反對警察暴力卻內化了某種強制性的態度，以此監察(Police)他人的觀點和表達。而這種內化了的強制態度，最終構成了一種自下而上的普遍意義上的「警察體系(Police system)」。女權主義者，出於他們對家庭暴力、性暴力、親密關係暴力等各種類型暴力的關注，本應對這樣的權力關係運作最具有敏感度。可惜，他們也參與到了這個自下而上的警察體系(Police system from below)²⁸的形成過程之中。

女權主義者的敗北

經過一系列的分析，我們來到一個無可回避的結論，就是必須直面卻一直被掩蓋的女權主義者的敗北。這敗北是如此的徹底，從對民粹神話的照單全收，到女權公司化的效益策略，無一不是與女權主義的批判性背道而馳。女權主義者不僅周而復始地成為

28 此語靈感取自 Verónica Gago 的著作 *Neoliberalism from Below: Popular Pragmatics and Baroque Economies* (《源自下層的新自由主義：大眾語用學與巴洛克經濟》，2017)。

劃界的對象，更內化了運動中的劃界暴力，與之形成一種共謀關係，參與形成了一個讓自我批判難以發生的空間。

在激烈的劃界實踐與排斥性政治的運作過程中，總是會形成一個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人民」概念，而這個「人民」不可避免地總是性別化的。女性和女權主義者的身份，提供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觀看視角，見證這個性別化的「人民」的產生(如「手足」和「兄弟爬山」)²⁹，以及基於性別的分工、等級如何劃下界綫(如「前線巴」和「後勤絲」)³⁰。厭女情節(Misogyny)與反女權主義(Anti-feminism)在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的民粹主義中本就十分常見(Bonikowski 2017)，女性與女權主義者經常成為多種政治形式的劃界對象。在反修例運動中，女性和女權主義者也時常是被劃分出去的他者或者被分派基於性別之「份內事」的對象，這個「份內事」的分派本身就帶有典型的父權色彩。就譬如象徵反修例運動的勇武民主女神像，哪怕穿著勇武裝，扛著抗命旗幟，腰間也要掛一個帶有紅十字記號的腰包，象徵其後勤醫護的角色。這正是反映著對照護與支援工作的女性化(Feminization)，以及一種本質化的(Essentialized)陰柔特質(Femininity)，以性別化的符號為不平等的性別分工背書。又譬如孕婦被拉倒就一定是女權主義者的「份內事」，這同樣反映的是一種基於性別的分工，而「女權L去咗邊」這樣的召喚本就帶有對女權主義者的敵意，絕不僅僅是普通的行蹤詢問。提出這些觀察無關乎陳文珊(2020)所說的「為運動定性」，而是揭示出性別分工在運動中的無所不在，這難道不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嗎？如果連這些細微之處都不去看見與探討，何來所謂的轉化？

29 手足和兄弟都是在中文語境中具有明顯性別意涵的詞語，而這些用語被廣泛用於指稱抗爭者。

30 巴是 Brother 的音譯，絲是 Sister 的音譯。

然而，香港的女權主義者們似乎看不見自己身份所帶來的視野，或者是不想看見(覺得不是優先考量)，又或者是不能看見(避免被劃出界外)。因而，這樣的觀看視角並沒有帶來針對運動以及「人民」這一概念的深入批判，甚至有女權學者說：「這次運動的象徵 Lady Liberty 是以女體形式呈現，肯定了女性在運動中的參與。」(蔡玉萍 2019)原句中的主語是缺失的，因而我們無法立刻辨識蔡認為是誰「肯定了女性在運動中的參與」，但這個例子在上下文中是用來證明運動的文化層面「不是一面倒複製父權的符號」，因此我們可以推論，被蔡視為「肯定了女性在運動中的參與」的，是運動。暫且不論周蕾(Chow 2001)早已批判過六四學運民主女神像對女性身體的使用，難道女性和女權主義者的參與是在追求運動的肯定嗎？難道我們應該為獲得了運動的肯定而感到鼓舞嗎？這其中被默認的權力關係在女權主義者的語言中被表達出來，是女權敗北最突出的「病徵」。

與這種「看不見」同時發生的，是周而復始針對女權主義者的劃界，但這種不斷在邊緣輪回的經驗仍舊沒有喚醒女權主義者們。香港女權主義者在運動中所經驗的一切——不斷被劃界卻不斷將女權的議題妥協，將議題的優先性給予運動及其民粹敘事，成為服務運動、包裝運動的工具——是一種歷史性的反覆，也是對自身發展歷史的壓抑。我們困在一個不斷倒置的沙漏中，永遠走不出時間的閉環。在循環往復中，閉環內的循環歷史取代了閉環外的歷史記憶，彷彿歷史上對民族主義各種問題的揭示——尤其是有關性別的問題——從未發生過。彷彿維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從未在《三枚金幣》(Three Guineas 1938)中追問過，在一個民族主義高漲的父權社會中女人的國家究竟在哪裏。彷彿米歇爾·華利斯(Michele Wallace 1979)從未抨擊過黑人群體的民族主義與性別宰制。彷彿奧菊·羅德(Audre Lorde 1983)從未寫下這樣的語句：「我負擔不起只對抗一種壓迫的奢侈(I cannot afford

the luxury of fighting one form of oppression only)。」

爲什麼我們無法看見歷史，甚至壓抑歷史對我們的啓示？爲什麼我們只懂得用當下的隱喻、政治術語和意識形態消費歷史，挪用歷史，擦寫歷史？爲什麼我們盡情地擁抱這個性別化的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人民」，對其不敢有絲毫怠慢？爲什麼我們承受並再生產了劃界的暴力，與之形成共謀？爲什麼由右翼主導的民粹敘事會成爲不容置疑的標準答案和決定所有議題優先順序的根據？這是筆者對敗北的女權主義者們(包括筆者自己)的追問。真正需要女權主義者們回應的，不是「女權 L 去咗邊」，而是女權的視角和議題到底去了哪兒？

轉化唯有來自自我批判，所有的革新首先來自自我的革新。如果女權主義追求的是父權制度的轉化，性別關係的轉化，以及社會整體的轉化，那麼自我批判在女權公司化及劃界暴力中被徹底排除的情況下，轉化真的有發生的可能嗎？當民粹神話裹挾著衆人一起走向命運預設的結局，存在一種無形的力量試圖控制或規訓轉化的發生，而沉默的、視而不見的、沉醉於上市融資的、甚至幫忙壓制異見的敗北女權主義者們，包括筆者自己，都曾經或正在與這股力量共謀。一個結局被預設因而也極其具有父權色彩的運動神話，是難以與一個不斷轉化的、非預設的、開放式的想象相兼容的。後者的結局無法預設也因而允許了更平等的權力關係和更多的可能性。如何做出選擇，敗北的女權主義者們需要重新思考什麼才是女權的中心議題和關懷。

後記

筆者與蘇哲安的相識源自 2020 年 3 月。當時筆者機緣巧合看到了他在臉書書寫的一段有關香港反修例運動中事件的評論，立刻被他的觀點與論述所吸引，從此成就了一段「三個死左膠」³¹的「孽緣」(笑)。在充滿了民粹神話敘事的公共空間中，筆者早已見慣了萬事以運動爲首，小批評大幫忙，用詞極度謹慎小心，不斷自我審查與閹割的書寫，而蘇哲安的分析筆觸與批判口吻對筆者來說可謂令人眼前一亮。更重要的是，他對於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和殖民主義鏗而不捨的批判，實在給我們帶來了莫大的啓發，也讓我們窺見自己對自身、對歷史、對地緣政治、對知識生產體系的認知存在極大的盲點，以及這種盲點與殖民性之間緊密的關聯。我們自己何嘗不是這篇(超長)序言中所描繪的敗北的女權主義者呢？我們也曾幻想過女權議題能夠藉運動之力發揚光大深入人心，也曾努力地想要將女權議題工具化，將女性和女權的掙扎納入到一個「更高的理念(Greater cause)」的麾下爲之服務，也曾一次次地嘗試向運動的「人民」證明女性和女權從未在民主運動中缺席……因而筆者並不能自外於本文所批判的「敗北的女權主義者」，這並不是一篇要劃分出敗北和不敗北兩個陣營的文章。直到我們經歷了殘酷的劃界暴力——不僅來自運動更來自其他的女權主義者，我們才開始有機會回看自己走過的路究竟伸向了何等歧途。蘇哲安的文字對缺乏相關學科背景的人來說有些艱深，但卻實實在在地爲我們的自我批判與反思提供了一條突圍的路徑和有用的工具。多少個日夜，我們反覆閱讀和討論他的書稿，才能夠循著他對左翼敗北的分析看見女權的敗北。本文的寫作過程同

31 蘇哲安因批評袁國勇的殖民種族主義言論而被香港運動支持者群起攻之，當時只有筆者二人轉發點讚過他的文章，且沒有公開與之割席，蘇、何、黎隧被網民稱爲「香港僅剩的三個左膠」。對此殊榮筆者實在倍感榮幸。

樣得到他許多寶貴的建議與回應，感激之情難以言表。因此，我們希望透過這個非典型序言來回應他給我們帶來的非一般啟發，也希望以此邀請更多人來了解他的思想、觀照與情懷，使得他在我們身上促成的反思與自我批判可以在更廣泛的時空發生，在我們無法預計的未來，帶來更多轉化與革新的可能。

黎明

何式凝

2020年12月8日

中文書目

以下連結 12/10/20 當天全部確認仍有效。部分被刪除的連結建議到以下網頁搜尋備份版：<https://archive.org/web/>。為了節省版面與印刷費用，凡是臉書貼文的截圖均被省略，敬請見諒。

鄧正健 2020，〈族群不應自我封閉，但也不能自出自入〉，《獨立媒體》，2/25/20，<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71038>。

團體 / 議員 / 個人 致警務處處長公開信（聯署）2020，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5p3UEjQCAu_gsy1O7znJj7FDnfSRHZYBWhOI3-5oujOAmnA/viewform。

蔡玉萍、郭子盈 2020，〈女權去咗邊？〉，《立場新聞》9/7/20，<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923154212/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E5%A5%B3%E6%AC%8A%E5%8E%BB%E5%92%97%E9%82%8A/>

蔡玉萍 2019，〈「香港反送中運動很父權？」— 回應何式凝教授〉，《立場新聞》12/23/19，<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1205124238/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9%A6%99%E6%B8%AF%E5%8F%8D%E9%80%81%E4%B8%AD%E9%81%8B%E5%8B%95%E5%BE%88%E7%88%B6%E6%AC%8A-%E5%9B%9E%E6%87%89%E4%BD%95%E5%BC%8F%E5%87%9D%E6%95%99%E6%8E%88/>

蘋果日報，2020，〈【抗暴之戰】12 婦女平權團體與逾百區議員聯署 促 PK 鄧向遭警暴女童孕婦道歉兼處分警員〉，《蘋果日報》9/11/20，<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00911/NPNGURWUPRF7XPEZCIDN4SHU24/>。

何式凝，2019，〈香港女權主義者的「時代革命」〉，《蘋果日報》11/27/19，<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191127/WBRZPBAGIZDXO2H7ZVGVQFROU/>。

黃之鋒，2020，〈週日話題：議會過半想像以「國際攪炒」反制「臨立會 2.0」〉，《明報副刊》3/29/20，<https://news.mingpao.com/pns/%E5%89%AF%E5%88%8A/article/20200329/s00005/1585420247924/%E5%91%A8%E6%97%A5%E8%A9%B1%E9%A1%8C-%E8%AD%B0%E6%9C%83%E9%81%8E%E5%8D%8A%E6%83%B3%E5%83%8F-%E4%BB%A5%E3%80%8C%E5%9C%8B%E9%9A%9B%E6%94%AC%E7%82%92%E3%80%8D%E5%8F%8D%E5%88%B6%E3%80%8C%E8%87%A8%E7%AB%8B%E6%9C%832-0%E3%80%8D>。

陳倩兒，2020，〈專訪黃之鋒：國際攪炒加速，如何在大國角力下謀香港利益？〉，《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530-hongkong-joshua-wong-chi-fung/>。

- 趙蒙暘 (夕岸) 2019, 〈時代遊戲〉, 《Matters》, 10/10/19, <https://matters.news/@zoezhao/%E6%99%82%E4%BB%A3%E9%81%8A%E6%88%B2-zdpuAvDCA9LjirBxRY3xP75eZYZ7CPMTXu6U38mrGwQ1F2cHi>。
- 戴耀廷 2020, 〈真攞炒十步 這是香港宿命〉, 《蘋果日報》, 4/28/20, <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00428/MTCUWRHKCIZT2RjXAUP6W4TNXA/>。
- 我要攞炒 2020, 〈攞炒巴:但願從此只有重光派〉, 《立場新聞》5/9/20,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6%94%AC%E7%82%92%E5%B7%B4-%E4%BD%86%E9%A1%98%E5%BE%9E%E6%AD%A4%E5%8F%AA%E6%9C%89%E9%87%8D%E5%85%89%E6%B4%BE/>。
- 許寶強 2019, 〈「我要攞炒」的情感政治——於自由之夏讀《酒神的抗爭》〉, 《立場新聞》, 9/13/19, <https://www.thestandnews.com/book/%E6%88%91%E8%A6%81%E6%94%AC%E7%82%92-%E7%9A%84%E6%83%85%E6%84%9F%E6%94%BF%E6%B2%BB-%E6%96%BC%E8%87%AA%E7%94%B1%E4%B9%8B%E5%A4%8F%E8%AE%80-%E9%85%92%E7%A5%9E%E7%9A%84%E6%8A%97%E7%88%AD/>。
- 文維廣 2020, 〈鄭松泰生日食美心蛋糕握蠱 鄭錦滿護航:個蛋糕我揀〉, 《香港01》11/5/20, <https://www.hk01.com/%E6%94%BF%E6%83%85/545185/%E6%94%BF%E5%A3%87%E8%AB%B8%E4%BA%8B%E7%94%BA%E4%B8%A8%E9%84%AD%E6%9D%BE%E6%B3%B0%E7%94%9F%E6%97%A5%E9%A3%9F%E7%BE%8E%E5%BF%83%E8%9B%8B%E7%B3%95%E6%8D%B1%E8%BD%9F-%E9%84%AD%E9%8C%A6%E6%BB%BF%E8%AD%B7%E8%88%AA-%E5%80%8B%E8%9B%8B%E7%B3%95%E6%88%91%E6%8F%80>。
- 林勵 2020, 〈梁繼平籲勿傳大選失實訊息 張崑陽拆解流言遭責難 袁爸爸堅持相信錯誤訊息〉, 《眾新聞》, 11/5/20,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35352/%E6%A2%81%E7%B9%BC%E5%B9%B3-%E5%A4%A7%E9%81%B8-fact_check-35354/%E6%A2%81%E7%B9%BC%E5%B9%B3%E7%B1%B2%E5%8B%BF%E5%82%B3%E5%A4%A7%E9%81%B8%E5%A4%B1%E5%AF%A6%E8%A8%8A%E6%81%AF-%E5%BC%B5%E5%B4%91%E9%99%BD%E6%8B%86%E8%A7%A3%E6%B5%81%E8%A8%80%E9%81%AD%E8%B2%AC%E9%9B%A3-%E8%A2%81%E7%88%B8%E7%88%B8%E5%A0%85%E6%8C%81%E7%9B%B8%E4%BF%A1%E9%8C%AF%E8%AA%A4%E8%A8%8A%E6%81%AF。
- 袁國勇、龍振邦 2020, 〈大流行緣起武漢 十七年教訓盡忘〉, 《明報》3/18/20,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6%91%98/article/20200318/s00022/1584457829823/%e5%a4%a7%e6%b5%81%e8%a1%8c%e7%b7%a3%e8%b5%b7%e6%ad%a6%e6%bc%a2-%e5%8d%81%e4%b8%83%e5%b9%b4%e6%95%99%e8%a8%93%e7%9b%a1%e5%bf%98%ef%bc%88%e6%96%87-%e9%be%8d%e6%8c%af%e9%82%a6-%e8%a2%81%e5%9c%8b%e5%8b%87%ef%bc%89>。

- 蘇哲安 2020a, 〈懇請香港大學查究並譴責殖民種族歧視〉, <https://www.change.org/p/president-s-office-university-of-hong-kong-call-on-hku-to-investigate-and-condemn-colonial-racism>。
- 蘇哲安 2020b, 〈回應馮晞乾—從翻譯到父權〉, 《Matters》, 3/30/20, <https://matters.news/@Areality/%E5%9B%9E%E6%87%89%E9%A6%AE%E7%9D%8E%E4%B9%BE-%E5%BE%9E%E7%BF%BB%E8%AD%AF%E5%88%B0%E7%88%B6%E6%AC%8A-bafyreiejlm7xeufkkrcijpd7qrw7lxxhthx53hczd5mvjtmksifyi>。
- 馮晞乾 2020a, 〈請法國學者撤回言論〉, 《蘋果日報》, 3/24/20, <https://hk.appledaily.com/columnist/20200324/MMCT2AJNIPG63Y4GCWNM4XI2Z4/>。
- 馮晞乾 2020b, 〈蘇哲安必須向袁國勇道歉〉, 《蘋果日報》, 3/27/20, <https://hk.appledaily.com/columnist/20200327/UPADHW3N3MKWKZMP6TGFJG5SWA/>。
- 馮晞乾 2020c, 〈給蘇哲安教授的挑戰信〉, 《蘋果日報》, 3/29/20, <https://hk.appledaily.com/columnist/20200329/RCHTSCBBE313KRFNFABK23DW7I/>。
- 陳文珊 2020, 〈父權革命 vs 女權時代——如何為香港反送中運動定「性」?〉, 《公民行動》, 4/27/20,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93999>。
- 佳奇 2020, 〈當性成為政治工具 專訪教授何式凝:性暴力,是用羞恥感摧毀我們的意志〉, 《性別力》, 10/3/19,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21416>。
- 侯彩琳 2020b, 〈【新冠肺炎】社協:逾百間食肆涉拒接待內地人 籲修改歧視條例〉, 《香港01》3/5/20,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443604/%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7%A4%BE%E5%8D%94-%E9%80%BE%E7%99%BE%E9%96%93%E9%A3%9F%E8%82%86%E6%B6%89%E6%8B%92%E6%8E%A5%E5%BE%85%E5%85%A7%E5%9C%B0%E4%BA%BA-%E7%B1%B2%E4%BF%AE%E6%94%B9%E6%AD%A7%E8%A6%96%E6%A2%9D%E4%BE%8B>。
- 王譯揚、呂諾君、朱雅霜 2019, 〈【8.5天水圍】女示威者遭制服抬走持續走光 警:她穿裙激烈掙扎〉, 《香港01》, 8/5/19, <https://www.hk01.com/%E7%A4%81%E7%99%BC/360091/8-5%E5%A4%A9%E6%B0%B4%E5%9C%8D-%E5%A5%B3%E7%A4%BA%E5%A8%81%E8%80%85%E9%81%AD%E5%88%B6%E6%9C%8D%E6%8A%AC%E8%B5%B0%E6%8C%81%E7%BA%8C%E8%B5%B0%E5%85%89-%E8%AD%A6-%E5%A5%B9%E7%A9%BF%E8%A3%99%E6%BF%80%E7%83%88%E6%8E%99%E6%89%8E>。
- 黎明 2019, 〈批評「警嫂3P」的口號=強化女性污名?〉, 《立場新聞》, 12/3/19,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6%89%B9%E8%A9%95-%E8%AD%A6%E5%AB%82-3p-%E7%9A%84%E5%8F%A3%E8%99%9F-%E5%BC%B7%E5%8C%96%E5%A5%B3%E6%80%A7%E6%B1%A1%E5%90%8D/>。

黎明 2020a, 〈疫情恐慌與公共話語生態：一個批判性的觀察〉,《立場新聞》, 2/2/20,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E7%96%AB%E6%83%85%E6%81%90%E6%85%8C%E8%88%87%E5%85%AC%E5%85%B1%E8%A9%B1%E8%AA%9E%E7%94%9F%E6%85%8B-%E4%B8%80%E5%80%8B%E6%89%B9%E5%88%A4%E6%80%A7%E7%9A%84%E8%A7%80%E5%AF%9F/>。

黎明 2020b, 〈從怒讚「Faggot」看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立場新聞》, 5/11/20,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BE%9E%E6%80%92%E8%AE%9A-faggot-%E7%9C%8B%E9%80%99%E5%80%8B%E7%A4%BE%E6%9C%83%E7%9A%A8%4%E6%A0%B8%E5%BF%83%E5%83%B9%E5%80%BC/>。

黎明 2020c, 〈說著普通話, 等待一個不曾謀面的人〉,《立場新聞》, 2/24/19, <https://matters.news/@dearasuka/%E8%AA%AC%E8%91%97%E6%99%AE%E9%80%9A%E8%A9%B1-%E7%AD%89%E5%BE%85%E4%B8%80%E5%80%8B%E4%B8%8D%E6%9B%BE%E8%AC%80%E9%9D%A2%E7%9A%84%E4%BA%BA-bafyreibq7ugli4awn4epaf6wdfvubu5426axzdudep5dulrk6yfmukzi。>

黎明 2020d, 〈從話語分析看日常困境：「大陸人」所經歷的歧視長什麼樣?〉,《Matters》, 2/4/20, <https://matters.news/@dearasuka/%E5%BE%9E%E8%A9%B1%E8%AA%9E%E5%88%86%E6%9E%90%E7%9C%8B%E6%97%A5%E5%B8%B8%E5%9B%B0%E5%A2%83-%E5%A4%A7%E9%99%B8%F4%BA%BA-%E6%89%80%E7%B6%93%E6%AD%B7%E7%9A%84%E6%AD%A7%E8%A6%96%E9%95%B7%E4%BB%80%E9%BA%BC%E6%A8%A3-zdpAogekL3ypXoUEuDKVvwpc7iK5FDQXoiNaoC7aHkuSgWYX。>

黎明 2020e, 〈有所不為的反叛者〉,《立場新聞》, 4/8/20,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6%9C%89%E6%89%80%E4%B8%8D%E7%82%BA%E7%9A%84%E5%8F%8D%E5%8F%9B%E8%80%85/>。

盧斯達 2020a, 〈黎明狙擊光榮冰室, 是打擊運動道德高地還是太沉迷自抬身價?〉,《立場新聞》, 2/28/20,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9%BB%8E%E6%98%8E%E7%8B%99%E6%93%8A%E5%85%89%E6%A6%AE%E5%86%B0%E5%AF%A4-%E6%98%AF%E6%89%93%E6%93%8A%E9%81%8B%E5%8B%95%E9%81%93%E5%BE%B7%E9%AB%98%E5%9C%B0%E9%82%84%E6%98%AF%E5%A4%AA%E6%B2%89%E8%BF%B7%E8%87%AA%E6%8A%AC%E8%BA%AB%E5%83%B9/>。

盧斯達 2020b, 〈學棍一路走一路屌, 是至智之禍, 亦長期包庇者之亂〉,《方格子》, 4/10/20, <https://vocus.cc/27708/5e9083f8fd89780001cb03fd。>

盧斯達 2020c, 〈黎明何式凝等人的幾個問題 — 無法適應真實, 我執太盛的負氣哀鳴〉,《立場新聞》, 3/3/2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318151534/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E9%BB%8E%E6%98%8E%E4%BD%95%E5%BC%8F%E5%87%9D%E7%AD%89%E4%BA%BA%E7%9A%84%E5%B9%BE/>

E5%80%8B%E5%95%8F%E9%A1%8C-%E7%84%A1%E6%B3%95%E9%81%A9%-E6%87%89%E7%9C%9F%E5%AF%A6-%E6%88%91%E5%9F%B7%E5%A4%AA%E7%9B%9B%E7%9A%84%E8%B2%A0%E6%B0%A3%E5%93%80%E9%B3%B4/

立場新聞 2019, 〈【反送中】絕食反惡法 教大講師黎明堅持近 90 小時後不適送院〉,《立場新聞》, 6/15/19,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8F%8D%E9%80%81%E4%B8%AD-%E7%B5%95%E9%A3%9F%E5%8F%8D%E6%83%A1%E6%B3%95-%E6%95%99%E5%A4%A7%F8%AC%9B%E5%B8%AB%E9%BB%8E%E6%98%8E%E5%A0%85%E6%8C%81%E8%BF%91-90-%E5%B0%8F%E6%99%82%E5%BE%8C%E4%B8%8D%E9%81%A9%E9%80%81%E9%99%A2/>。

女同學社 2014, 獨立媒體, 〈時事短評: 民主嫁香港 -- 「長男香港」與「長女民主」?〉,《獨立媒體》, 9/26/14,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26511。>

許尚 2019, 〈專訪《寫給左翼民粹主義》譯者楊天帥: 政治敵人與民粹之必要〉,《虛詞》, 11/21/19, <http://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1139.html。>

英文書目

Saved versions of broken links can often be found by checking the Wayback Machine: <https://archive.org/web/>。

Belew, Kathleen. 2018. *Bring the War Home: The White Power Movement and Paramilitary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nikowski, Bart. 2017. "Ethno-nationalist Populism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Collective Resentmen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8: S181-S213.

Buckley, Chris and Austin Ramzy. 2014. *Hong Kong Protests Are Leaderless but Orderly*. The New York Times 30 September 2014. <https://www.nytimes.com/2014/10/01/world/asia/in-hong-kong-clean-and-polite-but-a-protest-nonetheless.html>.

Carvalho, Raquel. 2019. #ProtestToo: the women at the forefront of Hong Kong's anti-government movemen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1 August 2019. <https://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3025146/protest-too-women-forefront-hong-kongs-anti-government-movement>.

Casullo, Maria Esperansa. 2020a. "Populism and Myth." Eds. E Eklundh and A Knott. *The Populist Manifesto*.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5-38.

- Casullo, Maria Esperansa. 2020b. "Populism and myth: crafting explanations for uncertain times." Keynote Speech 1, the 4th Populism Specialist Group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workshop. "The 'Populism Moment': Temporality, Transformations, Crises." <https://www.facebook.com/populismgroup/videos/676859479589260>.
- Choi, Susanne Y. P, Lai, Ruby Y and Pang, Javier C. L. 2020. "Gender Irrelevance: How Women and Men Rationalize their Support for the Right."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45(2). 473-496.
- Collins, Patricia Hill. 1990.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Collins, Patricia Hill. 2019. *Intersectionality as Critical Social The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how, Rey, 2001. "Violence in the Other Country: China as Crisis, Spectacle, and Woman." Ed. Herrmann, A. *Theorizing Femin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DOI: 10.4324/9780429494277.
-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 (1977). First published as "A Black Feminist Statement." Ed. Zillah Eisenstein (1978).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10 – 18.
- Chung, Roger. Y. N., and Minnie M Li. 2020. "Anti-Chinese sentiment during the 2019-nCoV outbreak." *The Lancet* 395: 10225. 686–687. DOI: 10.1016/S0140-6736(20)30358-5.
- Gago, Verónica. 2017. Tr. Liz Mason-Deese. *Neoliberalism from Below: Popular Pragmatics and Baroque Economies*.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Garfinkel, Simon. 2003. "Leaderless resistance today". *First Monday* 8:3 (3 March 2003). DOI: 10.5210/fm.v8i3.1040. Retrieved May 7, 2006.
- Ho, Sik Ying Petula 2019a. "Where Is Feminism in the Hong Kong Protests?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GenderIT*. Retrieved December 5, 2020. <https://www.genderit.org/feminist-talk/where-feminism-hong-kong-protests-issues-context-anti-extradition-movement?fbclid=IwAR1EB651Uob9wxEPzCjtxKsQ8zentuMBt6F2RZ2Jjg4KvqoBcU3B4IFwNtE>.
- Ho, Sik Ying Petula. 2019b. "On the Frontline: The Hong Kong Protests – On Being in and against the Crowd." *Discover Society*. Retrieved December 5, 2020. <https://discoversociety.org/2019/10/02/on-the-frontline-the-hong-kong-protests-on-being-in-and-against-the-crowd/>.
- Ho, Sik Ying Petula. 2020. "Queering the Valiant: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Hong Kong Protest Movement." *Feminista Journal*. [https://feministajournal.com/queering-](https://feministajournal.com/queering-the-valiant-an-alternative-perspective-on-the-hong-kong-protest-movement/)

- [the-valiant-an-alternative-perspective-on-the-hong-kong-protest-movement/](https://www.feministajournal.com/queering-the-valiant-an-alternative-perspective-on-the-hong-kong-protest-movement/).
- Laclau, Ernesto. 2005.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 Lam-Knott, Sonia. 2020. "The Immanent Frame." <https://tif.ssrc.org/2020/02/26/populism-in-hong-kongs-contemporary-politics/>.
- Lee, Francis L.F. and Chan, Joseph M. 2018. *Media and Protest Logics in the Digital Era: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orde, Audre. 1983. "There is no hierarchy of oppressions." *Bulletin: Homophobia and Education*. New York: Council on Interracial Books for Children. 9.
- Lin, Yao. 2020. "Beaconism and the Trumpian Metamorphosis of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 – 17. DOI: 10.1080/10670564.2020.1766911.
- Lo, Alex. 2019. "Protest movement is more populist than pro-democrac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2 December 2019.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043155/hong-kong-protest-movement-more-populist-pro-democracy>.
- Sheng, Andrew and Xiao, Geng. 2019. "Hong Kong's protests a populist movement of self-harm." *Financial Review* 13 August 2019. <https://www.afr.com/world/asia/hong-kong-s-protests-are-a-populist-movement-of-self-harm-20190813-p52gkr>.
- Stark, E. (2007) *Coercive Control: The entrapment of women in personal life*.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 Xinqi and Victor Ting. 2019. Hong Kong's 'leaderless' protest movement looks to minimise public's wrath through peaceful and organised non-coopera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3 June 2019.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15688/hong-kongs-leaderless-protest-movement-looks-minimise>.
- Wallace, Michele. 1979. *Black Macho and the Myth of the Superwoman*. New York: Dial Press.
- Walby, Sylvia, et al. 2012. "Intersectionality: Multiple Inequalities in Social Theory." *Sociology (Oxford)* 46:2. 224 – 240.
- Woolf, Virginia. 1938. *Three Guinea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all links were live as of 12/10/20.

第一章：邊界與敗北

一道前線

2019年發生在香港並延續迄今的抗議運動——即「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anti-ELAB movement; 下文簡稱「反修例運動」或「反送中運動」)在國際上的激辯中，因其國際地緣政治與左翼反帝國主義立場的意義而成為焦點。雖然眾說紛紜，可是評論者幾乎清一色預設了同樣明確的地理單位作為依據。換言之，就政治構成 (political composition) 的面向而言，這場辯論無論是以中文、英文或法文呈現，基本上都以既有的國際邊界為框架。根據此框架，對香港的描述一直延續著一個半世紀以來的慣例，將香港定義為一個前哨、一個文明間的互動區、一個夾縫生存、中西合璧的地方。正因如此，這場運動的關鍵，也就是劃界的行為，要麼被完全忽視，要麼被納入其他諸如身分認同、主權、自由等議題而被分散和遮蓋。相對於一些評論者將香港看成是個對抗諸如集權主義、監控式資本主義或數位獨裁等強權形式的全球性鬥爭的前線，這篇短論欲闡明：香港確乎是一道「前線」，但卻是在完全不同的意義上：其成為「前線」的原因，正是因為劃界實踐 (bordering

practices) 早已構成了當下全球政治局勢的核心。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葉蔭聰描述：

香港新一波的本土社運主義就是一種打造族群統治之治理主體 (ethnocratic governing subject) 的計畫，承載著管控這個都市與中國之間各種想像與物理邊界的令式 (imperative)。該令式的核心就是一種管理人口流動的生命政治意志」 (Ip 2020, 54)。

本文主張，這種牽涉邊界的生命政治，並非只出現在香港，而是當前全球規模最大且最為普遍的挑戰。在經濟國族主義逐漸成為世界各地政治主流的當下，回歸邊界的意志對於本來深受邊界烙印的人文學知識的影響，十分難測，但是似乎注定讓人文學的解殖任務加倍困難。面對這些生命政治意志的種種動盪與主張，什麼樣的知識實踐才足以抗拒邊界的回歸並執行思想的真正解殖，進而協助眾人脫離生命權力 (biopower) 所帶來的困境？我認為，一個重要的線索可從旅居紐約研讀碩士、身兼記者與青年學者身分的陳偉福 (Wilfred Chan) 於 2019 年 8 月在美國《異議》(Dissent) 雜誌發出的呼籲進一步追蹤：「國際左翼的當務之急，是跟香港人合力研究一種新的分析。不是拿著未消化、反芻過的西方框架套用在香港的境遇上，而應是從這麼一個『之間』的地方 (this in-between place) 的角度出發，敢於重新想像反資本主義、反獨裁的生存政治」 (W. Chan 2019)¹。為了對一種新的分析框架做出貢獻，我打算將陳偉福稱之為「之間」的狀態當做問題意識兼方法論，以資本對勞動發起的持久戰當中的劃界實踐為背景，開闢批判性的新視野，縱使最後可能與陳先生預期的結果漸行漸遠。以《邊界為方法》一書 (Neilson & Mezzadra 2013) 為左右銘去投身於學術

1 譯文題為〈抗爭是香港重生之門〉，2019年10月29日見於香港《夜貓媒體》網站，譯文略微修改。

界的「劃界轉向」(bordering turn) (Sakai 2010)，我想趁此重新思考「前線」的當代意義²。不只是香港，其實世界上每個地方都是一種「之間的地方」、一種對抗生命權力的「前線」。

本著如此「之間」的方法，本文以反修例運動及相關評論的翻譯實踐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並著墨於理論架構的更新，從邊界、翻譯與歷史轉型三種宏觀因素的關連去闡述以邊界為方法的視野。理論與具體案例的討論之餘，本文力圖納入香港的歷史脈絡，以論證左翼與回歸邊界思想潮流的歷史妥協。

受限於篇幅、時間與作者個人知識、經驗的限制，本著作未能納入兩個重要議題一事值得先說明一下。思想實踐之餘，左翼的成敗相當程度取決於組織上的創新。在下文中我雖然針對數位時代社運組織的若干問題展開分析，可是確實並未能夠系統性地針對政治組織問題提出比較全面的評估與反思，實為一大憾事。另外，本著作並未納入香港建制派、港府與北京中央政府相關的劃界實踐與論述。雖然一般認為中央政府對港長遠的治理目標就是取消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邊界，可是，我認為事實相反，中央政府本來就是以邊界的擴散為經濟成就之外政治正當性的主要基礎。中國當局源自邊界操控的政治正當性—所謂「牆」國及其「維穩體制」—與現代性翻譯體制的生命政治之間的關係，固然是個很需要討論的主題，然而因篇幅限制，筆者只好留待他日專論。對於「牆」國的崛起與自由主義陣營的反撲所帶來的政治挑戰，我在結語裡將會勾勒出一個政治回應的初步輪廓。

2 《全球媒體與中國》英文學術期刊 2020 年由香港大學教授朱耀偉 (Stephen Chu Yiu-Wai) 編的專輯—“Mediating borders: New boundaries for Hong Kong studies”率先發起了香港研究「劃界轉向」的號召 (Chu 2020)。

「超越邊界」真的就是進步嗎？

當前問題意識不足的最佳縮影，無非就是「無國界」的理念。雖然本文的重點放在香港反送中運動前後「回歸邊界」之趨勢的問題，可是為了凸顯該問題的跨國性質，我認為不妨從國際論述說起。

就香港抗議運動的情形來看，國際評論基本上聚焦在地緣政治的國際意義。以法國的脈絡為例，無政府主義色彩濃厚的左翼網路期刊《週一上午》(Lundimatin)上的相關辯論頗有代表性。旅居臺灣的法國哲學家布洛薩(Alain Brossat)發表了三篇系列文章，他詳盡的分析中將香港的運動認定為一場聯合西方對抗中國的政治倒退(Brossat 2019a, b, c)；而在同一法語政治刊物上，另一篇匿名發表、題為〈水來了〉(Water is coming, 法文原文以英文篇名刊登)的分析中，香港的運動反而被視為一種雙重對抗，同時針對中國和西方這兩個被斥為同屬資本主義全球集團的共謀大國(Water is coming 2020)。

國際評論者分析反修例運動，包括如同〈水來了〉一文的作者那樣用心專程赴港現場觀摩與學習的人，總是不免透過一些語句間接或直接地透露他們是站在「外國的角度」展開分析的，並在此基礎上以道德律令的口吻，一致呼籲國際的支持(或反對)。「外國的角度」雖然聽起來合情合理，可是其中隱藏的許多潛在性的邊界預設頗值得分析。以下兩個引自《水來了》一文中明顯帶有預設立場的段落恰好可以說明外界觀察家普遍存在對邊界的預設立場：

一、「反對逃犯條例的運動提供了一個鬥爭的基礎，可以拿來對抗當下和**普遍**形式的權力(基礎設施，網路，員警)」；

二、「我們更願意揭露**那邊**〔指香港〕吸引我們的東西以及

應該**穿越邊界**被分享的東西」(Water is coming 2020, 粗體另加)。

隔開「那邊」與「這邊」的「邊界」，以及「邊界」與「普遍性」之間所建構出的格局，倘若非常令人熟悉，是因為這是一種頗具代表性的現代性典型結構。其具體名稱就是「國際團結」(international solidarity)。就像現代性必須被視為「殖民」與「帝國」兩種對立面的結合體一般，〈水來了〉一文所依賴的世界版圖，追根究柢是由普遍主義 vs 特殊主義這組二元對立概念所組成。而這些不同地理區塊之間的關係，則被想像成可以訴諸空間化的邊界去理解的東西。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水來了〉一文還是布洛薩的系列文章，即使最後對運動的政治性質下了南轅北轍的結論，終究都還是以邊界分隔開來的政體—香港，中國和西方，作為分析架構的依據。總之，這些刊登在法國《週一上午》有關香港反送中的文章中，作者們都把某些知識型—地理學(epistemo-geographical)實體當作出發點，卻未思考持續生產出又反覆複製這些實體的劃界實踐，更沒有思考這些實踐不斷被遮蓋、擦寫，賦予不同意義的過程。對這些劃界過程缺乏關注，正是布洛薩的系列文章和批評布洛薩的文章—〈水來了〉一文共同的特徵。此特徵呈現在〈水來了〉一文將中國和美國聯合起來，指出「中國和美國是兩個國家，但卻被統合在同一個體系內：資本主義，其當下最新版本為新自由威權主義」(Water is coming 2020)。假設我們將這種觀點放在著眼於邊界的脈絡來看待的話，就會讓邊界顯得像是一種假象、一種虛假的意識形態而已，看穿了邊界，全球資本主義的共謀才會真相大白。然而，如果眾多邊界都是一種「虛假意識」，可以輕易看穿的話，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它們一定不可能持續存在這麼久。

將邊界視為意識形態假象一事在方法論上其實意味著國族形式(national form)的問題與資本主義轉型(capitalist transition)之間

並不存在任何必然關連。根據這種方法論，國族形式相對於資本主義歷史轉型而言，要麼是一種人類社會的基本組織單位，要麼是一種假象。這種方法論上的預設就注定連帶導致這樣的後果：「邊界」不但會被想像成一種純粹的空間裝置，更會讓我們將這種空間化的想像塞進另一種兩者擇一的二元格局，就好像邊界要麼是一種必須接受的給出事實，要麼是一種需要取消的障礙。

提筆之際，我內心兢兢業業。在「超越邊界」似乎已經成為了進步政治訴求的標誌之際，想要指出其背後與「回歸邊界」的合謀，無非就是踩進地雷區。尤其因為，如此的立場已經是離岸中國研究(offshore China studies)進步學者的基本共識，並反映在2020年成立《批判性中國研究學者》(Critical China Scholars)團體的〈原則聲明〉一文中：

我們認為我們世界現存的不正義現象之根基與緣由，均來自於**跨越國家邊界**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包括資本主義、威權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與父權體制。(Critical China Scholars 2020；粗體另加)

這句話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除了它對邊界的處理之外，還有它對於「我們世界」中「不正義」制度的列名單，竟然沒有提及歷史自由主義及其最新的當代權威版本——新自由主義。這兩點的關係，亦即歷史自由主義與邊界的關係，自成一種類比性的盲點，致使我們對現代性的理解產生偏頗。畢竟，如果這兩者從我們分析視野中刪除的話，就注定讓我們無法理解白人定居殖民主義(white settler colonialism)與現代國家主權的關連，遑論是美國的國族主義建構，在未經解殖的前提下，表面上與定居國族主義(settler nationalism)告別了，卻是披上了公民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的外衣，讓定居殖民主義獲得實質的延續(Rana 2015, 268)。

《批判性中國研究學者》有關邊界的觀點獲得了離散港人左翼團體《流傘》(Lausan)的回應，並出現在後者對「國際團結」(international solidarity)的呼聲中：

我們認知到帝國主義是一個**不僅限於民族國家邊界**的世界體系〔…〕現在是我們重新號召國際團結的時候了，打擊美帝和中共其實是同一個抗爭〔…〕(Andi W & Promise Li 2020；粗體另加)

或許正因為忽視了邊界作為社會實踐的特殊性質，這些外國團體與離散港人團體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願意承認，近年香港向認同政治全面傾斜一事，意味著左翼的某種歷史敗北，多多少少是反送中運動的重要歷史背景，但是他們並沒有去探究香港的左翼乃至全球左翼過去數十年對各種回歸邊界、重建邊界的呼聲與行動，最後自己都不但加入了，還可能帶頭領導。

是不是左派沒那麼重要？³

在一個左、右政治立場的區別日益受到質疑的時代裡，本文專門針對「左翼」的作法，或許是個一開始需要澄清的選擇。作為重要的歷史詞彙，「左翼」一詞的定義不但繁多，而且與許多重要政治紛爭與歷史事件有關，我在此無意涉入，更不用說去捍衛什麼「正確」或「正統」左派的定義。然而，為了方便討論，

3 這個標題取自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黃涵榆 2020 年 4 月 1 日刊登在《思想坦克》的短文〈是不是左派沒那麼重要〉。這篇文章將一些西方知名知識份子，例如阿岡本(Giorgio Agamben)、齊澤克(Slavoj Žižek)、儂希(Jean-Luc Nancy)與布朗(Wendy Brown)等人籠統地納入「左派思想家」的行列，進而總結地指出左派的種種思想毛病，例如：「本能性地、不加區分地將一切問題歸咎於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為了反美、反資本主義什麼都可以」、「不加區分地批判所有形式的國家主權和治理模式本質都一樣是極權主義」等等。作者甚至不惜與這些「對筆者學術養成、研究與發表，都給予筆者莫大的啟發」的思想家進行「割席」，讓人不得不去思考黃建宏所稱的「一種擺置方式」。黃建宏表示：「大量的台灣知識份子以消費者的位置進入現代主義式的價值階序制。此時進入該全球生產框架的知識份子，一面是支持與推廣歐美學術的忠實消費者與代理進口志工，一面則在政治正確下在台灣獲得作為知識份子的社會象徵價值與權力。」(黃建宏 2019, 42)。《是不是左派沒那麼重要》一文中的批評與宣稱皆籠統至極，遑論利用對方看不懂的文字(當然，他們看不懂一事也是他們制度位置的重要構成條件)，將對方思想的格局描述為一種條件反射的「本能」狀態來矮化對方，與網路互噴沒什麼區別，實不值得認真駁斥。但是確實有一點值得稍微澄清一下。黃涵榆聲稱：「病毒本身就是全球化，就具有全球性，我們不應認為病毒是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產物。」(黃涵榆 2020)難道病毒跟資本主義真的沒有關係嗎？難道西方左派思想圈真的沒有人曾經直接針對這個問題本身提出看法嗎？英文文獻方面，只要去參考美國進化生物學專家華勒斯的相關研究(Rob Wallace 2016, 2020 與 Wallace et al. 2020)，就不難發現，當時黃涵榆對於西方左派思想圈動態的掌握有尚待更新的地方。這點其實也不算什麼，畢竟跨國跨領域批判總是需要冒著這個險才能進行。重點不是資訊不足的問題，而是後殖立場的建構過程有沒有納入知識生產與消費的問題意識。

對華勒斯感興趣的中文讀者可以參見以下幾篇網路文章：香港《夜貓媒體》對 2020 年 3 月德國《馬克思 21》英文網路期刊對華勒斯訪談的中文翻譯(夜貓 2020)；《食物主權》2020 年 4 月 11 日刊登華勒斯〈新冠病毒與資本循環〉一文的中文翻譯(食物主權 2020；Wallace et al. 2020)；與香港《社會主義行動》2020 年 6 月 14 日刊登華勒斯 2016 年的著作—《大農場製造大流感》書評的中文翻譯(社會主義行動 2020)。

我還是先提出一個本人屬意的明確定義來作為出發點。此定義來自法國哲學家儂曦：

「左派」至少意指政治空間 (the political) 如然善於登錄「共同體」的問題意識 (同樣，「右派」意指政治空間上的任務僅僅是秩序與管理的安排)。(儂曦 2003, xxix - xxx；譯文略微修改)

這個定義有意義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它最完整或最精確，而恰恰是因為它所用來捕捉關鍵問題意識的切入點本身是相當有問題的。

儂曦的本意旨在清楚區隔針對政治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場、態度與期待。根據他的論點，所謂「左派」的特徵取決於對**社會關係**的堅持，而所謂「右派」的立場取決於秩序的捍衛與管理。這是一個相當簡潔而漂亮的定義，有助於抓出左、右不同政治立場對於國家、身分、財產等重要問題的分歧。問題是，左派所關懷的「關係美學」與右派所在意的「秩序管理學」之間存在一種無法迴避的混淆傾向。之所以如此，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在現代世界一亦即以殖民—帝國區隔為製圖原理的世界，邊界不但成為了秩序的依據，同時也成為了共同體、尤其是人民共同體的形象 (figure)。

為了彌補這個理論上的漏洞，本文採取的工作假設與台灣理論家黃建宏在《潛殖絮語》一書提出的結論基本上一致：「唯有通過對生產關係的基進提問，才能翻轉出「現代性」的另一面。」(黃建宏 2019, 44)不可諱言，這種方法論的原則表面上是一種歷史倒退，形同要求左派思想家趕緊歸隊，回到「正統」馬克思主義陣營對「生產模式」決定性作用的「正確」立場。遑論，那種曾經被認為「正確」的立場才是儂曦瞄準的真正批判對象。這是「共產主義的理念基礎本身的問題：也就是人，尤其是被定義為生產者的人(我們甚至也可以說：簡直就是被定義的人——在根本上經

由工作或創作的活動，專門從事自身之得體本質的製造者)」(儂曦 2003, 4; 譯文略微修改)。儂曦確實抓出了一種貫穿共產主義理論傳統的形上學弊病，讓我們清楚瞭解：「人的本質即是生產者」這個概念，其實只不過是屬於特定時空脈絡的知識成見。倘若引用儂曦的左派定義，卻將他刻意排除生產關係的哲學立場視為這個定義本身的缺點，這種作法對儂曦好像有點欠缺公道吧。然而，與其說是糾正儂曦的「誤差」，不如說是對儂曦所揭開的豐富問題意識及其系譜表示欣賞與承接。畢竟，在儂曦提出這種左派定義將近四十年之後的今天，「生產」的定義本身已經產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讓「生產」不再受限於工廠內幹活的事。例如，《潛殖絮語》一書大量著墨於傅柯生命政治與主體性建構的問題，指出傅柯「以知的意志予以延伸，能夠讓我們真確地理解『生命治理』的生產與再生產」(黃建宏 2019, 162)。黃建宏頗有代表性地點出的當前左派批判圈對「生產」的理解，足以顯示「生產」的概念早已超越了通俗馬克思主義「下層建築」決定論的狹義框框。更重要的是，這種「生產」概念已經擺脫了儂曦詭辯的本質主義形上學預設，進而朝向一種新的關係美學與關係存有論。正因此，政治哲學理論家巴里巴 (Étienne Balibar) 才會指出，除了「生產模式」(mode of production) 之外還有我們不得不關注的另一平行的「模式」(mode)，那就是「主體化模式」(mode of subjection)，或者說主體性被生產的模式(Balibar 1995, 155)⁴。本文的特點不僅

4 主體性一詞在當代華語圈的一般使用習慣，尤其是政治語境下的使用習慣，與富有哲學含意的“subjectivity”一詞相差甚遠，因此值得說明一下。

相對於當代政治脈絡的慣用案例，現代主體性的建構取決於「否定性」(negativity)。否定性之所以這麼重要的原因，在於它意指主體性建構過程中他者因素或內部差異的介入。而這些因素的介入都是發生在時間的流動過程中。時間成為時間的前提在於當下的流逝，而所謂的流逝就引進了對「當下」的否定。作為時代的劃界名稱，現代性將如此的否定性提升到極致。畢竟，在現代性的脈絡中，「現代」代表與「過去」之間的斷裂，而正因此，現代性的「時間」無法被視為過去、現在、未來三世連貫的介體。時間如此斷裂之後，反而分為一種無法對象化的未來與一種過度對象化的過去之間的衝突。另外，

在於將主體性生產過程連結到廣義的語言勞動問題，更在於進一步將語言勞動納入翻譯的脈絡去重新詮釋。這點也可以從儂曦對「溝通」的理解找出些許迴響：「溝通一事 [...] 並不構成一個 [社會] 「紐帶」 [...] 溝通反而是界定「其」點往外暴露的構成條件。」(儂曦 2003, 62, 譯文略微修改) 問題是，我們要如何理解這個「外部」？「左派」對此問題該持什麼看法？

酒井直樹指出，「說話的主體無法在發言(utterance)時自我一致(identical to itself)，畢竟凡是發言均會造成陳述主體與被陳述主體之間的斷裂。發言中如此的斷裂就如同經驗自我與超驗主體之間，自從康德以降存在裂痕一般，這是一直構成現代認知主體的困境。」(Sakai 2005a, 19) 因此可說，現代主體的特徵在於因為無法達成統一性(identity)而成為問題的狀態。

從這個角度來看，「主體性」(subjectivity) 與「身分」或「認同」(identity)，是兩個需要嚴謹區隔的概念。然而，主體或主體性等用詞在當代華語圈中一般的用法，因為排除了否定性的緣故，比較接近身分一詞的代名詞。更準確地說，主體一詞一般用法的實質意涵，其實就是意指生命政治脈絡中的身分之意。在當代華語圈政治辯論中，主體一詞的意義往往取決於一種強調相似於主動的「主」之意，而這種「主」的概念，其實就是殖民主義脈絡繼承下來，相對於「被奴役」之意的對立詞。也就是說，「主」體意味著一種消極自由的身體經驗或「主」權，而這位「主」人翁的身體主要的特徵在於它不是奴隸。但是，至於主權與奴隸的可能關連，倒是當代華語圈政治主體性論述中被化約為身分問題而鮮少面對的課題。一個顯著而卓越的例外，就是周思中在〈無怨無悔的解殖思考〉一文有關海地革命的引介與討論。周思中確確實實地指出，黑奴的解放與獨立建國的反殖鬥爭，必然在思想界引發一場平行鬥爭，與啟蒙思想抽象普世主義進行對抗。周思中認定解殖的對象不僅是經營黑奴買賣的帝國，更是包含以主奴辯證法為起點的黑格爾普世主義哲學姿態。至於周思中當下以法國哲學家巴迪烏(Alain Badiou)的思想作為解套方案一事是否正確並不重要。重點是周思中讓我們清楚看到知識解殖與政治解殖雙軌並行的必要性。然而，對於奴隸與主權的關連，周思中在〈無怨〉一文中僅僅宣稱，「海地革命揭開了黑奴解放成為獨立主權國的第一頁」(周思中 2011, 170)，卻並未察覺兩者間的非連續性，以及這種非連續性所帶來的思想挑戰。位於 2010 年代初期的周思中，自然無法從一系列後人相關的研究中獲益一事，可以凸顯 2020 年執筆的時代已經轉入截然不同的知識階段。例如，Wall (2013) 跟 Roberts (2015) 從不同角度切入海地革命，不謀而合地指出自由跟奴役之間存在某種「斷裂」(rupture) 或「轉折」(transition)，可以引以為鑑。前者強調「權益」並非政治構成的「標準」，而是政治構成的衝擊與重組。後者則認定奴役跟自由並非兩個平滑間隔的固定狀態，而自由並不是可以「實現」或「擁有」的。有別於啟蒙思想傳統，Roberts 主張奴役，而不是自由，才是人類普遍的生存狀態。自由的關鍵在於從奴役到自由的轉型過程，而這是一個絕非平順、注定充滿辯證矛盾與鬥爭的過程。

為了釐清這些問題，我們首先就得搞清楚，所謂「外部性」不僅是一種認識論的對象。當然，形式上，確實如同台灣政治哲學學者洪世謙精簡指出，「內是外，內又不是外，內是內又且是外，內非外又且非內」（洪世謙 2017，10）。洪世謙的觀點恰好響應香港作家董啟章在其深具影響力的《地圖集》一書裡〈界限〉章的分析：「在一個地方之內，同時意味著在另一些地方之外，反之亦然。並不存在沒有之外的之內，也不存在沒有之內的之外。換句話說，所有之外亦即之內，而之內亦即之外。沒有絕對的內，也沒有絕對的外。」（董啟章 2017，39）在董啟章那邊，空間的虛構性打開了界限的可塑性，讓我們得以想像眼前的邊界都具有其任意性，可動以改變。而改變的決定性因素在於權力的行使。權力對於製圖學起著決定性作用，透過邊框的制訂與比例尺的調節，最後甚至可以達成政治干預，「剝奪了香港的獨立性，強化了中國的統一性」（董啟章 2017，57）。

然而，純粹空間化的隱喻對於我們瞭解資本及其外部之間的關係是遠遠不夠的。畢竟，資本主義社會裡的「權力關係」往往跟另一種性質截然不同的關係形式有關。那就是剝削。我們更需要記住，所謂「剝削」的定義並不受限於「苦力」勞動的狀態。原則上，「剝削」歸根究柢牽涉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正因此，凡是試圖瞭解社會剝削現象的理論，均需從社會整體的角度出發，例如從生活中諸如貨幣、商品與抽象勞動等各種「具體抽象性」（real abstraction，下詳）的日常實踐切入。而這點倘若放在邊界相關的理論脈絡重新詮釋的話，那就等於指出，剝削的現實並不受限於邊界在權力遊戲中的遷移。為了掌握這些又具體又抽象的事情，我們必須從實踐過程的角度、尤其是該過程中斷裂性差異（discontinuous difference）的接觸與時間流變的角度切入。這些術語與問題下文，特別是本文第四章，將做進一步的說明。

資本的外部性

對於資本與外部性關係的詮釋，目前走得最深入且有趣的學者應該就是加拿大日本研究兼理論家沃克(Gavin Walker)。他將日本左派奇才學者宇野弘藏(Uno Kōzō 1897 - 1977)的研究發揚光大，巧妙地解釋資本及其外部間的互動問題。資本雖然盡量企圖在生產與流通間形成一條自足而封閉的迴路系統，可是實際運作上還是一直反覆依賴與引進某種外部性作為支援。之所以如此，歸根究柢就是因為資本最需要的「東西」——**勞動力，偏偏就是它唯一無法自行生產的對象**。換言之，資本根本就無法好好管控人類的社會世界，或者說，人類無法將社會世界的控管任務全權託付給資本去執行。相對於資本而言，尚未成為勞動商品的人其實就是一種「外部性」。

所謂「外部性」(outside, exteriority)的第一層含意，可以理解為種種尚未納入資本主義市場組織的社會關係、階層與制度。作為剩餘價值的來源，外部性並不受限於地理範圍，而可以涵蓋諸如年齡、性別、性向、種族、遷徙、語言等各種社會差異及其可能產生的差異性主體，甚至還可以延伸涵蓋其他物種、細胞、分子、資訊與情感等等。正因此，尼爾森與梅札德拉強調，「地理邊界」(territorial borders)與「資本疆域」(frontiers of capital)需要被嚴謹區隔(Nielson and Mezzadra 2020)。作為一種永遠追求擴張的運動，資本主義亟需不斷辨識出新的疆域，新的外部性，才能持續「發展」。那麼，「外部性」的第二層含意，大致意指「非資本」之意。然而，什麼才是非資本之物呢？一般咸認那就是「人」，而「人」與「資本」之間的互動所造成的結果，在「資本」那邊就叫做「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而在「人」這邊就叫做「異化」(alienation)。然而，相對於資本這份社會關係而言，「人」顯然並不純屬「非資本」的「外部性」範圍，尤其是作為商品化勞動力的人更不是。

必須強調的是，雖然我們使用「外」字來形容，可是**外部性本來不屬於「內、外」空間式的區隔，而是一種相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時間概念**。一旦我們開始追究「資本是什麼？」這個問題，答案必然連帶包含人類在內，因為歸根究柢，資本就是一種社會關係，而這種社會關係的基礎與產物，與其說是財富的積累，不如說是主體性本身的積累。沃克為我們總結指出：

馬克思同時還強調資本的誕生並不是發生在資本主義積累循環首度啟動之際，即使那樣的時間點真的可以在歷史中被抽離抓住。相反，資本早已醞釀在那些並非資本本身的社會形式當中，而那些形式自身往往也需要經由主體性積累的催化劑才能被激活。這個概念雖然十分詭異，可是相當有助於我們理解馬克思針對資本主義成形的過程（the becoming of capitalism）——這種社會關係成為社會中支配性的焦點一事——所展開兼具批判性與理論性的分析工作。它主要牽涉「轉型」的問題，一個在馬克思那邊尚未獲得理論提升的概念。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如此「非出生」或「死產」現象的意義，不只是意指資本的前史因素均受到資本——也就是說，它們的未來的影響，而且更意味著反之亦然，資本永遠無法完全成功地刪除其自身出其不意的突變過程。（G. Walker 2019b）

從時間的角度來看，「外部性」相當弔詭，它一方面是資本這份社會關係崛起而成為支配性主流形式的產物，另一方面它也被資本投射到資本主義誕生前的歷史階段，成為資本主義發展引擎的火星塞。從資本主義「發展」的角度來看，「民族形式」（national form）就好比一種「前現代」因素，對於資本主義試圖以積累的「理性」去重組整個社會一事構成障礙。但是放眼未來，「民族形式」恰好給資本主義積累體制提供了一個「理性」且「自然」的社會組織基礎——現代主權民族國家——去順理成章地規管勞動商品化的過程。在這點上，民族形式被分別投射到過去與未來兩個不同而

矛盾的時間，導致「民族形式」一面被視為社會關係整體性的「天然」架構，一面被視為一下子外在於資本的「擴張」對象、一下子由資本所收編並升級複製的「外部性」。舉一個香港的例子來說，「外部性」如此的雙重特性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的《香港故事》常設展，隱約可見。該展從城鄉差異的角度敘述香港建城史，讓鄉下（特別是瀕臨香港的廣東省地區）一面扮演香港華人傳統社會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文化因素（例如刻苦耐勞、逆來順受、家庭救濟等傳統價值），一面將鄉下視為一個尚待開發的落後地區。可見，民族社群的意識形態功能確實微妙。蒙受沃克的啟發，我們甚至可以說「民族國家」正是「外部性」的典範。重點不是「民族」還是「國家」孰先孰後的歷史關係，而是雙方彼此的複合體啟動了弔詭的循環運動，讓兩者輪流充當資本外部性的角色。

就在這點上，殖民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歷史貢獻不可取代。它不但使得資本順利將地理區隔套用在時間的流程上，更讓民族國家的建立成為解殖運動的終極目標，導致**民族自決成為資本主義的幫手**。雖然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歷史淵源各自不同，可是從前者的角度來看，後者提供了一套十分完美的治理技術去規管外部性詭異的雙重特質，讓殖民主義成為資本主義主體建構過程中典範性的「布署」（apparatus）。重點是，作為一種朝向全球無所不包的整體計畫，資本不斷地投射並吸納各種各樣的外部因素，一邊當作資本未來發展的目標，一邊充當積累體制過去賴以成立的基礎。

誠然，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主體性建構與劃界實踐之間的關係是一體兩面**。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生產關係的基進提問」，起碼必須顧及**劃界實踐與生產間的關連**，才稱得上名符其實的「基進」路數。我認為正因此，黃建宏才會正確指出：

我們今天面對的實踐問題或更進一步說實踐的邊界問題，正是在於邊界迅速而不斷地瓦解，反過來說，「邊界的碎裂」構成

了當今的邊界問題，如此便可以理解所謂的新保守主義就是邊界碎裂化後「極端抽象化」的邊界（黃建宏 2019，210）。

所謂「碎裂」的現象，除了意味著現代民族國家邊境所象徵的民族國家整體性開始瓦解之外，還具有一層擴散效應的含意在內。邊境的「碎裂」不僅是一種分散，同時也是一種乘法的過程。而正在擴散與繁殖中的邊界不只是一種認識論的對象，更多時候是由實踐所構成且持續流變的社會關係。基於此，本文將翻譯視為此類社會實踐的典範。翻譯往往又是一種劃界實踐，又是一種生產。或者說，從一切語言行為、包括「母語」內的交談均可重新詮釋為翻譯的角度來看，劃界實踐與生產關係都是主體性建構過程的關鍵。

文化研究與去馬的過程

從這些初步的理論考量出發，就不難發現我為什麼認為儂曦的左派定義依然值得採用。作為一種豐富的問題意識，這個定義恰好可以代表當代全球左派思想界兩種重要且需要克服的趨勢與障礙。其一就是後共產主義時代所形成的去馬(de-marxification)現象及其相關的歷史成見；其二則是一種語言與翻譯分工體制醞釀出的世界圖式(schema of the world)或形象。

去馬趨勢在學術界的最佳代表代莫過八〇年代之後橫行全球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這點說來其實也相當矛盾。畢竟，起源於英國伯明罕左派脈絡之文化研究，本來就繼承了左派、尤其是馬克思與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思想傳統。然而，到了七〇年代末，阿圖塞的思想失去了西方批判圈的權威性地位，而「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共產主義轉型」中的核心概念，同時被西歐

左派政黨與學者們徹底否定之後⁵，以霍爾(Stuart Hall)為首的伯明罕文化研究派基本上就跟上潮流，並開始棄守以生產模式為社會關係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立場(Sparks 1996, 96)。換言之，文化研究於八〇年代開始傳入香港與台灣等華語國家地區之前，這個後來在華語圈學術界影響極其深遠的新學門早已帶頭創造了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品牌銷路，讓「左派」與「生產」之間產生與儂曦的哲學批判異曲同工的一次斷裂。持平而論，文化研究扮演這種角色，還是需要還原當時的歷史脈絡，尤其是 20 世紀左派理論圈長期累積的盲點，特別是它向來並未成功納入諸如性別、殖民、語言等非傳統歐洲國家階級主體性經驗與因素。否則，我們可能就會忽視文化研究過去幾十年對整個人文學所帶來的重大思想貢獻。畢竟，文化研究的建制與擴展使得許多之前被排除於學術殿堂之外的研究對象，例如影視研究、性別研究、消費研究、大眾文化研究、甚至後殖研究等等新興領域，終於可以獲得正當性的機會。而在香港的具體脈絡中，文化研究這個新學門更是人文學主流思想，特別是「儒家文化論」的重要批判者(許寶強 2002)。

5 阿圖塞的弟子巴里巴(Etienne Balibar)1976年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Sur la dictature du prolétariat)一書，曾經一度試圖介入當下法共黨內針對該黨政治綱領是否刪除「無產階級專政」相關的辯論(Balibar 1976)，可以視為一次劃時代的指標性事件。近年，西方批判圈以 Dean(2012)、Kivotidis(2019, 2021)與 Bruschi(2020)為首，啟動了一波重新評估「無產階級專政」的可能意義與另類詮釋。根據義大利哲學家布陸希(Bruschi)的看法，「無產階級的支配性統治其實意味著一個過程，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邏輯下，令那些本來不可能產生的社會相遇不斷獲得重複發生、鞏固與穩定」(Bruschi 2020, 53)。這些過程的關鍵取決於「經濟」與「政治」這兩個不同領域之間的界線被取消，進而催促兩者間各種曾經無法想像的「相遇」與互動陸續產生。根據當年阿圖塞與巴里巴的理解，法共黨綱裡「無產階級專政」相關的條文固然應該保留，但是在概念上仍須展開重大更新。眾所周知，法共最後的決議，與阿圖塞、巴里巴等人的立場相違。結果，自從 1976 年法共決議將「無產階級專政」條文從黨綱刪除後，西方的左派政黨與社運團體均採取了幾乎一致的立場，將「民主」視為一個純粹形式或法定程序的問題。布陸希指出，「這就等於相信無產階級展開的階級鬥爭，可以不必去質疑國家體制，就好比根植於特定生產模式的國家體制——也就是根植於特定階級社會勢力的制度本身，反而不受制於這種社會勢力的支配」(Bruschi 2020, 54)。

雖然在此無法系統性地針對文化研究在香港的引進與歷史演變提出完整的分析與評估，可是，在相當程度上，這是無法迴避的課題。畢竟，想要勾勒出當今香港劃界實踐的系譜，就得去鑽研諸如陳清橋(Stephen Chan)、羅永生(Law Wing Sang)、許寶強(Hui Po Keung)、葉蔭聰(Ip Iam Chong)、彭麗君(Pang Lai kwan)等文化研究在香港先驅的學術著作才行。以 1995 年香港《今天》雜誌刊登「香港文化」專輯，以及同年陳清橋等人編，《香港文化研究》學報第四期「北進想像」專輯為象徵性的起跑點，文化研究在香港不但對於「身分認同」相關的公共討論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還籠統地奠定了「本土」視角即等同左翼的學術正當性⁶。甚至於，「本土」視角好像變成了左翼立場的一種入門前提與思想標誌，讓「本土」最後染上一種「自然左」的色彩。然而，作為一種邊界布署產生出來的概念，「本土」與邊界的關係雖然一直反覆被質疑，可是其與劃界實踐的關連其實從未被正視。可惜在時間有限的條件下，香港文研圈「本土」建構批判性辯證及其知識系譜只好留待他日另論。

儂曦左派定義揭露的第二種當代趨勢，則是台灣理論家黃建宏所稱的西方知識份子的一種「不面對」的情結。

他們〔指西方知識份子〕極盡可能地描述出各式各樣的解構思維，但這些打開更多可能性的思維模式或工具，卻大多在立基於各自明確的歷史社會脈絡同時，停留在一種抽象的市民社會的暗示，而幾乎不面對明確的國際關係與彼此異質之文化間的現實關係。他們有權不面對這種外部關係，但這種不面對使得解構思

6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魏簡(Sebastian Veg)甚至聲稱，「本來只是 1997 年前後一些文化研究學程的口頭禪，『香港身分』如今正在成為眾人愛戴的概念，不論是在報刊社論還是一般民調上均如此。」(Veg 2013)魏簡的觀察似乎可以間接見證，文化研究對本土論述的形成過程起了不成比例的重要影響。

想與解放思想成為以文化或人文思想延續這些過往殖民國的國際優勢，並以另一種方式維持其治理關係。換言之，這些思想與理論仍然以一種普世性的型態，輔以學術權力的國際網絡，通過交易與流通的形式完成新的國際階序制的普世形式(黃建宏 2019, 43)。

我認為這種「不面對」的現象，其實就是從帝國主義繼承下來展演性梯度中的位置(a position within a performative gradient, 下詳)。如今其最直接而重要的作用發生在廣義的語言勞動(尤其是翻譯)和非西方語言書寫的多重分工體系之上。之所以說這個分工體系呈現一種多重的狀態，主要是因為它不但包括學術界一些顯著不對稱的社會關係(例如，全球留學人口流動所呈現極其誇張的懸殊狀態)，還包括一些人文學學科分際的原理在內。所謂的不對稱關係，具體指的是與身分或與遷徙人口有關的不對稱現象，例如性別不平衡(譯者的身分往往以女性居多)，抑或後殖語言地位不平等(西方知識份子在升等與榮譽制度上可以完全免於使用非西方語言從事學術生產的要求，但是對於非西方的人文學知識份子來說，不論專業領域，幾乎都不得不從事西方語言的消費，甚至需要直接投入西方語言的知識生產，才能順利升等並獲得榮譽)。以儂曦的左派定義為例，雖然對於現代「共同體」展開了一次精彩的「解構」，但是他還是沒有去面對「共同體」與西方/非西方邊界之間的關連，以及這些所謂「文明」區隔與語言勞動(主體性)間的關係。換言之，西方知識份子這種「不面對」情結，與其說是反映在知識對象的選擇或忽視上，不如說是反映在翻譯與語言勞動的實踐上。

大概就是這種「不面對」情結間接引起了政大台文所教授陳佩甄，在回顧文化研究過去 20 年在台灣的歷史時，提出如此的結論：

與其說要擺脫西方，其實是要擺脫「現代性」內涵中的西方霸權〔…〕更確切地說，是擺脫「現代性」本身作為知識生產權力系統所進行的劃界（時間與空間都是）工程（陳佩甄 2019: 200）。

本文對於反送中的切入點，與陳佩甄的「劃界工程」完全一致。然而，即使如此也難免隱藏了另一種值得提防的潛在性的「不面對」情結，那就是翻譯理論兼日本研究學者酒井直樹(Naoki Sakai)長期耕耘的問題：

將現代性視為一種「西方」支配世界的時代，此一觀點的缺點，在於它並未回應一個問題：在那之前，「西方」到底有沒有存在過？〔…〕然而，連如此提問其實也是錯誤的。我們應該將現代性理解為一種讓「西方」這個統一範疇與「白種」這個種族範疇共同獲得確立的過程（Sakai 2005a, 14）。

假設放在上文討論生產問題的脈絡去理解，我們可以這樣提問：「西方霸權」中的「西方」，到底是「現代性」的發明者、生產者與操控者，還是「現代性」過程的產物？

總之，「西方」對於非西方語言勞動的「不面對」，以及非西方對「西方」統一性幻象的「不面對」，都貫穿本文追蹤的問題意識，本文欲從劃界實踐與生產關係的角度來切入當代香港乃至全球左派的若干癥結。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劃界實踐及其深層的知識系譜學均富有極大的啟發性與豐富的問題性，值得深入研究與廣泛討論。

歷史成見、外部性與世界圖式

從香港左翼史的角度來看，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本身即鐫刻

在一個至少在 15 年前就開始的政治動態發展次第當中。始於保衛天星與皇后碼頭(2006、2007 年)和反對跨境高鐵(2009 年)，到佔中(2011 年)和反國教運動(2012 年)，再到雨傘運動(2014 年)及其餘波的這一政治次第過程中，香港左翼⁷內部經過一番重大的辯論，讓進步陣營對於諸如身分、自決、移民、自由和歷史記憶等問題意識的框框漸漸全盤接受。這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發酵劑便是一連串令左翼／左派在香港社會整體上喪失信譽的輿論運動，其標誌包括在 2010 年開始廣泛流通「左膠」⁸與「太愛左膠」等說法，導致「左翼」的日常定義偏離了社會關係與生產之間的關連，並在歷史批判上完全失去了另類歷史詮釋與想像的能力。結果，左翼最後變成道德關懷—「太愛」的代名詞。2014 年傘運剛起步之際，部分參與者展開了「提防左膠」運動，特別「提醒」群眾「請勿在示威場地表演及嬉戲」。

在創意示威被泛道德化論述驅逐的陰影下，「左膠」一詞還添加了一層生命政治轉向的內涵，潛在性地代表「背叛(香港)本土」。這種本土論述背後其實還有國際因素，但是這個「國際因素」完全內在於香港社會。其最直接而影響深遠的表現就是歷史，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歷史詮釋的架構。香港本土民粹主義論述再怎麼「本土」，它一直脫離不了世界與世界史對它自身建構過程的重要性。該歷史建構的具體內容並不是重點，說那是「自由民主 vs 威權主義」的歷史對決亦可，反正最後都是一個足以成為信念對象的歷史進程。而如此的信念非常容易帶來各種歷史成見。

7 根據香港慣用的區分，「左派」一詞意指親中共，「左翼」意指非屬中共陣營的左派，兩者間的異同某程度上是冷戰留下的意識形態，但根據友人的說法，這區分在日常討論情況上對意識型態的指向並不明確。本文一般情況下保留這種定義區隔的同時，還保留超越其限制的餘地。在歐美的脈絡裡，如同香港那樣「左翼」vs「左派」的詞彙區隔並不存在。

8 關於左膠一詞的歷史及其意義的演變，請參見 Ip(2020)頁 93 起。

例如，香港工黨創始人之一兼曾任嶺南大學文研系教授一職的梁啟智 (Leung Kai Chi) 在 2017 年發表的非學術性著作《獨立路上：從前蘇聯省思香港未來》，可以被視為這種歷史成見所孕育出的主體位置的代表。作者赴前蘇聯各國現場見證，並以國族主義發話形式建構出該書的目標讀者(分為「相信香港獨立」、「相信民主自決」與「一國兩制的忠實支持者」三種類型)。然而，除了史大林主義的殘暴或者人道主義與布爾喬亞消費社會價值觀的假定關連外，作者還間接「見證了」一系列的當代歷史神話，例如「國際標準」與西方的潛在等同、「西方」不容置疑的假定統一性與普世性，以及國家(state)與民族(nation)的假定區隔等等神話般的預設。而這些預設立場其實都不是什麼現場見證的產物，而是出發前早已在他方被定格的後設敘事。甚至可以說，《獨立路上》一書的眾多觀察都是建立在上述「不面對」情結被延伸到邊界體制的基礎。與其說是一種政治偏見，不如說是一種邊界相關的**歷史成見**⁹。諷刺的是，這種歷史成見與 1920 年史大林將「蘇維埃自治權」定義為「中央地區與邊疆地區的革命性統一」的論調異曲同工 (Stalin 1953)。史大林否定少數人口脫離蘇聯的權益一事與梁啟智將民族獨立視為理所當然的原則，雖然兩者立場表似相反，其實都將邊界視為抽象的給出物，並將政治判斷化約為以邊界為基準的泛道德主義立場。

「綏靖主義」(appeasement) 一詞在香港的流通可以被視為歷史成見情結另一重要的實例。香港評論家歐家麟 (Au Ka Lun) 頗有代表性地認為「綏靖主義」的意思就是「姑息、軟弱、忍氣吞聲、對強權惡行視而不見」(區家麟 2020)。相比之下，早在 1980 年代末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者瓊斯 (Mark Jones) 指出，「綏靖

9 有關後蘇聯東歐挫敗的轉型與世界版圖尚未完成的解殖大業，請參見 Buden (2009, 2020)；有關俄羅斯在蘇聯瓦解後被洗劫的歷史，請參見 Klebnikov (2000) Wood (2018) 跟 Wedel (1998)。

主義」真正的歷史意義在於西方國家(當時還是帝國)，特別是英國與法國，還有美國的外交政策，從十九世紀末年起以反左為基軸¹⁰。這些國家寧可與極右勢力締結聯盟去對付社會主義的蔓延，卻死不願與左派勢力團結共同打退法西斯的浪潮。1937–1939 年間不斷努力在《國際聯盟》架構內湊合反法西斯國際連線的蘇聯，一再受到英、法的阻擋並吃上閉門羹一事，根據瓊斯的判斷才是希特勒順利發動戰爭的主因。換言之，所謂「綏靖主義」的**歷史教訓並不是「姑息威權，後患無窮」，而是「縱容右翼的跨國勢力才是戰爭浩劫的溫床」**。反過來看，假設將「綏靖主義」反而定義為「姑息威權」的代名詞，這就形同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勢力，二戰前積極扶持並成全德國與義大利法西斯勢力崛起的歷史記憶壓抑並刪除。更嚴重的是歷史記憶被如此刪除的結果就是將遮掩真相的歷史敘述捲入「威權 vs 自由」的敘史大綱，讓世界史染上兩大陣營對決的色彩。由此產生的冷戰思維往往被轉換為全球製圖學的原理，就好像「自由」自成一箇獨屬邊界一邊的「陣營」，或者更準確地說，就好像邊界才是自由的象徵與保障。誠如尼爾森與梅札德拉指出，這就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不對稱性」(asymmetry)的起點，其中「邊界正是那個讓如此不對稱性得以成立的匯合點」(Neilson and Mezzadra 2020, xix)。

從以上兩個例子來判斷，歷史成見現象可以被理解為後設敘事深層問題的表徵。就歷史成見現象本身而言，它可以被視為兩種認知問題的情感結晶，其一就是對於整體性的誤解，其二就是對現存「世界圖式」的認同。想要瞭解這種歷史成見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可以從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兼《批判性中國研究學者》創始人之一柯瑞佳 (Rebecca Karl) 對香港反送中的評語切入：

10 請參見 Jones & Porter (1987) 與 Jones (undated)。

香港，正因為當前以及過去各場運動（例如 2014 年的傘運）曾經採取鬆散且不割席的形式，所以很有可能起著一個指標性作用，指向一條針對資本主義及其不滿展開分析與再概念化的道路。如此再概念化的事情會不會與過往「先鋒黨」的政治運動一樣「紅」呢？鑑於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切（Given all we know now），例如有關革命黨奪權後激進民主的初衷遭受背離，並在暴力、官僚與技術導向的管理主義中以狼吞虎嚥的窩裡鬥終告失敗，難道這是我們想要的嗎？左翼團體《流傘》已經開始針對這些問題展開系統性的思想整理工作（Karl 2020）。

何謂「鑑於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切」？正因為現代社會以支配（權力關係）與剝削（按照資本的邏輯進行價值形成過程）為特徵，所以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切」並不是一種簡單的累積過程，遑論是一種毫無媒介的給出。至少我們不得不承認，「現在所知道的一切」——也就是說，當下的全部人文社會相關的知識，特別是歷史相關的知識或後設敘事——**就如同資本積累體制下任何其他社會整體性概念一般，都無法迴避與資本所幻想的整體性產生互動後被收編。**畢竟，資本最期待將自身的積累體制，從生產到流通，統統再現為「自由市場」自給自足的理性循環，但是礙於其自身的不足及其自身非理性的特質，資本永遠就處於一種依賴「外部性」的狀態，企圖從「外部」引進資本最需要、卻無法自行生產的物品——勞動力，也就是說人類自身。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當下知識整體不但以各種差異性的方式納入被壓抑的歷史差異與各種少數、弱勢「非科學」知識，而且還勾勒出資本自身無法達成卻夢想以求自給自足的整體性形象。

正因此，我們不得不質疑，「鑑於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切」的立場，與「過往的先鋒政黨」到底有什麼不同？過去的布爾什維克黨相信工人階級無法正確辨識社會關係的整體真相，所以才

會認定工人階級就不能缺少先鋒政黨帶頭引領的角色。如今，柯瑞佳的立場雖然好像否定了過往革命黨的總指揮角色，可是光憑她那句「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切」，先鋒黨一般的邏輯隨即獲得了變相的延續。當然，她所指的「我們」與「先鋒黨」不同，並不是一種領袖菁英而是一種以「無大台」為前提的謙虛與倫理態度。弔詭的是，正因此，柯瑞佳就難免創造了一個取代先鋒黨的整體性辨識器，只是這次的知識主體對於當代布爾喬亞階級而言，更加安全一些。

重點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凡是整體性往往無法擺脫被資本收編的命運。這種收編的過程其實就是一種歷史敘述，旨在讓我們相信，呈現在我們眼前的社會整體就是一種如同天然地層一般的必然積累。而這個「天然地層」作為後設敘事，其具體名稱就是「世界」，就好比世界就是一種給出的舞台，等著企業家好好開發並發揮。相反，以「世界」的名義被給出的整體性並非「所知」的中性容器，而是「現在所知道的一切」的意識形態布署，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產生出有利於資本積累的主體性。誠然，**我們這一代假設有什麼當務之急的任務，那至少必須從「世界」這個整體性與資本之間的關係著手，才能開始啟動良性的改變。**

作為整體性的範本，「世界」並不是一個在歷史上先於資本的存有或者一個提供給資本，卻比資本早先搭好的自然舞台。事實上，「世界」之於資本，就跟「人類」之於資本一樣，都是一個弔詭的「外部性」。而作為一個整體，世界與其說是個舞台，不如說是個形象、一種資本的「景觀」。為了進一步闡明這個概念，我們不妨從德博（Guy Debord）有關「景觀社會」的批判理論找出些許靈感。「作為一種整體性，景觀之於當下生產模式而言，又是結果，又是投射」（Debord 2014, 3）。德博對「景觀」的描述跟上文討論「外部性」弔詭特質十分吻合。之所以如此吻合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被稱為「世界」的「景觀」其實也是一種形象。作為資本積累體制的形象，「世界」—或者更精準地說，「世界的圖式」(the schema of the world)—代表一種弔詭的循環關係，讓「世界」這個資本主義的產物被投射到資本主義萌芽之前的階段，一面成為資本萌芽的預設，一面充當資本主義運作的結果。換言之，「世界」又是資本主義積累體制所需的前提(因為資本就是需要將自己呈現為「世界」它才能順利完成勞動力商品化的過程)，又是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所帶來的結果(因為「全球」的概念才是資本主義活動創造出來的產物)。

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大眾文化與知識圈呈現上述歷史成見的現象，追根究柢都是資本針對「外部性」一邊加以壓抑，一邊加以無線上綱的病徵。梁啟智筆鋒下的後蘇聯和歐家麟談論綏靖主義這兩個例子給我們的啟發，在於協助我們看出「外部性」被收編的深遠意義，就好比「跨界」與「劃界」都是資本最自如的事情。這個兼具預設性與歷史驗證性的「世界圖式」—資本賴以活動的「舞台」，就是一個被資本虛擬出來的整體性形象。它的用意如同康德哲學中圖式概念的功能一樣，就是將各種差異性的時間與空間納入一個超驗性的再現架構—一種「圖式」。「世界圖式」可以被視為一種布署，這個布署的運作就是將各式各樣非連續性的時間納入一個普世時間的脈絡(例如，「現代化」或「發展」)，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一種製圖學的機制，將「世界」劃為不同區域及其差異人口。當前左翼最缺乏的觀點，就是從「世界圖式」的問題切入整體性批判的脈絡，進而在此基礎上創造出嶄新的跨國團結與截然不同的劃界實踐。

誠然，左派思想有關「社會關係的整體」(the totality of social relations)需要展開一次重大更新。迄今最大的癥結在於過去的左派理論對於民族形式長期存在根本性的悖論，一面將民族形式視

為整體性的範本，一面將民族形式視為外部性的雛形。理論上如此混亂的狀態導致了社會主義轉型相關的思想，特別是傳統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中關鍵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均受影響，甚至被扭曲納入自由對威權的形式對立。希臘年輕法學家兼東倫敦大學教授齊沃提提斯(Dimitrios Kivotidis)，以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2015年執政後向右急轉彎的經驗為反思的出發點指出，「階級專政的本質並非取決於合法或非法、暴力或和平，而是取決於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這點則證實了『專政』本來是個綜合性的辯證概念，並主要牽涉社會關係的整體」(Kivotidis 2021, 91-92)。顯然，如何理解「整體性」就是社會主義轉型無法迴避的關鍵問題。然而，就在這點上，左派思想似乎往往陷入搖擺，除了將「整體性」視同「民族形式」的代名詞之外，還將「民族形式」同時潛在性地定義為「外部性」的主要參照。在「外部性」與「整體性」之間如此搖擺的「民族形式」難免落為一個混淆的概念，而這種概念上的混淆對於左派思想起著阻礙的作用，讓我們抓不好劃界實踐在資本主義積累體制中所扮演不可取代的關鍵角色。

「外部性」與「整體性」之間的關係長期構成一個解不開的謎。之所以如此可能就是因為它一面隱藏全球資本主義運作的秘密，一面也是脫離資本主義，朝向社會主義轉型的鎖匙。這個難題的挑戰不可低估。至少它意味著**知識生產的批判必須以雙軌並行的方式展開**，一面針對那些被假定為「外部性」地區或人口相關的領域(例如美國所謂「區域研究」area studies)，一面針對那些被假定為「整體性」相關理論的領域。之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為被假定為「外部性」的地區或人口本身是些自然反抗的基地空間或主體，而是因為有關外部性的起源與複製過程的故事始終暗藏了資本主義社會關係自我複製的秘密。

遺憾的是，在共產主義這個曾經構成「時代地平線」(儂曦，

2003, 3)的概念被徹底否定、甚至被絕對罪惡化的歷史定論下，「左翼」的可能意義與「世界圖式」的批判一事完全脫勾，導致批判性知識生產往往無法以那些被假定為「外部性」區域(例如非西方)為理論核心。結果，左翼久而久之就被化約為既有世界圖式內一種人道關懷、代言發聲的再現政治而已(不然就是一種藏在博物館內、隨時有復活危險的怪獸化石)。這當中的關鍵問題，與其說是一次歷史知識、甚至認識論的危機，不如說是世界製圖學一區域分界的危機，而這個分界危機與資本主義歷史發展及其當代複製機制之間的關連，迄今尚未獲得左翼足夠的理論重視。沃克因此提醒我們，「『資本』一詞意指一份社會關係，而那份關係所依賴的步驟就是將對抗性的外部摺入其內部運作」(G. Walker 2019a)。不用說，沃克所謂的「社會關係」絕不受限於一國的格局，而是必須涵蓋由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所形成的「世界整體」。從這個角度來看，以「東方」vs「西方」劃分為世界版圖的認知架構，其實一方面是資本賴以運作的「原料」，一方面又是資本的運作所產生的關係範本。誠然，我們如果想要理解這份做為社會關係範本的整體性圖式或形象，就需要去檢討當前的世界建構所隱藏的種種後設敘事與歷史預設。以歐洲中心主義為例，即使那些歷史預設都可以被理解為「歐洲中心主義論」的產物或前提，這也並不代表解決之道就在於引進更多非歐洲歷史因素即可。誠如沃克所說，「歐洲中心主義的邏輯不僅在於既有而獨立統一體〔例如區域〕之間的階序或排名關係，而是一個對世界整體社會關係的認知圖式。在這個意義上，各種不同的區域、語言、文化與經驗都可以被納入其中，卻不會干預該圖式的運作功能。因此，瞭解這個圖式運作的認知後果非常關鍵」(G. Walker 2019a)。本文的重點之一就是強調，反修例運動以回歸邊界為基調，形同加強資本這方面的「圖式運作」，並進而遮掩其運作的邏輯與世界圖式的意義。顯然，我的用意並不是想要給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發

出一次「歷史平反」的要求。重點是，「資本這份關係」由於運作需求的緣故，就少不了發明「世界圖式」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種」，讓這些假定整體性因素都被捲進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前提，並同時被投射為資本主義發展永無止境的「外部」。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以「現在所知道的一切」—整體性的面貌出現的歷史成見，不僅由反修例運動的擁護者推動，同時也是不少批評反修例運動的左派共同參與的事情。以香港當代托派團體《國際》為例，他們對反修例運動發出極其負面的評價，固然提出了眾多值得討論的宏觀問題(例如香港與國際金融的關係)，可是還是無法擺脫有關邊界與劃界實踐的歷史成見。該團體的立場從世界「地理分界」(geographical divide)出發，形同將帝國主義歷史遺產及其當代延續的國際架構保存下來，並在此基礎之上展開顛倒雙邊位置的批判，力圖讓被假定為弱勢的一邊(即中國)有效對抗強權(即西方)的入侵(Bo & Ding 2020)。不僅如此，他們同時還呼籲「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同上)。兩者加起來的結果，就是注定讓我們看不到世界的「圖式運作」—世界版圖上邊界流變的事實與劃界的實踐。舉例來說，「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區隔，其實根本不是什麼地理性的劃分，而是一些社會實踐與社會關係共同堆砌的組合體，而這些社會關係本身都屬於資本的範圍。畢竟，資本本身並不是一個物體，而是一份抽象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凡是「地理分界」本來都是資本這份社會關係的運作條件與運作產物。《國際》團體一面力圖保存邊界作為對抗基礎，一面將邊界的跨越視為對抗的具體戰略，如此內在矛盾的立場導致該團體之於它所極力非難的反修例運動，反而陷入同謀的尷尬。《國際》的立場從反面切入，意外加深資本積累體制不可或缺的邊界與劃界體制的「自然」面貌，算是扮演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推手。由此來看，香港反修例運動引起的激辯，相當程度上可以視為一次加深當前歷史成見—特別是關於「西方」的成見的運動。

左派的敗北

以上歷史相關的討論雖然膚淺粗俗，了無新意，可是至少可以協助我們體會，無論香港還是全球，「左派敗北」的現象並不限於過去二十年，而是整個二十世紀歷史拋出的難題。左派的挫敗至少可以追溯到 1919 年德國共產黨創始人盧森堡(Rosa Luxemburg)與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被追殺、德共被鎮壓的時候開始。隨後，威瑪共和國以左翼敗北為出發點，施行社會民主主義體制，這被認為是歐洲左翼工運史一次棄守革命路線，改採議會選舉改革路線的先例(Kivotidis 2021, 87)。到了 1960 年代之後，此一趨勢在整個西方左翼圈就佔了上風，讓代議制的形式成為無法跨越、無法挑戰的政治共識。結果，左派的政治戰略就被嚴格限定在盧森堡等人極力反對的代議制路線(Luxemburg 2006, 90)，將希望寄託在階級主導生產關係的司法體制內，漸次爭取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的選項。從這個角度來看，左派的歷史發展其實是一場反覆挫敗長期重演的戲碼。而作為反覆發生的事件，其特性並不在於什麼「起源事件」或「根本原因」，而在於反覆性本身所傳達的意義。這個問題可以從馬克思「原始積累」的概念在過去二十年獲得重大理論更新的角度切入。根據傳統的詮釋，「原始積累」一直被理解為一個階段性的時期，代表資本主義轉型的起點。然而，經過一系列理論更新之後¹¹，左派理論圈一般都認為「原始積累」反而是資本主義積累體制的運作邏輯，會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不斷重演。作為週而復始的運動而不是單次性階段，原始積累的用意在於將尚未「開發」的地區、階層、社會制度、甚至是生命、分子細胞與情感等等一系列「外部性」納入資本主義市場化的社會關係。納入的過程中，這些被納入的對象的

11 相關文獻不勝枚舉，僅此提供貢獻較為突出的，如下：De Angelis (2007), Ince (2014), Mezzadra (2011), Read (2002), Sanyal (2007), Singh (2016), Walker (2011)。

歷史或前身都務必經過重寫與重新詮釋。根據後殖理論家恰克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的分析，前現代的歷史就是這個重寫、重組機制的典範。經過資本積累機制的建立，連資本主義轉型的歷史過程都會根據資本主義本身的認知範疇被重新整理與詮釋，就好比現代社會將自身的種種基本預設投射到過去充當「歷史起源論」(Solomon 2010)。

換言之，原始積累每次發生前的歷史記憶全面受到發生後所建立的認知架構所影響，導致資本的前史就變成一種遺失的記憶。其中的標準典範就是國家的歷史—所謂「國史」。例如，被假定在時間潮流中保持高度一致性與統一性的「民族」，恰恰就是原始積累體制誕生出來的主體，也是一個將過去相關的知識組織起來並投射到過去的分類範疇。久而久之，這個主體性兼認知範疇對於知識生產的影響極其深遠。就「國」(national)與「國際」(international)之間的關係來說，一般都認為世界各個民族的「國家」都先於跨民族、跨國家的跨國關係(transnational)。然而，誠如酒井直樹所說，無論在邏輯上還是時間上，「跨國」(transnational)的概念必須與「國際」(international)嚴謹區隔，將前者排在「國族」成立之前，後者排在「國族」成立之後的位置。所謂「跨國」的狀態，其實往往就是先於，或者說外在於「國家／民族」的建構(Sakai 2018, 71 and passim)。然而，經過歷史知識被一再重組的過程，如此的跨國性(也算是外部性的一種)被遺忘之餘，它更會成為一種幾乎無法再現的對象。基於此，我們可以將「外部性的歷史」稱為一種「虛擬記憶」。所謂「虛擬」之意並非意指憑空想像，而是潛藏於當下、構成當下，卻從當下中反覆被刪除的因素。從這個角度來看，挫敗的思想主因在於左派一直尚未成功破解原始積累過程所透露資本邏輯與外部性之間的互動機制。

就香港的脈絡而言，六七暴動後，親中毛派陸陸續續失勢，

當然也可以被視為左派一次重大挫敗的案例。此後，取而代之的是脫離北京論述範圍、內部流派相當分歧的新左翼(包括諸如老早移師香港的托派，以及新興無政府主義派、社會派等等)。新左翼的崛起深受國際環境兩件事情的影響，其一為西方國家馬克思主義政黨 1970 年代起棄守「革命先鋒黨」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立場，並採納重大的路線修正政策，決定在昔日馬克思主義者稱為「中產專政」的選舉體制內運作。其二則是 1960 年代起不受傳統革命政黨領導的新興民權運動的抬頭。香港 1968 - 1970 年期間掀起《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下詳)關鍵參與者兼《70 年代雙週刊》創辦人之一的莫昭如(Mok Chiu Yu)可以被視為此一趨勢的重要推手。莫昭如從西方留學回港，「為香港的青年讀者帶來了新的視野和思想資源」，根據羅永生的評價就享有突破冷戰二元思維邏輯的功勞(羅永生 2017, 74)。然而，突破之餘，這些深受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棄守革命立場思想影響的個人與團體，與西方社運、知識界一樣，都不斷地陷入各種鞏固「世界圖式」歷史成見的漩渦。尤其甚者，在中國相關的語境裡(無論是中文還是外文陳述)，基本上都以「資本這份關係」之外部性的神秘化為出發點，導致作為資本外部性的「民族」、「文化」與「語言」等一系列假定整體性的社會對象，與資本邏輯之間的內在關連一事，並未受到重視。從這個角度來看，有 67 年暴動的挫敗在先，70 年代到 80 年代初中英談判啟動前的「火紅年代」中，新左翼從崛起

到沒落的起伏過程，其實都是左派敗北的故事大綱。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故事大綱往往只能以歷史記憶虛擬化的面貌出現。所謂虛擬的部分指的不只是左派一系列的挫敗，而是挫敗之後的轉型對重述過去所產生的效果。作為反覆發生的歷史教訓，「虛擬的歷史記憶」一事的啟發並非告訴我們過去堅持「正統」的熱情不足，而是提醒我們，**只要繼續不重視資本那份同時依賴並營造外部性的關係模式，左派就注定一直被迫以壓**

抑重返(return of the repressed)的方式被右派收編。畢竟，右派的策略始終脫離不了將資本的外部性作為實體邊界與想像邊界的「天生」依據，進而對非類即人的共通體展開收編，提出各種各樣「光復共同體」的主張。正是那些不可能呈現於當代語境下的虛擬記憶，才是當前種種不可能性與瓶頸的系譜。而孰不知，香港這個「之間的地方」最大的虛擬記憶，與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其實一樣，始終在於資本與殖民之外，被種種原始積累所刪除的可能性。假設說 70 年代是香港首次提出反資反殖激進訴求的年代的話，那個政治連結的可能性背後同時隱藏著一個被壓抑的虛擬記憶。這個虛擬記憶的具體呈現，下文將針對「中文運動」及其當代記憶做出進一步的分析。重點是，**「解殖」與「反資」結合在一起起碼的意義在於世界圖式的革命性改造。**也就是說，解殖與反資這兩項時代任務的最大公約數，在於破解「資本這份關係」管控資本及其外部互動的布署，以及破解並重組那個被稱為「世界」圖式一系列的邊界與劃界實踐。

以上這些誤解與成見，對於左派／左翼的意義影響極其深遠。簡言之，它們代表著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普遍被認為與諸如民族國家的政治劃分之間並無什麼內在關連可言。這種「不面對」說穿了才是廣義左派／左翼吸收右派對共同體的基本預設的主要癥結所在。而那些歷史成見最直接的後果，就是讓資本主義積累體制與後殖民主義主權之間至關緊要的關連性完全被遮掩。

於是乎，邊界不再是和勞動商品化與廣義生產有關的實踐，而是一種檢驗道德高尚度的指標而已。就香港的脈絡來說，最能代表這一取自右翼深層轉向的表現，莫過人們逐漸接受將政治構成的可能性與保衛香港和中國內地之間的眾多邊界一事連接起來¹²。香港的知識、文化界從2006年天星碼頭事件起，幾乎整個精力與創意全部都灌注在「文化保育」以及中產階級民主再現／代表權的爭取這兩項大任務上，導致回歸邊界的轉向逐漸成為一種政治統識(hegemony)。總之，香港左翼面對回歸邊界呼之欲出的浪潮之際，不是將邊界視為道德問題，就是放棄了試圖從邊界的角度去分析社會關係中的剝削與支配、並運用此一觀點去發明截然不同的政治願景¹³。

香港社會普遍視雨傘運動為分水嶺事件，認為該運動最大的教訓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路線的徹底失敗，「任何體制改革可能」都被港府與中央政府徹底「壓制」(葉蔭聰，2020)¹⁴。相對於那樣歷史敗北的敘事大綱，我反而認為雨傘運動

12 想要瞭解香港反中共左翼在雨傘運動前後重獲社會信任的軌跡，不妨參考由歐龍宇(Au Loong Yu)等人2010年籌組的《左翼21》團體吸收諸如主權式的自治、新移民與身分認同等回歸邊界主題的經驗，便可掌握。請參見《獨立媒體》上〈左翼21網誌〉<https://www.inmediahk.net/user/502775/post>。作為香港左翼的代表人物之一，歐龍宇的立場算是比較重視中港跨界聯盟的可能性。然而，他的觀點以十分傳統的社會學加上冷戰政治科學(例如，「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概念)等方法論作為出發點，最後難免陷入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的刻板。對於歐龍宇來說，瞭解中國的關鍵在於「前現代」文化因素的「滲透」與殘留。例如，中共的官僚體系就是「前現代」文化因素持續作祟的結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與香港的問題歸根究柢都是現代化不足。歐龍宇採取的歷史觀其實就是東方主義刻板印象的標準慣例，它最直接的後果就是讓我們看不到「現代」與「前現代」一樣都是「現代性」的產物。再者，我們一旦將這種東方主義歷史觀與那些社會學統計與政治科學的主權預設熔於一爐，結果更是一個完整的生命權力(biopower)論述。怪不得最後還是會朝向一個回歸邊界的方向去發展。

13 香港左翼團體一個顯著的例外可能就是《自治八樓 Autonomous 8a》那樣堅持從遷徙人口議題切入。請參見：<https://smrc8a.org/>。對於《自治八樓》的歷史總結，請參考 Yashae 2019。

14 曾經參與天星、皇后碼頭的保衛運動與反高鐵、保衛菜園村運動的人士其實早在雨傘運

的挫敗底下還有另一更深層、更久遠的歷史敗北需要注意。如此重大的挫敗，恰恰可以從國際左翼那樣抵賴自身曾積極參與上述那些歷史成見形構過程來解釋。想要否認包括香港在內的國際左派在這類劃界實踐中負有某種政治責任，就等於是判它無期徒刑。我的意圖並不是想把左派描述成注定要失敗並因此才有道德意義的政治理念(套用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說法，那是一種“lost cause”)，更不是想釘下幾個棺材釘讓它盡快消失。儘管我強調左派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之前已經陷入了挫敗一事，看起來像是在重複柯西彥(Razmig Keucheyan)最近透過《左半球：圖繪今日批判理論》(2013)一書所發佈的左翼驗屍報告一般，我與柯西彥的觀點卻有著關鍵性的不同。柯西彥從未如其承諾地描繪出新的全球製圖學。相反，他的分析卻依賴於繼承自殖民—帝國現代性製圖學的區域邊界，只是引進了更多的非西方知識份子的聲音去擴大其「代表性」的範圍。

相反地，我採取的繪圖方式，一開始就對創造出諸如文明和民族國家等種種區域的劃界行為提出嚴重質疑。之所以要提出質疑，並不是因為教條式的解構慾望，而是因為這些區域邊界的複製一事偏偏給資本主義積累機制提供了關鍵的支援，為它賴以生存的抽象勞動再生產一事鋪路(G. Walker 2019b)。這裡或許仍需重提上述那句老生常談：資本無法直接生產出作為商品的勞動力，但是它順利運作的前提反而建立在勞動力商品化被視為一種「自然」狀態的預設上。作為資本之「外部性」的人類，以及由人類所組成的資本主義社會，與其說是資本主義體制中的「例外」，又內又外，不如說是資本主義劃界實踐及其自然化的主體。

動之前就已經開始討論並面對運動失敗的深層意義。請參見周思中(2011)。

第二章：香港界址

運動的翻譯：回歸邊界

觀察劃界實踐運作的最佳領域莫過翻譯。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一些常見口號的翻譯問題恰好可以引為例證，用來探討劃界與翻譯如何並肩齊進。或許有必要說明一下為什麼選用口號當做研究對象。曾留學香港、目前在美國賓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大陸年輕學者趙蒙暘(筆名夕岸)，在一篇批判反送中「右翼轉向」並引起廣泛討論的文章裡這麼認為：

香港街頭的右翼轉向，並不是抽象的香港光復和獨立口號，不是具體的臨時政府宣言，也不是暴力手段的迅速日常化和激進化。口號、宣言、勇武和暴力行為都只是運動中的劇碼(趙蒙暘2019)。

源自堤利(Charles Tilly, 亦作蒂利)社會學的「劇碼」(repertoire)概念，在社運研究裡早已成為了顯學，與本文下面強調的「展演性」(performativity)表面上有些許關連。然而，堤利的方法論正好可以拿來當做一個參照，襯托出本文截然不同的理論旨趣。

根據堤利 2006 年發表的《體制與劇碼》(Regimes and Repertoires)一書的構想，「劇碼」是個相對於固定「體制」(regime)的概念。如果想要從根本上瞭解「體制」的意義，必須參考堤利在 2005 年發表的另一著作《身分、邊界與社會聯繫》(Identities, Boundaries, and Social Ties)。在該書序言裡，堤利清楚指出：

嚴謹來說，我們要觀察互動 (transaction¹)，而不是關係。不同的社會位置彼此間相互轉移能量，即使是顯微鏡下的事。從一系列的互動中，我們可以推論出一份位置之間的關係：一份友誼、一份競爭、一份聯盟抑或其他 (Tilly 2005, 7)。

本文採取的方法論與堤利對「關係」的理解完全相反。堤利將「關係」視為各種「位置」之間互動的產物。因為「關係」相對於「位置」原則是派生的，所以堤利將觀察的對象鎖定在「位置」這個富有原生意義的東西之間的互動上、以及互動關係對「位置」帶來的變動。而本文方法論之出發點可以說是 180 度相反，視「關係」先於「位置」。方法論上的分歧最顯著地反映在對邊界的理解。堤利指出：「身分…取決於我們跟他們的邊界」(Tilly 2005, 7)。本文旨在追蹤邊界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軌跡，從中抓出「我們」和「他們」彼此成立的契機。翻譯正好就是劃界實踐最佳的案例。從劃界實踐的角度著手，我們就不必如同堤利那樣將「人民共同

1 原文“transaction”一詞一般可當「交易」之意。從這個術語的選擇，我們能夠隱約看出堤利乃至當時整個美國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界，本來就存在一些人類學方法論上的預設，將「交易」視為人類互動的原始狀態。眾所周知，尼采對現代性展開的批判當中，人類學知識與語言學知識都是主要的批判對象。相對於當時人類學家以「交易」為人類社會起源的論點，尼采反而認為因「債務」而生的權力關係才是社會的起源。請參見 Lazzarato (2011, 33)。

體」視為一種給定的對象²。假設硬要沿用堤利的概念架構的話，我們或許可以說，作為「劇碼」的口號翻譯所相對應的「體制」就是一個超出一國範圍的跨國翻譯體制。然而，即使如此，堤利強調凡是運動的主張均由「認同」(identity)、「位置」(standing)與「大綱」(program)三種元素構成的此一理論架構，還是無法應用於口號翻譯這個「劇碼」身上。畢竟，以上三種元素都屬於再現—代表(representation)的範圍，而翻譯實踐的理論恰好立基於再現—代表架構無法說明的現象——非連續性(下文詳述)。然而，堤利的社運研究架構，在方法論上防堵了從實踐的角度去批評邊界再現的可能。因此，我堅持認為將翻譯口號視為劇碼一事有所不妥、或有尚待補充之處。

首先，我們來針對由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籌辦 2019 年 8 月 16 日集會的預備工作中出現「英美港盟，主權在民」的口號展開分析。該口號當初出現時就已經搭配現成的英文翻譯：“Stand with Hong Kong and Fight for Freedom!”(與香港站在一起，為自由而戰!)，抑或“Stand with Hong Kong, Power to the People!”(與香港站在一起，權力屬於人民)。前者正好也是協辦單位「我要攞炒」團隊的英文譯名。「攞炒」一詞原本是撲克牌的俚語，有類似「同歸於盡」之意³。「我要攞炒」乃是香港論壇

2 根據 Brubaker，堤利並未去探討國族劃界的問題：“He did not ask about what made the language of nationhood plausible, resonant, meaningful, or inspiring to ordinary people—or indeed if and when it was plausible, resonant, meaningful, or inspiring to them. He did not ask how people who belonged to particular states came to understand themselves as belonging also, or indeed primarily, to particular nations. He did not ask how ordinary people came to identify with and commit themselves to elite-led national movements.”(Brubaker 2010, 379)。

3 有關攞炒一詞的翻譯問題，可以參見趙平復(2019)。有關攞炒的學術討論可以參考 Stephen Chan(2020)與葉蔭聰(2020)。作為政治概念，攞炒的前身在於 2014 年雨傘運動後所謂「焦土派」的崛起，請參見周顯(2018)。香港作家兼記者維塔奇(Nury Vittachi)在《故事的另一面：一場在香港的秘密戰爭》(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A Secret War in Hong Kong)一書中指出，反送中示威者的請願信與標語口號等文獻的英文翻譯，均顯露

LIHKG (中文俗稱「連登」) 上劉祖迪 (Finn Lau) 的會員暱稱(亦稱「攞炒巴」)，從 2019 年 6 月起開始號召鄉民成立「我要攞炒」團隊，旨在動員國際勢力，特別是爭取英國認定中方違反 1984 年簽署並翌年在聯合國登記為國際條約的《中英聯合聲明》。「我要攞炒」早在 2019 年 6 月 11 日在連登上呼籲：「最後，在此溫馨提示香港政府——假如中英聯合聲明被判失效，根據 1841 年穿鼻草約、1842 年南京條約及 1860 年北京條約，英國有權強行回收香港島及九龍半島」(我要攞炒 2019)。顯然，中文與英文口號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直譯概念，而是採取一種當下盛行的「文化翻譯」的結果。有趣的是，這種文化翻譯的格式透過全球英語傳媒獲得了規模可觀的全球散佈。若將此病毒式的文化翻譯中的英文與中文作為一個整體看待，非對稱性的中、英兩句口號及其相關的脈絡便共建了奇妙的等同鍊，**將主權與自由等同起來**。下文將以翻譯為批判媒介，思考「主權＝自由」公式背後的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意識型態與人種差異預設。

與之類似，香港分離主義者梁天琦 (Edward Leung) 的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⁴ 同樣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翻譯體制預設差異的包裝手法去加強其功效。該口號通常(誤)譯為英語作“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解放香港，我們時代的革命)，但中文口號的「解放」概念全由「光復」一詞擔當。眾所周知，「光復」是個歷史悠久的詞彙。比如「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晉書·桓溫傳》；到近代中

出外籍人士參與的跡象(Vittachi 2020, 114, 頁碼為轉檔輸出)。我認為將翻譯關係化約為人種關係反而易於產生嚴重的誤解，讓人誤以為一種人代表一種語言、一種立場。現代性翻譯體制的特點在於，其中的位置，也就是透過「對照形象」(co-figuration)相輔相成的位置，均賴以想像、甚至幻想而成立。從這個角度來看，預設中的「外籍觀點」乃是「本土」建構的內在凝視(internal gaze)，即使有「實體」的外籍參與也並不重要。有關以上術語的進一步解釋，請參見下文。

4 關於該口號政治含意的各種不同詮釋，請參見李宇森(2019)。

國，章炳麟在《〈革命軍〉序》中寫道：「今中國既滅亡于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可見，與其說是收復失去的「主權」這樣的現代國家概念，「光復」一詞在中國歷史上的含義更直接意指「收復失地」。到了民國時期，國民黨在 1945 年從戰敗國日本手中收復台灣，翌年制訂「臺灣光復節」紀念之，確實具有收復失地之意。然而，該黨於 1949 年失勢遷台後，「光復節」隨即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工具，意圖給大陸遷台的主權者合法化，並讓原本的日本國民，即台灣本地人口，產生皈依中華民國的情感。這個「光復」所對應的現實(例如 228 事件與白色恐怖)恰恰是殘酷的，為台灣的民主轉型籠罩了極大的陰影。香港本土派在 2010 年代起開始將「光復」一詞引進他們的抗爭詞彙庫，實為矛盾的表現，同時既喚起又壓制該詞錯綜複雜而多元的歷史涵義與記憶。

「光復」一詞最早進入回歸之後的香港政治行動的詞彙庫裡，可以追溯到梁天琦在 2012 年在上水舉行的一次示威活動中的使用。上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毗鄰中國大陸的一個新市鎮。為反對跨境走私平行交易的水貨客，示威採用了「光復上水！」的口號。雖然水貨客是中、港兩邊的商人，並不只是大陸人而已，可是現場拍攝的照片中，示威者們所舉的標牌上寫著「中國人滾回中國！」(Eric Cheung 2015)，該口號足以顯示回歸邊界的濃厚意味。繼而到 2019 年 7 月「光復屯門公園」事件，「光復」一詞指的是將屯門公園的大陸性工作者趕出公園，這個時候，「光復」的涵義更直接地呈現對大陸移民的道德質疑。如果說光復屯門和光復上水都是具體的「光復」願景，對全香港的光復是否也只能限於這種片面的道德化想像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根據葉蔭聰的分析，「光復」一詞在香港政治詞彙裡跟「驅趕」與「佔領」等詞自成一個系列，因此他認為可以歸納為一種

空間取代時間的觀念轉變的過程(Ip 2020, 104)。如此的轉變形同對開放式未來的放棄，為劃界實踐民主化的可能性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若說「光復香港」是指收回原來擁有的失地的話，原來擁有的本身也許卻並不存在，或者存在的形式並未達成一致，以至於我們無法想像光復能恢復的狀態究竟是什麼，那麼這個「烏托邦場景」的缺席本身可以視為法國哲學家儂曦所稱之為「驀然回首，重建亡失共同體」的情結(儂曦 2003, 23-28, 譯文略微修改)。從這個角度來看，「光復」一詞的引用，確實可以視為一次香港這個多元社群納入由現代性主權所限定的共同體想像的案例。

倘若放在翻譯的脈絡看待，用英文「解放」(liberation)來解讀的情況，僅限於“liberation”一詞意指外敵被趕走的情況，並無法應用於奴隸獲得自由(例如英文“emancipation”)的情況⁵。從這個角度來看，該口號更準確的譯法應該是“Reclaim Hong Kong,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但即使如此，也傳達不出中文原句承載的感染力。畢竟，它讓返回邊界的泛泛訴求聽起來悖論似地變得進步——就像是用歐巴馬的語氣說出川普築牆的呼喚。怪不得香港的裝置藝術家林愷倩(Lam Hoi Sin)於2019年08月25日在其臉書上發表諷刺性的政治圖畫，將該口號乾脆譯為香港版的川普2016年的競選口號，“Make Hong Kong Great Again”(讓香港再次偉大)。而該英文口號確實曾經顯現於2019年的香港街頭上⁶。

在政治構成中，前衛與邊緣不能光看數量比例去定義。例如，在香港主張回歸英國主權，抑或主張美國派軍隊去武力解放香港的團體固然存在，其成員人數據說不到萬人，地位相當邊緣。然而，在政治構成上，「勢／識」比「數」重要，否則香港最大工會一

5 有關「解放」與「光復」的區隔，另請參見第二章註腳24。

6 川普另一口號 America First(美國第一)，早在川普競選前已經顯現於香港。所謂民主派議員毛孟靜(Claudia Mo)與范國威(Gary Fan)2013年創立《香港本土》政黨的英文名稱就是“Hong Kong First”(香港第一)。

親共的香港工會聯合會，就會保持政治行動上永遠的優勢。有別於「數」那易於認出的物質性質，「勢／識」指向的是主體性建構中的動態時間與語言、知識的他者因素。然而，「光復」一詞不容忽視的功效在於其暗含的主權觀念限定並主導了對「自決」訴求的政治想像，讓獨立主權成為政治願景無法跨越的想像邊界。

這點讓我想起香港學者歐特曼(Stephen Ortmann)前幾年指出：「香港之所以民主化不足，主要是因為這個都市缺乏完整國家性的條件。換言之，就是缺乏主權的兩種重要特徵，那就是無法自我決定政治結構，以及缺乏一種免於外力干預的自由」(Ortmann 2016, 109)。歐特曼雖然並不贊成那些主張「主權就是民主化的基本前提」(Ortmann 2016, 115)的觀點⁷，但是，一旦去參考他引證的書目，就不難發現，這種主權之外的民主過程的前提就是建立在另一變相主權的基礎上，那就是美國外交政策對於「民主化」的要求(例如金融市場的開放或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以及「那些成功建立有效民主制度的政體可望最後被頒發(awarded)完整的獨立身分」(Caspersen 2011, 338)。歐特曼引用英國約克大學卡瑟佩森教授(Nina Caspersen)，將國家主權視為一種可以被世界強權所「頒發」的獎品，就意味著國家主權之上還有更高形式的主權。換言之，歐特曼的論點只是將主權從國家或人民共同體的

7 關於主權與民主之間在政治哲學史當中的關係，以及香港過去十幾年興起的各種本土派對於主權的理解與立場的分歧，請參見李宇森(2019)。李宇森總結「三十年來泛民主派爭取雙普選的運動中，一直避諱討論香港的身分政治和民主自主背後的政治意志來源，甚至連主權和民主的關係也不願涉足……」(李宇森 2019)。李文雖然聲稱「主權思索不必然指向港獨」，又凸顯「國族的劃界問題」就是作者屬意的公民民族主義的首要難題，可是文章還是無法避免重蹈現代性共同體思想的覆轍，從同一性與再現的角度去思考劃界實踐。遑論，美國的公民主義以及民主制度的核心價值——自由，始終一直依賴各種以邊界為依據的支配關係(Rana 2010)。結果，李文最後儘管一切還是將國族形式(而不是特定國族)視為政治共同體的規範。更嚴重的，是香港公民國族主義的未來想像，與美國公民國族主義的歷史想像之間，形成了彼此取暖的合謀關係，不但讓美國與香港各自不同的定居殖民主義情結被遮掩，更使得兩地之間的對照關係被神秘化。

層次轉移到更高的全球層次，就好比美國是全球主權金字塔的頂端，其中，國際制度存在主權高低階序的意味十分濃厚。另一種廣為流傳的思路即認為民主化歸根究柢就是一種根植於「人民」、並起源於「人民意志」的表現。因為「人民就是最高權威的泉源」(Caspersen 2011, 340)。然而重點是，無論是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人民意志」，還是具有強烈生命政治治理性意涵的「最高權威」，這些傳統政治哲學概念均將國族形式及其所賴以再現的邊界視為一種實定性的給出範疇。即使特定邊界的位置可以變更或移動，邊界的一般功能也不會因此消失。

對於為什麼用「光復」而不是用香港自己在 1945 年日軍被趕走以後所用的「重光」的說法，受友人的啟發，我有一個不成熟的猜想。香港的中文政治語言在殖民地時代是相當貧乏的，而革命詞彙的發明幾乎也因為殖民地的狀態而沒有發生，以至於直到今天，香港政治語彙還在不斷反覆回收民國、甚至是毛時代中國的革命語彙，如對「光復」一詞的不敏感，導致了歷史認知的錯位。這是否也是一種邊界的時空錯亂？不言自明⁸。

香港左翼團體《夜貓》(The Owl) 雖然曾經試圖將「運動」和「光復」二詞所蘊含的殖民鄉愁區分開來，可是他們並未同時針對「主權」對「自決」所產生的限定作用展開批判。2019 年 7 月抗議高峰時，《夜貓》成員黃漢彤(Tony Wong)發佈評論，指出「光復」一詞無可否認地聯繫著英國殖民統治復辟的訴求。他寫道：「在

8 另一值得一提的案例，就是黃之鋒等人創辦的學民思潮於 2015 年 9 月 26 日舉辦的「重奪公民廣場」活動，將「重奪」一詞納入社運的常用詞彙。學民思潮當年參與反國教運動，與黨國教育直接對抗之餘，反而形同間接肯定、乃至鞏固香港既有的教育體制。孰不知，香港既有的教育體制基本上結合了世俗化教會與新自由主義兩種主幹勢力。再加上反國教運動恰好是香港邊界意識浮上檯面並普及化的重要推手，就不難發現，學民思潮所起的論述效果，就是將反對中共(港府)與支持隱藏於「正常」背後的新自由主義體制納入一個此消彼長的脈絡互動，產生正反比例的政治效應。

大家心中，『光復』僅僅是象徵性。不是真的要求英國重新接管。但以象徵來說，這依然是詞不達意。因為我們追求的甚至不是還原以往的權利格局〔…〕我們要建立一個屬於香港人民的香港」(黃漢彤 2019)。黃漢彤心目中的「大家」雖然不容「割席」，他卻對諸如香港歸英運動、香港獨立運動與香港民族論的存在偏偏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這一事實可以說明：與劃界的妥協式合謀早已成為左翼的總體特徵。「光復」一詞即使加上後現代式的引號，也無法防堵該詞繼續受香港大環境主權慾望的影響。尤其，如同黃漢彤那樣將「人民」視為領土所有者的觀念延續著傳統現代性主權思想最有代表的組合——人民與國家，這種表述與香港大學學生會於 2014 年 9 月出版、由梁繼平(Brian Leung Kai-ping)等人合編的《香港民族論》的論述脈絡完全一致。可見，引號的使用，不但顯示出新詞彙的缺乏，更意味著以《夜貓》為例的左翼團體仍然依賴於已劃定的邊界去思考香港的政治構成。

上述兩種翻譯情境共同揭示出一條由以下三種元素組合而成的時代脈絡：一、左派／左翼的歷史性挫敗；二、返回邊界的欲望；三、主權與自由的那需要經歷翻譯的媒介才能掩飾成自然的假定等同關係。而在香港，最能象徵這一時代脈絡的例子，莫過用筆名忤尚(Ng Soeng)寫作的 Emily Wong 與楊天帥(Yeung Tin Shui)所做的對談。楊天帥是一位年輕的香港藝評家和作家，在東京讀書。由他翻譯的墨菲(Chantal Mouffe)《寫給左翼民粹主義》(For a Left Populism 2018)的中文版於 2019 年 10 月在香港書店上市。簡單來說，墨菲的作品以「政治邊境」(political frontier)為出發點，比起

當前其他左派的思想，更加直接地以「回歸邊界」為己任⁹。這類的論述侷限了政治視野，創造並鞏固了對政治想像的限制。我們來聽聽他們的對話：

結果，這次的譯本確實獲得不錯的反響。坊間反應之熱烈，幾乎讓人誤以為左翼論述在香港發酵已久，甚至已勢成一格。想深一層，才意識到，這股熱切正反映了左翼論述在香港的失落。

實情是，過去十年間，「左翼」在香港過得並不好。

{…}

楊天帥坦言，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實在無法好好說明《寫給左翼民粹主義》對香港左翼的啟示，因為有太多的不確定性。「現在說『左翼』也不知道指的是誰，定位很模糊。即使是以前很怕身分政治的那些『左翼』人士，現在也叫『香港人加油』啦，也沒有人再問『新移民喺邊〔在哪裡〕』。」

{…}

那麼，香港到底需要多大程度的民粹？在楊天帥看來，民粹在香港的發展，甚至可以不劃下限。

「如果這樣講，quote 出來會不會很大錢？」楊想到了甚麼，先帶點無奈地自問，後又很快拋開了顧慮，「我覺得，香港人有

9 有趣的是，墨菲與拉克勞(Ernesto Laclau)的「後馬」理論，在文化研究被引進香港的初期階段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點從羅永生編的《文化研究與文化教育》(羅永生 2010)一書中許寶強跟葉蔭聰兩位學者的論文不謀而合都引用拉克勞與墨菲(慕芙)理論一事，隱約可見。該論文集象徵性高，可以視為知識生產的里程碑。根據陳清橋給該論文集寫的「總序」—〈文化研究十年與「拾文化」系列〉一文，該論文集的主要用意在於「紀念於 1999 年開辦香港以至亞洲首個文化研究文學士學位課程(Bachelor of Arts in Cultural Studies)，並於 2000 年成立了全港(也是全國)第一個文化研究系(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陳清橋 2010, 7)。象徵性如此高的論文集裡面對墨菲與拉克勞的引用，確實可以視為過去二十多年香港文化研究從「後馬」到「去馬」系譜的重要線索。

幾仇恨呢〔這〕個政權，就幾仇恨這個政權系最好。」(忤尚 2019)

由於無力解釋邊界的建制如何深刻聯繫著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再生產，¹⁰香港左翼如同歐美左派¹¹一樣，在過去 15 年間一再屈從於新自由主義「別無選擇」預設下的「現實」，將返回邊界當成政治行動的前提。經過認同邊界並鞏固邊界的文化翻譯機制，香港與西方邊界的兩邊出現了這樣的奇觀：邊界的那邊(即西方)在無知的狀態下去消費他者發出「自由」的訴求，而邊界的這邊(即香港)所消費的訴求則與「主權」相關。這場對外宣傳是為「自由」而戰、對內是為「主權邊界」而戰的反送中運動，顯然包含著一種值得被分析的創造性契機。想要瞭解主權與自由之間的關連及翻譯體制在其間所起的差異作用，就不能不顧及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的意識形態問題。

題外話：國際團結與現代性翻譯體制

上文討論的眾多反修例運動翻譯的案例，大部分都牽涉到國際團結(international solidarity)的可能性。反修例運動參與者常常討論的國際連結的問題，其實也是國際團結的一部份。例如《流傘》這個團體 2019 年反修例運動爆發後隨即成軍，基本上就是一種牽

10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資本」並非一種物品(例如，金錢)，而是一種社會關係的結晶，這些社會關係主要取決於生產模式。阿圖舍(Louis Althusser)的研究從資本作為一種社會關係的角度出發，力圖探討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所需的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延續。這些條件的總稱是「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主要由「國家機器」所確保。換言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的主要功能，就是確保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賴以運轉的社會關係，以相對穩定並順利的方式獲得延續。阿圖舍將這方面的社會實踐稱為「社會關係再生產」(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本文可以視為一次嘗試將邊界實踐納入「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與「社會關係再生產」的脈絡去思考。

11 關於「左派」一詞的用法，請參見第一章註腳 7。

涉國際團結政治需求的現象，其中翻譯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成為團結的基本條件。然而，這些團結與翻譯的努力，大多建立在現代性翻譯體制內的梯度預設，並不構成對它的挑戰，遑論是置換或革命性的改造。為了突破這個瓶頸，敘利亞異議份子薩勒(Yassin al-Haj Saleh)2018年《團結的批判》(A Critique of Solidarity)一文可以引以為鑑，為我們提供一個改造現代性翻譯體制政治關係的切入點。

根據薩勒的分析，團結可以被視為一種跨國關係的制度。其特點之一就是權力的方向性。在跨國團結制度中，權力的流向基本上順著殖民—帝國的歷史差異，從後帝國國家的主體單向流向後殖國家的受體。為了促進並確保方向性的順利運作，團結制度需要培養遠方「事件」的在地代言人。薩勒認為在地代言人的角色類似一種知識、資訊的門衛，可以決定「該揭穿的是什麼，該隱藏的是什麼」(al-Haj Saleh 2018)。而這種門衛的功能所牽涉的層面，不僅是事件的詮釋，也是一種「製造」(manufacture)過程，一方面包含「議題」(cause)從「原料到加工狀態」(from raw state to finished state)的製造過程，另一方面包含「自我製造」(manufacturing themselves)的生產關係(ibid.)。除了在地代言人之外，另一被製造出來的重要角色就是西方託管人。「託管」(custodianship)的功能有類似策展之意，不但可以影響遠方觀眾看到什麼，還可以對更高層次的詮釋與知識生產起著決定性作用。換言之，國際團結制度其實就是一種建構主體性的布署，其中生產關係與權力關係都是關鍵環節。

該布署的主要產品，除了各種相互依存的主體之外，自然還有議題本身。由於全球議題繁多的緣故，每一種議題產品都必須在消費市場爭取市場佔有率。不同議題之間的競爭關係，不但遮掩了每一個團結團體內部的權力關係，還催生受害者依序排列的對

比制度。團結制度的市場機制雖然確實創造了一些主體位置，但是同時也產生了去主體化的弔詭現象。「在這些〔…〕美國與西方的團結市場裡，議題與其所有者被分割(如同資本主義勞動市場將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割開一般)」(ibid.)。隨著去主體化效果的蔓延，團結制度最後加深了「新自由主義的組成、身分政治的崛起，與左翼的全球危機」(ibid.)。

雖然薩勒描述的跨國團結體制表面看起來與狹義的翻譯無關，可是因為牽涉跨國、跨語的再現與代言權相關的問題，追根究柢還是與翻譯之間有無法擺脫的內在關連。作為左右主體位置的市場機制，團結制度有效運作的前提，根據薩勒的分析，是西方左翼對遠方地區的「有限知識」(limited knowledge)。誠如下文「失語」情結的討論所顯示，實際上這不是知識量多寡或視野多寬的問題，而是知識生產當中語言與翻譯勞動建構主體性的問題。然而，薩勒確實有注意到，知識所有權的問題最後傾向於產生一種「壟斷」(monopoly)的格局。

這點放在現代性翻譯體制(下詳)的脈絡裡重新詮釋，其實就指向跨國脈絡中的區域研究，對於研究對象長期行使某種壟斷的再現權，而這個再現權對全球脈絡中的社會關係起著影響深遠的作用。作為一專業領域，區域研究不僅針對特定地理區域從事知識生產，更針對穿越該區域的人口展開主體性生產。位於遷徙人口對世界版圖的重組、離散社群的跨國政治、後殖主權的建立、在地菁英的培植、與全球資本戰略佈局等因素的交叉點，區域研究其實可以被視為全球人口治理技術中專門負責主體性生產與再生產的重點部門之一。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說，區域研究的主要「產品」可以分為知識系列與主體性系列兩種。其中，主體性系列產品還可以進一步分為生產與複製(再生產)兩種面向。在生產面向上，這個部門負責培養一系列相輔相成的主體位置，共同構

成現代性翻譯體制及其經營的對照形象(cofiguration)。而在再生產或社會關係複製面向上，該部門則負責規管現代性翻譯體制的分工體系及其順利的運作。作為規訓(discipline)而言，這個主體性生產部門確立了循環式的因果鍊，頗像阿圖舍曾經試圖用以描述「國家意識形態機器」運作邏輯的「內在性〔或稱結構性〕因果關係」(immanent or structural causality)理論¹²。我在此固然無法針對阿圖塞的因果論提供進一步的說明與檢討，只能先將重點拉回區域研究的社會功能。離岸中國研究，尤其是英語世界的中國研究，之所以站在統識性的位置(hegemonic position)，不是因為其知識生產的成果多麼卓越(儘管這點也不容置疑)，而是因為它可以順利確立並複製現代性翻譯與語言勞動體制下的種種邊界，並在此基礎上確保跨太平洋各種各樣的移動與定居人口的「主體性位置」與「被再現位置」之間所存在的有效對應關係。如此的循環關係當中，「全球通用語言」對主體性生產起著主導作用。所謂「全球通用語言」其實就是一種表面上看似與翻譯無關的普世翻譯機器。這個普世翻譯機器與資本主義交換價值的概念之間存在類比性關係，讓翻譯建構的等同關係成為交換價值在文化、再現層次的範本，一方面確立了普遍等同的抽象條件，一方面設下了特殊主義的位置以留給各種各樣的「國族語言」。美國的中國研究立基於普世翻譯的劃界體制，一邊從事知識生產，一邊塑造包括英文與中文在內的各種差異性的主體性位置，形成全球社會關係與「國際團結制度」的規訓。有趣的是，這種跨國規訓模式，追根究柢與美國定居國族主義的歷史及其當代延伸交織在一起，構成以語言分工體系為面貌的跨國合謀(Solomon forthcoming)。

反修例運動的參與者與觀察家經常強調，這場抗爭運動讓香港人成為國際焦點，提升了香港人的國際能見度，並使得香港人

12 有關內在性因果論，請參見 Read(2003; 2017)、Bruschi(2020)。

獲得更多的國際承認，甚至是提高了香港人的國際地位與聲望。然而，我們鮮少聽到另一種聲音，指出反修例運動對於既有的國際團結體制及其背後的殖民—帝國現代性翻譯體制的預設提出什麼革命性的展望。以《流傘》團體為代表，雖然該團體確實有一些聲音呼籲西方左翼，尤其是美國的，應該要站出來支持港人的抗爭運動，也呼籲香港的民眾應該要反過來積極表態支持「Black Lives Matter」和黃背心(Gilets Jaunes)等西方的社會運動，但是這些聲明並未針對西方／非西方相對位置的問題提出批判並加以實踐，反而頂多只是呼籲打造超越邊界的統一戰線。也就是說，種種聲明並未正視西方與非西方的權力關係、翻譯的媒介與劃界作用、以及西方本身作為製造邊界的機器的特質。上文分析香港反送中相關的翻譯經驗，足以顯示國際團結制度並不是解決方法，而是解殖問題的一部份。作為既有世界圖式的結晶與預設，國際團結制度不僅是一個語言與翻譯分工體系，更是一種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

這點就讓我想起《流傘》成員 Promise Li 在 2020 年末發表的〈「無大台」與香港極右翼的崛起〉一文所引起的迴響與質疑(Li 2020)。原文標題“*It's time for Hong Kong to reckon with its far-right*”與它的中譯標題不同，大致可以譯為「是時候與香港的極右翼算帳了」，其中，「算帳」(reckon with)有明顯的時間考量(time for)意味。我最好奇的一點就是這個時機的問題。自從 2019 年在各個媒體活躍撰稿討論反修例運動的種種，並堅持扮演「國際戰線」力推者的角色、在國際上推崇並凸顯反修例運動中左翼契機的 Promise Li 與《流傘》團隊，為何對運動右翼性質的總體批判拖延到運動早已落幕的 2020 年底才提出？這很可能是因為讀者的感受隨著刊登時機的差異會有顯著的不同。相信讀者能夠感覺到刊登時機可能產生的重大不同。到了 2020 年底美國總統大選進入白熱化階段之後，向來非常支持反修例運動的國際英文媒體不得不

開始報導香港社會中那些與「民主、自由」形象並不符合的因素，從川普在香港高度的支持率到運動的橫向歧視與接近內戰般的市民暴力，不再被粉飾為「一小撮人」的邊緣問題，而突然登上了敘述權平時受嚴謹管制的國際媒體的版面。川普在香港，尤其是在香港的「黃絲」陣營中的高度支持率讓反修例運動精心營造的國際團結條件一時受到嚴重的衝擊，引起觀察家趕緊提筆檢討美國自由派的立場(Julia Chan 2020)。

運動之所以為運動(不只是街頭運動，而是廣義上所有的政治運動)，時機(timing)有著關鍵的作用。義大利政治哲學理論家奈格里(Antonio Negri 2013)甚至辨識出政治運動乃至一切知識活動當中存在兩種關鍵而截然不同的時間，一種為“chronos”(順序性的時間)，一種為“kairós”(稍縱即逝的時間)。用中文來表達的話，就是時宜「合不合」的問題。而根據奈格里的觀點，這些時間向來受到政治勢力的操弄。誠然，右翼對輿論的統識權往往就是從「不合時宜」下手去引起道德恐慌(moral panic)，香港也不例外¹³。極右如今主導的格局不就是這些問題被提出的時機一再遭拖延的結果嗎？

2021年2月21日，《工潮》舉辦了一場以 Promise Li 及其右派相關的論文為主的網路論壇，討論香港右派統識權(hegemony)的問題。作為當時線上的聽眾，我雖然透過問答功能直接提出了「時機」的問題，卻並未獲得 Promise Li 本人的回應。事後思考，

13 一些擁護反送中的「黃絲」政論者總是喜歡在捍衛輿論邊界上用幾近人身攻擊的口吻提出他人言論「不合時宜」的指控。例如，鄧正健的網路文章—〈為什麼梁文道令人討厭？〉(鄧正健 2019)用「不合時宜」去形容梁文道的「誤判」，頗有代表性。對此，梁文道本人早在 2016 年曾經表示坦然接受「不合時宜」的標籤(梁文道 2016)。反送中爆發後，諸如外勞與社會問題、香港的種族(族群)問題、運動內的性別預設問題，美國干預的問題，或者如何團結大陸的社運人士等議題，都曾經被視為「不合時宜」的議題，並招致網路集群勇武的批鬥。

我覺得這個未獲正視的問題凸顯的正是國際團結體制的脆弱與複雜性¹⁴。

這個脆弱性在運動剛爆發時就搶先登場了。赴美攻讀社會學博士的香港作家陳婉容(Sherry Yuen-yung Chan¹⁵)與 JS Tan 於 2019 年 6 月底在美國知名左翼期刊《雅各賓》(Jacobin)發表〈香港最後一役〉(Hong Kong's Last Battle)一文，指出「雖然社會主義者並未構成本月運動的主體，他們確實扮演了關鍵角色，塑造運動的型態並提供有別於主流的陳述」(Chan & Tan 2019)。有關運動內部的政治分歧，〈最後一役〉一文的用詞相當籠統曖昧。除了「被自由派佔據」(dominated by liberals)之外，運動隊伍裡還有香港的左翼社會主義者與右翼本土主義者兩大隊伍。雖然後者被稱為「數量比起左翼更大」，但是比例多少並未詳論。重點是，左翼扮演了前鋒式的「關鍵角色」(crucial role)。如此戰略性的曖昧，置入《雅各賓》這份英文期刊的脈絡，顯然起了一個塑造形象的作用。呈

14 《工潮》舉辦的論壇過了幾個禮拜之後，Promise Li 參與的另一場論壇紀錄刊登出來了，其中 Li 坦承〈「無大台」〉一文「惹怒了運動參與者本身」(Lausan & Critical China Scholars 2021)。

15 陳婉容 2014 年有關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的論文集—《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可以視為上述「歷史成見」敘事大綱的實例。這些歷史成見往往旨在針對當下意識形態提供正當性的基礎。

有趣的是，《茉莉花開》一書將中東的政治動態化約為「普世價值」的追求，並在此基礎上將之視為香港的參照。該書收錄了原為 2014 年刊登的博客文—〈本土香港——誰想像的共同體？〉，其中作者陳婉容聲稱，「香港人恐懼中國大陸在這城『殖民』，對於新移民時有「經濟包袱」的批評，其真正正源自對於自我身份的不確定。然而觀照歷史，我寧願相信這數年興起的民粹主義，不過是香港經歷重建的陣痛。」(陳婉容 2014, 226)。站在「歷史潮流」的高度將新移民所承受的種種日常傷害與痛苦，通通塞進一個刪除細節、去名化的偉大進程，這如果不是一種犬儒的話，什麼才是呢？相對於右翼民粹主義這個「手段」而言，「重建香港」這個高尚的目標變成了一個將日常歧視與社會暴力加以合理化的藉口。如此的進程觀，與美國的「信念論國族主義」(creedal nationalism)，如出一轍。

現於不懂得中文、沒有一直追蹤，抑或根本無法追蹤香港中文語境論述動態的外文讀者群面前的形象，就是「這是一場左翼先鋒的運動」。兩年後，Promise Li 針對英文讀者提出「是時候與香港的極右翼算帳」的觀點，讓我們 2019 年 6 月當下的疑慮全部獲得遲來的證實。由此可見，透過翻譯的屏障呈現出香港左翼的形象，本來就是一個牽涉時機的敏感問題。2021 年網路論壇上 Promise Li 將反送中運動中出現的右派現象解釋為大型社運的「內部矛盾」(internal contradiction)(Li 2021)，與 2020 年《批判性中國研究學者》成員之一索拉斯(Christian Sorace)嘲諷國際知名左翼印度作家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曾經訴諸「內部矛盾」的說法去迴避中國政府打壓工人一事(Sorace 2020)，構成了明顯的雙重標準，就好比一邊的「內部矛盾」有正面意義，而另一邊的「內部矛盾」只是混淆視聽的騙局。〈最後一役〉一文結尾最後一句，以頗有英雄主義色彩的口吻呼籲：「香港的社會主義團體必須率先領導反抗」(Chan & Tan 2019)。在兩年後的 2021 年反觀這些前後敘述差異的情景，就難免讓人覺得 2019 年「左翼扮演關鍵角色」的說法多多少少具有跨國「漂左」(leftwashing)的作用，即使並非作者刻意操弄。值得注意的是漂左的順利執行以雙方的參與為前提條件。假設沒有《雅各賓》的積極參與，「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由中間偏左勢力主導」的國際形象根本就不可能成立。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跨國建構。重點不是哪些團體、個人或政府比較值得信賴或者當做連結的對象¹⁶，而是**連結的過程能否革命性地改變國際團結制度本身**？正因此，薩勒提出的結論，就是整

16 「跟誰連結？」大致就是美國學者兼《批判性中國研究學者》成員 Eli Friedman(2020)提出的問題。作為一種方法論，Friedman 的主張等於以「認同」為跨界互動的基礎。根據 Friedman 的立場，國際學者(亦即站在時空「邊界」另一面的人)面對他國發生的政治運動時，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找出「認同對象」。有關這個問題的批判與另類可能，請參見拙文(蘇哲安 2016)，特別是註腳 22。

個團結制度需要被拆除與取代，對我們的啟發非常重要。團結制度的拆除與取代，意義非常深遠。畢竟，將空間邊界與時間轉型等同起來去劃分「進步」與「落後」的區域或人口，進而將世界版圖畫為生命政治分類排序圖表一事，才是殖民—帝國現代性最具代表性的動作。這種意義下的西方就好比一種「命令中心」(Sakai 2005a, 16)，其發布的命令與其說是「西化」或「現代化」之類的不得不進行的轉型，不如說是**這些不得不進行的轉型都必須被納入翻譯與語言勞動的分工體系而獲得相對好認的位置與身分**。

定居殖民主義與「香港界址」

97 年後香港存在一種聲音，認為自身相對於中國而言是處於「賤民」(subaltern)的位置，承受著比英國殖民經驗更為暴力的二度殖民。這方面的問題，有很重要一部份源自香港《基本法》的雙重性質。作為保障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種種邊界的法理基礎，《基本法》另一實質意義就是凍結香港一切制度性解殖的可能性(Vukovich 2019, 12)。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是《基本法》對於金融資本，尤其是英國的金融資本進出自由的保障，讓以英資為首的資本主義勢力 97 年回歸後不必撤資，不必轉手。從這個角度來看，《基本法》的政治效果之一就是讓定居殖民主義的問題被置換到金融資本的自由上，導致定居殖民主義相關的情結，因為被遮掩而得以延續。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 2020 年 7 月 1 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強制施行後，香港形同進入戒嚴一般的常態性緊急狀態，決定性地強化了「二度殖民論」。從此後，一種仗著國家機器武裝力量的「失語」時代隨即啟動了。根據李宇森的判斷，《港區國安法》及其相關的七項具體執行方針，確實形同一種戒嚴法，頗像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所稱之

「常設性例外狀態」的措施(李宇森 2020)。一般認為該法代表「中國」與「香港」間的邊界被弱化、甚至被取消。但是從現階段(2020年)的角度來看,我認為該法反而比較像是將既有的國內邊界加強並武裝化的舉動,而不是取消。就好比**中央政府打算將香港設定為政治隔離區一般**¹⁷,並在**香港境內成立極權國家式的「雙重國家」(dual state)行政架構**¹⁸。而國內邊界的武裝化,無疑是一種殖民主義治理技術,特別針對所謂分離主義做出回應。誠如法國北非殖民史學者勒庫葛蘭梅綜(Olivier Le Cour Grandmaison)指出,「例外狀態」本來就是殖民主義治理性的特徵之一(2005)。從這個角度來看,指控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形同殖民政權的觀點,在《港區國安法》於2020年7月1日生效後一夜間獲得了無法否認的鐵證。竟然還有中國背景的學者隨後響應鄭永年2019年提出「二次回歸」的概念(鄭永年2019),主張可在《港區國安法》的基礎上,啟動一套「二次回歸」的解殖政策來「收復人心」(楊錦麟2020),可以視之為與殖民共謀的惡例之一。

痛定思痛之餘,所謂的「二度殖民」論述,不應該抹去本土人口與定居殖民主義的歷史轉移關係,及此一事對於邊界思考的啟發。這種關係曾在1990年代出自香港的資本家、經理層和專業人士在中國操練的「北進殖民主義」中達到頂峰。眾所周知,香港定居殖民主義的歷史經驗並不受限於白種英籍人口。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2009)一書中提出「殖民共謀」的理論架構,已成經典。然而,我認為羅永生的殖民共謀論需要圍繞以下的觀察

17 Peter Lee 曾經在2019年12月23日的《中國威脅報告》上預期反送中落幕後,中央政府在「秋後算帳」的過程中就會回應以政經隔離(political and economic quarantine)的手段而不是「收復人心」的方式。(Lee 2019)。

18 雙重國家(dual state)乃為弗倫凱爾(Ernst Fraenkel)1938年在德國起始動筆、1941年在德國流亡中完成的著作之標題,該書針對納粹黨的法理干預一事展開分析。

做出更新與補充：主動參與定居殖民的華人,不僅包括與港英殖民當局合謀的華人菁英,還包括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外地的「當地華人」人口。而更新與補充的工作可從以下兩點切入。

其一就是將湧入香港的遷徙人口,也就是湧入被清朝永久性割讓的香港島與九龍界限街以南這些殖民地的人口,從英籍外僑與不列顛帝國其他殖民地臣民,到從清朝帝國逃離出來的華人難民,通通視為定居殖民主義者。不僅這些湧入的人口具有差異性的定居殖民者身分,輸出的人口亦復如是。眾所周知,19世紀開始,香港成為華人遷徙人口的重要出境港口。許多華人及其後代從內地移入香港之後,轉而移民世界各地,特別是世界其他白人定居殖民主義的國家,如同美國、加拿大與澳洲,以及東南亞。定居殖民主義學者自從2000年代中半,大致已經達成了共識,認為非白人移民也具有定居殖民主義者的身分(Lawrence and Dua, 2005)¹⁹。香港來的華人移民身上的定居殖民主義情結,反過來對於留港華人人口的影響,雖然尚待研究,但是不可低估。遑論,如同美國這種白人定居殖民主義的國家,存在「移民的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immigrants)的歷史現象,利用美國移民去干預原祖國的政治、經濟事務,並協助美國的全球治理(Levine 2020)。總之,英國皇家殖民地香港的華人人口,即使定居殖民經驗與白人不同,還是具有一種定居者的歷史身分。

第二點,就需要先追溯到陳奕麟(Allen Chun)對新界土地革命與宗族實踐演變的經典研究。陳奕麟"Unstructuring Chinese Society: The Fictions of Colonial Practice and the Changing Realities of "Lan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中國社會的去結構：殖民實踐的虛構與香港新界「土地」現實的演變》一書徹底顛覆了離岸中國學研究領域過往對香港新界的神話。在陳奕麟的介入

19 Malissa Phung(2011)對 Lawrence and Dua(2005)做了重要的補充與修正。

之前，中國研究向來把佔了香港幅員 86.2% 的新界看成是紮根於土地，且未曾受殖民主義影響的傳統中國社會的原型。陳奕麟的研究首度衝破了這個學術神話：「曾經驅動正在萌芽中的市場社會動態的那些虛構物，不但對於現代性的引進帶來了嚴重後果，對於傳統而言，就起了同樣的物化作用」（Chun 2000，170）。受限於當年現實主義認識論的辯論，陳奕麟堅持認為本土概念反映當地語言使用的習慣，並從這個反解構主義方法論的預設立場去抓住本土社會的真相。結果，陳奕麟的本土主義方法論(Callahan 2002，221)局部性地遮蓋了社群屬性語言本身的虛構性與內在翻譯問題。之後，另一次重大突破來自於張少強(Cheung Siu Keung)的《管制新界：地權、父權與主權》(2016)。在羅永生那邊被描述為英國殖民當局與華人菁英間的共謀，在張少強筆鋒下反而成為一種跨階級全民參與的歷史運動。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在地人」社群基本上是個殖民主義人口治理的虛構。實際上，土生土長的「在地人」人口比直到 1970 年代，也就是回歸談判啟動前十年，才開始成為香港人口的多數，而這個五方雜處的人口在語言上的異質性相當高。關鍵在於，「在地人」的虛構論述將知識生產的認識論面向和香港內部邊界的法理面向結為一體。

1898 年大清與大英兩帝國簽署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條約，將深圳河以南，九龍界限街以北的土地還有一些外島一起劃為「新界」並租賃給英國。行政上，新界跟香港島與九龍之間一直保持著清楚的「界址」劃分。對於新界，大清、民國或是人民共和國不但從未喪失過主權，而且即使在英國管轄之下，「新界」也一直保持著特殊的行政地位。此舉形同將「界址」（邊界）永久性地內嵌於皇家殖民地香港的內部政治形構過程。這樣一來，由內部「界址」建構出的「土著性」(indigeneity)就變成了一種針對人口管理，並結合了知識與法理雙重邊界的治理技術。不管這是出於權宜之計還是精心設計，其效果在於把難民、移民以及流散人口

等各個階層，通通轉化成在地人口。並在此基礎上發明「傳統中國社會」的認同形象，作為白種定居殖民人口得以成立的不可或缺的對照組。如此精妙的人口治理布署，遮蓋了華人人口自身為定居殖民主義者的特質。這種特質與二十世紀中半湧入香港難民潮孕育「沒有領土疆界」、沒有「永遠的家」的「海盜敘述」（羅貴祥 2016，132）結合後，就像猛虎添翼。畢竟，香港宗主國不列顛帝國就是依靠如同德雷克爵士的海盜行為而成立²⁰。而同樣的海盜精神，確實就是美國白人定居殖民主義的重要系譜。香港華人不僅是定居殖民主義的受害人，同時也是定居殖民主義的創意詮釋者與行動主體。而這些具有自身能動性的華人定居殖民者，並不只是像羅永生所指出的僅限於菁英階層。菁英的共謀之外，廣大而多元的華人人口普遍而積極地參與了定居殖民主義的主體性建構過程。縱使是上下關係嚴明的父權體制，沒有弱勢一方默許的參與的話，也無法成立。換言之，廣大湧入英屬香港的各個社會階層的華人移民，而不只是華人菁英，在殖民當局的精心布署下成為香港「在地人口」的過程中，都順便脫胎換骨成為名符其實的定居殖民主體。

20 香港「海盜敘述」研究的先驅羅貴祥相關的討論(羅貴祥 2016)，專門集中在清朝史蹟及其現代文學中的再現。羅貴祥並未將英國海盜史的系譜及其種種大眾文化再現納入討論的範圍，令人費解。畢竟，海盜的歷史與海盜的再現都是香港定居殖民主義的重要環節。眾所周知，19 世紀鴉片戰爭時，英、美、法等海盜在香港外海的活動十分活躍(Blue 1965: 73)。而就海盜的再現問題來說，對於當代香港文化印象最深刻的，是香港人十分熟悉的美國好萊塢海盜片(swashbuckler)。海盜片先驅的澳洲演員埃羅爾·弗林(Errol Flynn)不但曾經旅居香港，在香港吸食鴉片並召妓，且其電影至少如《俠盜羅賓漢》(The Adventures of Robin Hood)早在 1948 年就在港放映，與香港大眾文化的淵源匪淺。海盜大眾文化形象與白人定居殖民主義之間的關連十分密切。著名電影公司華納兄弟電影公司(Warner Bros.)的四位創始人之一傑克·華納(Jack Warner)曾經這樣形容弗林：「你知道弗林，他必須要麼打架，要麼幹女人」(Burr: 152)。弗林螢幕下的為人，其實就是白人定居殖民主義主體性的縮影，立基於一種佔奪與攻擊性強烈的力比多美學。也許香港「海盜敘述」研究，作為一種華語文學現象，並不需要納入這些事情，但是，這並不代表我們不需要廣義「海盜敘述」的研究。羅貴祥將研究對象限定在「本土性」的格局上，似乎是一種先驗的設計，易於導致香港華人自身的定居殖民主義情結相對隱形。

誠然，想要瞭解當代香港左翼棄守劃界實踐批判一事對左翼政治立場的深遠影響，必須從定居殖民主義的歷史切入。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放棄這個課題最直接的後果，是一種壓抑的重返。於是乎，一種政治幻象開始作祟，讓邊界以類似於莫騰(Fred Moten)和哈內(Stefano Harney)在《地下公社：逃犯的規劃與黑色研究》(The Undercommons: Fugitive Planning and Black Study 2013, 17)一書令人印象深刻地稱之為「包圍」(the surround)的方式發揮作用。「包圍」指自身遭受到土著的圍攻與入侵的一種特定想像，是定居殖民者的特殊幻想，其用意在於賦予定居殖民者施暴於土著一事正當性。

被包圍的幻想在歷史當中有跡可尋。從保衛天星碼頭運動(2006)對凝視(gaze)社群的預設起²¹，到毒奶粉事件(2008)以及隨

21 一般認為香港本土主義政治之所以崛起是北京中央政府的「霸權」所招致。我反而認為這種歷史詮釋偏忽視了港人的能動性。被視為本土意識崛起的開端性事件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可以引為例，特別是其對「凝視」(gaze)的建構。此一論點是根據曹文筆著，〈回顧保衛天星碼頭清拆運動——一場自發的運動〉，《文化研究@嶺南》2007年3月一文(http://www.ln.edu.hk/mcsln/4th_issue/criticism_04.html)。根據這篇文章整理的文獻，運動參與者葉蔭聰與朱凱迪刻意採取了從社群認同的角度重新詮釋都市參與的方法論。作為一種知識選擇，其背後的動機確實是可以理解的，那是為了反駁庸俗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機械式階級觀。然而，以社群認同取代階級，並在此基礎上引進「凝視」(gaze)的概念為證，讓「凝視」無法迴避地染上了社群邊界的濃厚意味。這點就直接呈現在遷徙人口對角線(diagonal, 參見 Moulier Boutang 2001)被排除的問題上，僅剩本地社群與強權之間被本質化的差異。而其他社群，例如外僑與外僑，抑或新移民，均未納入。這樣一來，「凝視」的差異被簡單地理解為空間上的社群區隔，而不是具有時間性的社會實踐。畢竟，在拉岡(Jacques Lacan)或沙特(Jean-Paul Sartre)的著作裡，「凝視」與「他者」的存在有關，但是這個他者所起的功能，往往在於打亂均質性自我建構。有趣的是，葉蔭聰在運動脈絡對「凝視」的應用，與他數年前的學術立場形成鮮明的對比。在1998年〈邊緣性與混雜性的鬼影：文化批評中的「香港認同」〉一文中，葉蔭聰有關「凝視」的討論，主要是針對電影學者邱靜美(Esther C.M. Yau)掩飾當時香港與內地之間存在的權力關係。在批判邱靜美之餘，葉蔭聰總結指出：「為了打造一種作為受害者的香港人民身分〔…〕『他者』，也就是說大陸，必須被置放在一種外在且野蠻的暴戾領域。〔…〕在此，我想要強調的，是我們應該要更加瞭解我們並不太『混雜』的『自我』身分和我們對『他者』並不太慈善的態度」(Ip 1998, 52)。葉蔭聰從凝視的

後的走私交易所造成香港嬰幼兒奶粉的嚴重短缺(2012)，對於高度依賴移工褸姆的香港資產階級所造成的心靈創傷等等一系列事件，刻劃出被包圍的幻想的軌跡。甚至存在一個名為「中共殖民香港資料庫」的粉絲維基(Fandom Wiki) (其英文名稱“Save Hong Kong From China”可譯為「從中國手中拯救香港」)，以「消滅邊界」、「人口清洗」、「經濟侵略」等條目建構出一個計畫性的生命政治浩劫的虛構。

當然，最清晰的例證莫過於關於中國大陸「蝗蟲」入侵的橫向種族主義論述。集中體現在《蘋果日報》於2012年刊登的一則由群集募資的整版廣告上、2014年2月16日的「廣東道驅蝗行動」，以及2014年刊登於《新報》類似的全版廣告。香港居民或許並不清楚「蝗蟲」這個「迷因」(meme)是個植根於殖民主義與反共主義歷史記憶的混合。1950年12月11日的《時代週刊》雜誌封面是一群蝗蟲從毛澤東的面孔後面湧出(圖1)。在殖民主義的歷史中，對蝗蟲的指涉通常追溯到法國耶穌會士譚衛道(Armand David)。據說，他曾用這個詞描述陷入貧窮且被戰爭撕裂後過度開採自然環境、導致其惡化的中國人民。不過，由於我在譚衛道電子化的著作中搜尋未果，此說法暫時無法得到第一手



圖1 美國《時代週刊》1950年12月11號封面

權力關係切入族群關係的建構，時隔八年後處理的方式不一致，非常耐人尋味。在追蹤葉蔭聰各種立場轉變之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天星碼頭抗爭幾年過後，葉蔭聰又表示他與「文化保育」運動曾經一直保持了一定的距離(葉蔭聰 2010, 127 起)。

的確認。唯有二手著作確實如此記載了「蝗蟲論」的出處²²。

香港輿論界過去十年「蝗蟲」這個迷因的病毒式傳播，透過數位平臺擴散(Ong and Lin 2017)與媒體作秀效應，透露定居殖民主義透過倒置投射的方式壓抑了自身的歷史性，就好像香港的華人口本身並無定居殖民主義經驗與情結可言。作為一種殖民主義的主體性技術，「包圍」顯然是一種能生產出真實效果的幻覺。其中結合了想像的能動性與壓抑的創構性。這種特殊的結合，可以從「溝淡」一詞(可當「補倉」之意)的變化看出。這個原本用於表示股票市場買空的口頭語，自從2010年代起和「左膠」一詞一樣，開始佔據香港大眾文化想像的重要位置。

作為新的流行語，「溝淡」一詞意指當地人口被「外來的」中國人沖淡血統之意，香港部分人士因為開始幻想「被包圍」，自然就產生「被滲透」的焦慮。結合投資心態、歧視的恐懼與歷史的壓抑(畢竟香港華人本來都是「外來人口」)於一爐的「溝淡」一詞的廣泛流傳，反映出「包圍」的幻想富有極高的生命政治情感內涵。結果，邊界不但染上了「最後一道防火牆」的緊急色彩，就好比可以劃上「文明」與「野蠻」之間的界限，而且幻想還有擴散到分子的微觀層次，港人血液面臨被滲透、沖淡的危險。

香港的定居殖民主義歷史經驗，假設與大英帝國另一領地—巴勒斯坦託管地展開對比的話，是很有啟發性的。正如《部分人的正義：法與巴勒斯坦問題》(Justice for Some: Law and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2019a)的作者艾拉卡特(Noura Erakat)在一次訪談中的總結：「復國主義原本是為了修正和回應歐洲將猶太人從白人中驅除出去的現象…然而，復國主義運動對此所做出的回應並未從對付白人至上的體制入手，而是將它內在化了」(Erakat 2019b)。

22 Archibald John Little, *Mount Omi and Beyond: A Record of Travel on the Thibetan Border* (1901, 257)一書引用譯者(Armand David)神父的觀點，認為中國人有種「蝗蟲般的習性」。

根據艾拉卡特的觀點，復國主義運動的歷史意義其實是一種變相的西方幻象²³。畢竟，二戰前猶太人的歐洲白種身分曾經被英國主流社會否定。主導主流社會意識形態的英國白人至上帝國主義者在白種與歐洲地理之間劃上等同關係，建構西方幻象之際，猶太人從中被排擠並列為一個非白種、非歐洲的社群。如此被排擠於白種歐洲之外一事其實就等於猶太社群的生命政治次第被降格。復國主義者認為，想要重回白種歐洲世界的唯一法門，似乎就在於攫取並佔據一份歐洲「之外」的領土，以辯證法的方式去否定之前的否定。復國主義者一心致力於脫亞入歐的宏業，力圖讓巴勒斯坦那塊土地脫離「非歐洲」的想像位置，建立一個標榜「歐洲價值」的新國家—「以色列」，進而恢復猶太人的白種歐洲身分。復國主義那樣的辯證策略雖然算是一次變相入歐的捷徑，可是卻成了對於猶太人被排擠的歷史經驗最大的諷刺。

復國主義對於西方幻象的肯定與鞏固背後隱藏的生命政治動機，與香港華人追求自決的情形非常類似。畢竟，後者突然被1981年頒佈的《英國國籍法》剝奪了標準的英國國籍。該法針對國籍和公民身分創造出幾個差異性的類別：「其中有一類是『英聯邦公民』(Commonwealth citizenship)，它去除了英聯邦和香港的英國國民在聯合王國居住的歷史權利」(Tyler 2010, 62-63)。1981年的《國籍法》必須被看成是導向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準備工作，它開啟了關於英國公民身分持久性的生命政治。用伊莫金·泰勒(Imogen Tyler)的話說，這是「在設計構想上」刻意導向「失敗」的公民身分：「英國內部喪失公民權的人口存在(例如香港華人)並非由於設計缺陷導致的意外不幸，而是給整個英國公民權體制奠定基礎的刻意措施」(2010, 61)。通過一個象徵性的舉動，英國在清楚知道那將成為中國的問題的情況下，才在

23 有關西方幻象，請參見 Sakai (2005)。

香港推進代議制民主；而且是直到修訂英國本國的國籍法、排除了香港人之後才這麼做。這一舉動在象徵與制度層面上，將萌芽中的香港代議制民主(更遑論英國本身行之有年的代議制民主)與制度性種族主義的歷史情結結合在一起。兩者的複合體持續發酵並擴散至今——正如奴隸制的歷史仍在影響美國自由主義的建制，抑或巴勒斯坦的種族隔離和歐洲排猶仍影響著以色列的建制一般。

有趣的是，不同地區的定居殖民主義可能形成某種互動，甚至是合謀的關係。例如，2019年感恩節當天，香港的團體對川普當天所簽署的兩條涉港法案表示感恩而舉行的示威。在白人定居殖民主義意味濃厚的日子裡，同樣也是定居殖民區域的香港，數以萬計的人聚集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示威。當時舉起的美國國旗和「肌肉男川普」海報數量之巨，只有在川普競選活動現場堪與之匹敵。就數量而言，如前所述，香港的左翼討論中，「勢／識」與「數」的區隔問題，似乎一直沒有獲得正視。

一個指標性的例子，則是嶺南大學文研系教授葉蔭聰於2019年10月，在網路上回應趙蒙陽一篇批評反送中為一場右翼主導的運動並因而引起廣泛討論(甚至被譯成英文並公布於《流傘》網站)的網路文章。秉持「數」優先於「勢／識」的預設立場，葉蔭聰指出，種族歧視問題在2019年的香港社運，與2011年相比，前者比較不嚴重，更沒有「擴大化的跡象」(葉蔭聰2019)。然而，即便採用類似算術平均數的方法，力圖說明那些美國國旗、港英殖民旗與川普海報都只是一些邊緣團體的現象，也無法讓這種跨國定居殖民主義合謀關係消失。唯有訴諸文化翻譯機制才能達到那樣的效果，透過翻譯將主權與自由等同起來，並同時遮蓋那個等同的過程。

假設說定居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主權與自由的等同假設之上，那麼我們不妨參考黑人激進傳統出身的當代傑出哲

學家—錢德勒(Nahum Chandler)在《X——作為思想問題的黑人問題》(X—the problem of the negro as a problem for thought)一書中所提出的有關主權與自由的觀點。錢德勒認為，主權本質上需要從自身與奴役的關係上來理解，而非與自由的關係上。這就是「主權與被奴役之間的關連的問題」(Chandler 2015, 28)。

根據現代自由主義傳統²⁴，主權與自由之間一般會被認為存在著某種等同關係。主權就是自由的基礎，自由才是行使主權的具體體現。我透過錢德勒的問題意識才頓然明白，兩者間的連續性唯有從白種定居殖民主義的角度切入才能確定。假設換一個角度，從奴役的角度出發的話，兩者間非連續性的關係就會馬上顯現。**現代主權與奴役制之間的合謀，不僅是歷史事實，更是一種形式的問題。**前者必須依賴一種人民共同體的形式才能確立；凡是人民共同體，都無法迴避將「人民」理解為與其他人群之間存有某

24 美國各個不同領域的學者，如同法學研究學者 Rana(2010)、歷史研究學者 Gourevitch(2015)、泛非洲研究學者 Roberts(2015)與哲學學者 Chandler(2015)和 Warren(2018)等過去十年內的研究，開闢了一波再思考「自由」的浪潮。有別於自由主義主流傳統將自由定義為「不受干預」，Gourevitch 接下了「共和主義」的另類思想傳統，主張將自由定義為「不受支配」，進而在此基礎上納入勞工的自由，包括擺脫薪津制度與就業市場等自由。Roberts 從黑奴解放到實現自由的過渡經驗，針對主流思想的「不受干預」與非主流的「不受支配」提出批判性的修正，指出另類自由在於奴役「逃逸」(marronage)的時間經驗而不是「逃逸」的目的地。Warren(2018)從存有論的角度出發去思考黑奴制度留下的歷史創傷，並提出超出經驗論的觀點。面對黑奴制度不僅畫出了人種區隔、更將特定人種列為財產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市民社會」的歷史事實，Warren 指出：「我認為，將自由視為一種機遇經驗，只不過是浪漫人本主義(romantic humanism)的戰略。[...] 奴役與自由之間的區隔，唯有在一個將解放(emancipation)化為自由、並將自由化為權益的浪漫主義敘述中才能成立。作為典範，所謂「自由黑人」的啟發純粹在此，因為沒有任何權益足以光復(restore)黑人的存有——而如此的光復(restoration)動作其實只是個詭計。」(Warren 2018, 90-91; 刪除線為原文附加)相信讀過 Warren 對於「光復論」的否定之後，讀者對於「光復 XX」的口號形式就會產生不一樣的看法。正因為黑人曾經被列為財產，而自由主義主流傳統將自由定義為財產(包括自己的身體在內)不受他人干預的處置權(disposition of property)，所以 Warren 才會認為，將權益的確立與保障視為黑人獲得自由的途徑一事會帶來無法迴避的矛盾，致使市民社會難免延續黑人的存有遭到否定的恐怖狀態。

種種類差異(specific difference)的實體。一旦開啟種類差異的大門，現代奴役制的人種差異預設便成為可能。此隱藏於主權之中的人種差異前提，就是錢德勒所稱的現代性的「基礎設施的組織」(Chandler 2015, 20)。作為基礎設施的組織，現代主權將自由視為與社群邊界息息相關的權益，讓邊界成為實現社群集體「自由」的必備條件，就好像自由是特定社群、相對於其他社群所擁有的集體權益一般。以美國歷史為例，主權與人種差異兩者間的關係，醞釀了一種以邊界為基礎的自由觀，因為「自由不斷受到〔外在〕勢力來勢洶湧的圍攻」，所以「內部自由就需要依靠外部支配」(Rana 2010, 46)。根植於生命政治基礎設施的主權，具有甩不掉的悖論特性。而正是這種特質在主權與自由之間起著決定性作用，同時切斷了兩者間平滑連續的可能性。除非像白種定居殖民主義那樣，將自由限定為一群人——(例如白種社群的自由)相對於另一群人——(例如被奴役黑人的不自由)。面對奴役的歷史正義問題，我們很可能將批判的矛頭指向「西方」這個曾經支配世界並行使最高主權的地理區域，進而將「西方」與「白種人」等同起來。然而，我們一旦將現代性的種種社會關係歸納為「白種西方」支配世界的格局，以下的關鍵問題反而會消失：「西方」與「白種人」等範疇的存在，以及兩者間的假定等同，是否先於支配世界的歷史過程？面對這個問題，我們最後必須承認，所謂現代性，不是別的，正是建立「白種」與「西方」等假定統一性範疇的過程。換言之，主權與種族論述息息相關，而現代中文以「主權」來當作外文“sovereignty/souveraineté/souveränität/soberanía”一詞的翻譯實在太貼切，因為它凸顯了現代主權作為主從關係與奴役制度的根本關連。也就是說，主權的悖論源自於「人種」及其派生的「民族」、以及這兩個概念所透露的特殊性與普世性的合謀關係。被虛構為非白人人種的人若想將主權佔為已有的話，例如成立黑人的主權，就必須要肯定人種差異體制中「主權」與「人種」的

關連性，縱使最後成功取代了被虛構為白人社群的殖民統治者的位置²⁵。在解殖運動的歷史潮流中，主權獨立被視為解決「白種西方」支配問題的標準答案，實則並未切斷主權與生命政治基礎設施——也就是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之間密不可分的關連。

與資本主義不同，奴役制就是將勞動者的身體直接商品化。然而，相對應於資本主義積累體制的現代主權，基本上建立在公民具有自由意志的預設上。公民作為勞動者身分所享有的這種自由，也就是勞工相對於就業市場的虛設自由，是使得資本無法將人的勞動身體直接加以商品化的關鍵。現代主權與奴役制的關係受到了勞工自由論虛構的媒介，讓資本主義勞動力商品化的過程因而得以運轉。

放在一個具體的歷史脈絡去思考的話，主權與奴役制的關係就是美國法學學者喇訥(Aziz Rana)重新詮釋美國國族主義歷史演變的重點。根據喇訥的分析，美國現代史可以理解為一種從定居殖民國族主義(settler colonial nationalism)到公民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的轉變過程。這個過程的主要政治效果，就是讓美國這個表面一直堅持反帝立場的國家可以悖反性地跳躍自身的解殖過程，讓定居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寄居於公民國族主義的外殼。今天看待美國的人，尤其是美國人自己，大概都會不記得，美國「定居帝國」的國家制度被賦予兩種任務：

其一是幫助種族上被界定為本部人口(insiders)獲得自治與經濟獨立的解放條件。其二，為了支援如此的總體計畫，制度的設計就是盡量從土著與非定居者人口，尤其是非洲奴役及其後代，萃取亟需的土地與勞動(Rana 2015, 266)。

²⁵ 海地的黑人奴隸18世紀末發起革命建國，首度立憲之際，1801年的憲法第三條提及「自由」意指「法蘭西人」的身分一事可以引以為證。

源自1940年代瑞典學者梅爾達(Gunnar Myrdal)的信念論(creedalism)，後來為美國保守派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我們是誰？：美國國族身分面臨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書接棒，經喇訥批判性閱讀之後，便成為了喇訥用以分析美國定居國族主義自我更新意識形態的利器。喇訥的批判性閱讀指出，將美國憲法視為歷史性的突破是信念國族主義(creedal nationalism)的特徵。從信念論國族主義的角度來看，美國憲法代表啟蒙普世主義思想在歷史上首度獲得實現的案例。這種歷史性的「第一」，讓美國憲法被賦予一種「完美無暇」的色彩之外，還讓美國霸佔世界上獨特、甚至是例外的位置：

這個意識形態架構[...]不但讓享有典型特權的美國本部人口可以確保其政體的制度結構——一種日益完成的定居計畫，而且在國外還可以伸張一種日益增強的權威(Rana 2015, 268)。

信念論國族主義的巧妙之處，在於此一石兩鳥的功效足以構成一種全球人口的治理計畫。一方面假借憲法幾近完美的信念奠定一種進步主義的論述，主張各種剝削與支配現象只不過是現存社會關係的臨時瑕疵，在時間的進步運動中終究都會獲得糾正，一方面開始在國際上以捍衛自由作為己任，並利用此概念作為帝國擴張的理據。這種格局到了二戰後美國躍升為全球帝國之際，便提供了一種對內、對外四海皆準的意識形態原則。它不但確保了根植於私有制與歷史佔奪制的白人特權，還確保了美國的世界領導與世界警察角色永續地染上捍衛自由的色彩。作為遮掩延續性的定居國族主義醜陋歷史的手段，信念論國族主義不但讓美國成為他國人民嚮往的公民國族主義典範，還可以扮演國際上唯一具有最高邊界裁決權的超級強權與主權例外。喇訥總結過去幾年的研究成果：

我的工作集中在冷戰時期成形的特定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認為美國向來堅持著獨立宣言的原則：自治、普世平等與個人自由。信念論平常具體意味著相信市場資本主義、美國憲法的幾近完美、與美國海外帝治的正當性等。伴隨著這一切的就是將種族關係的改革單純視為一種形式歧視的法律問題，並認為美國正在逐漸克服，並終究會完成其本身自由主義的真理。這種信念論的信仰(creedal faith)數十年來構成了美國國族主義的核心，也是主導中間偏左／中間偏右共治體制的主要意識形態計畫(Rana and Purdy, 2020)。

反修例運動將政治焦點放在法治的細則上，多少顯示出香港社會與美國信念論國族主義之間存在某種轉移關係。一方面，香港內部對美國公民國族主義的認同與嚮往，是在全盤接受美國社會尚未展開解殖事業的歷史壓抑之下形成的。另一方面，香港人尋求與美國政府和個別團體或個人達成國際連結，往往並未顧及美國友人對普世價值的堅持依然包含許多被壓抑的定居殖民因素。

當前全世界各種社會矛盾加劇，自由相關的意識形態爭議日益白熱化，我受喇訥的啟發，將此一現象視為一種病徵，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國族主義，都是在尚未啟動實質解殖過程的基礎上延續著帝國國族主義的制度性因素，特別是白人特權的因素。西方國家形式解殖後，將自身蛻變為標榜公民國族主義的自由民主體制，可以視為一次品牌形象重塑的過程。該重塑過程讓西方國家得以壓抑帝國與定居殖民經驗的近代記憶，並壓制國家種種制度的種族歧視起源。隨後政治效果就是西方後帝國家將自己呈現為國際舞台上自由的捍衛者，不需要展開自我解殖的制度革命。

而正是這些因素，對於國際團結制度起著畸形的作用。毫無疑問，許多西方知識分子接受了這種位置的引誘，將自身與世界的關係幻想成一種不存在邊界可言的統一戰線，共同捍衛普世價值。

然而，他們所拒絕面對的事情，就是自身的立場是建立在一系列從殖民主義那所繼承的制度性不對稱關係，例如語言與翻譯勞動的分工體系。有別於非西方知識分子那樣從制度面被迫把英文等後帝語言作為知識生產與知識消費的必要工具，尤其以知識消費為甚，西方知識分子，或者說，那些在制度上將自己的身分直接連結到「西方」的知識分子，完全可以免除相同的要求。區域研究專家看似除外，但細想起來，西方的區域研究專家，例如中國問題專家，在關鍵的知識生產問題上，也依然被允許繼續依賴著不對稱的語言勞動分工體系來確保他們的發言資格與制度位置。西方知識分子迄今可以繼續站在語言分工體系優勢的位置上，就足以顯示他們在知識生產的實踐上，而不是知識對象的認識層次，尚未投入全面解殖的行動。他們的位置往往依賴那些被迫從事西方語言知識生產與消費的非西方知識分子的種種語言與翻譯的勞動，以及依賴翻譯與語言工業中建立在嚴重性別與種族不平衡之上的勞動成果。

值得強調的是，對美國帝國國族主義的政治構成來說，邊界扮演了無法取代的角色。喇訥指出，「邊境的問題就是讓我認定從定居殖民主義的角度去理解美國是如此重要的關鍵理由」(Rana and Purdy 2020)。從定居國族主義到公民國族主義的歷史壓抑過程中，邊界一直都是美國全球治理的關鍵治理技術。

透過這些歷史的回顧與重新認識的過程，我們不難發現自由與主權之間非連續性的狀態。主權並非自由的保障；自由亦並非主權的體現。為了掌握這層關係，錢德勒主張採取他稱之為「去沉降」(desedimentation)的方法。其中關鍵在於遵守一種「雙重的動作」(double gesture)：凡是用於對抗白種「純種論」的認同，務必都包含著無法馴服的差異，也就是下文即將分析的「非連續性」關係。而由此產生的問題意識——也就是徹底解除人種差異布署

的嘗試，往往需要透過「激動的爆發」(agonistic irruption)才會顯現。我認為錢德勒所說的「激動的爆發」可以理解為同一與差異梯度之外，非連續性因素出其不意的出現。正因如此，錢德勒才會強調「曖昧性的維持……又是一種政治，又是一種實踐的藝術」(Chandler 2015, 18-19)。這裡所謂的「曖昧性」，可以理解為一種針對邊界的介入。換言之，真正的自由並不在於主權的掌握與行使，而在於從總體上拋棄由邊界的單邊配置產生的政治主體。

現代主權誠如哈特(Michael Hardt)與內格里(Antonio Negri)所說那樣，將那些原本構成主權的關係物化(reify)，並通通轉換為所有權的對象(Hardt and Negri 2001, 95)。這點恰似資本並非一物品，而是一種社會關係一樣，甚至可以說，主權其實就是資本的類比性延伸。正因此，兩者間形成了歷史互補關係，讓主權國家成為成全資本積累的最佳社會組織方案。為了打破主權、資本與人種這些將社會關係(特別是非連續性的關係)化約為獨立存在事物的現代性支配布署，我們迫切需要建立批判劃界實踐的視野。

香港藝術創作中的邊界

在本章節結尾前，為了凸顯對邊界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我想簡單討論香港藝術家兩部值得參考的視頻創作²⁶。

李俊峰(Chun Fung Lee)的視頻作品《界限／南北 Boundaries》透過歷史假設的想像，呈現了內、外各種邊界對於社會組織所起的決定性作用。這部極富洞察力與前瞻性的作品，於反修例運動

26 邊界在香港過去二十年的藝術創作中佔了重要地位。其中包括的《暴力邊界》(Samson Young, Liquid Borders 2012 - 2014)、菲律賓移工 Xyza Cruz Bacani 的攝影作品、「港漂」學者兼藝術家潘律的《港城三記》等知名藝術家與創作。電影方面，從馮峰 1950 年的《細路祥》起，香港的導演對邊界議題的重視一直持續發酵(請參見 Chu 2020, Weng Kit Chan 2020)。

轉為大眾運動前一個月問世²⁷，相當程度上可以視為瞭解整場運動的鎖匙。視頻情節從 1980 年代回歸談判啟動時去著手提出另類歷史的假設，假設當時談判破滅，使香港陷入了與冷戰時期的柏林一樣被分割成南北兩塊區域的命運。從中間隔著一道「香港牆」的狀態說起，李俊峰探討邊界任意的改變對於身分可能產生的無法預期的根本影響。雖然該作品並未針對劃界實踐本身，但還是非常成功地讓人瞭解到：邊界作為社會實踐往往意味著凡是邊界均具有任意性與移動性，以及存在於香港社會內部的我稱之為「香港界址」的現象。該作品是有助於瞭解反修例運動的整體脈絡的必看佳作。

雨傘運動之後最能代表回歸邊界的運動所帶來的另類想像萎縮的藝術作品，莫過黃宇軒(Sampson Wong)與林志輝(Lam Chi Fai)二人組成的「打氣小隊」(Add Oil Team)從 2016 年 5 月 17 日



圖 2 李俊峰 2019 年 5 月視頻創作《界限 / 南北 Boundaries》截圖

晚上開始，每晚在香港最高的大廈(環球貿易廣場，簡稱 ICC)外牆上投影的視頻裝置藝術《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六十秒的朋友(Our 60-Second Friendship Begins Now)》。其中最後一個章節《倒

27 反修例運動雖然 2019 年 3 月早就正式啟動了(本人當時還加入了聯署反對)，可是直到 2019 年 6 月 9 日才開始成氣候。李俊峰的作品《界限 / 南北 Boundaries》2019 年 5 月問世。

數機(Countdown Machine)》，顯示距離 2047 年 7 月 1 日零時零分，剩下的秒數時間。所謂「六十秒的友誼」所傳達的概念是一種典型的後現代性反諷，透過反諷去建立一種犬儒視線。這種犬儒視線所瞄準的對象，就是帝國自由主義思想大師約翰·斯圖爾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所謂的「惻隱的共同體」(community of sympathy)。在穆勒那邊，惻隱之心是現代國家共同體的基礎。

《六十秒的朋友》表面上想要呈現的是一國兩制大期限對自主權的侵蝕，以期喚醒人民共同體的自覺。然而，由於後現代自我嘲諷的犬儒意味的介入，作品的意義可以說完全逃脫了藝術家的原訂計畫。即使黃宇軒當時宣稱「香港的未來應該由香港人作主」，可是《六十秒的朋友》這個作品太過執著於呈現「大期限」帶來的「不自由」，所以將焦點放在鄉愁感的具像化(空間化)而不是「朋友」所意味的社會關係。當然，友人 vs 敵人的組合，從施米特(Carl Schmitt)到毛澤東都被視為人民主權共同體基礎。但在此我想強調的是「朋友」一詞所代表的社會關係。現代脈絡中的社會關係，因為往往包含許多非連續性的社會因素在內，所以必然包含一種開放未來的契機，這種開放未來的契機恰恰被黃宇軒和林志輝的構想掩蓋住了。這點就導致了藝術家標榜的「人民作主」的概念完全被犬儒主義顛覆。與其說《六十秒的朋友》見證「不自由」的到來，不如說它反而見證新自由主義時代共同體缺乏未來想像，僅存懷舊鄉愁的窘態而已。遑論，2015 年國際知名的中國藝術家曹斐在 ICC 摩天大廈上的視頻裝置作品《樂舊·圖新》，早已納入了倒數計時的畫面，《六十秒的朋友》相形之下缺乏創新。總之，在面對轉型模式迫切需要發明新形式的時代任務之際，《六十秒的朋友》呈現的不是創作人期許的人民共同體自主權的必要，而是創新未來想像本身的犬儒危機。《六十秒的朋友》正式上映當晚，藝術家無預警地將作品整體名稱改為《倒數機》一事加深了犬儒的意味。誠然，《倒數機》以「亡失共同體」為形象，

無意之間標示出在還沒有「倒數完畢」前，另類未來的想像其實早已消亡了。而其消失的主因不是 2047 年的大期限，而是當下另類社會願景的缺乏。這種自廢武功的概念，隨即變成了雨傘運動之後，「非自願選擇」論述對於回歸邊界一事所展現的拜物化執著，將時間化為空間的限制。



圖 3 《倒數機》官網截圖 <http://addoilteam.hk/countdown/>

第三章：翻譯的生命政治

回歸邊界與翻譯的生命政治

根據葉蔭聰對於他 2020 年發表的英文著作 *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的中文介紹，香港本土派「想像及實踐著一種族群味道更濃的政治，我…稱之為族群統治(ethnocracy)，以族群之名守護邊界」(葉蔭聰 2020a)¹。「守護邊界」的問題多少也反映在葉蔭聰英文書名的中文翻譯——〈香港身分新認同〉。原作者提出自身著作的譯名固然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可是從翻譯的角度來看，兩者不盡相同。由於「identity politics」一詞在英文詞彙裡被當成慣性詞組，甚至可以縮寫為「IdPol」，所以原著標題中作為修飾語的「新」字，就會自然被理解為針對「身分政治」一詞的修飾語，而不是單獨針對「身分」或「認同」。這樣一來，英文

1 有關「族群統治」一詞的含意，除了去質疑特定族群專用民主的概念之外，葉蔭聰還完全迴避了一個關鍵的問題：後帝大國「例如法國、英國與美國」為什麼「都是族群統治制度強勢的推動者」？(Morjé Howard 2012, 162)。說那些軍事強國都是「推動者」(advocates)未免太過委婉，畢竟可能如同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持與軍火援助那樣，有殖性支配戰略佈局的用意。重點是，「族群統治」與定居殖民自由主義的關係乃美利堅治世全球治理的技術。

書名的正確中文翻譯應該是《香港新興的身分政治》(以下簡稱《身分政治》)。然而，作者自己提出的中文翻譯方案，將身分政治這個慣用詞彙刪掉，並用「香港身分」代替，就好像一個給出的香港身分起了政治更新的效果一般。將「身分政治」這個負面多於正面色彩的詞組從標題中刪除的中文譯名，基本上不可能反過來譯成英文，畢竟「身分」與「認同」都可以是英文“identity”一詞的翻譯。如此微妙的差別其實貫穿葉蔭聰橫跨中、英兩種語言的寫作實踐，形成英文對外、中文對內的兩種界線分明的發話模式。

作為一種差異分布機制，現代性翻譯體制常常產生耐人尋味的分歧現象。例如，意志相關的敘述裡，中、英之間存在耐人尋味的差異：

中文：「香港的社會文化認同漸變為一種『權力意志』，一種掌控自己、周遭環境以至他者的集體渴求，認同宣稱背後就是意志。它有點像哲學家盧梭說的普遍意志，一種不可分割的共同體的想像……」（葉蔭聰 2020，粗體另加）。

英文：I argue that Hong Kong's new wave of nativist activism is a project of forging an ethnocentric governing subject with an imperative to control the city's imagined and physical boundaries with China. What lies at the heart of this imperative is a biopolitical will to administer population flow.” (Ip 2020, 54, 粗體另加)。(我主張，香港新一波的本土社運主義就是一種打造族群統治之治理主體的計畫，承載著管控這個都市與中國之間各種想像與物理邊界的令式。該令式的核心就是一種管理人口流動的生命政治意志。)

顯然，「普遍意志」與「生命政治意志」這兩種針對意志的限定方式相左甚遠，前者出於自由主義社會契約論的傳統經典，

後者則源自反自由主義的批判脈絡。從後者的生命政治的批判角度來看，凡是「普遍意志」，跟主權一樣，都是一種「法理的意識形態」(Foucault 1997, 33)，其真實面貌需要在生命政治的層次中尋找，但是葉蔭聰並未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有趣的是，英文原著完全找不到盧梭相關的討論，「權力意志」指標性哲學家尼采的影子更是空中鳥跡。重點是，香港反送中所展現的「意志」到底是「普遍意志」還是「生命政治意志」，在葉蔭聰那邊根本沒差，反正一樣都是「政治現代性的開端」(葉蔭聰 2020a)就對了，就好比一切都可以訴諸普世轉型了事。即使自由主義批判的工具箱引進了如同生命政治那樣的批判概念，葉蔭聰始終執著於普世轉型的模型。有趣的是葉蔭聰 1998 年的〈邊緣性與混雜性的鬼影：文化批評中的「香港認同」〉一文對於現代性作為一種「宏偉敘事」(grand narrative)的特質以及對香港「北進殖民主義」的批判 (Ip 1998)，與 2020 年的立場形成了鮮明而矛盾的對比。不知這種矛盾是否足以說明葉蔭聰為什麼在回應趙蒙暘的最後，坦承「請原諒我的回應帶有極大的犬儒主義無力感 (我有時也原諒不了自己)」(葉蔭聰 2019)? 身為《香港獨立媒體》創辦人之一的葉蔭聰 2019 年給法輪功媒體《大紀元》背書一事(香港大紀元新唐人聯合新聞頻道, 2019)，不是犬儒是什麼? 畢竟，根據美國 MSNBC 的報導，《大紀元》是全世界臉書川普廣告最大贊助商(Collins 2019)，而川普自己對媒體的抨擊，以及其散播的各種謊言與謠言，從未罷休。媒體人竟然幫一位徹底藐視媒體的美國總統背書，不是犬儒是什麼? 又，左翼加入右翼主導的大眾運動並與右翼狐唱梟和一樣的口號(Ip 2020, 136)，不是同流合污的犬儒是什麼?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何式凝(Petula Ho Sik Ying)將葉蔭聰的書寫視為一種「情緒管理」策略的觀點給了我不少啟發，讓我清楚看到葉蔭聰書寫裡兩個平行的軌道，其一為「情緒管理」，其二則是「邊界管理」。「情緒管理」是知識分子的「無

力感」所引起的錯綜複雜的反應；「邊界管理」則是社群想像所引起的右翼轉向。依何式凝的判斷，兩者間的扣繫點在於葉蔭聰英文著作《香港新興的認同政治》中對於右翼轉向本土派的描述：「本土主義的選擇似乎是非自願的」（Ip 2020, 80）。換言之，葉蔭聰訴諸「邊界」去執行「情緒管理」。根據葉蔭聰的理解，相對於香港的政治發展與政治構成的問題而言，本土主義者並沒有什麼能動性可言，就好比他們遇上了無法跨越的欄杆。而這種欄杆恰好與葉蔭聰接受右翼本土論述以空間化的邊界作為政治構成的依據（Ip 2020, 54）一事所起的作用一樣，是為合理化當代左翼的右翼轉向的根據。作為一種方法論，「非自願性的選擇」可以跟傅柯的思路做鮮明的對比。眾所周知，為了抓到自由無時無刻存在的契機，傅柯寧可接受一個沉重的代價，讓權力關係滲透一切人與人的關係，即使是最親密的情人關係或家庭關係也不例外。正因為傅柯認定權力關係無所不在，他才可以有效避免陷入「非自願性的選擇」而刪除能動性。否則，一旦如同葉蔭聰那樣，將別無選擇當做抉擇行動的正當依據，我們怎能在各種不同「非自願」的社會主體之中去分辨真偽與輕重？葉蔭聰將「非自願性選擇」作為政治構成的出發點，追根究柢也算是一種選擇吧，而這種選擇最後呈現對自由主義「殘酷的執著」（cruel attachment）以及悖反性地自我否定。

術語翻譯的差異之所以引起我的興趣，一方面是因為，葉蔭聰英文著作指出香港主流社會本土主義其實是一種牽涉邊界生命政治的判斷非常正確，一方面是因為，我認為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種種核心概念與形上學預設，通通都形同一股具有壓倒性優勢的論述勢力，一不小心香港的生命政治困境就會被悄然轉化並呈現為自由主義對抗威權主義的傳統鬥爭。

許寶強早在《資本主義不是什麼》（2002）一書中就討論過類

似的問題，值得我們在此參考。該書第五章〈翻譯與措辭：自由經濟意識形態在香港的傳播〉，針對香港當時一些知名的經濟學家展開分析，例如被認定為市場經濟理論大師的學者們——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系前主任張五常（N.S. Cheung）與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前系主任及榮休教授雷鼎鳴（Francis Lui）。該章揭露這些學者如何通過譯介的手段去建構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許寶強精彩的分析涉及到金融化資本虛構的一面，讓我們深深體會**翻譯的劃界功能與金融資本的關連**²。以張五常與雷鼎鳴為代表，「這些經濟學家用中文和英文寫作的方式也截然不同」（許寶強 2002, 112），他們利用翻譯與差異性平行書寫去打造意識形態的權威，進而將香港通俗小說，尤其是武俠小說的觀念詞彙，納入譯介的脈絡。結果他們創造了一種「經濟學的小說世界」，「把小說和『事實』合二為一」（許寶強 2002, 117）。這種被許寶強一針見血地稱為「經濟學的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根據他的判斷，「恐怕是西方自由經濟神話在香港得以維持的重要原因」（許寶強 2002, 122）。假設將許寶強敏銳的觀察應用在 18 年後葉蔭聰的案例上，難免產生令人錯愕地似曾相識，右翼民粹主義的翻譯布署與意識形態像幽靈一般地復活、作祟。

《香港新興的認同政治》一書及其周遭翻譯問題所揭露的矛盾，恰好可以再次驗證許寶強 2002 年時的分析方向的價值。葉蔭聰的英文著作中雖然多了一些中文介紹中所沒有的那些對香港本土主義的批判成分，但是對於生命政治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關係，書中幾乎沒有問題意識可言。最能代表問題意識之缺乏的兩點，

2 這點其實早在 1930 年代就已經獲得了左翼作家茅盾（沈雁冰）的注意。其經典著作《子夜》將小說創作與金融投資並放在同一個敘述脈絡，同時呈現金融資本虛構的本質與小說創作虛構的本質，以及兩者間必然的關連。《子夜》不但是二十世紀的理論先驅，還提供了解釋 21 世紀香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參考值。有關茅盾文藝創作的先驅理論，包括翻譯理論、虛構資本等議題，請參見江曉璐（2018）。

莫過作者對於本土主義「存在式威脅」論(existential threat)的處理方式，以及作者對於香港共同體建構的信念。

「存在式威脅」一詞的出處雖然並非英文原著，而是出於中文介紹短文，但是其主要內容呈現於原著第五章〈保衛都市：本土主義與政治存在主義〉，特別是其中以「存在式鬥爭」為標題的部分。在原著的結語裡，作者總結「香港這個身分瀕臨身分的消失(an identity on the verge of losing its identity)，而民眾剩下唯一的選擇，就是去對抗當局」(Ip 2020, 136)。香港本土意識成功塑造了「我們的都市正在死亡中」³的形象一事在《身分政治》一書裡被列為一種「存在式威脅」，其主要基礎就是身分的消失，而不是人口的具體滅亡。香港所面臨的這種「存在式威脅」可以與書中描述另一類似的「存在式威脅」形成對比。例如，葉蔭聰聲稱「北京高官與官方傳媒對分離主義的處理往往呈現超出分寸比例(blow out of proportion)的傾向」(Ip 2020, 82)。分離主義在中央政府眼裡所形成的威脅，由於易於超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範圍，引起全國規模的骨牌效應直到國家四分五裂徹底崩潰，所以在當局的眼裡確實達到了「存亡相關」的門檻。但即使如此，也並不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各個人口群體在國家崩解後會就此突然蒸發。從這個角度來看，分離主義確實帶給北京當局「超出分寸比例」的幻覺。然而，與北京的主權恐懼相比，葉蔭聰並未一視同仁地指出香港所感受到的特殊「存在式威脅」，可能同樣也有超出比例之嫌，甚至包含虛構與幻覺的成分。「身分的消失」其實是身分的轉變，即使是個非常痛苦而相對暴力的過程，也應該要與十九、二十世紀各種種族清洗、牽涉生理意義的滅絕事件嚴謹區隔。也就是說，「存在式威脅」有程度的不同。畢竟，

3 超級人氣影集《天與地》(2011年)第七集，DJ Dr Dylan 聲稱，「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普遍被認為是影集經點金句之一，也立即成為大眾文化的口頭禪。相關討論可以參見 Ip, 2019 頁 98。

香港的一些社群身分消失的危機，不能與迦薩走廊巴勒斯坦人集體被大規模奪走生命的處境相提並論，更無法與二戰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相比。

在生命政治研究的脈絡裡，這些問題至關重要。誠然，**凡是主權慾望就代表一種恐懼的幻想與假想受害的情結**⁴，而不同主權彼此間的包容與理解十分艱鉅。面對各種相剋的主權恐懼之際，或許我們期待擬出一個客觀尺度去論證其中的輕重。問題是，這種比例尺本身就是建立在一種潛在性的生命政治運作的基礎之上，形同一種**生命政治基礎設施的對比架構**(biopolitical infrastructure of comparison)⁵。眾所周知，生命政治這個概念在1970年代末年被傅柯引進，本來就是針對自由主義契約論與主權論的批判。作為一種批判性的範疇，生命政治這個概念旨在揭露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從契約論到主權理論種種形上學預設所遮掩的權力運作，進而呈現自由主義假包容、真暴力的一面。然而，生命政治研究如今日益集中在身分認同的問題上，確實有忘卻初衷之嫌。作為二戰後自由主義治理技術當中的中堅概念，身分認同確實與生命政治有內在關連，但是作為一種特地針對自由主義的批判性範疇使用，生命政治研究假設將身分認同這個範疇視為一種本質上中性的概念，終究會失去生命政治批判原有的立場。以傅柯之後的生命政治研究知名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為例，他從存有論的深層基礎出發去批判自由主義，並訴諸「特異性」(singularity)的概念來取代「個體」的概念⁶。不用說，一旦作為契約論政治哲學

4 此處「幻想」與「假想」等詞彙的用意並不在於否定其真實性的含意，而是想要強調想像之於國族建構不可取代的角色。

5 「生命政治基礎設施對比架構」一詞最早的使用案例應該是 Cheah (2009, 539)。為了補充這個概念的理論基礎起見，我認為它可以分為兩種平行的裝置組成，其一乃為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之間的對比(參見 Ma 2017, 7)，其二為翻譯再現體制創造出的種類差異(參見 Sakai 2013)。

6 例如：特異性「被佔奪一切身分，為的是收編屬性本身」(Singularities "are expropriated

概念基礎的「個體」被置換，整個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就會倒塌。

語言、解殖與「中文運動」

那麼，著重解殖的人要如何回應這些深深印刻在現代性語言與翻譯勞動體制上的殖民因素呢？

一個可能的回答來自嶺南大學文研系教授羅永生〈冷戰中的解殖：香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評析〉（簡稱〈中文運動評析〉）一文。刊登於2015年的這篇論文最近引起了廣大的注意，大概就是因為在羅教授筆鋒下，「中運」成為一個解釋香港親中左派致命盲點——民族主義的鎖匙，進而足以論證香港97年回歸後未曾展開真正的解殖運動的依據。

1967年的「六七暴動」與1970年的「保釣運動」這兩場大事件之中，「中運」的政治意義似乎注定是小插曲般的宿命。儘管如此，羅永生成功地讓讀者看到「中運」深遠的歷史意義，尤其是解殖議題如何被日益虛偽的中國民族主義立場所堵住、掩蓋。

我對〈中文運動評析〉一文的批評主要分為兩點。第一個問題，也是最表面的問題，就是羅文完全沒有將1970年代前香港社會語言多元性的真實面貌，以及香港二戰後到回歸前夕生活語言的重大歷史演變納入思考的範圍。羅文中所討論的「中文」一詞，本來就是一種含混不明的概念。作為「中運」當時重要陣地的《70年代雙週刊》，確實曾經刊登了一篇專門討論「中文」一詞如何

of all identity, so as to appropriate belonging itself". Agamben, 1993, 11); 「以種類為身分的原則乃為我們文化中的原罪，乃為它最根深蒂固的布署。將某件事情人格化並將它指涉為一種身分的代價，就是犧牲其特性。」（"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ecies into a principle of identity and classification is the original sin of our culture, its most implacable apparatus. Something is personalized – is referred to as an identity – at the cost of sacrificing its specialness." Agamben 2007, 59.）

定義的文章，有趣的是這篇文章刻意選擇使用英文，為的是凸顯「身為中國人的作者，被皇家殖民教育搞成到一個實際上形同無法寫出易讀中文的地步」（Tong 1970, 15）。寫不出易讀的中文的這個評估，需要放在「中文」在二十世紀經歷大規模改變的脈絡來理解。從外語和日語吸取詞彙、語法與使用習慣的「中文」，其實是個相對流變性的概念，不但凸顯語言本身的新創特質，同時也意味著殖民脈絡中翻譯與語言勞動等重要的不平等現象。權力關係的流變，自然造就了「中文」使用者的殖民情感：「香港屬於中國。它的人民是中國人。凡是華人的英國人都會對此〔指中文非官方地位〕感到憤怒」（Tong 1970, 15）。

作者進一步分析，「中文」的含意分為「書面語」與「口語」兩個層面。為了使「中文」成為官方語言，作者列出了書、口語各三種選項。書面語的選項包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語；二、

Epilogue
What really has been done in China when we talk of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as official language?
Every language has mainly two sources referred to – one for writing and one for speaking. W1 as used b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2 as used by Republic of China.
W3 as used by Singapore.
R1 – Mandarin (official i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R2 – Cantonese (official in nowhere)
R3 – others (irrelevant)
We have to make decision to choose from W1, W2, W3, R1, R2, one W matching with one R. Personally, the author favours the following plan:
W3 with R1 is the Chinese that we want to make official. However for a period of 10 years W1 and R2 will have equal standing as W2 and R1 respectively. One committee (actually committee should be the word but since Marx has taken over the word for his own use, I have to use this horrible word) via my statement to the Dip not allow the British who are forever so subtle in colonial affairs to take us the show of Chinese they think a right.

圖4 《70年代雙週刊》
第14期頁14

中華民國的法語；三、新加坡的法語。口語的三個選項則包括：一、國語；二、粵語；三、其他。口語的第三選項——「其他」，因為被認為與現實「不相干」（irrelevant）而立即被排除。作者提議最佳方案就是將新加坡的書面語和中國大陸與台灣共用的國語結合起

來，但是在頭十年的過渡期間，粵語可以暫時享受與國語同等的官方地位(Tong 1970, 14)。

孰不知，1970年代以前的香港華人社會，諸如潮州、客家、廣州、閩南、閩北、上海、國語、甚至四邑等各種語言與族群都曾經存在過，更何況還有為數不少的其他遷徙社群⁷。中國學者劉鎮發總結：「到了九十年代，非粵語方言在香港的使用，已經由60年代的四成以上，降到只有幾個百分點。香港的第二常用語也由當年的四邑話變成菲律賓語，但普通話的使用卻大幅回升」（劉鎮發 2004）。無論是當年「中運」參與者提出國語成為香港官方語言的主張，抑或當代的學者回顧當年的語言環境之時去重視「中運」無法顧及的其他差異，這些種種被歷史壓抑的差異，都是羅文並未納入討論的對象，導致羅文對於語言混雜性的過去與未來之真實與虛擬可能性呈現了一副冷漠的態度。這點反映在羅文針對時任華民政務司徐家祥一次發言的相關討論：

在接受《學苑》(1967.12.16)訪問時，華民政務司徐家祥提出了幾點，否定要求中文官方語文的訴求。他認為，規定中文為法定語文，實在沒有針對香港如何才能充份達意的問題。他認為香港文化多元，中國文字也未足以表達意思。香港活用的反是混雜著廣東話和英語，將來也可能發展出中英混合的語言。規定「中文」法定，並不對應香港混亂的語言應用的現實（羅永生 2015, 5）

羅文指出徐家祥的發言「充滿殖民者的傲慢」確實無誤，但這並不代表語言混雜性的問題在歷史回顧的時刻就未曾存在抑或沒有絲毫積極意義可言。這種混雜性的視野被刪除後，所謂「勾結

7 除了佔香港人口 20% 的「新移民」之外，其他非華人族裔的佔比約 8-9%，包括菲律賓、印尼、南亞、非洲等重要社群。兩者加起來快到三成。而在語言方面，除了廣東話之外，香港主要的語言包括普通話、英語、客家話、福建話、潮州話、印尼話、菲律賓語等多種語言，歷史上還包括四邑話、上海話等等「方言」。

共謀殖民主義」的主角才可以簡單化約為種族與階級的交叉身分。

黃夢花在這段慨慷的發言中，準確點出了香港勾結共謀式殖民主義的最重要特徵，也就是殖民權力不一定只會劃定華洋種族關係中的不平等，反而殖民權力是深深的本土化，成為本地既得利益者維繫特權的依憑。而這些人往往是去殖民抗爭中最大的阻力。（羅永生 2015, 11）。

因為語言問題被限定在要麼大眾 vs 菁英、要麼華人全體 vs 港英殖民當局的層次，所以在解殖議題的理解上就產生了偏差。例如，相對於以托派為名的吳仲賢 1970 年聲稱，「為甚麼中文運動是反殖民革命的基礎呢？這是針對抗衡消解英國政府的同化政策而言。在香港，中文地位和同化政策，實在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對此，羅文提出如下的結論：

吳仲賢這個以中文運動為反殖革命奠立基礎的論說，跳出了冷戰對峙中只能選擇「擁共」或是「反共」的二元對立，清理出一個反殖激進運動的左派實踐和想像世界，也挑戰了「恐共必須保殖」的右派思維或「要民族意識必先按（中共）指示繼續默許殖民主義存在」的左派犬儒主義（羅永生 2015, 14）。

問題在於，這個二元對立的局面相當程度上是建立在港英同化政策之後，刻意培養香港華人有別於中國人的「香港神話」，對於一系列語言、文化政策記憶的刪除。畢竟，二戰後直到 1970 年代，國語在香港社會的重要地位，從國語電影旺盛的事實便可見一斑。然而，隨著六七暴動之後 1970 年的「中文運動」，再加上港英當局與資本家的危機感，港英政府採取了一種刻意培養中、港文化界線分明的政策，「除了在學校禁止國語以外，還在中學會考取消國語科」（劉鎮 2004）。由此來看，我們可以獲得如此的

結論：港英政府晚期的語言政策，與英國國籍法政策異曲同工，旨在創造種族化的香港內部「界址」。1974年正式修改《法定語文條例》，讓中文成為法定語言的同時，港英政府也完全取消了國語在香港教育體制的位置。與此同時，土生土長的人口佔比首度躍升為多數，導致另一種有別於同化的新殖民政策悄然生效。這種「異化」政策或許可以稱之為港英當局又一次「界址」政策的豎立，但是，與1898年之後不同，1970年代起的這一波「界址」運動主要發生在語言即身分的前提上。混雜性語言問題的歷史記憶被壓制之後，解殖的意義在〈中文運動評析〉一文裡就停留在針對公民權與人權的範圍。對於語言與社群，以及兩者間的生命政治關係是否同樣需要展開解殖這點，完全不在羅文思考的範圍之內。〈中文運動評析〉一文最後在歷史記憶被刪除與概念解殖未遂的雙重條件下，認定97年後的香港乃處於一種新殖民的狀態，這個結論顯得太過倉促，欠缺說服力。與其說是新建的殖民主義，不如說是尚未完成的解殖過程。解殖的途徑並不在於邊界的回歸，而是在邊界實踐的打開與重新詮釋。

最耐人尋味的，是羅永生在〈中文運動評析〉一文六年前的《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一書中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場。相對於五四運動那樣引介歐洲國族主義概念發起新文學運動的「國族文學」概念，羅永生反而細膩地捕捉了當年存在在香港作家之間的一股另類主張，這就是羅永生稱之為「遷徙者世界主義」(migrant cosmopolitanism)的概念：

與其承認方言文學就是國族文學的構成元素，一些「本土」作家甚至對於「方言文學」的標籤提出異議。〔…〕如此遷徙者世界主義的聲音，忠於尊重民眾日常語言的白話理念〔…而這種〕國族語言的另類概念〔代表〕一種賤民的堅持，強調國族建構中各種方言的參與〔…〕(Law 2009, 127-129)。

羅永生前後的矛盾，在於語言整體性的預設。無論方言、國語還是英語，都被認為是一種整體。《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一書針對「混雜性」(hybridity)展開大量討論與解構，固然十分精彩，但是對於「混雜性」概念的理解，一直停留在兩塊整體之間的碰撞與滲透，而並未將混雜性擺在整體性的核心位置，讓一切語言皆為混雜狀態的面向顯現。

在此或許值得再次強調，語言整體性並不純粹是理論層次上的問題，而是牽涉到我們如何理解非連續性的社會關係。《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一書雖然針對國族語言「歐洲白話原則」(European vernacularist principle; Law 2009, 130)的殖性特質展開必要的批判，可是並未針對語言整體性的概念提出平行的解殖觀點。結果，到了六年後〈中文運動評析〉一文有關語言解殖計畫的相關討論，羅永生從根本上還是採取了均質性發話模式的預設(Sakai 1997, 3)，將「凡是語言皆為翻譯」的異質性發話視野先驗地排除。

第四章：聲音、收編與左翼的失語

主權慾望

「失語」現象是左翼常常面臨的處境。然而，在「自由民主 vs 威權強權」的二元架構常常被右派勢力拿來當作回歸邊界的先決條件下，左翼有必要將社會發言從純粹「權利」的脈絡置換，以便開闢另類想像。為此，本章節試圖追蹤香港左翼歷史敗北指標性的現象之一——所謂「失語」的系譜。

這個問題在反送中運動 2019 年 6 月初剛轉變成大眾運動不久之際就浮上檯面了。《夜貓》團體在 2019 年 6 月 18 日刊登了另一核心成員覃俊基(Thomas Cham)一篇題為〈左翼的失語——當運動和世界和你有所距離時應該如何自處〉的文章¹。文章雖然做了清醒的分析，指出右翼主導運動的事實，可是對此所做出的回應，竟然採取了一種焦點經濟的角度去評估市場佔比。覃俊基(2019)指出，「這次運動的方向相當精確 [...] 但運動精確，就意味著容許左翼詮釋的空間極度狹小 [...] 在根本的立場上，左翼的想

1 覃俊基這篇論文的英文翻譯在 2019 年 09 月 06 日獲得《流傘》網路期刊刊登。

法無法 map 在當下的對抗之中」。兩度登場的「精確」一詞在中文的脈絡裡存在高度曖昧性的解釋空間。例如，根據商務印書館《現代漢語辭典》的定義，「精確」一詞包含「非常準確」或「正確」之意（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辭典編輯室 1985，596）。顯然，「精確」一詞的日常意義，與「正確」、甚至「準確」等詞之意，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除非說是一種比普通「正確」更加精細的「超級正確」之意。然而，「精確」一詞一旦應用在科學實驗測量的脈絡，就必須根據英文“accuracy”跟“precision”的區隔來定義。也就是說，本來就不存在「精確」vs「準確」這一區隔的中文，由於經歷了一種歷史翻譯過程，後來針對特定脈絡就引進了來自外語「準確」與「精確」之間的區隔，導致非科學脈絡的日常中文就染上了更多曖昧。在英語在語境下，社運目標是否“correct”（正確）是可以討論的，但是是否“accurate”（精確）的問題根本沒有多大意義（倒是運動的目標敵人是否瞄得準確還是相當有意義）。雖然覃俊基的意思相當清楚，他從左翼的立場出發，將運動的訴求²看成是一種「精確」卻不太「準確」的表現，容易讓左翼的朋友「感到非常疑慮 [...] 感到異常的失語，不知道自己的位置」（覃俊基，2019），可是相信對於很多中文讀者來說，運動的目標如此被描述為「精確」，與其目標被描述為「正確」之間，並無差別可言。這種曖昧與混淆的問題，到了覃俊基提起結論的時候變本加厲。覃俊基認為在這場目標「精確」的運動裡，「左翼詮釋的空間極度狹小」。最後，讀者搞不清楚，左翼在這場運動裡之所以沒有什麼用武之地，是因為運動的目標太過集中、狹隘（也就是說，太「精確」），還是因為目標太過正確（也就是說，

2 運動最早的訴求就是全面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2019年6月16日（覃俊基〈失語〉一文刊登前兩天）「譴責鎮壓撤回惡法」大遊行的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民陣），首度提出了「五大訴求」，包括撤回《逃犯條例》、撤回「暴動」定性、撤銷所有反送中示威者控罪、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追究警隊濫權情況、立即實行「真雙普選」。

太「對」)，讓左翼論述變得毫無意義可言？

可以確定的，是覃俊基敏銳的觀察力非常「準確」地抓住了左翼面臨真正的挑戰：「左翼的想法無法 map 在當下的對抗之中。」根據我的理解，“map”的問題，可以理解為「精確度」與「準確度」無法疊合，也可以理解為整個用以衡量「準確度」的預期目標本身就是不對的。怪不得他的左翼友人會「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我的意思並不是想說自己比覃俊基等人更懂得什麼才是左翼「正確」的位置，而是想要說，「位置」並非一種給出的點，而是一種通過社會實踐一起創造出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左翼的處境就是一種版圖(map)或製圖學的危機，而這個危機的能否被化解的關鍵取決於我們對劃界實踐的理解**。遺憾的是，覃俊基最後並未試圖從新製圖學的發明切入，而是為了一種類似市場佔有率的考量，選擇依循舊有的地圖，回歸熟悉的邊界，逐漸去拉攏「群眾」：

要做的是接受那些限制、然後徐徐圖之，慢慢擴大左翼思想的影響力，而不是自我劃界然後作眾人之敵。這是左翼最易邁上自絕群眾之路的方法——無法接受難以述說，難被理解，然後故意將立場激化、批判所有較為「溫和」態度以突顯自己的正確。這就是 far-left 自我邊緣的老故事。

當然，另一邊的陷阱就是為求貼近群眾然後忘卻了自己的左翼立場。如何走這條鋼線，終究在乎一心（覃俊基 2019，粗體另加）。

關於版圖、劃界和界線的修辭確鑿無疑，可惜如此敏銳的分析卻並未帶動視野與實踐的更新——讓左翼虛心承認其所處的位置冰凍三尺，並清醒地認識到未來的任務即是將回歸邊界一事從政治構成中徹底刪除。相反，覃俊基詞彙中的「劃界」一詞，**被理解成一種自我限制，而不是一種關係實踐的契機。同樣，製圖**

的實踐被理解成一種既有地景再現的框框內圖謀路線與板塊的擴大，而不是從整個地圖的重新制訂過程切入。儘管覃俊基表現出真誠且可敬的自我批評態度，並同時說出了包括我在內很多人共同的焦慮與感受，可是他的論述最後還是忽視了這一時代左翼自我批評最為關鍵的對象——左翼對回歸邊界的歷史妥協。畢竟，唯有納入劃界實踐的問題意識，政治構成相關的敘述才可能產生全新的版圖，即便一時之間無法順利收編社會擴音器(例如，媒體)來擴大聲勢。覃俊基放棄了新製圖學的展望，結果就讓那些社會關係都被簡化成了一種對「群眾」不加區分的預設，比方說，認定「群眾」由於均質性高的緣故，自然都講「一樣的」語言，根本就沒有什麼社會翻譯的問題可言。換言之，覃俊基筆鋒下的「失語」狀態，是排除語內翻譯與跨語翻譯存在可能的單語主義慾望的表現。

譚俊基筆鋒下左翼失語的問題早在許寶強 2015 年的文章〈過門都係客：佔領與光復〉裡已經有跡可尋。該文前頭很莫名地以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案例去比擬香港本土派掀起一系列以驅趕跨境水貨客(也就是部分港人稱為「蝗蟲」的人群)、回歸邊界的「光復」行動：

納粹德國之反猶，並非源自猶太人的「特性」，而是基於德國社會自身的問題；同理，香港「光復」行動中出現的「排外／拒中」傾向，也不能歸罪於「陸客」（或「水貨客」）的「特性」，而是植根於政府管治不善、發展速度過速、旅客數量過多、貧富嚴重不均的香港社會脈絡……（許寶強 2015）

許寶強將香港的反中浪潮比擬納粹德國的反猶事蹟，卻將比喻接的非常勉強。首先，該比喻等於間接承認，香港的反中問題確實有些許類似納粹反猶的作法。然而，很奇怪的是，該比喻所

建立的平行關係馬上就得急轉彎，免得香港人與德國人要負起同等責任。許寶強針對兩者的起因採取截然不同的處理態度。雖然陸客與猶太人一樣都沒有做過任何事情可以給法西斯暴力提供正當化的理由，可是就法西斯暴力責任歸屬的問題而言，雖然德國那邊就要全體人民負責，可是在香港那邊反而是政府當局要承擔責任，而廣大的社會民眾卻被完全免除。顯然，許寶強刻意迴避香港社會本身的問題。這個問題當時就引起了香港托派政評家「土茯苓」一針見血的精彩回應：

這段話〔…〕讓我們看到，為何當今「左翼」與民粹右翼往往只有一線之差；「左翼」話語可以如何通過詭辯，去為右翼民粹服務。〔…〕情況就是：面對香港一群大香港法西斯主義者以極其噁心、侮辱性的言行去驅趕來自大陸的水貨客、遊客、居民、新移民，左翼大師要我們理解，雖然這些所謂「光復行動」與納粹有幾分相似，但它背後有著「政府管治不善、發展速度過速、旅客數量過多、貧富嚴重不均」為基礎，於是，我們可以絕口不提納粹的暴行，更加可以不去深思香港法西斯將會把香港引向一個什麼樣的深淵（土茯苓 2015）。

「與右翼只有一線之差」的評語雖然有以片概全之嫌，十分不公允(畢竟許寶強長期耕耘左翼批評觀點)，可是確實抓住了許寶強在這篇文章莫名比擬的語病。或許之所以出現如此思想誤差的原因，誠如「土茯苓」所說那樣，是「左翼失語」情結的想像所造成的結果：

一眾左翼社運人與革命導師被右翼團體與「民眾」掃出場，卻仍然不甘寂寞，戀棧「社運導師」的位置，不願在「運動」中被進一步邊緣化，因此也不願直斥右翼民粹言行。結果，左翼的介入出現了「語言轉向」：既然不能影響「實質」的「運動方向」，

便憑著他們的固有強項——三吋不爛之舌，抓住一字一句，在文字上轉圈，無限發揮（土茯苓 2015）。

最後，「土茯苓」認為許寶強因為寧可遷就右翼而不願進一步面對失語可能性背後的癥結，所以就加入了「回歸邊界」右傾的時代潮流：

導師甚至提出「舊疆」這個概念，占領與光復者要返回「被占領」前的生活狀態。我不禁問：什麼是香港的「疆」（土茯苓 2015）？

「失語」，追根究柢，是特定地出現在講求擁有明確相對應的人種和語言的國族主義範疇中的一種現代政治現象。正因此，德國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才會說，「主權意指一種足以產生絕對安靜的能力——一口氣消除所有的噪音並讓他人陷入沉默」（Han 2017, 5）。想要說明這點，就可以先追溯「失語」現象在香港的系譜。其最早的引用，應該是魯迅 1927 年 2 月 18 日和 19 日連續兩天在上環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兩場演講。尤其第二天的演講以《無聲的中國》為標題，借助香港的殖民地經驗去說明中國「已經啞了」（魯迅 1932）。一個無法順利站在主語位置的「中國」自然無法形構自主的政治主體，這是十分典型的現代國族主義邏輯。根據黃芷敏的分析，「很明顯，魯迅就著香港這個殖民地跟中國在地域上、社會上和語言上的隔閡來發揮他要討論的主題，即中國的失語狀態」（黃芷敏 2013, 10）。換言之，魯迅將香港當做工具去說明中國的問題，跟香港自身的殖民處境不盡相同。從此開始，香港語言狀態的政治論述或政治再現，都與中國國族主義擺脫殖民束縛的歷史計畫綁在一起，形同一種（中國）失語中隱約存在另一種（香港）失語狀態的詭異現象。這個主權相關的雙重失語局面一直持續到 1960 末年香港中文運動興起之後，港英政

府決定啟動語言和身分政策去培養一種對抗「赤色中國」的重大改變，刻意去塑造有別於中國的香港身分。此後，「失語」狀態在香港的出現就染上了新一層的反共差異，將殖民經驗「擦寫」，成為有別於回歸前的情感結構。

在九〇年代之前，「失語」的問題往往跟殖民主義對民族主權所造成的創傷情結有關。但是在天安門與香港回歸中國的雙重效應下，「失語」的現象自九〇年代之後就逐漸失去了與殖民主義經驗的關連，導致「失語」狀態當中所隱藏之根深蒂固的人種與語言相對應的意識形態預設，偷偷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正當性。而恰好就是如此的潛在正當性——一種「自然本土」情結，為 2000 年代起的回歸邊界運動奠定了基礎。它將九〇年代之前「失語」情結的國族主義內涵與九〇年代之後「失語」情結的反中共意涵熔於一爐。結果就創造出一種綜合主體性，一邊反中共，一邊堅持香港「自然本土」，卻在政治立場上「和稀泥」。從主體性建構的角度來看，「只要大家團結」，左、右的原則與立場都不重要。也就是說，「失語」情結的歷史演變最後匯入了「回歸邊界」的政治轉向，成為一體兩面的事情。凡是沒有加入「回歸邊界」的浪潮就是注定「失語」。這點應該是左翼思想需要批判的對象，而不是需要「接受的限制」。

在很多人看來，「失語」與「本土」是源自同一淵源的兩種反應。陳奕麟代表性地指出，「本土情感的出現，可以視為一種針對大陸對港政策霸權性質的反應」（Chun 2020b, 45）。然而，周思中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具有不可否定的洞察力：

本土意識的產生，有著 1970 年代時港英政府希望把香港人培育成抗拒共產中國的意圖，亦有著 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初倫敦北京就香港前途談判時，把逐漸蛻變得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香港「物化」、固定下來的後遺。（周思中 2011, 171）

換言之，本土意識的系譜，必須追溯到港英殖民時期的殖民治理技術。因此，失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土視角的缺席，自然就關係到回歸前的香港「聲音佔有」的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種種問題意識。這方面的問題，在上文有關 1960 年代末興起的中文運動的討論中已有所討論。重點是，97 年回歸前的香港之所以並未出現完整的「失語」情結的原因之一，就是港英殖民政府刻意地收編了當時以中文運動為訴求的反失語勢力，並在此基礎上成功塑造了一種與中國有所區隔的港人身分，透過廣東話建立某種「本土聲音佔有」的氛圍，哪怕是建立在歷史差異被壓抑的基礎。

宗教戰爭

失語作為一個政治問題通常被放在一個更大的歷史脈絡，強調發言權與失語現象都屬於「自由主義」與「威權主義」之間的歷史對決。然而，這個「主義之爭」的格局在相當程度上繼承了西方國家宗教戰爭的問題意識與侷限。根據美國學者莫爾費爾(Jeanne Morefield)的分析，美國自由主義理論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自由主義哲學可以理解為特定歷史認知的理論呈現。雖然《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這本經典的自由主義理論著作基本上不談歷史，甚至可稱為一部排除歷史的純粹理論著作，可是根據羅爾斯(John Rawls)在其他地方透露，「宗教戰爭」才是他寫這本書背後的主要參照(Morefield 2019, 192)。換言之，對於自由主義者而言，「宗教戰爭」才是唯一值得參考並思考的歷史事件。如此選擇性的歷史觀使得自由主義者可以相對忽視歷史的其他面向，尤其是自由主義國家那些極其霸道(illiberal)的做法，包括各種「分別發生在境內(例如奴隸制、定居殖民佔奪、種族歧視法律)與境外的事情(例如，帝國侵犯、資源採掘，以及對全世界各地萌芽中的新生民主體制的顛覆)」(Morefield 2019,

192)。羅爾斯等自由主義者從「宗教戰爭」出發，將現代政治衝突納入宗教戰爭的潛在架構思考，導致現代歷史被化約為「宗教自由」的延伸。其最直接的「翻譯」，就是讓「宗教自由」變相成為一切自由的標準，進而將現代歷史的敘述轉譯為「自由主義」對「威權主義」長期進行的一場持久戰。從這個角度來看，就非常容易誤以為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的問題都是發生在高尚理念的「落實」或「執行」面上，而並不牽涉更深層的矛盾。結果，自由主義就成為一個撥擋術，讓我們看不到「自由」的建立過程偏偏依賴著那些發生在國家邊界內外並一直不斷重演的「霸道」事蹟，更讓我們憶不起現代脈絡中自由其他另類定義的歷史³。

自由主義將失語情結歸咎於威權主義的高壓手段。然而，自由主義難道完全沒有什麼歷史責任可言嗎？礙於自由主義撥擋術精湛的緣故，我們常常看不出自由主義及其他者(無論是敵人還是異己)之間的內在關連。莫爾費爾的分析值得大塊引用：

讓我感到比較擔心的事情就是如此的哲學／政治立場——也就是說，在自由主義理想化道德理論之處去尋找自由主義國家自己搞出來的全球問題的解決之道——就易於產生一個迂腐的論述環境，讓自由主義社會相對於全球政治問題永遠處於一個好比剛醒過來的階段，永遠以天真的姿態，從自由主義潔白的寶典中努力找出因應的辦法。如此的論述醞釀了自由主義國家的一套外交修辭(這是一個具有悠久而卑鄙的帝國歷史色彩的修辭)，將我們的焦點從國家的種種霸道(illiberal)事蹟不斷地轉移開來，使得我們的討論往往得回歸到自由主義的純正血統。畢竟，自由主義理想化理論的假定誠信特質——這是全球正義論述中普遍的假設——過去與未來隨時都可能被自由主義國際主義者「武器化」，

3 請參見第二章註腳 24。

並拿來成全帝國的目標。(Morefield 2019, 191)

所謂「自己搞出來的」問題涵蓋的範圍固然很廣，我在此想要強調的還是跟邊界與劃界有關的部分。誠然，「在中世紀、前現代以及早期現代歐洲的劃界過程 (bordering process) 裡，宗教確實扮演了非常核心的角色」(Forlenza & Turner 2019, 7)。假設說自由 vs 威權的冷戰格局背後隱藏著一個宗教戰爭的模型，而這個模型的主要功能在於堵住全球解殖契機的話，那麼以「宗教戰爭」邏輯為架構的「失語」情結，歸根究柢與劃界實踐的關係必然密切。

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在此無法針對「宗教戰爭」與現代香港意識形態的形成提出完整的系譜分析。然而，從香港公共教育系統從創校時代以降將近一半以上的社區學校都交給教會承辦的細節便可隱約看出，世俗化神學對香港社會的影響非比尋常。用比較籠統的方式去說，「世俗化神學」在香港歷史上不但提供了「反共意識」的重要依據，同時為了新自由主義日後創建新的統識權 (hegemony) 提供了重要的輔佐功能。甚至可以說，「反共意識」、「定居殖民身分」與「世俗化神學」都成為現代香港意識形態三座鼎足的基礎。在反修例運動期間，運動參與者提出一系列的想法、策略與概念，均可以視為世俗化神學塑造過程的結晶⁴。從「攬炒」推行「鳳凰慾火重生」的故事大綱到運動主題曲《願榮歸香港》的國族神學政治語彙，世俗化神學論述的痕跡十分顯著。

然而，假設說「自由與威權的對立」如今早已成為了現代與當代歷史詮釋的主流共識，那也是左派自身的思想弱點所招來的

4 世俗化神學的軌跡必須與香港基督教團體反修例運動的實際參與做一個嚴謹的區隔。關於後者，請參見刑福增(2019)。重點是，《環球網》等中國傳媒指控基督教學校煽惑學生，就跟外國勢力操縱的說法異曲同工，都嚴重曲解了意識形態的本意，讓意識形態淪為「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的騙局，並忽視意識形態作為主體性建構基礎的普遍意義。

結果。這個問題主要呈現在左派思想圈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相關的歷史辯論。無論其捍衛者還是批評者其實一樣都未免陷入同樣「形式主義」的陷阱，將「專政」的內涵理解為法律與暴力的問題。然而，根據齊沃提迪斯(Dimitrios Kivotidis)的分析，專政並非一個形式問題(例如，「獨裁」)而是一個牽涉社會關係整體性的事情(Kivotidis 2021, 91-92)。在這點上，「宗教戰爭」的意識形態比起歷史左派更強的地方，在於「宗教戰爭」思想打從一開始將「整體性」的社會領域理所當然地定義為「全世界」。反過來看，左翼思想的優勢，在於其辯證性的整體性概念必須涵蓋「否定性」(negativity)與「媒介」(mediation)的因素，一旦套用在「全世界」身上，也不會導致邊界如同宗教思想那樣就被莫名取消或「超越」。

「顏色革命」

世界各地，特別是共產主義國家或舊共產主義國家發起民間運動推翻政權一事被廣泛稱為「顏色革命」。然而，經過一系列爭議之後，「顏色革命」在某些人的語彙中漸漸成為負面的貶義詞，代表民間運動背後其實有外國勢力，特別是美國幕後黑手插入，刻意引發「政權更替」(regime change)。從聲音佔有與失語問題的角度來看，被貼上「顏色革命」的標籤，幾乎等於指控人家是美國傀儡沒有自己的聲音，就好比推翻政權的民間運動提出的訴求都是由幕後黑手策劃並發聲的腹語術。就香港反修例運動而言，確實有類似的批評。

尤其，自從2014年受美國團結中心贊助的香港職工會聯盟秘書長李卓人(Lee Cheuk-yan)站出來積極推動《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之後，親北京傳媒與一些國際反帝左派就會拿此做文章並貼標籤，力圖說明直至反修例運動的這些反對運動都是外國勢力在

背後指使的親帝運動，居心搞「顏色革命」。遑論，當年確實有英國廣播公司（BBC）政治編輯昆斯伯格（Laura Kuenssberg）的報導聲稱，2013年美國私人智庫《奧斯陸自由論壇》（Oslo Freedom Foundation）⁵舉辦了一次練習營，有千餘名港人參加，共同學習策劃香港大規模顛覆活動（Kuenssberg 2014）。該活動參與者當中也包括一位塞爾維亞政權顛覆高手——波波維奇（Serđa Popovic）。根據《維基解密》透露的美國政府檔案，波波維奇創辦的《非暴力應用行動與戰略中心》（簡稱 Canvas）跟美國戰略智庫之間有來往，並曾經參與過從敘利亞到瑞內委拉等國的顛覆政權活動。

有關反修例運動作為顏色革命的觀點，最生動的目擊者報導，是長期定居香港的斯里蘭卡記者維塔奇（Nury Vittachi）2020年的著作——《故事的另一面：一場在香港的秘密戰爭》（*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A Secret War in Hong Kong*）與一樣是長期定居香港的美國作家 Laura Ruggeri 寫的文章——〈動亂的代理：美國如何在香港埋下顏色革命的種子〉（*Agents of Chaos – How the US Seeded a Color Revolution in Hong Kong*）（Ruggeri 2020）。前者主要從美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USAGM（美國國際媒體署）、奧斯陸自由論壇、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與 Canvas 等機構與團體的參與判斷，提出背後有外國黑手操弄的結論。維塔奇的觀點固然值得參考，也還是無法讓我們理解港人為什麼積極投入這場運動。Ruggeri 一文較有趣的地方，在於它試圖分析一種由諸如政府機關、民間組織、智庫與學術機構等公、私不同部門跨界組成的意識形態機器。然而，Ruggeri 一文最後還是難免掉入

5 《奧斯陸自由論壇》的資金來源之一乃為美國新自由主義右派富翁赫赫兄弟（Koch Brothers）主導的「捐款者資本基金」（Donors Capital Fund），並被戲稱「美國右派提款機」（Kroll 2013）。該《論壇》為了諸如打敗工會、消滅國立學校，並反駁氣候變遷專家等新自由主義政治議題而大量注入金援。該基金曾經捐款贊助極右派反伊斯蘭教宣傳與右派組織，在全球各地倡導美國軍事工業複合體樂見其成的政變（Blumenthal 2013）。

了一種「操弄論」的陷阱，將意識形態呈現為他人被操弄的工具。「操弄論」的潛在預設，與通俗馬克思主義稱為「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的概念差不多，將意識形態視為資本家強加於勞工的騙局。1970年初年阿圖塞提出自己的意識形態理論，旨在將「虛假意識」概念間接淘汰，進而掌握「意識形態」積極、創構性的一面。從阿圖塞的角度來看，意識形態是個讓某些社會行動成為可能，並打造主體性的物質建構，絕非一種心理狀態。與其說是個騙局，不如說是一切社會行動的基礎。香港左翼常常批評類似 Ruggeri 與維塔奇的觀點藐視港人的能動性（JN & JS 2020），將港人當做只能被操弄的無腦傀儡，是十分重要的批評。重點是，意識形態並不是強加於人民的外在勢力，而是塑造主體性的社會基礎。承認港人的能動性一事才是探究香港意識形態系譜不可或缺的前提。

「顏色革命」的標籤不但曲解了意識形態的一般運作，更嚴重的是，諸如此類的標籤最直接的後果之一，就是讓我們看不到劃界實踐的種種境內活動的關鍵面向（例如，港人透過翻譯實踐所複製的邊界位置）。反過來看，以〈香港人與 Black Lives Matter 的連接屢遭惡意中傷及抹黑〉一文為代表，香港左翼目前仍處於避重就輕的不面對狀態。該文針對美國民主基金會（NED）的參與（involvement），將它列為一種「最低限度參與」（minimal involvement）的現象，顯然試圖訴諸「數」來迴避「勢／識」的問題（JN & JS 2020）。文章作者 JN & JS 力圖駁斥「香港人缺乏實際政治能動性的信念」，非常值得讚賞，可是作者似乎依然搞不清能動性（agency）與情報局（The Agency）之間的差別。接續美國在冷戰期間對世界各地的左派團體窮追猛打，狠狠地策劃屠殺、甚至展開「政治清洗」（political genocide）（Bevins 2020；Esparza et. al，2010；Marcetic 2020；Naureckas 2017），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就利用民主基金會（NED）去顛覆各地，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反新自由主義

左翼民主政府(Telesur 2019)。同樣，在一系列民主黨與共和黨輪替的政權攜手摧毀美國境內工會的同時，美國還一直利用世界各地的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The 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對世界各地的工人展開「秘密戰爭」(Scipes 2010)。孰不知，香港的《團結中心》正是 NED 歷年撥款的主要窗口單位。坦白說，「最低限度參與」如同「合理推諉」(plausible deniability)一詞一般，早已都是美國各種「隱蔽行動」(covert operations)的官方詞彙，都是美國藉著「國家利益」之名去侵犯邊界並隨心所欲重組邊界的執行原則。怪不得該詞會出現在美國戰略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白皮書中：「經過十五年中東與南亞參與大型軍事行動之後，美國日益尋求以最低限度參與的方式(minimal involvement)去窮追其安全利益」(Felbab-Brown 2015)。如同《流傘》這般的香港左翼團體，雖然滿口國際連結的口號，可是在主體性論述上已經吸收了隱蔽行動的語彙一事，**象徵性地顯示香港左翼仍然無法毫無分辨地直接面對香港所有的邊界糾結**。這種根植於「不面對」情結的「失語」狀態，直接反映在〈香港人與 Black Lives Matter 的連接屢遭惡意中傷及抹黑〉一文中中文翻譯的副標題：「全球性的抗爭理所當然需要尋求跨國、跨界別，及跨運動的連結與交流。」在內文採取「隱蔽行動」措辭般的效應下，副標題中「跨界別」一詞的實質意義，其實等於對「界別」進行選擇性的忽視，將「界別」的意義降到「最低限度」。而香港長期作為「赤色中國觀察站」，甚至是「赤色中國監聽站」、「資本主義光復中國的前哨站」與「共黨政權移轉基地」的諸般根深蒂固制度功能，以及在此基礎上在香港長期運作的種種外國政府機關、民間團體、智庫、新聞媒體與學術機構的種種活動，假設這一切全部都交給中共官方傳媒 China Daily(Yan 2014)跟美國反帝媒體 The Grayzone(Singh 2019; Cohen 2019)專門去處理的話，最後結果注定讓香港左翼持續為新自由主義武裝

化的邊界政治背書。

香港左翼團體對美國駐港單位的活動保持低調、甚至緘默才是左翼「失語」情結背後無法迴避的問題。2019年5月14日《明報》刊登的採訪報導裡，香港大學教授潘毅特地回憶，六四事件之後，「我一回港，就在深圳搞女工組織，已經不能再說話了」(明報，2019)。六四事件事發當時在北京的潘毅，事後在內地一直呆到同年七月中旬，忙著協助學運人士逃亡海外。其中包括美、法、英情治單位主導的「黃雀行動」(Operation Yellowbird)四百多名受庇護對象之一的柴玲(ibid.)⁶。即使二十年後的採訪中，潘毅依然針對當時的細節指出，「不能說的太具體」(ibid.)。潘毅的沉默不管是為了保護當事人還是為了遮掩外國的參與，反正都讓人想起香港「失語」情結另一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面向。美國政府在香港過去數十年設立的種種「民主轉型」與「政權移轉」的機構中，以民主基金會在香港設立的團結中心、國際事務全國民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簡稱 NDI)和香港人權監察(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位列前三。這些機構在香港的活動與金援贊助的具體用途，不但從未完全透明公開(部分相關細節包含在《維基解密》的檔案中)，而且也**從未被列入香港左翼民主轉型的政治訴求或相關討論中**。結果，另一種「失語」情結在香港就長期蔓延生根。少了一次美國駐港單位歷史活動的大公開，民主轉型的歷史正義無從落實，並針對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透明化的呼聲就會顯得更加失之偏頗。遺憾的是，這些問題早已被納入社會口水戰，導致能動性、意識形態與聲音的建構等議題均被嚴重簡化。

少了中、美雙方這些細節與歷史檔案的公開，意識形態在香港的複製過程就無從追蹤。以《香港轉型計畫》(The Hong Kong

6 關於柴玲與美國情治單位、右翼的互動，請參見 Day & Sun(2021)。

Transition Project) 為例，該跨校項目從 1989 年到 2018 年歷時 30 年持續執行，其主要經費來源為香港政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資研局，且定期受聘於美國 NED 旗下的 NDI，負責進行香港政治體制民主化相關的調查研究。那麼，NDI 的參與該怎麼理解呢？難道真的如同一些西方反帝評論家所說那樣，都是美國「隱蔽行動」的延伸嗎(Cartalucci 2014)？根據《香港轉型計畫》官網的說法，該研究項目的宗旨確實在於推動香港作為全中國民主轉型的「前體」與「關鍵」(precursor and key)(HKTP 2014)，但是這種願景並不代表整個計畫一定就是一國情治單位顛覆他國政權的隱蔽行動。實際上，NDI 參與真正的意義並不在此，而是在於意識形態錯綜複雜的建構過程。誠如上文所說，意識形態並非一種強制性的外在勢力，而是一種塑造並引導主體性與能動性的布署。就 NDI 在香港的活動而言，大致都屬於法國國際關係學者葵歐(Nicholas Guilhot)曾經描述為一個年度總值超過七億美元的新興工業—民主轉型跨國工業的延伸(Guilhot 2005, 2)。也就是說，「民主轉型」已成為了美國公、私部門攜手經營的重要外銷工業，而香港乃為該工業業績相當響亮的拓展市場，其中港人，尤其是專業人士的參與，不可或缺。根據葵歐的分析，該工業作為一種產生主體性的布署，其標準產物就是一種「雙面特務」(double agent)式的主體性。葵歐引用該詞彙純粹是個隱喻，並非直指對方真的為敵對雙方情治單位服務，更不是影射對方居心不良，而旨在描述多重參與、多重角色的特質，避免將社會關係塞入單一性意識形態、行動模式的死板框框。

從葵歐研究的角度來看，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曾經扮演 KOL(關鍵意見領袖)角色，且在此前長期投身於《香港轉型計畫》研究工作的沈旭暉(Simon Shen)，可以被視為民主轉型工業塑造在地主體性與跨國團結模型的典範。沈旭暉畢業於牛津大學並曾在中文大學、香港教育大學等香港名校任教，且曾獲邀客座美國重要且為

公帑支撐的戰略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除了學術機構、半官方智庫任職之外，沈旭暉還當了一位十分成功的媒體人與電台主持人、並創辦了一家顧問公司。總之，作為 NDI 贊助的《香港轉型計畫》核心成員，沈旭暉橫跨學界、業界與官方的個人經歷與傑出成就，十分符合葵歐「雙面特務」概念的特質。葵歐指出：

吊詭的是，他們對於民主國際主義的忠誠度，以及他們從不放棄理想的特質—而不是政治轉向或變節—才是這些社運分子成為雙面特務的主因。很大程度上，國際關係的「理想主義轉向」與道德概念被引入國際舞台一事都是社運分子一代接一代的功勞。但是如此的轉變卻剝奪了這些人曾經掌握的批判性武器，使得他們面對那些將霸權包裝在解放、將政策譯成民主化詞彙的全球制度時，手無寸鐵(Guilhot 2005, 15)。

從葵歐研究的角度來看，NDI 或美國其他一系列「民主轉型工業」機構在香港的經費贊助，與其說是一種操弄或干預，不如說是一種聲音與能動性的格式化力量，從求知慾的塑造開始，整個過程可以被視為聲音收編的機制，導致社會上某些聲音成為可能，而某些其他聲音反而落為「失語」經驗的對象。香港左翼對此長期睜隻眼閉隻眼，卻在關鍵時刻抱怨左翼「失語」的窘境，乃為整個左翼敗北現象的最佳縮影。

誠然，在新自由主義時代，被格式化的發言比起緘默不語更像真正的失語現象。沈旭暉 2011 年針對 NDI 在港角色曾經發表的一次評語，恰好可以舉為例。當時沈指出「親北京評論者，基於中國國家安全可能遭受威脅的考量，就喜歡抨擊全國民民主研究所 [NDI] 與香港泛民主派政黨之間的互動」(Shen 2011)。此句「親北京」(pro-Beijing)的修飾語有如同標示出意識形態一般的用意，

暗示那些評論者(沈並未指明是誰)對事情的看法,因受到預設立場的左右,所以根本就毋須認真回應。光憑一個「親」(pro)字貼標籤就可以讓對方的信用破產,更可以轉移交點。其言下之意就是將意識形態視為僅存於敵對陣營,就好比金錢往來之於一般的主體性建構過程完全無關。結果,有關他國政府補助款對於在地知識生產的可能影響,尤其是對於主體性求知慾的塑造效果,統統都從公共理性的討論範圍消除。如此被格式化的發言與「失語」現象相差有幾多,答案就不言而喻⁷。

新自由主義

美國理論家迪恩(Jodi Dean)指出新自由主義的特徵之一就是強迫勞工保持「上線」的狀態,隨時進行工作與個資相關的「溝通」與「互動」。迪恩稱此為「溝通資本主義」(Dean 2005)。弔詭的是,不斷刺激溝通行為的新自由主義,同時一直還在壓抑溝通。而其壓抑的方式,主要是透過極端個體化效應達成。在極端個體化的基礎上,社會連結與社會合作,都成為資本積累體制的利器。

7 在如此失語現象的陰影下,香港近幾年有關學術自由的討論中,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往往被視為渺不足道的事情。雖然香港《高教公民》團體 2020 年發表的《2019 年香港學術自由報告》白皮書指出「撥款機構」與「大學管理層」都是「受訪者視為最影響他們現時工作職位的學術自由程度的三個因素」之二(高教公民 2020:12),可是該白皮書對於新管理主義(New Managerialism)對學術自由所構成的威脅卻隻字不提。更甚者,《2019 年香港學術自由報告》白皮書結尾提出三個政策性的「行動建議」,其中之一竟然就是加強新管理主義官僚體制的核心機制—學術評鑑制度,「爭取將學術自由列為 THE 和 QS 大學排名指標」(高教公民 2020, 8)。大學排名體制的引進,與全球高等教育過去三十年革命性的重組過程息息相關。簡言之,大學排名與評鑑制度都是高等教育金融化與企業化浪潮中的關鍵步驟。過去二十多年相關的討論累積太多,已有不勝枚舉之勢,最經典的著作還是 Bousquet (2008) 與陳光興、錢永祥 (2005)。重點不是在中共干預與新自由主義控管之間何者輕何者重,而是這些不同干預勢力都與邊界重組過程有關。以黃之鋒為代表的《學民思潮》團體 2011 年成軍反對「愛國教育」政策,反而潛在性地将香港當時結合新自由主義與世俗化基督教既有的學院體制間接加以規範化與肯定一事,對於學堂自由的負面作用未能引起重視與討論,實為遺憾。

這些弔詭與矛盾可以從香港另一位傑出的知識人周思中的種種文字與實踐說起。首先且讓我們聆聽周思中 2010 年對於香港失語情結的分析：

北上或留港這對互相排斥的選項,難道不是被同一盲點所遮蔽嗎?這個盲點有個名字,就是對香港社會的政治、歷史失語。這種失語,不是一時一地的機能偶然失靈,而幾乎是系統地迴避自身的歷史政治沿革,結果當然只能是任由宰割無言以對。失語有多種不同的面貌,包括正常的話說不出,卻不斷發明新用語和字眼,亦包括語言錯亂,即把不恰當的詞語、音節等置換到本想說的話,造成溝通的混亂,餘不一一。缺乏對香港本位/視角的了解及探索,其實無異於棄守一套有歷史累積(由成功失敗檢討教訓所組成)的語言(周思中 2010)⁸。

根據周思中的觀點,所謂「本土」也是一種積累機制的框框或構成條件。我認為這是非常敏銳的觀察,只差進一步將之脈絡化,放入可以與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積累體制對話的概念位置。畢竟,有一種積累是相對應於生產模式的,還有另一種積累是相對應於主體化模式的。這兩種積累之間的關連,應成為左翼的核心問題意識。

有趣的是,獲得嶺南大學文研系博士學位的周思中確實察覺到了知識生產對於積累體制舉足輕重的意義。他耐人尋味地指出,文化研究這個學門在香港的引進與發展,本來就是試圖從本土視野的角度去回應作為歷史情結的失語狀態：

自七十年代末的前途談判以來,香港不是已連番經歷類似的失

8 「失語」問題對周思中當時思路的重要性,從 2011 年〈無怨無悔的解殖思考〉一文提及「失語狀態」的語句,隱約可見(周思中 2011, 166)。

語麼？香港的流行文化研究，約七十年代末八十初開始成為顯學。《號外》伙拍《大特寫》、《電影雙周刊》等於1979年在藝術中心搞了個「香港普及文化研討會」，不就被譽為香港文化研究的起點麼？有趣的是，文化研究這門學科，戰後在英國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及知識份子透過辦成人教育，嘗試鞏固工人階級的生活方式，抵抗保守黨的文化統識工程而創立的跨學科（文學、歷史、社會學等）運動。在香港，在前途談判給趕出倫敦及北京的談判桌，自己命運無法掌握的同時，香港的文化研究卻「發現」了茶餐廳鴛鴦菠蘿包阿燦 can do 不中不西混雜夾縫等「繽紛」的香港文化真締，傳頌至今（周思中2010）。

換言之，作為標榜本土的知識生產領域，文化研究這個學門著力於建立一種有利於「積累」的主體性。周思中這點觀察意義非常深遠。果然，美國藝術評論家赫姆斯(Brian Holmes)在劃時代的〈靈活人格：一種新的文化批判〉(The Flexible Personality: For a New Cultural Critique)一文裡，曾經指出文化研究的知識生產與新自由主義「靈活積累」體制之間存在著內在關連：

英國文化研究從20世紀50年代末期興起之日起，就通過將文學批評的複雜詞彙轉向工人階級的實踐與形式，以期顛覆美學上的既有階級關係。它透過大眾與精英文化彼此沾染的過程提升大眾口語並改造精英文化，力圖針對大眾傳媒所呈現的新的支配關係來創造積極的另類可能。在這個同時也改變著精英文化的交互運動中，大眾表達的水準得到提高。這一方法大大擴大了大學裡合法科目的範圍，豐富了學院研究的風格，為改變大眾教育理念做出了切實的貢獻。進而，文化研究發展了一套戰略意圖，成為不折不扣的左翼知識份子「學派」。但是，它主要的理論工具卻是鑒別接收法或者叫做「協商式閱讀」法——以及資訊的接受者所賦予的私人色彩。這種批評理論的初衷還是在階級意識的模式

之下揭示工人階級對於支配性資訊的不同解釋。可在1980年代，接收的重點一旦從階級的動態脫鉤以降，文化研究淪為舉出每一個個體或團體對全球化傳媒產品的特殊貢獻並加以讚賞不已。這樣一來，它逐漸為一種新的跨國消費者意識形態建立了合法性。這種論述就等於是異化理論的圓滿實現，將它收編並加以個體化、民族化，並占為己有。〔…〕目前的支配結構〔從「靈活積累」產生新的資本主義霸權關係〕在相當程度上其實就是之前的文化批判在面臨當代資本主義收編之際無法演進而終告失敗的後果而已（赫姆斯2008，222-223）。

香港的失語情結，透過文化研究這個作為辯證性媒介的學門，與新自由主義之間形成了緊張又辯證的關係，一邊有所批判，一邊有所複製，結果誕生了一種病徵性批判的合論。雖然此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在此，力不從心的我只能暫且補充一個膚淺的觀察。在知識生產的過程當中，赫姆斯所談佔為已有的消費動作，確實也涵蓋聲音的建構。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的文化研究建構出的本土聲音帶有明顯的新自由主義腔調。

耐人尋味的是，上面引用周思中那段文字刊登的時間，跟作者開始轉為務農生活的時間點大約相同。身為香港《獨立媒體》創辦人之一，自從2000年代起一直活躍於社會運動的周思中，在參加2009-2011年間「反高鐵、保衛菜園村」運動前後的2010年，就開始專心投入農業。如此的決定可以視為「失語」情結的一種置換策略。在一次跟黃孫權的訪談中，周思中坦承，之所以決定務農，是因為務農擁有開啟「自主模式」的契機(周思中、黃孫權，2013)，只是礙於都市視野的慣性屏蔽，「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沒有農業這一塊」(ibid)。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周思中找到了「失語」情結更深層的切入點。雖然這個往更深層之處一土地邁進的嘗試，確實曾經養育了一代接一代的國族主義浪漫回歸思想，可

是周思中所談的自主模式連帶包含一種重寫世界版圖的契機在內，未必就注定受限於國族主義的格局。幾年後，羅貴祥(Kwei-Cheung Lo)指出，「反高鐵、保衛菜園村」運動前後，香港興起了一種「農地敘述」。在回顧這段歷史經驗時，羅認定它的意義在於它引進了「不少當下世界的流行理念，例如生態運動、有機耕作、食物自主與安全、環保意識、文化保育」（羅貴祥 2016，136）。這些當下流行的進步概念之餘較有趣的一點，是香港的農地敘述不是建立在一般國家主權論述中的「土地固有論」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對於過去地主—新界原居民的否定：

傳統的新界原居民，在這個敘述裡，反而較負面地被標籤為「地主土豪」。換言之，農地敘述是以非原居民，或以任何對耕種有興趣的人的角度出發，即那些與土地沒有固有關係的人（羅貴祥 2016，137）。

如此顛覆土地所代表既得利益秩序的「農地敘述」，確實包含一種民主化的契機，但是即使如此也並不代表一定與現代主權概念無關。將土地交給那些「與土地沒有固有關係的人」，說不定正是一種標準的現代性翻轉，在象徵性領土歸屬感上進行移轉。正因為是發生在「沒有固有關係」的人群中，也就是說，注定是彼此陌生的人群中，一種典型的現代人民共同體方能成立。儘管如此，羅貴祥堅持認為，「農地作為一個另類想像，是希望保存香港的自主——不是主權——地位」（羅貴祥 2016，136），但是並沒有進一步說明非主權自主與主權邊界的關係。坦白說，凡是認真閱讀香港過去二十年思想史的人都會發現，類似的表態層出不窮。然而，如同羅貴祥一般，這些表態大部分都接近一種宣誓或信仰表述，缺乏具體說明。對於一個擁有諸如獨立貨幣、獨立預算、獨立央行（香港金融管理局）、獨立警備隊、獨立公務系統、獨立教育體系、獨立語言等一般專屬主權國家制度的地方而言，

非主權自主性的具體物質意義，雖是難題，起碼也該試著討論，不該全然迴避或者當做口號去喊。羅文接近結尾處聲稱，「不一定等同分離主義者的獨立訴求，農地敘述堅持它的本土視野」（羅貴祥 2016，140）。「不一定等同」的宣稱有類似強迫症的重複滋味，透露出不可掩飾的焦慮。這種焦慮來自於如何面對國家邊界不容許曖昧的特質。企圖將「不一定等同式」注入主權邊界非此即彼的硬性邏輯，最後結果不是失敗，就是透過例外的方式去鞏固主權的邏輯。因此，我還是認為，在現代情境當中，「失語」情結就是國族主義慾望的病徵。2010年一邊寫著部落格討論香港缺乏本土視野造成歷史性的失語情結、一邊開始務農的周思中（或者說我透過文字所看到「周思中」的形象），多多少少驗證了這點。

雖然在此無法針對香港「農地敘述」展開完整的討論，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藝術家、設計師、都市農夫及客席講師梁志剛(Michael Leung)對糧食主權的討論與努力。在《流傘》媒體刊登的文章裡，梁志剛特地提及法國的ZAD試驗(梁志剛 2020)。作為一種自主性的無政府主義公社，ZAD(“zone à défendre”，「需要保衛之區」)代表一群人試圖生活在資本主義主權國家體系之外的嘗試(該區在2018年底終於被法國政府派武裝警察鎮壓後收回而告一個段落)。2019年，法國知名左翼經濟學家羅頓(Frédéric Lordon)推出新書，名為《生活中假設沒有(制度、警察、勞動、金錢等等)？》(Vivre Sans ? Institutions, Police, travail, argent...)，專門針對當下思想界乃至社運界廣為信奉的理念加以批評。根據羅頓的分析，當代思想最為普遍的特徵就是試圖創造「制度外」的視野，並標榜「區塊切分」(fragmentation)的差異性願景，讓抗爭主體呈現一種「無法治理」(ingouvernable)的安那其精神。但是，正因為無法直接面對一些如同號令般的現實制度，並無法採取整體性的觀點打開新視野，所以都無法帶動全面的社會、政治改造或革命。我大致上贊成羅頓這些批判性的觀點，特別是其潛在反

映到邊界這個制度無法鄉愿取消、無法鄉愿超越的延伸意義。尤其羅頓對於當代思潮缺乏整體性概念的問題，我認為有一部分緣由可以追溯到文化研究這個學門的學術立場，這個立場基本上建立在反整體化的信念上——畢竟直到 1970 年代之前，整體性批判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代名詞。然而，羅頓的著作的致命缺點，在於**他完全沒有針對我們平常稱之為「世界」的整體性建構—世界圖式進行反思**。尤其是那個曾經被稱為「第三世界」的另一個世界，完全不存在於羅頓的視野中。由於時間的關係與問題的複雜性不成比例的緣故，我只能將書中一段文字譯成中文饗宴一下讀者：

問題不僅是需要知道誰有能力去過著 ZAD 式的生活，並自願脫離所有的物質享受。重點在於，一個 ZAD 無法去內化整個分工體系：它永遠連結到一個資本主義的外部世界來提供一系列必需品，尤其是裝備（工具、能源、衣服等等）。我希望大家知道這一切都只是一種分析，而完全不足以構成對 ZAD 不足之處的判斷或批判或者任何類似的動作。那樣做只會是一種極端的謊謬，或者更嚴重地，是一種極端的狂妄。然而，假設我們可以承認 ZAD 也是一個思想的對象（*objet de pensée*）的話，那麼我們就得承認，ZAD 是一種處於資本主義內部裡的單細胞因素（*isolat*），而無論您 like it or not，它還是依賴資本主義及其分工體系，並向其接收各種流動體。〔…〕分工體系幾乎全部都已經被資本主義所擒住。我們怎麼可能一時之間在物質生活上不再依靠它，特別如果我們僅限於地方的層次上重組自己？（Lordon 2019, 235；法文原著夾雜英語）。

羅頓給我們的啟發，無論是其著作的正面內容，還是其著作自身的侷限，都在強調**跨國脈絡中的左翼思想，再也不能不去面對另類整體性的視野**。從這個角度來看，最近諸如《流傘》與《批判性的中國研究學者》等團體對「超越邊界」不謀而合的呼籲，

多多少少可以視為一種願意「面對整體性」的新態度正在醞釀中的跡象。然而，恰恰因為這種整體性是建立在「超越邊界」的基礎上，所以最後還是陷入了另一種「不面對」的陷阱。

有趣的是，十年後的周思中，也就是說已經當了十年農夫、體內細胞全部都已經換新至少一次的新人，反送中爆發之際，曾經一度再思「失語」情結：

眼見中大、理大淪為「戰場」，周思中卻在田間呼吸着違和的清新空氣，「我有問過自己，到底是否逃避？」〔…〕周思中笑言，自己今時今日去前線衝擊反而礙事，「暗號又唔識，地形又唔熟，不如耕好塊田，每個人在不同崗位發揮最大的能力。」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明周文化記者 2020）。

周思中這樣富含自省意味的自述表達，可以當做「失語」情結另類「翻譯」的開端。那是一種跟生態有關的翻譯實踐，未必可以被人類語言直接收編。怪不得《明周文化》的採訪記者選擇用最簡單的方式提出結論：「文字貼地有人味，比起當年筆戰時用詞艱澀生僻，從文字也能讀出不一樣的周思中」（明周文化記者 2020）。記者或許並未發現，「不一樣的周思中」其實比起當年還有更加「艱澀生僻」的一面，只是無法訴諸準國族主義「失語」情結的語彙來呈現。採訪中即使周思中自己表面訴諸了一種現代民族國家必備的分工概念——「每個人在不同崗位」，但或許那就只是一種來自於另類生態翻譯實踐的謙虛。「這是一件牽涉將語言如同泥土一般去耕耘與栽培的事情——與自我藏儲的土地展開溝通，接觸它的不可計量與深度」（Han 2017, 38）。作為一種靠著雙手進行的物質活動，小型務農的經驗與數位生活的現實距離非常遠。如此的距離與對比正好也是韓炳哲的一個重要切入點，針對數位集群主導的時代政治展開批判。韓炳哲的立場確

實難免染上了幾分繼承自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保守色彩，讓人懷疑此立場是否跟海德格一樣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國族主義因素。雖然《在群內》(In the Swarm)一書連一次提及民族或國族主義(nation and nationalism)的實例都沒有，國族相關的沉默顯然也不足以證明國族主義慾望並不存在。畢竟「失語」情結始終就是國族主義內在的構成元素。然而，從韓炳哲拒絕訴諸「定居者」(settler)與「游牧者」(nomad)(Han 2017, 42)的對立組合去理解數位時代媒體風暴的堅持來判斷，確實可以看出超越國族主義思想架構的意圖。就美國的帝國國族主義而言，「定居者」與「游牧者」這兩種表面相互排斥的身分乃為一體兩面的關係，並不矛盾。

數位轉型

翻譯可能作為「失語」情結的一種出路，最近在許寶強一篇直接回應覃俊基的文章—〈「左翼失語」，還是被消聲的抗爭主體？〉(2020)，曾經一度短暫登場，值得一提。許寶強在結語中主張：「『左翼』所扮演的角色，大概是…轉譯者(translators)」(許寶強 2020)。這是一個多麼有趣的出發點，可惜被放在文章結尾，沒有進一步推動。可能早期從事後殖民翻譯政治研究譯介、引進先驅工作的許寶強(許寶強、袁偉 2000)認為，「轉譯者」的意思已經夠清楚，無須贅言。畢竟，他同時還把左翼所扮演的角色同樣描述為「『促進者』(facilitators)」或「『中介人』(mediators)」。這些角色並排在一起成為綜合形象，就足以說明，對於許寶強而言，所謂譯者大概就是站在兩種不同體系及其背後所隱藏的兩種價值觀之間搭建橋樑的角色。假如連劃界實踐如何成為資本主義價值攫取不可或缺的裝置一事都沒有納入「聲音佔有」(appropriation of voice)的左翼戰略檢討之中的話，即使聲勢再壯大，全球化時代

的左派也可能只是一種焦點經濟的腹語術，帶著左派口音去說出新自由主義的母語而已。

翻譯問題延伸出來另一面向，就是許文對「聲音」與「主體性」的理解。許寶強儘管再三強調需要「仔細聆聽」抗爭者與民眾的「聲音」，他卻完全沒有針對「聲音」建構過程中媒介／媒體所起的壓倒性物質作用與回饋效應加以討論⁹。許文中的「聲音」，無論是在表達「正義感」或「民間公義訴求」，都被賦予一種「樸素」的色彩，就好比是一種有機狀態，甚至有如野生生命物發出的天然吶喊，只等待社會科學家用量化的手段去「採集」後呈現即可¹⁰。而數位時代裡那些不僅是傳達、更是建構出聲音的錯綜複雜的物質媒介，均被排除。這樣等於是將主體性不可或缺的關鍵

9 香港大學教授胡德(Daniel Vukovich)針對傳統媒體在反修例運動中的角色展開分析，指出傳媒其實是「事件的根本驅動力」(Vukovich 2020, 202)。在中國研究的脈絡裡，注意媒體對事件所起的現時反饋作用的首例，應該是周蕾對天安門事件的分析(Chow 1991)。

10 許文引為抓住運動主體性真實面貌的重要文獻就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李立峰的系列調查報告。這些報告內容後來均收錄於李立峰等著，《「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現場調查報告》(簡稱〈調查報告〉)。值得注意的，是〈調查報告〉的問卷設計，暗含一些預設立場，特別反映在調查問卷所建構的「中間派」位置。在壓倒性多數的回應者為「80後」(指1980年代出生)世代成員，有將近七成左右自認為屬於「民主派」或「本土派」兩大陣營。然而，問卷如此將「民主」與「本土」分為兩種不同派別的作法本身帶有一定的預設立場。假設問卷反而包含了兩者的混合體—「民主本土派」範疇的話，佔比總數或許可能更高。在範疇虛構性的基礎上，問卷將「民主派」分為「激進」與「溫和」兩種不同類別之舉，形同化約政治選擇為一種道德修養或個性偏好的表現，跟「民主」的實質內容關連不大。遑論，「本土派」這個選項的名稱本來就染上了十分濃厚的道德色彩。總之，調查問卷「政治取向」的分類表以「民主派」與「本土派」為「建制派」以外唯一有意義的選項(其他諸如「無取向」、「其他」、「不知道」等範疇，均欠缺積極正面內涵)，完全見不到任何「左翼」或「左派」的選項，實際上已經表明了一種「和稀泥」的政治偏見吧。在「左翼」／「左派」缺席的條件下，「中間派」如何被建構出來乃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在問卷調查進行的時間過程中，前後增減最多的「中間派／無取向」類別，只能理解為佔比最高的「本土派」與「民主派」之間的浮動選項。也就是說，從「中間派」的建構來看，整個問卷的設計是建立在極其顯著的預設之上，跟法國政壇將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稱為「中間」路線的作用一模一樣，僅是將過去十幾年整個政治選項嚴重向右傾斜的歷史轉向規範化而已。

因素—「否定性」¹¹，從社會分析視野中刪除。總之，所謂「主體性」在許文中被壓縮為一種僅僅反映出認同與利益的範疇，導致主體性變成一種僅具描述性意義的社會學範疇，而不是馬克思極力堅持具備自我意識改造條件與能動性的實踐者。

少了這些媒介相關的反思，就看不見反送中運動的政治主體與數位轉型之間的歷史關係。如同其他當代社運，尤其是沒有領導組織（沒有「大台」）的當代運動，反修例運動一直處於現時反饋的迴路當中。抗爭者一邊靠著如同通訊程式 Telegram 等數位科技展開抗爭，一邊透過數位科技另類平台或主流媒體現場直播立即消費自身的種種媒介形象。如此媒介化的現時反饋迴路，曾經被形容為一種電玩遊戲模式 (Davies, 2020)，將反修例運動引向右翼轉向的發展 (趙蒙暘, 2019)。這種反饋迴路現象從根本上打亂了「聆聽」與「發聲」，「旁觀者」與「參與者」之間的社會區別 (Vukovich, 2020: 203)。同時，它也使得媒介的問題變本加厲，給各種強勢勢力提供方便門介入，例如外國政府情治單位外圍機關提供資訊科技協助 (Perrigo 2020)。身為蒙受香港富豪黎志英 (Jimmy Lai) 等人捐款「612 人道支援基金會」信託人之一的許寶強，應該比誰都清楚，資金的介入對於聲音建構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我們應該將現時反饋迴路的現象視為一個「數位集群」(digital swarm) 的誕生所引進的政治難題。根據韓炳哲的分析，集群「說話沒有聲音」(Han 2017, 10)。而數位集群的標準活動，就是引發並投入所謂的“shitstorm”現象。該詞直譯為「屎風暴」，可以理解為「網路互噴」、「口水橫飛」、「穢言風暴」、甚至「網路批鬥」等用詞的綜合。根據韓炳哲，網路互噴風暴即使鬧得翻

11 「主體性」(subjectivity)與「身分」或「認同」(identity)，是兩個需要嚴謹區隔的概念。前者特別必須納入量化研究從本質上無法掌握的「否定性」(negativity)因素，方能充分掌握。因此種種，許寶強所談「抗爭主體」，更準確的名稱應該是「抗爭身分」。請參見第一章註腳 4。

天覆地，也是一種「同樣缺乏聲音」的現象 (ibid.)。韓炳哲想要說明的事情，就是數位時代主權所產生的根本性變化：「可以支配網路互噴風暴 (shitstorms) 的人才是主權者」(Han 2017, 6)。韓炳哲這方面的觀察，可以拿來闡明「沒有大台」(沒有領袖)運動勇武圈內掀起集體網路批鬥集群與欺凌文化的現象。受到韓炳哲的啟發，我覺得香港 2019 年之後興起諸如肉搜 (HKChronicles 2020)、抹黑、謠言、私了、「全天候批鬥」(Damon 2020)等層出不窮的網軍事件，足以開啟「失語」情結的新一階段。有趣的是，數位集群現象的爆發與香港民族主義的主權慾望之間存在無法協調的矛盾。而這個矛盾本身透露了代議制，例如雙普選的訴求，早已陷入新自由主義與數位轉型 (digital transition) 共伴效應下的雙重危機。今天的剝削體制不需要外在的強權支配也依然可以達成：「遊戲的玩耍就意指以業績最佳化與成就最大化的標準去強迫自己」(Han 2017, 33)。根據韓炳哲的觀點，數位生活的崛起其實意味著真正的遊戲—沒有目的的快樂之終結。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政治支配制度，讓每個人自願被奴役。資訊時代的遊戲，其實都是壟斷平台受益的勞動。監視與模控才是資訊科技的普遍真相；凡是數位活動，包括遊戲在內，都是一種受監控的免費勞動。

詮釋學侷限與失語問題的再思考

假設說左翼在右翼主導的歷史脈絡中普遍感覺到的「失語」狀態，有相當一部份源自左翼不知不覺接受了一些邊界相關的預設的話，我們要怎麼破除這些體制，也是未來各個運動需要長期耕耘的課題。

為了進一步釐清這些癥結、並將翻譯的問題納入一個更貼近個體實踐的脈絡起見，我們不妨去參考致力於左翼思想與運動交匯的香港左翼團體—《懷火》2020年3月11日以〈矛盾大對決：美

國左翼對談舉美國旗的反送中示威者〉為標題，刊登美國左翼運動分子「樹葉君」、反送中運動中舉美國國旗且被告暴動的 C 君、還有《懷火》編輯 Jin 三人之間的對談錄¹²。這次的對談錄之所以值得分析，是因為它包含了諸如翻譯、階級與抵賴等上文已討論過的重要因素。

翻譯的問題在這次對談錄的位置相當微妙。雖然樹葉君在中國待了十年之久，可是有關與 C 君和 Jin 編輯的對話在英、普、粵三種語言間到底採用了什麼語言進行，編案隻字不提。無論是美國人的樹葉君還是香港人的 C 君和 Jin 編輯，在文字上都操著標準的普通話表述己見，留下一種語言差異被省略的印象。語言差異的跡象僅有兩個：一則是 C 君的普通話偶爾夾雜一些港式(粵語)流行語，這些用詞都給加上了夾註號並附上普通話的翻譯，二則是對談內夾雜個別英文單字。或許是為了加強文字版的可讀性，原始的對談錄經過一個刪減、潤稿、修訂，甚至是翻譯的整理過程。然而，語言的統一性再現還是無法完全泯滅對談錄殘存的差異性語言勞動的痕跡。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差異基本上與全球化移動性不均勻的分布有關。

就美國國旗的象徵意義而言，三個人的對談更是錯過了一次從翻譯實踐的角度切入的黃金機會。作為用心設計的表演，三人對談凸顯了身分差異的格局。身為《懷火》編輯的 Jin 可以暢談東亞地區各國對抗美軍基地與美國種種霸權的歷史；美國出身、富有長期從事社運，長期居住國外經驗的樹葉君可以以跨國視野的角度，一邊批評那些舉起五星旗的美國左翼，一邊批評那些舉起星條旗的香港人；而缺乏這些國際見識與閱讀經歷的在地港人 C 君，就在編案裡被描述為「更接近普羅的政治性和感受性」。

12 對談進行的時間為 2019 年 11 月 9 日。

「普羅」一詞的出現具有一定的指標意義。雖然當代中文的使用習慣早已脫離了二十世紀「無產階級」的含意(何況「無產階級」一詞的原意經過文革極端普列漢諾夫(Georgi Plekhanov)傾向被徹底踐踏)，進而把它化約為泛指低層大眾的代名詞而已，可是那些搖著左翼知識隊伍旗幟的人，跟著那樣馬虎使用，十分遺憾。畢竟，在馬克思那邊，「階級」有別於純粹量化、社會分層、身分式的意義，是一種牽涉主體性建構過程的靈活概念，否則不但無法解釋工人為何經常違背自身的利益偏偏去支持一些代表資方利益的統治勢力，更無法理解工人的主體性如何自我改造成為革命主體。總之，「階級意識」並不是反映利益的再現與利益的代言權的鏡像物，而是深受包含支配與剝削關係在內的各種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所影響的流變體。利益的再現與利益的代言本來就不同，而兩者往往都包含各種透過時間媒介與他者媒介所產生的矛盾與差異。由此產生多重慾望並具有多重裂痕與差異的意識，始終是無法訴諸身分般的階級概念去掌握的。遑論，對於特地針對意識、試圖產生政治改造的左翼計畫而言，建立單純代表工人利益的機制遠遠不足以達成此一任務。正因此，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在其經典著作—〈賤民能否說話？〉(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早已指出：

重點是馬克思並未試圖創造出一種將利益和慾望重疊在一起的專一主體。階級意識的活動並未以此為目標。無論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領域還是在(世界歷史載體的)政治領域，馬克思在其理論模型建構過程中一樣被迫建構出一些分裂且被置換的主體，而那些主體裡面不同部分之間的關係，並非彼此連貫或連續。(Spivak 1988, 276)

史碧娃克的觀點可以視為針對一般馬克思主義論者詮釋「自在階級」(class in itself)與「自為階級」(class for itself)這個區別的批

判。一般來說，馬克思主義論者會認為，前者意指在生產過程中扮演各種不同角色的社會分層，後者則指工人階級成為自覺的社會力量，本著自身的利益與其他階級展開對抗。不同於一般馬克思主義者的詮釋，史碧娃克勾勒出馬克思原著裡對於統一主體性的批判，進而將馬克思的立場視為對再現—代言模型的全面置換。基於此，我們可以總結，作為革命主體性的「無產階級」應超越一致性的利益、單一性的再現、以及口徑一致的代言制度。此一觀點放在邊界的脈絡來思考的話，就意味著需要超越的不是邊界本身，而是邊界的邏輯所創造出來的格局，讓劃界實踐成為「無產階級」內在的構成條件。

然而，在《懷火》的對談裡，上述的非一致性主體性偏偏被遮蓋了，導致對話中每一位參與者均代表明確、甚至格式化的階級或國籍身分。而被夾在兩個人中間的 C 君，一直被迫去面對自身所處脈絡中那些原本對他而言是看不見的社會建構的複雜因素。在樹葉君與 Jin 編輯多次以柔性姿態，將針對 C 君的批判包裝在一些「如有冒犯」或「我是很理解〔…〕那種慾望」之類的客套表達之後，稍早已經坦承了舉起美國國旗行動的理由並「沒有想得那麼深入」，甚至可能有點「幼稚」的 C 君，最後有點氣急敗壞地承認，他「沒有用他們〔即香港內、外種種他者〕的角度去想這個事情〔…〕我是很自私的」（《懷火》2020）。此時編輯 Jin 的回應特別值得注意：

要感謝你的 real。其實我不是覺得一定要說一定要一副「我已經讀完了整個區域政治和社會運動歷史」才可以抗爭或說話。我覺得這也是不公平的，畢竟每個人的資源也不一樣，聽你說完以後我也明白了你的資源的侷限（《懷火》2020）。

有趣的是，那種在對談中被描述為普羅侷限的狀態，雖然確

實可以理解為邊界所起的屏障作用造成知識貧乏、視野不夠寬廣，可是在現代社會裡面，也就是說，在繼承了資本主義剝削與殖民主義支配之雙重關係的全球社會裡面，那些邊界作用不斷地滲透進每一份社會關係與每一次社會實踐，即使大學殿堂也不例外（甚至更囂張）。甚至用「滲透」去形容一種本身屬於所有社會「內部」構成過程的契機一事，實在顯得失之精準。畢竟，存在於每個社會內部裡的因素本來就無法用「滲透」一詞去形容。誠然，邊界的問題之所以是個基本的政治課題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內嵌於所有的社會關係。原則上這就牽涉到每一個地方乃至每一個個體自我構成過程中，劃界實踐具有不可繞過的悖論特質：問題不是誰的侷限大，誰的侷限小，而是邊界雖然無所不在，到處都是擴散中的邊界，但是邊界同時「無所」（亦即邊界自身無法構成一個獨立的空間）而「不在場」（亦即邊界真正的意義是其作為一種展演性的社會實踐，而不是一種給出的對象）。假設將「視野狹窄」vs「視野開闊」的框框套用在邊界作用上，反而會導致邊界作為社會實踐的性質從我們的社會分析視野中消失，讓左翼隨後忽視，邊界與劃界實踐本身都需要歷經一次民主轉型。結果注定讓我們之間分享的唯一共同體—邊界，以物化的方式不斷加深。可惜樹葉君在對談一開始的時候提起邊界的問題，同樣將它納入了侷限的視野去理解：

在美國的左翼裡面，對香港的態度也是有分歧的，有一些對我來說是「左膠」的人會說：「反對香港示威者！支持中國！」雖然我是左翼，但是我對這種左翼是不同意的。在反送中運動以後，我看過一些主流的評論、左翼的評論，還有一些不那麼左翼的、本土派的論述。基於我對國族主義和邊界的批判，對本土主義我是很難下嚥的。但我今天來到這個對談，是因為我認為我不應該那麼快地對香港的本土主義妄下評論，畢竟我對本土主義的許多

理解是來自美國的社會。（《懷火》2020）。

自認不瞭解香港本土脈絡的樹葉君提到「左膠」的時候，因為讀者無從知曉她／他使用的是中文還是英文，所以無法判斷她／他對於該詞的中文脈絡瞭解多少，特別是「左膠」一詞在香港所代表「背叛本土」之意。¹³ 然而，即使再多的理解、知識或閱歷也並不等於邊界的「障礙」必然就可以減弱。否則的話，以知識生產為業的各國大學機構，早就成為了無國界運動的中堅力量，而不是國家利益或財團利益的推動者。

且讓我們回到一開始引用陳偉福把香港形容為一個「之間的地方」的說法。《懷火》三人對談所揭露的正是如此：凡是「地方」其實都是一種「之間」的狀態，何止香港而已。¹⁴ 同樣，C君被說有「侷限」的地方，跟另外兩位與談者本質上沒有什麼差別。與其將之設定為可以克服或溝通的障礙，抑或蒙受其負面影響的「侷限」，不如去打開翻譯實踐的視野，將這個「之間」狀態的普及性與共通性好好發揮。有趣的是，解套的可能方法之一在對談過程中就有短暫乍現。樹葉君跟 Jin 編輯在在叮嚀 C 君（和讀者）注意的事項，追根究柢就是國旗的使用連帶啟動了許多隱形的社會關係，例如與東亞或美國各種社群之間的關係，抑或與中國或香港內部的各種社群之間的關係。這些社會關係本來可以被視為無所不在的翻譯實踐的脈絡，偏偏被呈現為侷限，十分可惜。畢竟「國際戰線」那些社會關係，本來都屬於香港社會內部的日常，並反映在港人長期的信念——香港即是中國的轉型模範。

13 關於左膠一詞的歷史及其意義的演變，請參見 Ip (2020) 頁 93 起。

14 香港離散知識份子周蕾 (Rey Chow) 1992 年曾提出「第三種空間論」，將香港處於中、西（英國）夾縫間的特殊位置當做一種方法論的泉源 (Chow, 1992)。我在此所提的「之間」性質，與周蕾的概念雖然表面上有異曲同工之處，其重大的分歧點，在於我認為，連「中」、「西」兩邊都具有一樣的「之間」特質。「之間」性質並非一種相對於「正常國家」的例外狀態，而是現代區域 (area) 的本質。

性別與失語

香港反修例運動前後另一重要的失語經驗跟性別有關。很榮幸邀請到香港兩位參與性別研究與社運的教授為拙文作序，相信她們的序文對此已有精闢的發聲，我在此便使用有限的篇幅分享一個關於雨傘的奇想。

眾所周知，自從 2014 年傘運起，雨傘就變成了香港抗議運動、乃至香港本土文化整體的標誌。被譽為香港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詩人兼學者也斯 (梁秉鈞) 病逝前，曾經寫過名為〈一個人一把傘〉的詩稿如下：

我從來沒見過好像你這樣的傘。

你的骨骼這麼嬌脆、衣服這麼輕柔

當你打開來你給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我逐漸習慣了你的存在

我開始在有太陽的日子也帶一把傘

坐在咖啡店喝一口咖啡

或者在藝術中心看電影的時候

老是想打開一把傘……

我知道人們在我背後竊竊私語

他們開始說我是個奇怪的男人。

這也不要緊的，只是有時

你老是閉上了，怎樣也沒法打開。你冰冷得好像冬天的雨

你鋒利得好像早晨的霜雹刺在赤裸的頸背上。

然後有時候你失蹤了，

下雨的時候我沿街去找一把傘。

他們說我其實可以在七—十一另外買一把，

或者將就一下，用一疊舊報紙…

「你看，雨停了，還擔心什麼？」

我想我真是變得有點奇怪…

2013年去世的梁秉鈞這首〈一人一把傘〉的詩稿遺作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注定與傘運產生聯想，甚至讓一般人誤以為就是專門為了傘運而寫。然而，這首詩令人印象最深的地方並不是(尚未發生的)政治聯想，而在於其中表達的性別混雜性與曖昧性。不但第二人稱的角色，從男性的「你」變成女性的「妳」，再而變回來，而且「嬌脆」、「輕柔」的「你／妳」，時不時呈現「鋒利得好像早晨的霜雹刺」的面貌。如此結合了刻板女性特質—溫柔—與刻板男性特質—鋒利—於一身之「雨傘」，顯然就包含了高度的曖昧性與雙重性。怪不得詩人說「我知道人們在我背後竊竊私語，他們開始說我是個奇怪的男人」。性相受到質疑之餘，詩人拜雨傘這個象徵意義多元而未定的物品之賜，發現了「打開一個全新世界」的訣竅。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一篇討論尼采的論文裡，從尼采遺稿中的一句「我忘了帶傘」說起，針對一般哲學家曾經均認為與真理無關的“style”(可以譯為「筆鋒」、「風格」甚至「風骨」)一詞的曖昧性，去探討性別差異、意義的產生、整體性與局部性的關係(也就是—一些詮釋學派的哲學家稱為「詮釋循環」的問題)，

以及存有論的遺忘等難題。有趣的是，英文“Style”一詞源於尖頭狀的東西，恰如中文「筆鋒」一詞中的鋒字那樣。根據德希達的描述，雨傘是結合剛柔、隱蔽與打開於一身的物品。作為一種隱喻，雨傘所打開的「世界」就是個存有論真理卻被遺忘的世界。因為被遺忘，所以各方專家紛紛前往提出自己的看法，力圖辨識出其中真正的意義。例如，對「遺忘」與象徵陽具的尖頭物特感興趣的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依德認為，雨傘不僅是一個象徵性極高的實質物品，更是一種後設心理概念(Derrida 1979, 130/131)。面對專家的眾說紛紜，德希達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一方面認為考證尼采的原意有其必要，一方面堅持強調，不論考證結果如何，最後都無法改變一件事實，那就是文本的「物質性」注定留下的「其餘」(法:restance; 英:remainder)意義(Derrida 1979, 130/131)。德希達使用“restance”一詞並非法文常用詞，而是德希達自己的創舉，其用意在於標示出符號重複(複製)過程隨時可能產生的「意外」。意外一詞又可表達未料的發生之意(例如，西方帝國資本主義建構下性別二元論之外的可能性)，又可表達「意義之外」的意思(例如，需要翻譯的對象)。而放在一個生物學的脈絡看待，意外就是物種複製過程中「變種事件」的突發。事件的意外性讓德希達轉而針對「整體性」的概念加以分析，就好比尼采草稿中「我忘了帶傘」此句的出現讓人感到意外、費解，進而假設該句子本屬一個可以重建的整體意義(作者原意)。德希達的目標並不像一些人預期那樣致力拆解而不是建立。雖然他確實否定了整體性被人類簡單掌握、知曉的可能性，但是他並未簡單地否定整體性本身。對於德希達而言，存有的整體性就跟那句「我忘了帶傘」一樣，都像是一些「不規則的移植體」(法:une greffe erratique; 英:an erratic graft)(Derrida 1979, 134/135)。這個意象的用意一方面可以視為針對現代人文科學，從人類學與語言學到社會學均訴諸樹狀結構或樹狀圖表(例如，將人類語言畫為根同枝異的樹狀關係)的批判，

另一方面還可以視為取而代之的新意象與組織原理。¹⁵

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王家琪在一篇討論也斯的後殖本土理念與文學實踐的論文裡，將也斯視為香港失語狀態的終結者。王家琪強調「也斯卻是希望表述『真正的』香港，讓本地人奪回話語權…拒絕香港被外來者『代言』也是也斯的主要訴求。例如他在〈香港的故事〉所批評的幾個電影及藝術文本，主要問題在於香港人只是被再現的客體，而不是自主發聲的主體。」(王家琪 2020:105-106)關於「真正的香港人」是誰，「外來者是誰」，我跟王家琪看法不太一樣，這些問題上文都討論過。重點是，作為文學文本，也斯的這篇詩稿遺作永遠存在無法輕易納入事先確定好了的整體性架構內，產生選邊站式的意義。¹⁶就像梁秉鈞本人無法左右讀者將「也斯」唸為粵語音“yasi”還是國語音“yěsī”，甚至英語的“Yes!”(抑或因為是文言文虛詞而拒絕有聲朗誦)。面對如此根本的曖昧性與不確定性，難道除了重複喊出“Yes! Yes!”還有什麼更好的選項嗎？傘運反而力圖對此快刀斬亂麻，憑藉最曖昧的象徵物—雨傘去劃下界限，形同對劃界實踐無法被化約為空間界限的特質說「不！」並引發空間化的生命政治邏輯。於是乎，雨傘這個東西原有的曖昧性，在傘運效應下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種差異布署下「通俗進化論式想像」的物種優劣排

15 頗類似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塊莖(rhizome)思維的主張，只是德希達的「不規則移植物」更脫離了有機想像的框框，可以納入非有機「生命」物。有關「塊莖思維」與疆界的關係，台北大學視覺藝術系教授許濤月(2014)如此解釋：「哲學家德勒茲所提出來的地下塊莖概念…就是相對於樹狀系譜的線性邏輯，透過植物作為類比的地下塊莖，例如薑或馬鈴薯等這類植物。地下塊莖顧名思義是強調，由塊莖與塊莖間，不斷產生連結與無限制的生長。因而地下塊莖在強調其多樣性與不斷流動，地下塊莖於是成為一種解脫疆界／重納疆界(deterritorialisation/reterritorialisation)的過程。這種解脫與重納疆界的說法，可回到德勒茲對國家體制階層化與國家鞏固領土的批判。」

16 對於也斯遺作詩稿的曖昧性詮釋，可以參見賈雅緻(2015)。

序。這就讓雨傘硬成為「撕裂」(劃界)的象徵。¹⁷

這張據說於2014年創作的圖案是根據知名的〈人類進化史〉圖案改繪而成，將香港社運史俏皮地比擬為物種進化史。作為一個人類世(anthropocenic)想像，這個圖案表達了一種目的論，社運必然循著已知的終極目標演進。至於「進化」本身的問題，圖案的再現包含一些常識性的誤解。根據現階段的科學認知，人類的起源多元而非單一，而今天現存的人類並不代表進化的最後發展。



有趣的是，《香港抗爭者進化史》明確地使用女性形象來再現香港的抗爭，或許有人認為這就意味著一次性平概念的落實，然而，我想針對此再現的預設邏輯提出一些反思。第一，女性由嬌弱進化為剛強的轉變與香港的民主抗爭的進化並行，暗示了「女性」和「香港」都是弱勢受害者，「女性」和「香港」是可置換的，而這個可置換性必須建立在「女性是絕對的弱勢」這一預設上，而不是去反思女性何以弱勢、那個弱勢位置本身的複雜性、甚至是那個位置如何鑲嵌在種族淨化／進化的國族論述中。也就是說，

17 有關「撕裂」的意義，請參見李俊峰(2020)。

置換的效果並不直接有效地重新塑造「女性」賦權(empowerment)的意義，反而強化了「女性是絕對的弱勢」這一前提的不可動搖，而這一前提越是不可動搖，香港作為絕對的受害者的位置就越加穩固。

第二，是「女性」形象再現的扁平化。如果欲挑戰「女性」在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建構下之於「男性」這一標準人類／中性個體的性別差異他者的位置，「女性」的再現能不能夠不再依賴圖中直白扁平的具現化—乳房臀部的輪廓、長髮披肩，還有裙裝和凹凸有致的緊身衣—而有其他種可能呢？反推此邏輯，是否不通過再現上述生物性或社會性特徵，就無法再現「女性」呢？比方說，再現一個酷兒(queer)—沒有任何可以輕易被歸類的性別特徵、甚至批判性地怪物化一下「人類」這個作為「人類世」英雄的形象—是否更能有效地讓「女性」能夠作為活生生的非類即人(person, not human)去體現(embody)他／她／牠／它在現代性的規訓之外的主體性呢？如果「女性」從來就不只是生物性質的給定，而是社會建構的類別，必須也只能代表被動性和嬌弱，那麼我們是不是能與這樣的建構劃出批判性的距離，試著不再一味地抓著人類世的社會進化思維不放、企圖讓「女性」「進化」，而是打從邏輯的根本上去否定「女性」這個帶有殖民性的社會建構本身呢？而甲由(蟑螂)、蝗蟲、殭屍等等在香港時常被投射為「低劣人類」的他者物種形象，何嘗不是被建構在如此這般進化論的想像的陰暗面呢？如果「女性」的進化式未來必須建立在他者物種／人種的低劣性、原始性、前現代性之上，「女性」的再現又何嘗不是被迫成為與人類世史觀共構共謀的工具呢？

最後，為雨傘說句話吧：雨傘被拿來當作「正名」、並準備進行到下手「撕裂」一事的象徵，對雨傘那富有更多創造性和可能性的本性實在太過殘忍了吧！

結語：一場加速主義的政治運動？ 轉型之後呢？

左翼參與香港反修例運動的過程中，在思想方面埋下敗北伏筆的地方主要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面向。其一就是回歸邊界，遷就資本；其二就是保全「西方及其他者」，遷就殖民—帝國現代性的世界圖式；其三就是錯失翻譯良機，遷就宗教戰爭、醞釀出新自由主義意味濃厚的「失語」情結。¹

整體性與橫向自主

從文化研究對整體性的否定，到語言整體性的假設與具體抽象性的社會建構，我們一直不斷地發現劃界實踐與整體性的問題意識有密不可分的關連。這點其實並不奇怪。畢竟，全球政治生活的基本組織單位—民族國家，就是我們生活中整體性的強勢版本與日常現實。這點從酒井的分析就可掌握：

1 關於社運搭配思想運動的可能性，請參見拙文—〈太陽花運動類比性的翻譯：在全球國家物流改變與共通普及的創構之間〉(蘇哲安 2016)。

現代國族共同體種類式的身分 (specific identity) 意味著個人與整體性之間享有直接而毫無媒介的互動關係。相比之下，前現代的社會形構反而立基於相對性的身分。在相對性身分的脈絡中，群體屬性由父子、君臣等地位高低的關係界定，而眾多地位關係中的身分因而並非固定。換言之，個人身分由社會網絡與親屬關係決定。然而，在現代種類身分 (specific identity) 的脈絡中，非經由地位性身分的歸屬關係，例如個人與種族、個人與族群、個人與國族等反而佔了主導地位。於是乎，根植於制度性平等的社會關係首度成為可能。所謂「平等」，意指〔個人〕與整體性的關係保持毫無媒介的狀態 (Sakai 2005a, 38)。

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民族身分之於個體如影隨形，主導著我們日常生活的身分經驗。有趣的是，這種經驗雖然感覺非常具體，其實卻是十分抽象的。或者可以說，正因為這些經驗背後隱藏一系列劃界實踐所造就的整體性幻象，日常經驗才會讓我們感覺到，如同民族國家這麼抽象、這麼理論的東西，反而最實在、最具體。面對諸如此類的詭計，我們應該怎麼辦？當前最為普遍的答案之一就是反中心主義 (anti-centrism)。諸如歐洲中心主義 (eurocentrism)、華夏中心主義 (sinocentrism)、我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男性中心主義 (androcentrism) 等等一系列的「中心主義」都成為了批判的對象。

作為一個知識計畫，反中心主義與拉美理論家莫雷拉斯 (Alberto Moreiras) 二十年前批評的「無限解殖」 (Moreiras 2005, 586) 計畫無異。面對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種種不正義，許多人認為進步主義唯一的選項就是力圖從各式各樣的「中心」勢力獲得解放，並對於諸如權益、身分專有名詞、土地與勞動等等展開「光復」或「重奪」的行動。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反中心研究以比較與跨界關係為特徵，旨在恢復被中心主義掩蓋的多元性。以「西

方」的建構為現代中心主義的範本，反中心主義研究力圖揭穿「西方」背後由全球互動組成的多元面貌。在《現代個我的全球起源》 (The Glob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elf) 一書中，阿爾伯特 (Avram Alpert) 總結：「遵循薩依德 (Edward Said) 的說法，我將這種歷史學方法論稱為『重建』 (reconstitution)」 (Alpert 2019, 12)。作為一種「無限解殖」的知識計畫，反中心主義企圖一邊反對各種各樣的歷史「中心」，一邊「重建」曾經被「中心」所壓抑的多元性與在地身分。也就是說，當代反中心主義其實就是在思想的層次上力圖展開無限橫向的「光復」行動。

然而，我們這一代的關鍵政治難題並不是「什麼是中國本部？」或「誰才是真正的中國人？」，遑論「什麼是歐洲？」與「真正的歐洲人是誰？」。我們所需要瞭解的，是諸如此類的問題為什麼不僅是眾多政治課題中的一個，更決定性地構成了政治關係本身。除非可以針對區域與人種差異部屬的框架本身去反思，否則，反中心主義運動與知識生產其實只會導致該部屬所引起的暴力變本加厲。自決若不再被理解為充滿剝削與支配關係的特定歷史脈絡所建構出來的社會實踐與政治範疇，反而被抬舉為道德號令，就注定淪落為「無限解殖」運動所追求的普世「人類法規」 (Moreiras 2005, 591)。不用說，作為現代性區域的典範，民族國家本來就是一個對比性的單位。反中心研究固然強調比較 (comparison) 與交插的歷史 (crossed histories) 等方法論，卻並未動搖或置換以民族國家為潛在性對比架構的全球社會建構。因此，我們不得不問，一邊反對一切中心主義，一邊力推各個地區的光復，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政治計畫？莫雷拉斯的回應很簡單：這就是「時代權威的進步主義意識形態」 (Moreiras 2005, 587)。我認為此意識型態中的危險，在於我們可能會輕易相信反中心主義運動 (無限解殖的當代更新版) 比脫離區域部署更加重要。本文開闢的批判路線儘管不足以擺平整體性與劃界實踐的衝突，但或許可以當作逆向思考的

結合，從劃界實踐的角度再思考整體性相關的思想行動與物理行動，進而從共通普及的角度重新奮發。

「牆」國與核心問題意識

然而，可以預期的是，一些批評的聲音會指責這些再思考的嘗試太過「離地」，與現實(或群眾、或受害者、或被壓迫者)太脫離。諷刺的是，那些聲音以為最具體的，例如城市的空間或國家的建構，其實往往才是最抽象的、最理論的。

儘管如此，有些政治問題不能、也不該被迴避。例如，香港研究知名學者兼理論家陳奕麟(Allen Chun)，在一篇書評中抨擊葉蔭聰《身分政治》一書的認同理論站不住腳之餘，進一步指出，與其說香港新的身分政治就是反修例運動的核心問題，不如說「[中共]政權的性質才是真正的核心問題意識」(Chun 2020a, 1)。我與陳奕麟，乃至眾多評論家的分歧點，並不完全在於「政權的性質」問題(這點我確實認為有商榷的必要)，而更是在於如何認識並回應它。法國哲學家拉庫·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與儂曦(Jean-Luc Nancy)合著的《納粹神話》(The Nazi Myth)一文最後一句話可以引以為鑑：

對道德與民主的確信所帶來的舒適安全感，不但不是什麼事情的保障，而且還會讓人暴露於風險，讓人看不到有一樣東西的到來或回歸，其實並非單純的歷史意外。對納粹主義的分析絕不該被視為一種控訴檔案的簡單彙編而已，而是應該被理解為針對我們來自哪裡的歷史展開全面解構的元素之一(Lacoue-Labarthe and Nancy 1990, 312)。

根據拉庫·拉巴特與儂曦的分析，納粹政權「屬於西方一般的

性質」而不是一種「失常偏差」(ibid.)。中共政權假設有什麼地方跟「全球一般的性質」有所關連或最大公約數的話，那就是劃界實踐與邊界的再／製造。然而，坊間到學術殿堂一般都認為，中共政權以國家主權之名，行使竊據中國人乃至香港人話語權之實。持有此類觀點的人通常將中共「主權的騙局」放在「自由與威權的歷史對決」的脈絡去理解。然而，「自由與威權的歷史對決」說穿了就是一種定居殖民主義迴避解殖的意識形態，自然就支撐了資本主義一系列有關轉型、翻譯與區域的預設。這不是否定自由的意義而是提防自由被意識形態收編。以主權國家為「政權」的標準，「自由與威權的歷史對決」這個格局本身不僅是一種轉型論述，也是一種生命政治對比架構，認定「自由」這個定義多元、實踐多元的理念，完全可以當做是一種評量的簡單標準，拿來評鑑各國政權的轉型業績。² 這種論述無視、甚至蓄意去除了後殖世界一切政權之建立的核心脈絡，亦即「語言」、「人民共同體」、與「主權」三者間的必要關連。

中國今天處於全球政治風暴圈，從邊界的角度來看其實並不意外。這點可以從《拓扑學家的世界地圖》的圖案去快速掌握：

這張地圖呈現的，是世界各個主權國家的邊界關係。邊界數量越多，所佔的區塊就越大。只要一看就能明白，中國的邊界比世界任何其他主權國家多(不但多，也是世界最長的)——遑論，這張地圖並未納入諸如特區、走廊、加工區、免稅區等各式各樣的國內邊界，否則可能就更誇張。再者，該圖最大的盲點就是讓

2 英國法學教授沃爾(Illan rua Wall)指出：「把焦點專門放在權益(rights)一事的危險，在於讓我們忽視權益的〔政治〕目的。權益於是就好像只牽涉到標準的確立與執法的問題，導致我們的焦點傾向於檢驗各國政府是否有效貫徹各種權益。然而，海地〔革命〕的啟發在於，權益的用途多元，其中之一為的是產生激進的改變。奴隸將權益的概念納入他們自身的政治傳統，力圖對當時的政治構成產生斷裂(rupture)。」(Wall 2013, 20-21)。

人誤以為邊界是固定的。相反，邊界才是個本質不穩定的因素，它一直處於流變的狀態中。換言之，中國政權，任何中國的政權，暴露於邊界這個核心問題意識的

「程度」之高，假如不是獨佔世界之冠，就是數一數二的前列者。遑論，美國長期一直策劃各種侵犯中國(乃至世界各地)的邊界、破壞中國邊界穩定的行動。這些實情雖然無法說明什麼，但是恰好可以說明的，偏偏就是當前「核心問題意識」的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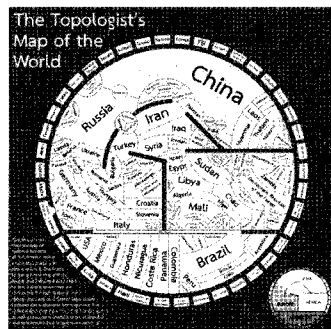


圖 6 《拓撲學家的世界地圖》

換言之，享有「牆」國之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以「牆」的經營與擴散為經濟發展以外、政治正當性基礎³的原因與諸般相關的問題，並非一件可以在「牆」內(中國「語境」內)單邊追究的事情。「牆」的系譜由眾多關係實踐構成，其中關鍵在於劃界實踐如何將時間轉化為空間，創構「牆內」與「牆外」兩種看似獨立自主的主權範圍。

當前中國的崛起常常被描述為一個新帝國力圖取代舊帝國的轉折過程。然而，從劃界實踐與世界圖式的角度來判斷，中國的崛起並不能訴諸「帝國輪替論」去理解。歸根究柢，這不是一次歷史輪替，而是世界圖式的突變事件。雖然並未挑戰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可是確實造成了時間性的碎裂效應，讓轉型的問題重新浮出檯面。正因此，部分人士對此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鄉愿地期待中國的崛起帶來美麗新世界的開端。相反，對此抱有恐懼

3 最近幾年中國流行「入關學」的大眾論述，憑藉「關」的邊界意象去詮釋國際地緣政治，足以反映出邊界思維對當代中國政治想像的關鍵作用。

的另一群人還積極投入各種「光復」運動，力圖在既有世界圖式中(也就是說，在一個「西方」的邊界十分明確的世界圖式中)尋找歷史殖民主義的轉型正義。此兩種態度南轅北轍，卻都沒有正視資本與轉型之間的關連。

非轉型主張

近幾年西方激進政治思想圈出現了各種各樣「非轉型」的主張。例如：沒有過渡期的革命政權(Hazan and Kamo 2013, 35)，或者沒有轉型期的生態文明(Désobéissance Écolo Paris 2020)。在衡量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困境之際，英國理論家多士卡諾(Alberto Toscano)曾經清醒地指出：「從當代批判性思想內部出發，轉型的問題依然含混不明，甚至根本就是無法思考的」(Toscano 2016, 213)。西方當代激進政治思想圈對於此困境的回應，往往就是加以否定轉型及其所屬諸如時間(例如階段性的過渡期)、空間(例如獨立自主的管轄區域)與主體性(例如前衛政黨或人民共同體)等概念(Toscano 2016, 213-214)。弔詭的是，正當轉型思想陷入了如此徹底的危機之際，當務之急的轉型似乎從未這麼迫切，從能源轉型與生態轉型起，到文明轉型與物種關係的轉型，恰好凸顯了這點。

香港的反中共本土運動偏偏將普世轉型視為抗爭的核心目標，所呈現的情景與多士卡諾筆鋒下的西方激進圈可謂 180 度相反。然而，凡是普世的主張往往「內嵌於一系列界限、邊界與限制的特定組合之內」(R.B.J. Walker 2009, 257)。與其幻想著一切邊界的消失抑或一切邊界的回歸，不如去發明新的轉型論述與實踐，企圖引發邊界的民主化、世界圖式的基進改變與跨國連結的另類形式。故此，多士卡諾坦承：「為了打通因廢功而壅塞的左翼戰略想像，一種新的轉型概念十分有必要」(Toscano 2016, 216)。

雙重國家

有趣的是，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多士卡諾將「一個國家內的兩國家」(two states in one state)這種「雙重權力」(dual power)的局面當做再思考的出發點。原本為列寧提出的概念，「雙重權力」當時旨在給蘇維埃(工人的代表會議)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提供一個理論與實踐的共同架構。引起多士卡諾回去重溫列寧這個概念的導火線，是美國左翼知識分子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近年以普世軍隊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主張(Jameson, 2016)⁴。「雙重權力」的主張歸根究柢牽涉社會主義轉型的歷史辯論。尤其從1970年代西歐左翼拋棄革命路線，改採議會漸進路線，亦即所謂「歐式共產主義」(eurocommunism)崛起之後，「雙重權力」相關的主張原則上都脫離了典型的革命轉型。無產階級革命軍與中產國家體制之間的互動一事不再為轉型相關思考的出發點。取而代之就是體制內漸進式的改革視野。當時希臘知名左派理論家普蘭查斯(Nicos Poulantzas)將非革命路線這個新戰略描述為「一個漫長的過程，其中大眾展開的鬥爭並不尋求創制外在於國家並與之平行的有效雙重權力，而是企圖在體制內激發國家的內部矛盾」(Poulantzas, 2014: 257)。回顧左派思想這段歷史轉折的種種預設與後果，如今顯得日益重要，免得我們不知不覺從左翼的歷史敗北經驗吸收過多的預設，造成新思想發明嘗試的障礙。值得注意的，是多士卡諾對「雙重權力」的討論重點在於具有國家性質的權力(statist power)。這點就與當前一些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生態社會主義

4 詹明信的問題不但只是單獨針對美國一國而已，更沒有具體說明從美國帝國國族主義全球軍事佈局到國民軍隊的轉型過程應該怎麼處理？詹明信僅僅宣稱他構想中的普世軍隊「無法展開海外戰爭」(2016, 28)，但是「基地」相關的討論不但非常薄弱(僅限於基地扮演的經濟角色而已)，而且完全迴避了美國在全球上現設800多軍事基地的事實。結果，無論詹明信還是士卡諾，其雙重權力的點子也難免不自絕地訴諸國族形式的預設。

主張對雙重權力的理解有著微妙的不同。以美國「社會生態主義」理論創始人布克欽(Murray Bookchin)為例，「雙重權力」相關的主張，都以一種自立於國家之外的自主權(autonomy)為出發點，力推政治上的橫向發展。而如同「之外」一詞所暗示那樣，多多少少還是迴避了羅頓提及的「外部性」問題(見上)。

對於雙重權力的辯論，我雖然無法提供什麼新的解釋或權威性的觀點，可是比較引起我注意的，是這個議題與香港脈絡之間的可能關連。放在香港的語境裡，多士卡諾的想法想必會招惹一些批評聲。這些聲音應該會指出香港「一國兩制」的破滅，已經足以證實多士卡諾這個點子其實是沒有出路的，或者至少無法應用在香港身上。另一種預期中的回應，可能來自於類似梁志剛在《流傘》媒體上撰文，主張「糧食主權」與「雙重權力」的立場(梁志剛 2020)。然而，梁志剛的「雙重權力」概念與多士卡諾「兩個國家」的概念不同，是強調「一個國家」與「國家之外勢力」的概念。比較接近多士卡諾定義下的「雙重權力」概念的則是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彭麗君的觀點。在其英文著作《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一書中，彭麗君將「一國兩制」的「兩制」概念視為一種理論與實踐的泉源，「與民主非常相關」(Pang 2020, 12)，確實可以視為一種對多士卡諾的迴響。⁵然而，如上面所說，

5 雖然我非常贊成彭麗君對單一權力中心與主權邊界的質疑，並且承認在這點上她與陳清橋(Stephen Chan 2020)、葉蔭聰(葉蔭聰 2020)的重大不同，但是我認為《民現》一書中那樣將人民視為一種實定性(positivity)的存在(Pang 2020, 13)，在方法論上已經產生了無法克服的矛盾，實不可取。持平而論，以上這個觀點還是需要針對彭麗君引用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作法展開具體分析才能確立。重點是阿倫特將「言語」(speech; Arendt 1998, 178)當做人類社會平等的基礎一事其實業已包含了一些有關「正常」語言(=本國語言)與「派生」翻譯(=外國語言)的預設，而這些預設其實都是傳統現代性社會關係梯度(亦即從殖民到帝國的梯度)的基礎。另一值得一提的面向，是「民現」的概念本身難免令人懷疑，與香港研究知名學者亞巴斯(Ackbar Abbas)在《香港：文化與消失的政治》(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一書所堅持的立場之間，

隨著《港區國安法》的頒佈，「一國兩制」就被旨在回應分離主義的「雙重國家」(dual state)取代，導致一個儘管包含種種曖昧矛盾與阻擋解殖因素卻仍有民主契機的制度終告失敗。

不論我們如何去理解「雙重權力」，重點始終在於轉型的難題。基於此，我認為，與其完全放棄轉型的概念或毫無保留地擁抱資本主義普世轉型的概念，倒不如將邊界與翻譯當做轉型的關鍵，去探討有無可能置換或刪除那些牽涉生命政治對比架構的部分——區域，以及人種差異布署與現代性翻譯體制。從宏觀的國際地緣政治到微觀的個人互動，本文透過各種不同脈絡，將廣義的翻譯和語言勞動視為一種典型的劃界實踐，力圖發明既有世界圖式以外的新可能。假設想要沿用多士卡諾的「雙重權力」概念作為線索的話，我們或許可以說，從語言作為現代國家規管「外部性」的典範一事的角度來看，翻譯與語言勞動其實就是「雙重權力」最實在、最日常的所在之處。然而，要如何去想像以翻譯為共通語言的政治組織一事，可謂超出了以再現與代表認知主體

有背道而馳之嫌。曾任港大比較文學系教授一職的亞巴斯曾經指出，「香港文化或直接或間接提出的問題，就是一個消失空間裡主體性的問題。這個問題往往以易於產生誤導的方式被提出，誤而成為一個有關「香港身份」或「後殖身份」的問題」(Abbas 1997, 10)。根據亞巴斯的分析，香港文化之所以「消失」為特徵的原因，並不是因為香港本土身分不斷被泯滅，而是因為全球後殖都市空間裡，再現與自我再現的條件不斷被置換一事引發了「在地」的含意「就在我們眼前不斷地蛻變」(Abbas 1997, 28)。所謂「消失」之意，其實就是意指身分從國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等「具體抽象」過程的視野消失，讓身分不再被分界所定義。亞巴斯堅持在方法論上需要從主體性，而非認同的角度切入。其中「主體性」的意義，務必包含「認同」無法處理的否定性與各種內部裂痕。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過去二十年政治論述朝著回歸本土身份劃界的方向發展，其實可以視為一次弔詭的現象。表面上是在保持歷史記憶，實際上也是在重寫歷史、竄改歷史，將香港原有的歷史特性——消失中遷徙經驗及其混雜性，埋沒在回歸邊界的視野下。亞巴斯個人享有香港土生土長、非華人學者的身分，讓他成為香港歷史文化的最佳見證人與香港「非關認同」政治可能性的理論大師。誠如亞巴斯所說，「身分的泯滅不完全是負面的，只要可以進行到底」(Abbas 1997, 14)。怪不得亞巴斯認為以下三種常見的「選項」——「本土」、「邊緣」與「世界主義」，均無法幫助香港展開真正的解殖(Abbas 1997, 11)。對於亞巴斯而言，「本土早已就是一種翻譯」(Abbas, 1997, 12)。

為基礎的現代性政治哲學的範疇。

中文書寫

2021年初等待半年前大致寫好的稿子送去編排、印刷的漫長等待過程中，我趁三天連假的機會趕忙回來補充漏洞，發現本文將香港過去二十年的政治運動冠以「左翼敗北」的標題，與李俊峰在2020年底問世的小冊子——《撕裂／日常：「香港反修例運動」筆記》不謀而合地共鳴。李聲稱，「連串的城市運動，包括『保衛皇后碼頭運動』(2007)、『灣仔利東街社區運動』(2003-08)、『反高鐵、保衛菜園村運動』(2009-11)……這些運動所建立理想主義的進步主體或許仍在萌芽階段，在還未廣泛確立之際，連串保守、排外與現實政治傾向的論述與行動又陸續展開」(李俊峰 2020, 10)。讀完了《撕裂／日常》一書後，蒙受眾多正面啟發與震撼之餘，我腦海裡立即浮現了這樣的質疑：為什麼自己沒有從劃界實踐的情感面說起？看到李俊峰從情感面切入，不談什麼抽象的「劃界實踐」，而直接抓住日常經驗的真相，用非常具「體」的字眼——「撕裂」去評論香港的政治演變，我都來不及佩服他這位政治翻譯高手的模範翻譯(從我的角度來看，李俊峰成功地將「劃界實踐」一詞翻譯成「撕裂」，真是太妙了!)，更是質疑自己立場的無情。鎮定之後，我反而認為，那就是「撕裂」現象在我這邊切身入骨的迴盪。⁶我不是無情，而是熱情地參與。就像「撕裂」可以當作「劃界實踐」的情感翻譯，反之亦然，「劃界實踐」一樣也是「撕裂」的理論翻譯。

此時講到翻譯，自然就牽涉到中文書寫的選擇。一位美國籍的

6 例如2020年3月底，筆名馮唏乾的香港專欄作家在並未履行新聞盡職調查倫理義務(journalistic due diligence)且享有實際法律免責權的雙重條件下，在香港《蘋果日報》上亂刊登其臉友對我的不實指控，進行抹黑與人格暗殺。

白人為什麼，憑什麼用中文來寫一本有關反修例運動的書？該書的預期讀者是誰？殖民主義理論家梅米(Albert Memmi)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一書中反諷指出，西方左翼知識分子脫隊去加入反殖運動，最後注定「逐漸體會，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保持緘默」(Memmi 1965, 87)。梅迷的批評言猶在耳，似乎就是針對今日被戲稱為「白左」立場的人發出一個溫馨的提示。然而，梅米將殖民主義對人種的法理區隔推論到規範的層次，形同掉入現代性殖民—帝國翻譯體制的預設立場，將均質性發話書寫當作自然規範。錢德勒針對黑人思想先驅杜波依斯(W.E.B. Du Bois)「色種界線」(color line)概念展開解構與再思考的努力中，「去沈降」的概念可以視為一次超越梅米的提案。假設說梅米對殖民主義的批判以殖民主義本身的法理區隔為規範，導致解殖的格局陷入空間化梯度想像的陷阱，那麼錢德勒所提「去沈降」的概念，旨在移除一層一層、累積已久的空間話語，讓我們恢復殖民主義梯度以外的可能。

讀者可想而知，書寫語言的選擇是個曾經令我感到猶豫的問題。因應我的提問，一位資深香港友人早在2019年初勸我，⁷寫書最好用英文發表(人家自己也都是這樣做，而且還有其他華人幫忙將其外語著作譯成中文)。兩年後，自己的選擇早已成定局，白紙黑字螢幕虛擬的中文草稿，我才讀到李俊峰一段文字，讓我產生強烈的共鳴感。將自己所處的位置描述為「香港以致亞洲 [...]『邁向全面撕裂社會』的局面」的李俊峰建議，此時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尋找顛覆的可能性，挑戰或質疑這些選擇本身」(李俊峰2020, 17)。我的想法與動機亦復如是，即使結果不盡人意。何止香港以致亞洲，如今全世界都正處於「劃界實踐」的臨界點上，

7 本人當時蒙受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所之邀，在港短期教書一個學期，早在2019年2月底加入了第一波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連署與示威活動。

面臨全面「撕裂」的命運。故此，「劃界實踐」這個主題——恰恰是這個主題而不是其他反修例運動相關的可能主題——讓我感覺到，中文書寫的選擇絕對有其必要。之所以有必要並不是因為本書的目標讀者是一些特殊的人種或社群，例如「香港人」、「台灣人」、「中國人」或者「華人」，而是因為透過中文去想像並實踐另類世界圖式一事本身不但很有意義，更對跨國團結的另類發明也影響深遠。我們不能甘心於英文充當普世翻譯機的自然選擇，更不能接受語言與人種的假定互換(等同)性，就好比什麼語言「屬於」什麼「民族」，什麼人就講什麼語言。假設說《批判性中國研究學者》將邊界當作該團體賴以成立，卻同時在普世訴求中力圖「超越」的對象，那麼那條邊界最原始、最具體的呈現始終源自語言與翻譯勞動的分工體制。這就使得該團體成員永遠無法且不需要站在「中文人」內部的位位置書寫、發言並承受生活的種種。與此不同，我堅信對「另類世界圖式」的貢獻，起碼必須從現代性翻譯體制以外的發話模式開始，而這也是我嚮往已久的個人夢想。

然而，理想歸理想，從現實面來看，中文書寫的選擇最直接的後果，大致如下：一、書稿的出版變得加倍困難；二、出書對個人品牌或個人聲望的加分成度立即銳減，甚至從正轉為負數；三、書寫的過程被迫減速，害我更加辭不達義，力不從心；四、就思想展論的面向而言，由於個人能力不足所致，中文書寫就難免產生弔詭效果，讓概念表達同時失之精準卻更加簡易明瞭。也許，這對我來說就是一次需要虛心領受的重要教訓。總之，這個選擇確實稱得上一次劃界實踐，從瞎忙的新自由主義教學機器偷竊閒暇時間，換取主體性的蛻變。

資本主義下一轉型：朝向武裝、私有化超級生命體的誕生

從劃界布署與世界圖式的角度來看，**反修例運動的歷史意義可能最後定義為一次具有悖反性質的加速主義運動**(accelerationist movement)。類似的想法過去一兩年在《品蔥論壇》熱絡討論中，大致都將加速主義抬舉為終結中共政權的良方。然而，加速主義的政治意義其實非常曖昧，有許多值得進一步釐清之處。香港反修例運動此起彼落地提出「攪炒」主張，雖然確實代表以毀損社會機器的行動去實現轉型的渴想，但是實際上完全缺乏未來的想像。如此負面的評價一定會引起一些嘲諷與否定：「攪炒」的目的不是別的，而正是為了打開未來，不是嗎？問題是，從「世界圖式」的角度來看，「攪炒」完全受限於回歸思維。例如，香港人權律師與前任港大教授戴耀廷 2020 年 4 月 28 日刊登在《蘋果日報》的〈真攪炒十步〉一文頗有代表性。該文論及「攪炒」第十步時（「攪著中共一起跳出懸崖 [...] 看哪一個在跌出懸崖後仍能死裏逃生」），用「超出香港界線」為由，拒絕設想此舉可能引起的後果。然而，這方面的想像早已有譜在先。同年 3 月 29 日，運動（非）領袖黃之鋒在其臉書上與《明報》上同時刊登了文章，呼籲其支持者將「攪炒」活動推進到國際層次，引發一場「國際攪炒」（黃之鋒，2020）。至於「國際攪炒」對中國以外地區的政治局勢可能產生的後果，黃、戴兩人及其支持者隻字不提。可見，無論是黃之鋒還是戴耀廷，「攪炒」的前提假設其實就是「後殖民免責權」（postcolonial immunity），就好比認為曾經被殖民過的人口就沒有必要為其行為可能產生的境外後果——例如大規模國際戰爭或者某一「民主」國家陷入政治法西斯等事情的發生，負起任何道德責任。戴耀廷「超出香港界線」的說法，充分顯現「攪炒」的想像脫離不了回歸思維。從回歸邊界、同歸於盡等概念出發一直到光復自由的整個射程中，「攪炒」對世界圖式並未產生任何鬆動或帶來什麼積極的改變。即使是引發中國「巴爾幹化」的分解，也不會置換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相反，「攪炒」與其說是「加

速」不如說是負面的加深，以「後殖民免責權」的幻覺成全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的蛻變。

至於加速主義本身的問題，過去兩年來的討論相當熱烈。在華語圈，這個概念最有力的政治分析，來自筆名韋乞的理論家 2020 年頗有思想價值的大塊文章——〈加速主義：作為一種嚴肅的政治（抗爭）立場〉（簡稱〈加速主義〉一文）。從國際加速主義理論的整理與介紹出發，該文確確實實地說明了「攪炒」放在加速主義的政治哲學脈絡，決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跡可尋的「嚴肅」議題。根據〈加速主義〉一文的判斷，「攪炒」的主張甚至該算是中文語境中「加速主義者的一次早期教育」（韋乞 2020）。然而，對此「教育」的過程，〈加速主義〉一文保持些許警惕，並以深入淺出的方式點出加速主義的「兩難困境」：

總的來看，加速主義陷入了如下兩難困境：一方面，這種理論希望通過加劇民眾苦難來迫使維穩體制失去平衡（宮廷政治學中所謂「左」與「右」的平衡），因此被認為充當了暴政為惡的仲介；但另一方面，如果加速主義者爭辯說他們只是旁觀並預測苦難的加劇會帶來顛覆性的政治後果，就又要面對關於政治參與的批評，即被認為喪失了政治抗爭者的能動性與主體性（韋乞 2020）。

這是非常精彩、一針見血的分析。基於此，我認為〈加速主義〉一文可以被視為一次接一次潛在性的雙向翻譯(bidirectional translation)思想試驗，試圖將認識與實踐、資本與人類、「工具性的加速主義」與「無條件的加速主義」、國際左翼加速主義與中國語境內的加速主義通通加以雙向翻譯，以期克服「兩難困境」。透過這一系列的嘗試，〈加速主義〉一文好比試圖讓潛在性翻譯本身加速並勾勒出一種遞歸翻譯(recursive translation)式的加速策略，創造嶄新的主體位置。

問題是，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加速主義〉一文堅持從認識論，而不是時間的角度，去衡量加速主義的政治意義，算是一次後果深遠的政治選擇。其後果之一就是〈加速主義〉一文對實踐一詞的理解始終脫離不了認識論的層次。根據〈加速主義〉一文的說法，「『實踐』就是指行動者可以完整認知到其意圖實現的後果、並依據這一後果的價值而決定是否踐行其意圖」（韋乞2020）。這段文字算是一次標準的人道主義哲學表述，企圖將意義的產生限定為認知主體意向的表達，導致意義與「非意義」之間的互動被排除。

重點是，〈加速主義〉一文將「未來」與「未知」等同起來，等於將未來視為「現在」的「外部性」，並將「外部性」化約為一種連貫空間式的想像，就好比「未知」往往都是從特定區域之外湧現出來的。其中「認知主體」對於劃界實踐的理解停留在法理模型(juridical model)，認為「界線」的意義全部在於空間區隔的辨識及其相對利弊的裁決。全文結尾倒數第二句話以法理號令頒佈的口吻宣示，我們「不可能站到歷史進程之外」（韋乞2020）。至於時間的流逝在主體性建構中必然引起的異質性與否定性等現象，這一切反而通通遭到遮掩，導致「誰才能站到歷史進程之內？」的問題無法被提出。然而，我們怎能確定，所謂「歷史進程」不就是資本狼吞外部性(非資本)之後所反吐的虛構或稻草人呢？至於真正的「非資本」之事物是什麼，《加速主義》一文並未討論。〈加速主義〉一文對時間如此理解，基本上就複製了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共同賴以運轉的「均質、空洞性的時間」(homogeneous empty time)，讓時間淪落為客觀量化的標準單位，而不是主體的存有經驗。換言之，這種法理模型就注定讓我們忘記，「速度」及其「加快」現象本來都是一些社會關係而不是一個特定主體所駕馭的對象(例如技術或體制)。在這點上，阿利亞·迪恩在〈黑色加速主義札記〉(Notes on Blacceleration)一文針對加

速主義的批評很值得參考。根據迪恩的觀點，加速現象當中最重要、最重要的社會關係，莫過與「黑人(非)主體」(the black (non)subject) (Aria Dean 2017)之間的互動與壓抑。迪恩提的「黑人非主體」其實就是上文以「外部性」的概念加以討論的典型歷史案例。作為一種社會關係而不是認識對象，「速度」問題的啟動就是從歐洲帝國在非洲的佔奪行為起步的(Wilderson 2003, 229)，並經由殖民主義對外部性的規管作業而成為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另一賴以運轉的要素—世界圖式。作為「外部性」的虛擬記憶，世界圖式將「世界」的假定整體性劃分為各個不同的「區域」，進而將每塊被分出來的區域當作特定「人種」(例如「黑人」)的「故鄉」。然而，從黑人現代經驗的角度來看，這些「故鄉」及其人口全部都是資本建立在黑人非人化(或者說物品化)基礎上的幻影。作為現代性的起始點，黑奴被當作物品而不是人一事啟動了所有其他「人種」的主體化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原來以為最天然的世界區域分布圖，其實是個龐大拘留所的藍圖，讓其中的「人類」形同戰俘一般，被迫轉變成積累主體。「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產生的各個不同「人種」主體背後都隱藏被對象化(被物品化)的黑人非主體。正因此，迪恩就提醒我們：「不論資本主義機器轉得多快，加速主義總是早已陷入缺油的狀態 [...] 那麼，這點對於加速主義意味著什麼呢？直接了當地說，黑色就中斷了並阻擋了左、右政治區隔得以成立的『人類 vs 資本』這個二元格局」(Aria Dean 2017)。「加速」的現象與其說是「體制」或「技術」的問題，不如說是「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創造的虛無幻影，遮蓋「非資本」的啟發。

方法論的選擇另一嚴重後果在於它所暗中應用的族類觀，將族群或人種身分視為一種經驗事實或經驗的對象，就好比整體性(例如，一個民族語言)是生活中的實體經驗。此一觀點忽視了人類社群區分從本質上是一系列非連續性實踐的表現，區分中亦有

區分，而這一系列區分無法訴諸「統一」與「多元」的架構詮釋。正因為是非連續性的實踐相關，這些以語言為典範的區隔，歸根究柢無從訴諸認識論的架構來理解。也就是說，如同語言的整體性無法在現實經驗中獲得具體體會一般，我們同樣無法將社會關係視為一些純粹認識論的對象。即使是知識生產始終也是一種社會實踐。可惜的是，〈加速主義〉一文前衛性的翻譯嘗試，最終收場的方式就是將「外部性」再現為不同整體性語言之間的差異(例如，西方與中國不同語境)，並將外部性化約為實體空間。問題的根源在於〈加速主義〉一文將「語境」—尤其是「中國語境」視為一個給出性的整體，並將翻譯理解為不同語境間的搬運或轉移過程。然而，語言的整體性往往依賴兩個步驟方能成立：首先要將差異納入連貫性的梯度，然後再以「科·種·屬」的邏輯圖式加以分類。「中國的語境」並非一個現實經驗當中可以體驗的對象，而是一個假定概念。這個假定概念必須暗中透過翻譯的步驟才能確立。因此，假設從「語境」成為「語境」的視野出發，抓到「語境」成為「語境」之前或之外的劃界契機(也就是說，抓到「凡是語言都是翻譯」的契機)，〈加速主義〉一文的遞歸性翻譯嘗試或許最後才有可能衝破加速主義本身對於「非資本」之物的錯誤預設(這個錯誤預設誠如迪恩所批評那樣，從「黑人非主體」的預設隱約可見)。

不然，少了這些批判與解構視野，〈加速主義〉一文所秉持的加速概念最後難免落為一種信仰論。「歷史進程」壓境後，世界圖式與歷史的發展方向均可朝向回歸的目標邁進。當然，對於「攪炒」信徒而言，重點是世界圖式的回歸還添加了一些邊界的重劃動作，終結中共的維穩體制乃至整個中共政權及其「天朝」的疆界。問題是，所謂「維穩體制」要維持「穩定」的對象，歸根究柢就是廣義「邊界」這個具體抽象性，因為這個具體抽象性才是中共統治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牆」國當局採取獨裁政權的

決策，其實是一種針對轉型帶來危機感的回應，試圖訴諸邊界來駕馭轉型的風險並確保轉型前後的種種射程軌跡。⁸那麼，「攪炒」訴諸邊界試圖推翻維穩體制的結果，除了讓邊界「加速」(移動、擴散與繁殖)之外，還有其他可能性嗎？在如此犬儒信仰的陰影之下，最需要被提出的問題是，攪炒真正催促的轉型是什麼？從表面上來看，答案必須在科技與戰爭的結合那邊去尋找，但是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希望最後說明這個答案為什麼其實缺乏一定的說服力。

根據速度研究先驅維希留(Paul Virilio)，速度往往與戰爭，尤其是殖民戰爭有關係。如今中美戰爭隨著諸如科技、貿易、供應鏈、金融、資訊與人工智能等各種戰線的啟動繼續延燒。而邊界普遍被武裝化(weaponized)，導致熱戰的可能性日益增加。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法爾克(Richard Falk)在2020年7月判斷：「可能以冷戰開始的『中美新冷戰』局勢隨即引爆大型熱戰的可能性與美蘇冷戰時代相比更大」(Falcone 2020)。我在2021年執筆之際，難免悲觀地認為，也許我們所處的階段為時已晚，雙邊升級的動態似乎進入了不可逆轉、往上爆發的惡性循環。甚至，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已經變成了日益逼近真實的預言。

「攪炒」如果執行到底會不會導致「中美斷交」甚至「中美戰爭」，確實沒有人知道。然而，重點不在於中美戰爭能否避免(反正，攪炒信徒擺明不管)或者中共能否被推翻，而是在於早已以各種不同形式佔據我們生活、正在進行中的戰爭前後的轉型是什麼？從這個角度來看，「攪炒」最大的意義在於一次恐怖生命政治轉

8 習近平領導的獨裁政權一面構築了一條對抗金融化勢力的防火牆(Hudson 2021)，一面延續了中共管理層的階級利益。作為一種潛在性的政治抉擇，這樣的獨裁體制似乎旨在確保中國的轉型未來可以避免踏上金融化資本主義的道路，並恪守相對經典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路線。

型的邏輯，最終得透過人工智能自主武器的研發與布署，去催促資本主義下一階段的物種轉型。⁹ 正因此，攪炒也完全符合「災難資本主義」(Klein 2007)的邏輯，以災難為治理技術，賺取暴利，順便推進資本主義恐怖的演變。然而，這個演變不能單從資本主義或科技的角度去詮釋。對此，前人的警告或許最能引起世人的共鳴。義大利左派哲學家奈格里(Antonio Negri)親身參與 1977 年義大利自主論左派大規模社運，最後以大挫敗收場，經過數十年後他為我們總結關鍵的教訓：「當時毀壞機器行動就是衝著現存機器而來，但是我們反而並未成功發明一個毀損未來機器的方法」(Negri 2017)。在奈格里那個年代，所謂「未來的機器」指的是即將被引進生產過程的電腦。爾今，「未來的機器」之意，從香港哲學家許煜(Yuk Hui)稱為「科技總體化」(technological totalization)趨勢的角度來看，就是意指朝向「超級生命體」(superorganism) (Hui 2019, 29)誕生的方向邁進。從目前國際關係的走向判斷，這個具有人工智能的「超級生命體」注定與諸如軍事化、私有化與金融化等惡性趨勢結合。美國《國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員會》2021 年的報告呼籲美國政府拒絕簽署任何智能武器反擴散條約，並以「中國威脅」為由，呼籲美國產官學攜手投入積極研發智能武器的計畫(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1)。¹⁰ 對此，《禁止殺人機器聯盟》(Campaign to Stop Killer Robots)的發言人夏齊教授回應，「這是一份令人震撼與恐懼的報告，將殺人的決定交給自動判斷的智能武器，並縱容它們無限擴散。全球最資深的智能科學家一致發出警告，指出此事後患無窮，但是他們〔指美國政府〕還是執意繼續。這將來注定會引起嚴重違反國際法的事態。」(Kelion 2021)重點其實不是有沒有違反國

9 請參見拙文 Solomon(2020)。

10 英國與法國前後響應了美國的立場，以「中國威脅論」作為智能武器研發的正當性依據。請參見 Sabbagh(2021)與 AI Task Force(2019)。

際法，而是智能機器人的發展與軍事化資本主義積累體制的結合一事，從本質上超越了任何倫理使用原則可以控制的範圍。也就是說，智能武器的發展因為不是單純武器系統的問題而是一整個社會生產組織架構的問題，所以就完全缺乏任何正當性可言。為了彌補正當性的缺乏，信仰論者豎立一個「絕對邪惡敵人」的對象一事隨即變成了不可取代的當務之急。攪炒的歷史意義盡在此。它所扮演的歷史角色與其說是對抗「赤納粹」的前哨戰，不如說是透過中美衝突的催促，給「武裝超級生命體」的發展提供一個正當性的藉口—所謂「中國威脅論」，讓「超級生命體」和軍事化、金融化與私有化等資本主義既有的趨勢順利結合並無限、快速地發展。此一發展趨勢的歷史先例就是前一恐怖武器系統—原子彈的發明過程。根據最新公開的機密資料顯示，雖然英國情治單位最晚在 1944 年已經掌握了確切的訊息，確知希特勒下令禁止了原子武器的研發，可是為了動員科學家積極加入研發的計畫，美國政府刻意隱瞞事實並操弄德國威脅論，誤導科學家誤以為納粹德國快要越過倫理界線搶先發明恐怖的世界末日武器。透過如此純粹虛構的騙局，美國當局終究克服了美國科學家團隊內部對此計畫的倫理反對，進而開啟了後果不堪設想的核武災難時代(Ellsberg & Jay 2018)。

表面看起來，這種「武裝超級生命體」的誕生過程似乎驗證了加速主義的預設立場，將歷史視為一個進程，進而將人類的位置定位在該進程內部非自主的幫手。然而，這種觀點其實只是將「黑人非主體」效果加深。「武裝超級生命體」與其說是科技與資本結合的產物，不如說是外部性被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所俘虜的結果。此一批判性論點的啟發之一就是促使我們將現代生命政治的歷史分為兩大階段或時期。在第一個階段裡—我們可以稱之為「經典現代性」，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的典範關係就是「國家」與「人民」。到了「奇點現代性」時代裡，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的典範

就被「升級」，蛻變為「基因池兼資料庫」與「機器人群」的關係。換言之，攪炒所開啟，或者說至少推助的進程，是一次物種，特別是「機器」等技術對象(technical objects)相關的轉型。其真正、持久性的意義其實遠遠超過以內戰(香港)或宗教戰爭(中美)為範本的政治格局，而是直接指向物種之間的生命政治災難。

正因此我們還是需要回到「牆」國與「我們」的關係這個命題上。雖然自由主義戰爭國家對於奴役制的歷史責任，已經是廣為人知的事情(儘管這些責任的範圍與具體意義依然十分模糊)，可是，自由主義戰爭國家應該為其反自由主義的諸敵國(illiberal enemies)負起何種歷史責任的這一歷史正義之問題，一個廣獲正當性的初步提案似乎還離我們十分遙遠，更何況是個有雛形的答案。為了打退共產浪潮，美國在二戰前給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提供的金融、法理、論述與技術協助，對於法西斯的崛起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武裝自由主義儘管與其歷史他者——從奴役到恐怖分子與獨裁——之間的互動，存在著這麼多的黑暗密史與合謀，它之所以能持續享受如此指標性地位，恰恰是因為它不斷研發出各種有效抵賴或轉嫁這些歷史責任的機制。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其實是一種轉型論述與翻譯再現的霸權，而其中最重要的機制莫過於「邊界」。從這個角度來看，「牆」國歸根究柢只不過是「西方」種類差異體制必然反覆產生的連環他者之一。

如今面對又一次反自由主義敵國的崛起之際，左翼假設不是從邊界的取消抑或邊界的捍衛、而是從劃界實踐與資本主義的關連重新出發的話，一定可以避免成為加強邊界的回歸、加速武裝超級生命體誕生之幫手，進而對於截然不同的轉型實踐做出重大貢獻。

我們共同的處境恰恰在於我們分享的共通邊界。這種共通性訴說它「自己」的方式就是透過翻譯實踐去說話。以此為基礎，

我們可以嘗試對埃馬紐爾·西哀士(Emmanuel Sieyès)1789年在他論革命的小冊子《論特權·第三等級是什麼？》中發出的著名提問做出一次更新：「什麼是第三等級？所有人。它現在如何？什麼都不是。它想要什麼？變成些什麼。」今天，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可能會是這樣：「什麼是第三等級？大家分享的共通邊界。它現在如何？只是在邊界的一側選邊站。它想要變成什麼？一名劃界實踐的高明譯者。」在翻譯這個非常日常卻意義深遠的社會實踐日益被交給智能機器去執行的時代裡，新的第三等級人革命顯得越來越重要。

蘇哲安

現任里昂大學教授兼巴黎十大跨科多語研究中心研究員

附錄：轉型、翻譯與區域布署

轉型，翻譯與區域佈署

首宗注意翻譯與資本主義轉型之間內在關連的著作，應該是印度後殖理論學者恰亏巴提(Dipesh Chakrabarty)之《將歐洲省級化：後殖民思想與歷史差異性》(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假設想要避免歷史主義思想結構的陷阱，資本主義轉型相關的歷史辯論就必須將此一轉型視為「翻譯」的過程(Chakrabarty, 2000, 19)。

恰亏巴提將人類社會分為眾多「生命世界」(life-world)組成，而所謂「翻譯」一事對他而言，就是意指不同「生命世界」之間，在資本主義擴展的衝擊之下，彼此進行互動關係。作為現代殖民主義的主要驅動力，資本主義逼使世界上每一塊「生命世界」進行資本主義轉型，而這一轉型的過程，自從最早英國16世紀「原始」或「初始」積累(primary or originary accumulation)時代以降，往往就是一種翻譯事業。作為一種生產，這種翻譯的結果就是「差

異」的創造：

翻譯從「不可估量性」(incommensurability)所生產出的[...]正是我們稱之為「差異」的半透明關係。(Chakrabarty 2000, 17)

對恰克巴提而言，翻譯不僅發生在不同生命世界之間，更發生在抽象思想的層次上，尤其是歷史知識與歷史敘述上。恰氏認為對歷史的認識可以分為兩大類型，「第一型歷史」意指直線式的「進步」觀，將時間視為均質性而空白的故事版，將由「落後」往「進步」的演進當做填版的故事細節。這種歷史認識類型遮蓋了資本轉型對知識和語言及相應的主體性造成的革命性變化。相比第一型歷史的普世主義預設，第二型歷史則是一種潛伏在第一型歷史底下的特殊主義歷史觀。這兩種類型的歷史敘述模式之間的關係，也可以視為一種翻譯關係：

由此誕生的過程就是歷史學者通常所稱的「資本主義的歷史轉型」。該轉型也算是一種翻譯的過程，將眾多生命世界與人類存在的概念視野通通轉譯進順著資本邏輯的啟蒙思想範疇(Chakrabarty 2000, 71)。

對於恰克巴提而言，現代語境下的翻譯可以分為兩種。其一為普世主義模式，將潛在性理想化(概念化)的第三項當做兩個不同生命世界詞彙的媒介。與這種被稱為「社會學式的翻譯」模式不同，第二種翻譯，亦即「非社會學式的翻譯」(Chakrabarty 2000, 86)，具有「非現代」(ibid. 88)特質。這兩種翻譯模式追根究柢都是一種政治經濟學。非現代翻譯就好比以物易物，而社會學式的翻譯則好比商品經濟的一般交換(ibid. 85)。用哲學的概念去說明，前者展現的是特異性(singularity)，後者展現的是普世性(universality)。

將人事物抽象化的過程關鍵性地把「資本主義」與「翻譯」關連了起來。恰克巴提認為馬克思描述資本主義將「具體勞動」(real labor)轉型為「抽象勞動」(abstract labor)的關鍵過程¹，基本上也是一種翻譯。

從「具體」到「抽象」的轉型因此是轉型／翻譯的問題，是一種從眾多而可能彼此無法換算的時間性到抽象勞動的均質時間性、以及從非歷史到歷史的轉型(ibid.: 92)。

透過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對話，恰克巴提將翻譯納入價值形成過程(valorization)中出現交換價值與抽象勞動的脈絡，使得兩種社會過程達成等同關係或相輔相成的狀態。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條件下，交換價值可以說是一種翻譯，而翻譯就是為交換價值而服務，或者更精準地說，翻譯為根植於交換價值預設的資本主義積累體制而服務。

恰克巴提的「翻譯／轉型」綜合概念凸顯的，是世界版圖想像對於翻譯與轉型的重要性。**如何瞭解世界的劃分一事就被提升到相對關鍵的位置，使得我們對轉型的理解取決於翻譯實踐所創造出的世界圖式。**然而，恰克巴提這個創舉的侷限或缺陷在於，種種翻譯，無論是不同歷史類型間的翻譯還是不同生命世界間的

1 「抽象勞動」就是將勞動從一切具體生活脈絡抽離之後，根據勞動所需時間去加以抽象化。勞動一旦被視為跟特定生活脈絡無關的活動之後，時間就被化約為一種均質性的介體，可以拿來衡量各種具體勞動的價值。根據古典經濟學理論，商品的價值就是根據這種均質性的抽象標準—勞動所需的時間來計算。因為馬克思認為可以作為交易對象的「抽象勞動」其實是一系列被抽象化的社會關係的結晶，而不是一種認知對象單純被抽象化的概念，所以他才將批判的矛頭集中在價值之所以成為價值的社會過程。這就是所謂「價值穩定過程」或「價值形成增殖過程」(英：valorization；德：Verwertung)。價值形成過程雖然表面上主要牽涉商品上市的具體價格，可是其真正的用意在於確定資本最需要的商品—勞動力，被貼上價值，並成為一種商品化的對象。也就是說，價值形成過程就是將人的價值限縮在自我商品化、催促資本累積等行為中的過程。

翻譯，都已經事先納入了對翻譯的某種預設。就像生命世界的概念包含潛在性的翻譯預設在內一般，歷史類型概念的成立也脫不了與翻譯的潛在關係。這樣一來，翻譯與轉型兩者便形成套套邏輯的循環關係。一方面，不同區域的不同轉型都是翻譯的結果，另一方面，不同翻譯都是相異的區域轉型所引起。

為這些問題困惑之際，我剛好讀到了越裔美國學者阮李巍(Duy Lap Nguyen)於2013年對《將歐洲省級化》一書的批評，受益非淺。阮李巍確確實實有注意到恰克巴提的展論最後難免掉入套套邏輯的陷阱：

因此，在恰克巴提的分析中，啟蒙思想中的「人」的概念，內嵌於一種特定實踐，而這種特定實踐則內嵌於啟蒙思想中的「人」的概念。於是乎，現代性由其自身的普世抽象性誕生(Nguyen 2013, 6)。

如此套套邏輯問題之所以會冒出頭，是因為恰克巴提偏離了馬克思對抽象化的理解。根據阮李巍的看法，恰氏蒙受早期海德格詮釋學的影響，將抽象化與具體實踐對立起來，認定抽象化僅能產生於具體實踐缺席的脈絡——比方說理論思想的脈絡。例如，恰克巴提認為普世主義啟蒙概念之所以會成為一種現代性統識，主要是因為源自具體脈絡的觀念與習俗均被納入「社會學式的翻譯」邏輯之後，就失去了其原有的特異性意義，並成為普世 vs 特殊生產機器的原料。換言之，對恰氏而言，第三世界的「生命世界」經過一種「粗暴翻譯」(rough translation Chakrabarty 2000, 17)，其具體實踐所含有的特異性因素即被刪除，取而代之並佔上風的是普世主義的抽象思想。與此相反，阮李巍教我們去注意，在馬克思那邊，「抽象勞動」與「資本」這些牽涉抽象化的關鍵概念，都是具體實踐的真實產物。當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

大綱》一書中指出，中產階級主導的現代性社會「受治於抽象性」(ruled by abstractions)(Marx 1973, 164)，他試圖描述的情景恰恰就是由具體實踐創造出來並隱藏在日常生活裡的具體抽象性(real abstraction)²。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商品中的商品—貨幣。天天使用的習慣使得我們對其極高度抽象性習以為常，直到無法察覺貨幣其實是個非常抽象的東西，由許多表面看不見的社會關係組成。抽象勞動雖然抽象，但是還是產生於非常具體、處於特定歷史時空脈絡的資本主義實踐之上。因此，對馬克思來說，作為一種抽象理念的啟蒙思想，特別是啟蒙思想對「人」的理解，其實都是具體實踐—人的勞動產生出來的東西。抽象的普世主義人類概念與抽象的勞動概念之間，存在對應關係。恰氏與馬克思的差別，在於恰氏對此對應關係的認識中，具體實踐或被「社會科學式的翻譯」所扭曲，或乾脆缺席，尤以非西方的具體實踐為甚，而對於馬克思來說，抽象勞動其實本來就意指一系列非常具體的實踐，一點都不「抽象」。總之，恰克巴提的問題在於他無法把抽象性歸納為特定實踐的具體結果(Nguyen 2013, 6)。

我之所以針對「具體抽象性」的說明花上心思，是因為我認為可以從酒井直樹的翻譯理論那邊吸取重要的養分來彌補恰克巴提「翻譯／轉型」的不足。《將歐洲省級化》一書問世後引起辯論，不少評論者認為恰克巴提採取了一種相對主義的立場，儘管書內直接宣稱，「歐洲省級化的計畫因此就不能是一種文化相對主義的計畫」(ibid. 43)。有別於相對主義，恰克巴提強調他的翻譯主張主要是一種「以特異性為方法的思考」(ibid. 83)。在學術界「以

2 阮李巍雖然並未直接提及，但是他對抽象性的重視與理解需要放在2000年代起，諸如多士卡諾(Alberto Toscano)、墨爾(Jason Moore)與尾註(Endnotes)等理論家都回去重新詮釋馬克思及其後人，特別是索恩·雷特爾(Alfred Sohn-Rethel)與阿多諾(Theodor Adorno)等人的相關研究，將「具體抽象性」(real abstraction, 亦做「現實抽象化」)的概念發揚光大。有關這方面的思想史，可參見Oliva, Oliva & Navara(2020)。

XX〔地區〕為方法」的主張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當代思潮脈絡裡，**恰克巴提的立場頗有獨創性，教我們去想像一種與區域無關的翻譯模式。**然而，這個翻譯模式到底是什麼，或者說，什麼樣的翻譯理論才能呈現翻譯實踐的特異性？並不清楚。由於恰克巴提將語言當做「生命世界」的介體的緣故，這個問題因為受到了太多浪漫主義語言與民族相關預設的限制而無法被提出。畢竟，將世界版圖切分為各個不同「生命世界」的作法本身已經包含了潛在性的翻譯契機，否則就不可能將這些「世界」之間的邊界指認出來。

作為邊界範本的語言區隔，曾經為酒井直樹〈何以計數語言？翻譯與非連續性〉(How do we count a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Discontinuity)一文中詳盡分析的對象：

在概念層次上，翻譯文本的「來源語言」與「目標語言」僅是規整性的理念 (regulative ideas)³。這些理念的用意在於勾勒出一些圖式，套用在我們對翻譯的再現上 (schemata in our representation of translation)。至於這些語言本身的經驗性存有，唯有透過事後再現翻譯的運作，才能被確知。我們用以辨認語言整體性的尺度〔…〕僅能在語言的界限處找到，僅能在那個接觸無所意味 (non-sense)、並逼使我們將無所意味轉變成有所意味 (sense) 的「邊界」上遇到。不用說，如此將無所意味轉變成有所意味的情景，也就是展開社會行動的情景，例如跟外國人互動，向他們徵詢回應、尋求肯定等等，就是一般所謂的「翻譯」——只要是允許我暫時不顧「翻譯」與「詮釋」間的慣性區隔便能成立。這就是說，語言的整體性往往就是相對於另一整體的再現關

3 康德將那些如同自由或上帝等無法以經驗去證實，卻對經驗知識起著架構性輔助作用的概念稱為「規整性理念」。作為主觀信念，規整性理念可以代替現實經驗中無法體驗的對象——例如，語言的整體性，讓我們的現實行動假借這個理念去進行。

係。它永不可能自行給出自己，而只能通過另一整體而獲得轉移性的給出。在界定特定語言整體性的過程中，一種對話性的二元性 (dialogic duality) 確實是無法迴避的事情。作為整體的語言之所以往往召喚另一語言並存的原因，不只是因為翻譯就是一種跨界活動，更是因為，甚至主要是因為，翻譯首先就是劃出邊界的動作，就是劃界實踐 (Sakai 2009, 83)。

換言之，恰克巴提的「生命世界」概念作為一種變相的語言整體性概念，雖然依賴翻譯的動作才得以成立，但是在成立之後被再現的過程中，他反而回過頭來壓抑了能夠看清原始翻譯動作的劃界實踐的批判視野，讓每一個「生命世界」的專屬語言看起來像是獨立且純粹的整體，並不包含任何語內翻譯的元素。這樣一來，恰克巴提的翻譯概念注定落入他所詬病的啟蒙思想抽象化的陷阱，成為與具體實踐毫無關連的抽象概念。在這點上，酒井直樹的翻譯理論可以雪中送炭，挽救恰氏的困境。對酒井來說，翻譯具有雙重特質，其一是將無所意味轉換成有所意味的實踐過程，其二是事後再現的抽象化過程。純粹實踐型的翻譯與實踐被轉換為再現型的翻譯之間的區隔，表面上相對應於恰克巴提「社會學式的翻譯」與「非現代」、「特異性」翻譯的區隔。然而，對酒井來說，無論是翻譯的再現還是翻譯的實踐，其實都牽涉不同的個別實踐過程。兩者的差別在於翻譯實踐是否被抽象化。重點是，酒井為我們打開了一個關於翻譯的寬廣視野。

從這個角度來看，翻譯不再僅僅意指一種跨語現象，而是語言本身具有的特徵。不但可以說，凡是語言都是一種翻譯，還可以說，凡是社會關係都牽涉到翻譯的實踐問題。基於此，本文對「翻譯」一詞的使用，分別涵蓋廣義的語言勞動，以及全球社會關係(含跨物種關係在內)。為了置換傳統語言學對翻譯的成見，酒井直樹翻譯理論中重要的基礎概念之一就是「均質性語言的發

話模式」(homolingual mode of address)與「異質性語言的發話模式」(heterolingual mode of address)。與「單語主義」的概念不同，前者其實涵蓋了語言複數並存的情形。重點不在於數量，而在於如何思考語言的整體性。「均質性語言的發話模式」代表一種以翻譯的再現為預設立場，將每一種特定的語言視為一個系統性的整體。反過來看，「異質性語言的發話模式」將一切語言行為視為翻譯、一切發話者視為譯者。從這個角度來看，凡是發話事件本身就是一種翻譯，而翻譯根本上就是社會實踐。然而，在均質性發話模式的預設下，我們所看到的僅是語言(翻譯)被再現並虛構為整體性的假象。

放在資本主義抽象化的脈絡來看待，翻譯的再現是一種標準的具體抽象性。如此的抽象性雖說抽象，可是也是以非常具體的方式被編入我們的日常生活，成為行動的前提或基本假設。它順利讓我們習慣性地誤以為，從無所意味到有所意味的轉換過程，可以完全“map”在兩個不同生命世界語言整體之間。然而，**翻譯與其說是牽涉兩個不同語言—文化—民族複合體或「生命世界」之間的「橋樑」，不如說是創造出「需要蓋橋的兩岸」的技術。**作為一種再現，翻譯雖然確實具有「搭建橋樑」的功能，但是「橋樑」的作用之一——遮掩「橋」的兩端，其實都是翻譯作為劃界實踐(而不是再現)的結果。唯有當翻譯被納入有別於實踐的再現架構去理解的時候，也就是說，當翻譯被抽象化的時候，「現代性翻譯體制」(the modern regime of translation)(Sakai 2017a, 106)儼然成形。現代性翻譯體制的抽象性其實非常具體。翻譯實踐獨有的創造性——將無所意味轉換成有所意味，一旦被遮蓋，原本透過它的運作而形成的種種「兩岸」倒過來成為一種預設性的實體存在，就好比個別語言的單獨存在先於認定語言區隔的步驟。然而，**認定區隔的步驟其實不是別的，正是翻譯最原始的行動**，但是在現代性翻譯體制的統識之下，我們一般習慣從再現的角度切入，將

翻譯創造出的語言整體性圖式(schema of the totality of a language)(Sakai 1997, 56 passim)理解為翻譯發生前的原點，將翻譯實踐的時間性本末倒置，導致原本引起翻譯需求的非連續性一無所意味的經驗，立即被壓抑。

套用酒井直樹翻譯理論的觀點，這正是現代性翻譯體制針對譯者的位置施行壓抑性收編的結果之一。其主要的的作用就是透過一種再現的邏輯，**將譯者混合性與激進不確定性的位置化約為一個符合邊界分明的格局。**在這個再現的格局裡，譯者則被呈現為一種在不同社群之間穿梭的身分，而社群間的邊界具有一種道德色彩，譯者的任務就是在遵守邊界道德價值的條件下去搭建一些具有倫理色彩的橋樑，讓一些訊息概念可以順利通過。也就是說，在現代性翻譯體制的意識形態作用之下，譯者被賦予一種不同社群間穿梭的身分一事，純粹是抽象化再現的產物，與譯者真正的實踐經驗距離甚遠。

相比之下，酒井將譯者的主體性描述為一種「轉運中的主體」(subject in transit)，並凸顯了翻譯實踐透發出發話者、聆聽者與譯者等三種角色的不穩定性與混合性(Sakai 1997, 11 passim)。正因此，酒井總結：

我們倘若將翻譯定義為一種溝通行為的話，翻譯中非連續性的面向就會被壓抑。這就是我稱之為翻譯當中人格的不確定性或擺動性(Sakai 1997, 13)。

追根究柢，作為一種轉運的主體，譯者的位置就是以上三種角色的綜合體。從這個角度來看，譯者的位置並不存在「失語」的問題，而是一種不規則的熱鬧狀態。擺動的聲響所帶來的多重聲音相互穿插的狀態，確確實實地壓過「失語」的可能。

連續性的梯度

然而，翻譯實踐與差異之間的關係確實容易引起困惑。恰丐巴提雖然可以順利指出「翻譯從『不可估量性』所生產出的〔…〕正是我們稱之為『差異』的半透明關係」(Chakrabarty 2000, 17)，可是恰氏對理論如何才能忠實呈現「不可估量性」的問題，並未提出具有說服力的答案。相反，恰丐巴提的生命世界概念本身已經將不可估量性納入了抽象化的翻譯再現架構。由各個生命世界組成的全球版圖於是呈現了完全缺乏真正的不可估量性的面貌，讓生命世界的範疇本身成為一個對稱性的共同尺度或標準。儘管如此，恰氏敏銳的眼光還是抓住了重點。**差異的存在並不是引起翻譯行動的原始事件。相反，差異才是翻譯行動這個原始事件創造出來的結果。**需要補充的部分在於，這裡所謂的「差異」僅是翻譯實踐後的再現，需要與當初號召我們展開翻譯的「不可估量性」或「無所意味性」嚴謹區隔。

「非連續性」(discontinuity)一詞與「差異」(difference)的概念之間的區隔因此值得說明一下。基本上，**差異屬於連續性的範疇。**畢竟，哪裡有同一，哪裡就有差異，哪裡有差異，哪裡就有同一。連續性則意指同一與差異連結起來的關係。換言之，差異不可避免地返身導向同一性與相同性，非連續性反而牽涉一種基進的不確定性。雖說非連續性可以理解為一種差異性的差異，可是為了避免術語混淆起見，我採取非連續性一詞作為清楚區隔。非連續性恰恰就是那種逃脫了同一與差異的閉路耦合的東西。它總是保持不可通約性和不確定性，並出現在任何對比操作發生之前。因此，連續性可以視為一種派生的、後於非連續性的基礎設施或建構，使得對比以及由對比所產生出的差異成為可能，進而建立一個規範參照去指認一些相互反對的對象，例如互相不隸屬甚至敵對的主權國家。與此不同，非連續性就是一種存在於國際架構

誕生之前——也就是國與國被區隔之前的跨國性(transnationality)，(Sakai 2013)或共通普及(common)的狀態。而這裡所謂的「之前」，其實無法用線性時間觀的方式去理解，就像「之間的地方」最好不要單獨訴諸空間的概念去理解一樣，「之前」或「之間」的狀態在任何時候都是可能乍然出現。

邊界研究一般都是從邊界催生出的分類形式與各種控管功能去著手。儘管邊界催生的諸種效果或則在激烈的爭議中受到質疑以至引起「無國界」的呼聲，或則作為當下危機的解決方案而獲得肯定以至成為築牆的主張或計畫，其將民族國家或文明區域的存在自然化的制圖學式想像，卻毫髮未損。相比將邊界當成一種空間裝置來展開批判，我在此更感興趣的對象是那些創造並複製邊界的**社會實踐(bordering practices)**。邊界雖然往往呈現出一種自然給出的面貌，但是它始終具有根本的社會性質，需要反覆展演方能成立。**這類社會實踐的特徵在於，它們能夠透過封圈(enclosure)的過程去產生一些社會「對象」，並在此基礎上反過來將諸「對象」呈現為先於劃界實踐的給出存在。**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我們使用了空間相關的詞彙表達，可是劃界實踐基本上都是透過時間去展開的，跟空間無關。換言之，劃界實踐過程中出現的邊界，與純粹再現式或觀察式的界線需要嚴謹區隔。

確切地說，劃界實踐意指那些將非連續性(discontinuity)的社會關係轉變成連續性(continuity)的實踐過程。這些過程以封圈運動的形式生產出假定具有內在一致性且相互對立的知識—地理實體(拿當前香港的例子來說，那就是西方 vs. 中國，中國 vs. 香港，或者再變為中國和西方聯合體 vs. 香港)。透過對這些圈地或區域精耕細作，邊界就被假定為不同且對立的區域間的界線，而根據界線所創造出的實體就成一種連續性的梯度(continuous gradient)。其中的差異與對立儘管可能存在懸殊的權力不對等，也始終保持

著形式上的等同關係。它們實際上服務於同樣的規範參照和同樣的資本主義價值的生產。這些對立發明出的知識—地理實體(主要是些民族國家和文明集團)實際上是被置放在連續且單一梯度的不同點上而已。

當前進步思想與社運圈，如同前面說的《批判性中國研究學者》或《流傘》等團體，在在強調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超越邊界」的呼聲，雖然揭穿了連續性梯度內差異的假象或合謀，對於那些將梯度創造出來的劃界實踐卻完全置之不顧，甚至正因此而讓這類實踐既有的制度性收編形式變本加厲，引發邊界擴散。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酒井直樹的分析(Sakai 2005b, 184-185)，差異梯度不僅是牽涉國族身分的事情，更是與個體位置相關的制度。梯度作為梯度存在就意味著梯度內的個體位置相對不穩定。這些相對不穩定的位置需要經過反覆展演的過程方能順利複製。換言之，差異性梯度就是兩種二元對立組合的結合，例如，本質 vs 反本質主義與普世 vs 特殊主義。作為一種抽象關係的符徵，「西方」的位置，隨著具體脈絡的變化就會不斷地產生各種浮動或移動，但是關係本身不會變。在梯度中處於相對優越的位置的「西方」，隨著脈絡的變動就可以讓各個不同身分的身體去臨時佔有它。從這個角度來看，種族主義與社群區隔的意義顯得不一樣。在一種脈絡中可能扮演「西方人」的人，在另一脈絡中可能就被當做西方人的他者。例如，在香港之於西方的脈絡中可能被當做非西方人的香港微生物學專家，在香港之於中國內地的脈絡中，可能就可以站在如同「西方」一般的相對優越位置上去譴責中國文化的「劣根性」，並發布各式各樣的建言命令去糾正中國人的「陋習」。

作為從 15 世紀迄今一波一波全球化浪潮中最大、最顯著的遷徙人口之一，「華人」對於區域布署的歷史體驗非常深刻。無論

居住世界任何地方的「華人」，其實都需要一直面臨該布署產生的人種差異對比機制，以及在此基礎上所訂定的生命政治優劣排序。有趣的是，一切政治分歧都可以成為人種差異相對優劣排序的依據，甚至連公民權與人權的尺度與行使，都難免被納入社群對比與排序的指標，就好像是一種生命政治的 KPI(關鍵業績指標)一般。重點是，幾乎任何一種差異都可能變成特定社群優劣劃分的依據，更何況是結晶為地理邊界⁴。就香港的情況而言，這個邊界在歷史上的呈現就是所謂「高等華人」的概念，而這個區隔不但存在於與內地之間的關係，而且還存在於香港華人社會內部，讓香港人口長期暴露在生命政治對比架構之中。隨著「中國的崛起」所帶來的經濟變動，該布署在中國內地不斷擴散，產生日益多元的指標因素與日益懸殊的優劣劃分，進而與香港既有的排序結構發生衝撞。需要牢記的是，「華人」「內部」無限擴散的排序關係，並不是「華人」所屬或專屬的問題，而是全球性的生命政治——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的運作跡象。然而，被賦予「華人」身分的人口特點，在於一種特殊「卑屬感」的殖民情結(黃建宏 2019, 40)。例如，「華人」與「白人」這些社會建構即是一些相輔相成的對照形象，其中最大的區別在於，「白人」的定義基本上就是被允許去幻想一種除外權或免受權(immunity)，就好比相對於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的生命政治對比架構而言，「白人」的假定身分如同一種優先名次的保證書，可以隨時隨地免除「自我證明」的臨檢步驟及其連帶產生的「卑屬感」。然而，「白人」雖然被允許幻想著名次降格現象在其身上發生是不可能的事，名次「降格」的風險實際上卻跟「白種」身分需要反覆展演的不穩定特質綁在一起，導致「白人」一直無法擺脫一種政治焦慮，那就是淪落為非白人的可能性——例如現代歷史不同時空脈絡下的

4 例如，「以文明程度而論，香港人有資格宣稱自己跟中國人不屬於同一個民族。」(諸夏文化傳播協會 2018)。類似的觀點不勝枚舉。

猶太人、愛爾蘭移民、義大利南方人口、北歐人等等社群的現代歷史經驗。而「華人」作為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中的認同對象，需要反覆「證明」自己的身分及其排行的名次，光是這點就足以引發並複製「卑屬感」效應。重點是這些富有生命政治含意的實踐，將身分與一種潛在性的「轉型」搭上連結，不但好像一種區域就等同一種人種一般，更好像每一個帶有人種一區域烙印的身體，都需要不斷地投入轉型的宏業，改造其身上的「民族劣根性」，進而日益接近理想形象的目標。

以上這些討論有助於我們理解翻譯真正的社會意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翻譯的大眾想像常常落為一種「解密」的行動，將「外語」所代表的「亂碼」轉變成看得懂、聽得懂的本國編碼系統。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永無止境的轉型過程中，作為一種具體抽象性的翻譯之實際運作，恰好相反。甚至可以說，**翻譯弔詭地變成了一種加密的技術**。根據加勒比地區解殖主義哲學家雷斯特雷波(Sanin Restrepo 2017)的分析，加密過的對象的特徵在於彼此間所形成的權力關係。我主張將雷氏的「加密」概念應用到現代性翻譯體制的批判上，將加密理解成將非連續性轉換成連續性的動作。也就是說，現代性翻譯體制的特徵就是將社會關係，尤其是與非連續性因素有關的關係，封圈並納入一個差異的梯度，就好比那個梯度是一種捕捉器。加密的結果則是規則化的差異梯度的確立。

隨著非連續性受到壓抑，社會關係就被圈定在一個差異化的梯度上。這個梯度不但遮蓋了翻譯實踐中的非連續性或無所意味的體驗，還啟動了一種循環關係，讓那些構成了該梯度的元素顯得自主而外在於梯度本身。那樣的循環關係可以分為兩個同心圓環，一個由語言、人口和土地構成，一個則在邊界想要分隔開的兩極間迴圈。差異化梯度在一個封閉的圓環內起作用：它的預設被當

成歷史積累的結果並呈現和投射到過去。然而，由上述操作產生出來的各個區域性的劃分(民族國家，地區性文明)絕非從過去直接繼承而來。現代性對時間的重組所造成的裂痕導致時間的連貫性一同被打亂。那些區域性的劃分，雖然表面上是歷史積累的基體，可是它們實際上應該被視為直接承受現代性時間裂痕對社會關係所造成的衝擊的對象。這些區域性劃分作為現代性的對象，不過是些依賴於當下及投射向未來的實踐創造出的「後設穩定式對象」(metastable object)。該術語的引進，主要是用來標示出這些區域對象的不穩定性。用直白的方式表達，民族歸屬的「身分」絕不是與生俱來、給出的存有，它只能是一種想像的對象。在這點上，我的論點確實可以納入當代港台民族主義思想的靠山——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書所展論的概念。然而，與安德森不同，我認為想像的問題意識根本不是一種打開人民集體記憶與集體意志的視野，反而，它強調人民共同體本身不但具有時間裂痕色彩極其強烈的展演性(performative)、更是一種梯度內的產物。想像中的社群身分(identity)本質上不可能達成同一(identity)狀態，在這個意義上，身分(identity)比較像是一種想像的靶心，用公認的形式與制度去組織各式各樣的社會行動。身分的同一性確認動作，雖然始終無法達成，但是確實可以變成一種慾望的對象、一種行動的靶心，而諸如此類的慾望對象確實都可以轉而被納入各種各樣的制度脈絡，成為制度反覆複製的對象。制度雖然無法有效打造身分的同一性，但是確實可以不斷激發並獎賞對同一性的追求。正因此，建立在反覆複製對象的基礎之上的主體，永遠是不穩定的，不自主的。換言之，想像的共同體作為批判性概念，雖然打開了邊界的虛構性，讓我們意識到邊界可以隨著新主體的出現而產生更新，讓一群人自稱為民族並爭取獨立建國的條件，可是它同時

因此連帶引起了代價頗高的障礙，讓確立展演性梯度的劃界實踐均被遮掩。

轉型學與西方的意義

經過上文對恰克巴提的修正與補充，我們終於可以提出一個初步結論：現代性翻譯體制所牽涉的不僅是狹義的語言，還有廣義的社會實踐，而作為社會實踐的制度，它就是一種配合資本主義轉型的治理技術。根據沃克的觀點，翻譯體制與資本主義轉型是一體兩面：

就像翻譯被再現為一種純粹的交換一般，轉型一直需要被再現為一種天然的生長，一種從「此」到「彼」的「簡單而毫無內容可言」的必然躍升（G. Walker 2016, 26）。

我們熟悉的世界地圖，其實就是根據翻譯的具體抽象化過程去劃分「生命世界」的圖式。因為抽象化過程本質上包含了差異對比的契機，而這個差異對比契機又因為跟資本主義積累機制相關，必然招致意識形態的作用。這種意識形態作用基本上可以視為一種天然化的效應，讓那些服務於資本主義積累機制的社會組織看起來像是自然的、必然的，而國族形式正是如此自然化的標準規範。從這個角度來看，現代性翻譯機制與廣義上的現代轉型學(transitology)，都是這種意識形態的承載體，讓一些空間化與人種化相關的預設均被納入連貫的梯度。

“Transitology”（轉型學）一詞通常專門用來描述蘇聯解體後，東歐及俄羅斯各國進行民主轉型相關研究的領域。然而，廣義來說，轉型學一詞透露了人文學與社會科學學門分際原理的潛在性預設。只要區域繼續作為學門分際的依據，轉型的預設就揮之不

去。正因此，任何如同陳偉福所要求那樣的新分析架構，另一必備的批判對象就是現代轉型學及其支援的各種政治主體。這個任務的重要性不但來自於香港《基本法》大期限引起的問題，抑或中國民主轉型的促進所引起的迫切需求，更源自全球欲徹底擺脫殖民—帝國現代性的解殖呼聲，以及資本主義歷史轉型如何理解的相關辯論⁵。

假設說「現代」是個啟蒙與進步的時代的話，所謂「進步性」最終建基於這樣一個假設：各種各樣的轉型相伴而生，從而將現代與之前的時代區別開來。「現代」一詞所意味的轉型不但多元，而且個個轉型之間的關係都染上了息息相關、連帶相扣的色彩。於是乎，在典型歐洲中心主義的層面上，一種轉型相關的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就誕生了。根據這個敘事架構，從農業到工、商業的經濟轉型，或稱工業革命，連帶搭配了另一從君王和封建家族的統治過渡到資產階級透過法律制度建立公民權代議制的政治轉型，亦即所謂的民主轉型或民主革命。以上這兩種轉型最終連帶搭配了一種知識型(epistemic)的轉型高峰，也就是所謂的科學革命，即對世界的理解從神話—宗教型過渡到科學—理性型。如此一來，每種轉型匯出另一種，最後成為一個名副其實轉型相關的轉喻鏈。有趣的是，每一種轉型都具備代替所有其他轉型的潛力，而它們作為一個總體則一同構成了一種轉喻式的普世轉型(metonymical universal transition)。

作為具有論述與實踐兩種面向的綜合體，轉型的假定普世性實才是所謂現代「普世價值」的實質根據。凡是標榜普世價值的

5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並未能夠有效消化並進而呈現資本主義歷史轉型相關辯論的重點與歷史，以及這些辯論與學門知識之間的關連，讓我不但感到十分失望，而且還同時感到難免辜負了讀者正當的期待。有關資本主義歷史轉型的辯論，可以參考 Ashton and Philpin(1985)與 Heller(2011)。有關資本主義轉型與主體性生產之間的關連，請參見 Walker(2016)。

論述背後其實都隱藏著關於轉型的預設。從上述阮李巍對恰克巴提批評的角度來看，轉型真正的普世性質並不在於假冒普遍的特殊性因素，而在於資本主義是個永續的佔奪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不斷利用任何外部性差異因素去充當捕捉價值的利器。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普世轉型確實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烙印，但是必須注意的是，那樣一個作為獨立區域的歐洲之形成，不但隱藏了其他文明不被承認的參與與貢獻，還遮蔽了作為世界組成元素的「區域」本身的誕生。也就是說，**世界版圖的成立及其劃分都是資本主義轉型必備的條件**。同時統一並劃分的製圖技術將線性、均質性時間觀與連貫疆域的空間技術綁定在一起，產生一個連續性梯度的區域布署(an apparatus of area within a gradient of continuity)。這些區域——**民族國家與文明體**，表似為歷史繼承的**建構**，卻偷偷隱藏著反歷史的契機，它們都需要反覆展演其本身永不穩定的邊界。對於一個借助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雙重運動逐漸開始將自身變成單一球狀體的「全球」世界來說，從前現代到現代的「普世轉型」這一觀念，恰好提供了具有廣泛適用性的敘述範本，其真正的用意在於確保區域布署呈現自然的面貌。

就其核心而言，**普世轉型是一種將國族形式(亦即統一世界當中的劃分單位)與資本主義結合起來的後設敘事**。在殖民—帝國現代性的兩極化、等級化組織背景中，這種由邊界管理所產生的狀態主要包括兩組關係。第一組是主權民族國家間的關係；第二組是所謂文明間的關係，或借用霍爾(Stuart Hall)的著名說法，「西方與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間的關係。在這兩組關係中，邊界的社會功能均在於組織和調動殖民—帝國現代性基礎性的二元對立並服務於資本主義的積累機制。就後者來討論，人們對「西方與其他」的認知通常建基於一個錯覺，把西方與西方之外的世界之間的關係看作是一種牽涉地理性邊界的問題。在此我們必須強調，「西方與其他」的關係所意味的邊界，本質上與空間無關，

而是一種社會關係的格局，不但可以移動(例如從西歐移到北美，再移到上海)，只要是經歷過殖民—帝國現代性微型政治的重組過程，就甚至可以在任何地方的社會關係中出現。確切說來，「西方」與「其他世界」之間易於再現的地理想像邊界就被拿來壓制真實的、富有展演性的社會關係(performative relationship)。有關這個部分的問題，可以參考加拿大日本研究學者蓋文·沃克(Gavin Walker)的解釋：

讓我們試著給這個詞一個簡明的定義，或至少對它所佔據的多少有點難以定義的空間做一點澄清。因為「西方」無法在製圖學的意義上嚴格定位，也無法在嚴整的分類學意義上去描繪，所以它正是「(一種)操作的結果之一，使得真正的連貫性(coherence)不可能出現的地方反而產生易於分類的連貫性」(Sakai 2005b, 183)。此處的「西方」自身是一種社會關係的類型，而根據這個類型我們才可以將異質性的相遇或次第加以計算和典型化，就好像彼此的相遇是兩個穩定且實存的實體、位置或空間之間直接互動。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將真實的社會關係組織起來的抽象性。我們或許會馬上認出，原屬不可能的社會連貫性終究順利被生產一事，正是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形式的核心洞見之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的身體自身無法被商品化(像在奴隸社會中那樣)，而只能是「勞動力」(Arbeitskraft)的生產場所。這個無法被資本當成商品生產出來的元素，卻可以被資本當成商品順暢地流通。流通過程中看似不過是個理論侷限的東西，在生產過程中則作為歷史邊境(historical boundary)起作用。這樣一來，人們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被稱為勞動力這個不在場的潛力的各種買賣關係，就開始被當做一種結晶為具體而固定的關係，一種被迫變為物質性存在而開始於社會中流通的東西，儘管它無法被直接生產出來。(G. Walker 2018, 212)

西方世界的諸多邊界在過去一個世紀不斷發生劇烈變動，「西方」確實無法被理解成一個固定的地理區域或是確定的地緣文化實體。作為殖民—帝國現代性區域的樣板，「西方」所命名的，不是一個區域，而是一種關係的抽象形式，正如資本所命名的不是一種東西(例如，金錢)，而是一種包含著剝削的社會關係。就效果面而言，作為抽象物或者社會幻象的「西方」，其實是一種有助於勞動力商品化的主體性生產技術。作為一種抽象化的社會關係，「西方」啟動了區域布署，凡是領土都必須納入其內。在區域布署的統識之下，邊界是一種有利於資本積累的主體技術。有了邊界就有與資本主義轉型相對應的差異性主體性。

在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國際體系裡，包括分離的權益在內的民族自決權與邊境不可侵犯的自主權之間無法化約的矛盾，其實就是各種極其暴力的生命權力叢生的溫床。沃克給我們的啟發，就是轉型與翻譯必須納入同一個脈絡去思考。「國族的問題往往牽涉一群特定的歷史議題，也就是說，往往與轉型的問題相關」(G. Walker 2016, 70)。國族一般的形式作為世界版圖生命政治劃分的範本，一方面是現代性翻譯體制的結晶，一方面是資本主義轉型不可或缺的必備條件。蒙受這個論點的啟發，我們要提的問題不再是「這個落後的國家到底要怎麼樣才能成功轉型成為先進的民主國家？」，而是「什麼樣的轉型實踐才能克服資本主義生命政治的劃分製圖學與翻譯體制？」誠如沃克指出那樣，「轉型與翻譯每每複現，都是打開新的政治格局的潛在契機」(G. Walker 2016 194)。因此，沃克建議我們從方法論的層次開始去堅決破除國族形式的給出性質，並將之視為一種政治範疇，也就是一種在構成過程上滲透著政治關係(支配與剝削)的建構。想要破除「國族形式的給出性質」的話，單單指出「國族」是一種「歷史建構」或「想像的共同體」是不夠的，而是需要從劃界實踐與資本的關連切入。

致謝

特此感謝嘉栩同學(Chia-hsu Chang)提出意見與校對。稿子最後一次給她過目後又經過不少變動，現存大小錯誤均為筆者個人專屬的責任，請讀者海涵。

感謝家人，尤其是老婆與家貓瓜蕾、灰逗的陪伴。感謝所有協助我成為一位「中文人」的人，特別是那些被認為中文不標準的個人、群體或機構。

唐山出版社創辦人兼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理事長陳隆昊先生作為獨立書店的先驅，對於台灣獨立出版業乃至台灣「異識」(dissensus)空間的貢獻舉足輕重，不禁讓人仰敬。特此感謝「陳老闆」承接此一注定冷門的出版計畫。唐山編輯賀卓恆為此計畫所付出的心血讓我感到十分汗顏，特此感謝。吳國強老師的封面設計為了一部艱澀、單調的拙作填上了獨特的創意光環，真是我最大的榮幸。如果沒有去年將我編入其中的巴黎十大研究團隊的贊助與支持，此一出版計畫最後還是只能當作「抽屜文學」。該團隊對「異識」性學術研究的實際支持讓長期處於發聲平台缺乏狀態之我五體投地，感恩荷德。撰寫過程中，老同學白培德(Peter Button)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訊與觀點，讓拙作貧乏的面貌增填了微弱的博學跡象，特此感激。白先生如同我認識的許多傑出學者一般，被迫失去教席和發聲平台，卻依然堅持思想工作與書寫，叫人頂禮膜拜。

筆者還想感謝的個人固然多，為了避免對方遭受不必要的煩擾，只好以心照不宣的方式致敬。「失語」的問題隨時可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制度或個人身上出現，希望大家對此集思廣益，設法置換。

中文書目

部分被刪除的連結可以到以下網頁搜尋備份版：<https://archive.org/web/>。

筆畫順序

3

土茯苓，2015年，〈光復的左翼話語〉，《彼時彼岸》2015年3月23日，<https://course5293.wordpress.com/2015/03/23/光復的「左翼」話語/>，如今存於<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003220936/https://course5293.wordpress.com/2015/03/23/%e5%85%89%e5%be%a9%e7%9a%84%e3%80%8c%e5%b7%a6%e7%bf%bc%e3%80%8d%e8%a9%b1%e8%aa%9e/>，轉載於《國際》，<https://international-online.org/2016/03/22/reactionaryleft/>，10/22/19 瀏覽。

4

《中共殖民香港資料庫》，https://savehkfromchina.fandom.com/wiki/%E4%B8%AD%E5%85%B1%E6%AE%96%E6%B0%91%E9%A6%99%E6%B8%AF%E8%B3%87%E6%96%99%E5%BA%AB_Wikia。4/8/19 瀏覽。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辭典編輯室編，1985年，《現代漢語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王家琪，2020年，〈也斯的香港後殖民文學與論述〉，《台北大學中文學報》第27期（2020年3月），頁75-144。

5

世界公民文化中心，2018年，〈中文都是「精準」，一次搞懂英文單字 accurate、precise 和 exact 用法差別〉，《風傳媒》2018年04月17日，<https://www.storm.mg/lifestyle/42019710/23/20> 瀏覽。

6

江曉璐，2018年，『為人生的文學』—茅盾寫作的主體性實踐。里昂第三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12月18日。<http://www.theses.fr/2018LYSE3080>。10/11/20 瀏覽。

刑福增，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的香港基督宗教〉，《端》媒體2019年10月18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18-opinion-hk-protest-christian/>，7/20/20 瀏覽。

7

李立峯、鄧鍵一、袁璋熙、鄭煒，2019年，《「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現場調查報告》，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2019年8月。

李俊峰（Lee Chun Fung），2019年，《界限／南北 Boundaries》，視頻作品，5月，錄像：30分鐘、彩色、HD 1080p、粵語配音、華英文字幕。

—，2020年，《撕裂／日常：「香港反修例運動」筆記 Si Lit and the Everyday: Notes on the Hong Kong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香港，水滸、《同時》、物資部聯合出版。

李宇森（Lee Yusum），2019年，〈光復什麼，為何革命：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政治理念雜議〉，《燃燈者》，8月13日，<https://truthseeker922.wordpress.com/a-treatise-on-political-thoughts-of-the-anti-extradition-bill-movement/>，2/27/20 瀏覽。

—，2020年，〈以內戰為管治——香港抗爭鎮壓的例外與日常〉，《燃燈者》，7月11日，<https://truthseeker922.wordpress.com/stasis/?fbclid=IwAR2jlrB6yGBO0-oJL0kZLSJOfRM8NWSwTzAwSt0VQrb5OUDQBs2nnhCrNY>，7/12/20 瀏覽。

我要攞炒，2019年，〈【突發】正式開火！第一批信已發出！我地香港人要幫政府官員、保皇黨取消外國護照！〉，LIHKG 6月11日，<https://lihkg.com/thread/1204306/page/1>，08/17/19 瀏覽。

忤尚（Emily Wong），2019年，〈專訪《寫給左翼民粹主義》譯者楊天帥：政治敵人與民粹必要〉，《虛詞》，11月21日，<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1139.html?fbclid=IwAR1u5sXGpkZAoCcOuehO2EU1NcuFQt3KVO6Fng0c3pjjUTJXj5RVVkkOltM>，12/5/19 瀏覽。

8

周顯（Chow Hin），2018年，〈焦土派是如何出現的？〉，《am730》，4月11日，<https://www.am730.com.hk/column/%E8%B2%A1%E7%B6%93/%E7%84%A6%E5%9C%9F%E6%B4%BE%E6%98%AF%E5%A6%82%E4%BD%95%E5%87%BA%E7%8F%BE%E7%9A%84%EF%BC%9F-122147>，10/21/19 瀏覽。

周思中（阿野），2010年，〈《1970s》編話：拒絕認命，重複《70》〉，《Cultural Imperatives》2010年1月13日，<http://cihk.blogspot.com/2010/01/1970s70.html>，10/24/20 瀏覽。

—，2011年，〈無怨無悔的解殖思考〉，《思想》第十九期 2011年9月，頁159-175。

周思中、黃孫權，2014年，〈周思中：後殖民地的自主性〉，《諸眾之貌：亞洲社會

運動圖像》2014年7月31日，<https://www.multitude.asia/archives/156>，10/24/20 瀏覽。

明周文化記者，2020年，〈【80後／周思中】反送中仍然堅持耕田是逃避還是責任？一個男人耕田十年之後變成點？〉，《明周文化》2020年4月，https://www.mpweekly.com.cdn.ampproject.org/v/s/www.mpweekly.com/culture/%E5%91%A8%E6%80%9D%E4%B8%AD-%E7%94%9F%E6%B4%BB%E9%A4%A8-%E8%80%95%E7%94%B0-145044/amp?usqp=mq331AQFKAGwASA%3D&_js_v=0.1#aoh=16034495265316&referrer=https%3A%2F%2Fwww.google.com&_tf=%E4%BE%86%E6%BA%90%EF%BC%9A%25%24s&share=https%3A%2F%2Fwww.mpweekly.com%2Fculture%2F%25E5%2591%25A8%25E6%2580%259D%25E4%25B8%25AD-%25E7%2594%259F%25E6%25B4%25BB%25E9%25A4%25A8-%25E8%2580%2595%25E7%2594%25B0-145044，10/24/20 瀏覽。

明報，2019年，〈當年赴京歷鎮壓為護伙伴緘默30年潘毅：今打壓工運拘學生如同六四〉，《明報》2019514，http://www.mingpaocanada.com/VAN/html/News/20190514/hk-gch1_r.htm，10/26/20 瀏覽。

《夜貓媒體》，2020年，〈資本主義農業和 COVID 19——一對致命的組合〉，《夜貓媒體》，2020年03月27日，<https://theowl.hk/2020/03/27/%E8%B3%87%E6%9C%AC%E4%B8%BB%E7%BE%A9%E8%BE%B2%E6%A5%AD%E5%92%8C%9F%BC%9A%E4%B8%80%E5%B0%8D%E8%87%B4%E5%91%BD%E7%9A%84%7B%58%84%E5%90%88/>，10/11/20 瀏覽。

9

洪世謙，2017年，〈「例外」的戰鬥姿態〉，收入黃涵榆著，《跨界思考》，台北：南方家園出版社，頁8-11。

香港大紀元新唐人聯合新聞頻道，2019，《香港獨立媒體創辦人 葉蔭聰：〈大紀元〉體現香港有多元觀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FmqREGm3YA>，10/26/20 瀏覽。

香港編年史，2020年，〈人物資料〉，《HKChronicles》，https://hkchronicles.com/?fbclid=IwAR0t6_4f4Yio5uXSxjz2qwjxL3AKbkg24B9Mefid426KkRyKV1s43MsXBv4，10/26/20 瀏覽。

韋乞，2020年，〈加速主義：作為一種嚴肅的政治（抗爭）立場〉，《端傳媒》2020年7月27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727-opinion-what-is-accelerationism/>，8/2/20 瀏覽。

10

高教公民，2020年，《2019 香港學術自由報告》，<https://bit.ly/31yoHJn>，2/8/20 瀏覽。

陳光興、錢永祥，2005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學術生產〉，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鑑》，台北：唐山，2005：3-30。

陳清橋，2010年，〈文化研究十年與『拾文化』系列〉，羅永生主編，《文化研究與文化教育》，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頁7-13。

陳婉容，2014年，《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香港：圓桌出版社。

陳佩甄，2019年，〈以誰作為方法？：從文化研究、亞洲研究到臺灣研究〉，《文化研究》第二十九期，頁196-205。

11

許寶強，2002年，《資本主義不是什麼》，香港：牛津出版社。

——，2015年，〈佔領與光復〉，《獨立媒體》2015年3月24日（轉載《明報》3月22日刊登的文章），<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32684>，10/22/19 瀏覽。

——，2020年，〈「左翼失語」，還是被消聲的抗爭主體？〉，《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15期2020年4月，237-258頁，《Matters》轉載2020年8月31日，https://matters.news/@PK_Hui2020/%E5%B7%A6%E7%BF%BC%E5%A4%B1%E8%AA%9E-%E9%82%84%E6%98%AF%E8%A2%AB%E6%B6%88%E8%81%B2%E7%9A%84%E6%8A%97%E7%88%AD%E4%B8%BB%E9%AB%94-bafyreiffnjhocnx4xhqytk7hylbwnp2u-poco4iyewm5bift6rxeypnqxt?fbclid=IwAR2m7G8SvXzBw2Ej9sMEZSDfQbb97bNsh_qS1SOgwbLH7dorrYflaTEybQ#_edn6，10/24/20 瀏覽。

許寶強、袁偉雄，2000年，《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許瀚月，2014年，〈地下塊莖圖譜：安聖惠（娥冷·魯魯安）的藝術創作〉，《現代美術學報》28期，頁135-156。

曹文聲，2007年，〈回顧保衛天星碼頭清拆運動——一場自發的運動〉，《文化研究@嶺南》2007年3月，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326093757/http://www.ln.edu.hk:80/mcsln/4th_issue/criticism_04.html。08/22/19 瀏覽。

張少強（Cheung Siu Keung），2016年，《管治新界：地權、法權與主權》，香港：中華書局。

梁志剛（Michael Leung），2020年，Mary L. 譯，〈農業與全球瘟疫：如何在動盪中找到團結？〉，《流傘》2020年8月17日，<https://lausan.hk/2020/agriculture-and-pandemics-from-indeterminacy-to-solidarity-chinese/>，10/27/20 瀏覽。

梁文道，2016年，〈不合時宜——梁文道專訪〉，《立場新聞》，12月14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612170509/https://www.thestandnews.com/culture/%E4%B8%8D%E5%90%88%E6%99%82%E5%AE%9C-%E6%A2%81%E6%96%87%E9%81%93%E5%B0%88%E8%A8%AA/>，7/10/20 存取。

歐家麟，2020年，〈緩靖時刻——慕尼黑協定的故事〉，《立場新聞》2020年8月3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09034734/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E7%B6%8F%E9%9D%96%E6%99%82%E5%88%BB-%E6%85%95%E5%B0%BC%E9%BB%91%E5%8D%94%E5%AE%9A%E7%9A%84%E6%95%85%E4%BA%8B/>，12/5/20 瀏覽。

12

覃俊基（Thomas Cham），2019年，〈左翼的失語——當運動和世界和你有所距離時應該如何自處〉，《夜貓媒體》，6月18日，<http://theowl.hk/2019/06/18/%e5%b7%a6%e7%b9%bc%e7%9a%84%e5%a4%b1%e8%aa%9e-%e7%95%b6%e9%81%8b%e5%8b%95%e5%92%8c%e4%b8%96%e7%95%8c%e5%92%8c%e4%bd%a0%e6%9c%89%e6%89%80%e8%b7%9d%e9%9b%a2%e6%99%82%e6%87%89/>，06/19/19 瀏覽。Thomas Cham, “Left Silent: Negotiating Alienation in the Movement: How leftists can build power from the affect of dejection.” Tr. Promise Li and Brian Ng. Lausan September 6, 2019. <https://lausan.hk/2019/left-silent-negotiating-the-distance-between-you-and-the-movement/>. Accessed 10/23/2020.

黃漢彤（Tony Wong），2019年，〈沒有光復〉，《夜貓媒體》，7月24日，http://theowl.hk/2019/07/24/%E6%B2%92%E6%9C%89%E5%85%89%E5%B1%A9-tony/?fbclid=IwAR04u3Anqa7bdcX7_Ygzdwy7hguYPByS39BZSeMjCQVTaPgV0k8lj-tO-VA，07/26/19 瀏覽。

黃建宏。2019年。《潛殖絮語》。台北：宣言製作工作室。

黃涵榆，2020年，〈是不是左派沒那麼重要〉，《思想坦克》2020年04月01日，<https://www.voicetank.org/single-post/2020/04/01/040101>，10/11/20 瀏覽。

黃芷敏，2013年，〈文盲、群眾與世界：三十年代中國的拉丁化運動〉，彭麗君編，《邊城對話：香港·中國·邊緣·邊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96-123。

黃之鋒，2020年，〈議會過半想像以「國際攪炒」反制「臨立會2.0」〉，《明報》2020年3月29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E5%89%AF%E5%88%8A/article/20200329/s00005/1585420247924/%E5%91%A8%E6%97%A5%E8%A9%B1%E9%A1%8C-%E8%AD%B0%E6%9C%83%E9%81%8E%E5%8D%8A%E6%83%B3%E5%83%8F-%E4%BB%A5%E3%80%8C%E5%9C%8B%E9%9A%9B%E6%94%AC%E7%82%92%E3%80%8D%E5%8F%8D%E5%88%B6%E3%80%8C%E8%87%A8%E7%AB%8B%E6%9C%83-%E3%80%8D>，4/5/20 瀏覽。

華勒斯（Rob Wallace）等人，2020年，佳惠、堅如、羽婷、好運等《食物主權》同仁譯，〈新冠病毒與資本循環〉，《食物主權》2020年4月11日，<http://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2235>。10/11/20 瀏覽。

董啟章，2017年，《地圖集》，台北：聯經出版社。

13

葉蔭聰 (Ip Iam Chong)，2010 年，〈當文化研究遇上文化保育〉，羅永生主編，《文化研究與文化教育》，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頁 122 - 139。

——，2019 年，回應趙蒙暘〈時代遊戲〉（見趙蒙暘 (Zoe Zhao)，〈時代遊戲〉），2019 年。

——，2020 年 a，〈葉蔭聰：香港身份新認同——當「香港認同」變成權力意志〉，《端媒體》，1 月 4 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104-book-intro-hk-new-identity/>，02/02/20 瀏覽。

——，2020 年 b，〈直面香港這場「不知節制」的運動〉，《思想》第 40 期，頁 195 - 208。

楊錦麟 (陳子帛)，2020 年，〈香港如何實現「第二次回歸」？〉新加坡《聯合早報》，7 月 9 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200709-1067641?fbclid=IwAR1mAM0Y-z_AvimRbqPM6nlEP7gPJJLyScj5xsmsQnDP1D15UX_-MNYvgg，7/9/2020 瀏覽。

賈雅緻，2015 年，〈雨傘的含義：談也斯的遺作〉，《立場新聞》1/5/2015，<https://www.thestandnews.com/culture/%E5%82%98%E7%9A%84%E5%90%AB%E7%BE%A9-%E8%AB%87%E4%B9%9F%E6%96%AF%E9%81%BA%E4%BD%9C/>，2/20/21 瀏覽。

14

趙平復 (Ozaki Takami)，2019 年，〈「英美港盟，主權在民」和「我要攞炒」的英語是什麼？〉，《國際 International》，8 月 10 日，<https://international-online.org/2019/08/10/iad-english/>，8/10/19 瀏覽。

趙蒙暘 (Zoe Zhao)，2019 年，〈時代遊戲〉，《Matters》，10 月 10 日，<https://matters.news/@zoezhao/%E6%99%82%E4%BB%A3%E9%81%8A%E6%88%B2-zdpuAvDCA9LJirBxRY3xP75eZYZ7CPMTXu6U38mrGwQ1F2cHi>，10/15/19 瀏覽。

赫姆斯 (Brian Holmes)，2008 年，李洋譯，蘇哲安校，〈靈活人格：一種新的文化批判〉，《熱風學術》第一輯，頁 221 - 240，https://brianholmes.files.wordpress.com/2008/01/flexible_personality_chinese.pdf，10/26/20 瀏覽，英文原文：“The Flexible Personality: For a New Cultural Critique,” Translate 2002.1，<https://translate.eipcp.net/transversal/1106/holmes/en.html>，accessed 10/26/20。

鄭永年，2019 年，〈「抗議之都」：誰主香港？〉，新加坡《聯合早報》2019 年 8 月 20 日，<http://www.uzaobao.com/mon/keji/20190820/60943.html>，9/27/20 瀏覽。

鄧正健，2019 年，〈為什麼梁文道令人討厭？〉，《獨立媒體》，12 月 29 日，<https://www.independen.com/2019/12/29/why-is-leung-wan-dao-so-hated/>。

www.inmediahk.net/node/1069599，12/29/19 存取。

15

尚呂克·儂曦 (Jean-Luc Nancy)，2003 年，蘇哲安譯，《解構共同體》，台北：桂冠。劉鎮發，2004 年，〈香港兩百年來的語言生活演變〉《臺灣與東南亞華人地區語言生活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孺明出版社，頁 128 - 143。

魯迅，1932 年，〈無聲的中國〉，《三閑集》，上海：新北書局。<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t/%E7%84%A1%E8%81%B2%E7%9A%84%E4%B8%A1%E5%9C%8B>，10/23/20 瀏覽。

潘毅，2007 年，《失語年代的光與影》，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諸夏文化傳播協會，2017 年，〈香港民族，命運自決〉，《諸夏文化傳播協會》2017 年 10 月 21 日，<https://medium.com/@cathaysianculturesoc/%E9%A6%99%E6%B8%AF%E6%B0%91%E6%97%8F-%E5%91%BD%E9%81%8B%E8%87%AA%E6%B1%BA62ac6bd29276>，11/19/19 瀏覽。

17

戴耀廷，2020 年，〈真攞炒十步：這是香港宿命〉，《蘋果日報》2020 年 4 月 28 日，<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00428/MTCUWRHKCIZT2RJAUP6W4TNXA>，5/5/20 瀏覽。

19

羅永生 (Law Wing Sang) 編，2010 年，《文化研究與文化教育》，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

——，2015 年，〈冷戰中的解殖：香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評析〉，《思想香港》第 6 期，香港嶺南大學。

——，2017 年，〈「火紅年代」與香港激進主義思潮〉，《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61 期 (2017 年 6 月)，頁 71 - 83。

——，2020 年，〈「攞炒」是一種解殖運動〉，《輕新聞》2019 年 9 月 20 日，<https://www.litenews.hk/news/9562-%E3%80%90%E8%A7%80%E9%BB%9E%E3%80%91%E7%BE%85%E6%B0%B8%E7%94%9F%E7%B9%95%E3%80%8C%E6%94%AC%E7%82%92%E3%80%8D%E6%98%AF%E4%B8%80%E7%A8%AE%E8%A7%A3%E6%AE%96%E9%81%8B%E5%8B%95>，9/22/19 瀏覽。

羅貴祥 (Kwai-Cheung Lo)。2016 年。〈從海盜邦到耕作村：國家主權下香港的海岸與農地敘述〉。《文化研究》23。頁 127 -140。

《懷火》Reignite，2020 年，〈矛盾大對決：美國左翼對談舉美國旗的反送中示威

者) , Matters , 3 月 11 日 , [20](https://matters.news/@reignite/%E7%9F%9B%E7%9B%BE%E5%A4%A7%E5%B0%8D%E6%B1%BA-%E7%BE%8E%E5%9C%8B%E5%B7%A6%E7%BF%BC%E5%B0%8D%E8%AB%87%E8%88%89%E7%BE%8E%E5%9C%8B%E6%97%97%E7%9A%84%E5%8F%8D%E9%80%81%E4%B8%AD%E7%A4%BA%E5%A8%81%E8%80%85-bafyreidpcinjrkombmqp4cv6k3doxctjs5av4qd3pa2iev4tdnnt5xys74 , 4/20/20 瀏覽。</p>
</div>
<div data-bbox=)

蘇哲安 (Jon Solomon) , 2016 年 , 〈太陽花運動類比性的翻譯：在全球國家物流政變與共通普及的創構之間 An Analogical Translation of the Sunflower Movement: Between the Logistical Coup in the Global Stat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ommons〉 , 《文化研究》第 23 期 , 頁 79-117。

羅馬字母

Csean0615 , 2020 年 , 〈美國對日本的支配超越你我想象〉 , 《Matters》2020 年 1 月 5 日 , [Damon , 2020 年 , 〈從批鬥楊千嬅反思黃色的陋習〉 , 《3C Music 中文唱片評論》2020 年 9 月 20 日 , \[Sam Belton , 2020 年 , 〈書評：羅伯·華萊士的《大農場製造大流感》〉。《社會主義行動》2020 年 6 月 14 日。 \\[Yashae , 2019 年 , 〈訪談 Yashae：從反送中看大眾恐懼的物質基礎，及左翼與大眾／連登的距離〉 , 《Matters》 , 7 月 24 日 , \\\[參考書目\\\]\\\(https://matters.news/@reignite/%E8%A8%AA%E8%AB%87yashae-%E5%BE%9E%E5%8F%8D%E9%80%81%E4%B8%AD%E7%9C%8B%E5%A4%A7%E8%A1%86%E6%81%90%E6%87%BC%E7%9A%84%E7%89%A9%E8%B3%AA%E5%9F%BA%E7%A4%8E-%E5%8F%8A%E5%B7%A6%E7%BF%BC%E8%88%87%E5%A4%A7%E8%A1%86-%E9%80%A3%E7%99%BB%E7%9A%84%E8%B7%9D%E9%9B%A2-zdpuAktqH5jrNLWx2uHGK8BGwdhnpN43NpXkp3dUPVAGa3r . 10/23/19 瀏覽。</p>
</div>
<div data-bbox=\\\)\\]\\(https://chinaworker.info/zh/2020/06/14/23871/ , 10/11/20 瀏覽。</p>
</div>
<div data-bbox=\\)\]\(http://3cmusic.com/home/%E5%BE%9E%E6%89%B9%E9%AC%A5%E6%A5%8A%E5%8D%83%E5%AC%85%E5%8F%8D%E6%80%9D%E9%BB%83%E8%89%B2%E7%9A%84%E9%99%8B%E7%BF%92/ , 10/25/20 瀏覽。</p>
</div>
<div data-bbox=\)](https://matters.news/@csean615/%E7%BE%8E%E5%9C%8B%E5%B0%8D%E6%97%A5%E6%9C%AC%E7%9A%84%E6%94%AF%E9%85%8D-%E8%B6%85%E8%B6%8A%E4%BD%A0%E6%88%91%E6%83%B3%E8%B1%A1-zdpuAuhMwK6CsmkzNtA6aUZ4J95Ef6kgYxrRu5oKZ7QU3cnf8 , 3/12/21 瀏覽。</p>
</div>
<div data-bbox=)

外文書目：

Saved versions of broken links can often be found by checking the Wayback Machine: <https://archive.org/web/>。

/

Abbas, Ackbar. 1997.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gamben, Giorgio. 1993. Tr. Michael Hardt. *The Coming Commun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gamben, Giorgio. 2007. Tr. Jeff Fort. *Profanations*. New York: Zone Books.

AI Task Force. 2019. *Report of the AI Task Force (Ministère des Armées)*. Accessed 5/20/20. <https://www.defense.gouv.fr/content/download/574495/9841172/>.

Alliez, Eric and Maurizio Lazzarato. 2016. Tr. Ames Hodges. *Wars and Capital*. Cambridge and London: Semiotext(e).

Alpert, Avram. 2019. *The Glob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elf, from Montaigne to Suzuki*.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Andi W & Promise Li. 2020. "Left On An Island: All enablers of US imperialism must be held accountable, especial the Chinese state." Lausan August 20, 2020. <https://lausan.hk/2020/left-on-an-island/>. Accessed 10/28/20. 〈獨善其身的美國左翼——香港，中國，和國際團結反對中共亦是反對美帝的其中一步驟〉 , 《流傘》2020 年 8 月 20 日 , [Arendt, Hanna. 199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https://lausan.hk/2020/left-on-an-island-chinese/ , 10/28/20 瀏覽。</p>
</div>
<div data-bbox=)

Ashton, T.H. and C.H.E. Philpin. 1985.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libar, Etienne. 1976. *Sur la dictature du prolétariat*. Paris : Maspéro.

----- . 1995. Tr. Jean-Marc Poisson and Jacques Lezra. "The Infinite Contradiction." *Yale French Studies* No. 88. New Hav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42 – 164.

Berardi, Franco. 2009. Tr. Francesca Cadel and Giuseppina Mecchia. *The Soul at Work: From*

- Alienation to Autonomy.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9.
- Bevins, Vincent. 2020. *The Jakarta Method: Washington's Anticommunist Crusade and the Mass Murder Program That Shaped Our Worl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Blue, A.D. 1965. "Piracy on the China Coast."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5. 69 – 85.
- Blumenthal, Max. 2013. "Oslo Freedom Forum founder's ties to Islamophobes who inspired mass killer Anders Breivik." *The Electronic Intifada* May 14, 2013. <https://electronicintifada.net/content/oslo-freedom-forum-founders-ties-islamophobes-who-inspired-mass-killer-anders-breivik/12451>. Accessed 10/28/20.
- Bo, Xun and Ding Boshun. 2020. "Why the fake Left is against China (Part 1)." 《國際》 (International) December 13, 2020. <https://international-online.org/2020/12/13/wtfvsc1/>. Accessed 12/13/20.
- Bousquet, Marc. 2008. *How the University Works: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Low-Wage Nation*. New York &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Brossat, Alain. 2019a. "Hong Kong: Le somnambulisme des mouvements [Hong Kong: The somnambulism of movements]." *Lundimatin* #214 November 01, 2019. Accessed 01/25/19. <https://lundi.am/Le-somnambulisme-des-mouvementistes>.
- 2019b. "Hong Kong – Rétablir les droits de l'intelligibilité historique [Hong Kong – Reestablishing the priority of historical intelligibility]." *Lundimatin* #218 November 25, 2019. Accessed 01/25/19. <https://lundi.am/Hong-Kong-Retablir-les-droits-de-l-intelligibilite-historique>.
- 2019c. "Hong Kong: Lettre ouverte (par mégarde) aux amis [Hong Kong: Open letter (by accident) to friends]." *Lundimatin* #220 December 9, 2019. Accessed 01/25/19. <https://lundi.am/Hong-Kong-lettre-ouverte-par-megarde-aux-amis>.
- Brubaker, Rogers. 2010. "Charles Tilly as a Theorist of Nationalism." *American Sociology* 41. 375 – 381.
- Buden, Boris. 2009. *Zone des Übergangs : Vom Ende des Postcommunismus*. Berlin : Edition Suhrkamp.
- Buden, Boris. 2020. *Transition to Nowhere: Art in History After 1989*. Berlin: Archive Books.
- Burr, Ty. 2013. *Gods Like Us: On Movie Stardom and Modern Fame*. New York: Anchor.
- Bruschi, Fabio. *La matérialisme politique de Louis Althusser*. Milan : Mimesis.
- Cafruny, Alan. 2009. "Geopolitics and Neoliberalism: US Power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Autonomy." Eds. Van Apeldoorn, B. et. al. *Contradictions and Limits of Neoliberal*

- European Governance*. 64 – 86.
- Callahan, William. 2002. "Review: Unstructuring Chinese Society: The Fictions of Colonial Practice and the Changing Realities of 'Lan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9. 220 – 221.
- Cartalucci, Tony. 2014. "Hong Kong's 'Occupy Central' is US-backed Sedition." *New Eastern Outlook* October 1, 2014. Accessed 11/19/19. <https://journal-neo.org/2014/10/01/hong-kong-s-occupy-central-is-us-backed-sedition/>.
- Caspersen, Nina. 2011. "Democracy, nationalism and (lack of) sovereignty: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democratisation in unrecognised stat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7:2. 337 – 356.
- Chakrabarty, Dipesh. 2000.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an, Julia. 2020. "#hkfortrump: How American Liberals Have Failed Hong Kong's Democracy Movement." *Boundary 2* December 14, 2020. <https://www.boundary2.org/2020/12/julia-chan-hkfortrump-how-american-liberals-have-failed-hong-kongs-democracy-movement/>. Accessed 12/20/20.
- Chan, Stephen. 2020. "Some thoughts on the endgame of resistance: Ngo-yiu Naam-chaau as terminal reciprocity."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1:1. 99 – 110.
- Chan, Sherry Yuen-yung & JS Tan. 2019. "Hong Kong's Last Battle." *Jacobin* June 2019. Accessed 7/24/19.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9/06/hong-kong-china-protests-extradition-bill>.
- Chan, Weng Kit. 2020. "Beyond Nationhood: Border and coming of age in Hong Kong Cinema." *Global and Media China* 5:2. 154 – 168.
- Chan, Wilfred. 2019. "Hong Kong's Fight for Life" . *Dissent* 8 August 2019. Accessed 9/8/19. 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hong-kongs-fight-for-life . Chinese translation: http://theowl.hk/2019/10/29/%e6%8a%97%e7%88%ad%e6%98%af%e9%a6%99%e6%b8%af%e9%87%8d%e7%94%9f%e4%b9%8b%e9%96%80-wilfred-chan/?fbclid=IwAR3UNHpa1yft22AcU_adoYw1yac24tvs8e6DxVvG4nwtGpYGRjVe3OhGij4 . Accessed 11/01/19.
- Chandler, Nahum. 2015. *X—The problem of the negro as a problem for thought*.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Cheah, Pheng. 2009. "The Material World of Comparison." *New Literary History* 40:3. 523 – 545.
- Cheung, Eric. 2015. "Explainer: Sheung Shui shambles as parallel traders leave a trail

- of waste.” Hong Kong Free Press July 15, 2015. Accessed 01/25/20.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5/07/15/shambles-in-sheung-shui-as-parallel-traders-leave-a-trail-of-trash/>.
- Chow, Rey. 1991. “Violence in the Other Country: China as Crisis, Spectacle, and Woman.” Ed. Chandra Mohanty.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81 – 100.
- , 1992. “Between Colonizers: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Self-Writing in the 1990s.” *Diaspora* 2:2 151 – 70.
- Chu, Leo Chia-Li. 2020. “From ‘Crisis of Masculinity’ to Queer History: Gender, Borders, and Body Politics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Crime Films.”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46:1. 39 – 57.
- Chu, Yiu-Wai Stephen. 2020. “Mediating Borders: New Boundaries for Hong Kong Studies.” *Global Media and China* 5:2. 103 – 108.
- Chun, Allen. 2000. *Unstructuring Chinese Society: The Fictions of Colonial Practice and the Changing Realities of “Lan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 2020a. “Book Review: 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ostcolonial Studies*.
- , 2020b. “‘Nativist’ Social Movement to ‘Postcolonial’ Democratisation.” *Arena* 1. 43 – 49.
- Cohen, Dan. 2019. “Behind a made-for-TV Hong Kong protest narrative, Washington is backing nativism and mob violence.” *The Grayzone* August 17, 2019. <https://thegrayzone.com/2019/08/17/hong-kong-protest-washington-nativism-violence/>. Accessed 10/26/20.
- Collins, Ben. 2019. “Facebook says a pro-Trump media outlet us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reate fake people and push conspiracies.” *MSNBC* 12/20/19. Accessed 12/22/19. https://www.nbcnews.com/tech/tech-news/facebook-says-pro-trump-media-outlet-used-artificial-intelligence-create-n1105951?fbclid=IwAR3fokeI9af2JbFntWsOIPhfyvtA8ZWs-04VbUjs7w_2oI8EqY0MBYu3r4.
- Critical China Scholars. 2020.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Critical China Scholars*. <https://criticalchinascholars.org/>. Accessed 10/28/20.
- Davies, Hugh. 2020. “Spatial Politics at Play: Hong Kong Protests and Videogame Activism.” *Proceedings of DiGRA Australia 2020*. http://digraa.org/wp-content/uploads/2020/02/DiGRAA_2020_paper_46.pdf. Accessed 3/5/20.

- Day, Harold and Sun Feiyang. 2021. “Another view of Tiananmen.” *Redsails* March 3, 2021. Accessed 3/5/21. <https://redsails.org/another-view-of-tiananmen/>.
- De Angelis, Massimo. 2007.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Value Struggles and Global Capital*. London & Ann Arbor.
- Dean, Aria. 2017. “Notes on Blaceleration.” *E-Flux* No. 87. Accessed 5/20/18. <https://www.e-flux.com/journal/87/169402/notes-on-blaceleration/>.
- Dean, Jodi. 2005.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The Circulation and the Foreclosure of Politics.” *Cultural Politics* 1:1. 51-74.
- , 2012. *The Communist Horizon*.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Debord, Guy. 2014. Tr. Ken Knabb.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Berkeley: The Bureau of Public Secrets.
- Derrida, Jacques. 1979. Tr. Barbara Harlow. *Spurs. Nietzsche’s Styl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ésobéissance Écolo Paris. 2020. *Écologies sans transition*. Paris: Éditions Divergences.
- Ellsberg, Daniel and Paul Jay. 2018. “Hitler Wouldn’t Risk Doomsday – But the United States Did.” *The Real News Network* October 31, 2018. Accessed on 04/06/19. <https://therealnews.com/stories/hitler-wouldnt-risk-doomsday-but-the-united-states-did-daniel-ellsberg-on-rai-2-8>.
- Erakat, Noura. 2019a. *Justice for Some: Law and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2019b. “Has international law failed Palestinians?” *+972 Magazine* August 30, 2019. Accessed 1/9/19. <https://972mag.com/noura-erakat-justice-for-some-podcast/143122/>.
- Esparza, Marcia et. al. 2010. *State Violence and Genocide in Latin America: The Cold War Year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Falcone, David. 2020. “Cold War with China and the Thucydides Trap: A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Falk.” *Counterpunch* July 9, 2020. Accessed 7/10/20.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20/07/09/cold-war-with-china-and-the-thucydides-trap-a-conversation-with-richard-falk/?fbclid=IwAR1YgNxdszYRaR8bdt3jMuLm2ZSTy4QfnXquLpAicWTN9O7g8re0bVTXSu0>.
- Felbab-Brown, Vanda. 2015. “The dubious joys of standing up militias and building partner capacity: Lessons from Afghanistan and Mexico for prosecuting security policy through

- proxi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21,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the-dubious-joys-of-standing-up-militias-and-building-partner-capacity-lessons-from-afghanistan-and-mexico-for-prosecuting-security-policy-through-proxies/>. Accessed 10/27/20.
- Forlenza, Rosario and Bryan Turner. 2019. “Das Abendland: The politics of Europe's religious borders.” *Critical Research on Religion*. 7(1):6-23.
- Foucault, Michel.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Paris: Gallimard.
- Fraenkel, Ernst. 2017. Tr. Edward Shils. *The Dual State: A Contribution to a Theory of Dictatorshi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iedman, Eli. 2020. Tweet on 19 September, 2020. twitter.com/EliDFriedman/status/1307357424525991936. Cited in Christian Sorace, “Undoing Lenin: On the Recent Changes to China's Ethnic Policy.” *Made in China May – August 2020*. <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20/09/25/undoing-lenin-on-the-recent-changes-to-chinas-ethnic-policy/>. Accessed 10/12/20.
- Gourevitch, Alex. 2015. *From Slavery to 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Labor and Republican Liber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uilhot, Nicholas. 2005. *Democracy Makers: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an, Byung-Chul. 2017. Tr. Erik Butler. In *The Swarm: Digital Prospects*. Cambridge & London: The MIT Press.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1. *Empire*.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zan, Eric & Kamo. 2013. *Premières mesures révolutionnaires*. Paris: La fabrique.
- Heller, Henry. 2011. *The Birth of Capitalism: A 21st Century Perspective*. London: Pluto Press.
- HKTP (The Hong Kong Transition Project). 2014. Project Summary. Accessed 12/20/2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7104913/https://www.hktp.org/>.
- Hudson, Michael. 2021. “America's Neoliberal Financialization Policy vs. China's Industrial Socialism.” *Naked Capitalism* April 15, 2021. Accessed 4/16/21. <https://www.nakedcapitalism.com/2021/04/michael-hudson-americas-neoliberal-financialization-policy-vs-chinas-industrial-socialism.html>.
- Hui, Yuk. 2019. *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 London &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Huntington, Samuel. 2004.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 York: Simon & Schuster.
- Ince, Onur Ulas. 2014. “Primitive Accumulation, New Enclosures, and Global Land Grabs: A Theoretical Intervention.” *Rural Sociology* 79:1. 104 – 131.
- Ip, Iam Chong (Ye Yincong), 1998. “The Specters of Marginality and Hybridity: Hong Kong Identity in Cultural Criticism.”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30:3. 45 – 64.
- , 2020. *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Jameson, Fredric. 2016. Ed. Slavoj Žižek. *An American Utopia: Dual Power and the Universal Arm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JN & JS. 2020. “We can't let China apologists stop us from supporting Black Lives Matter.” Lausan June 18, 2020. <https://lausan.hk/2020/we-cant-let-china-apologists-stop-us-from-supporting-black-lives-matter/>. Accessed 10/26/20. Chinese translation: <https://lausan.hk/2020/we-cant-let-china-apologists-stop-us-from-supporting-black-lives-matter-chinese/>. Accessed 10/26/20.
- Jones, Mark. Undated. “Stalin, appeasement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Accessed 12/5/20. http://www.columbia.edu/~lnp3/mark_jones/appeasement.htm.
- Jones, Mark and Cathy Porter. 1987. *Moscow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Chatto and Windus.
- Karl, Rebecca. 2020. “Thoughts from afar on Hong Kong, 1 January 2020” . *Positions Politics*. Accessed 1/2/20. <http://positionspolitics.org/thoughts-from-afar-on-hong-kong-rebecca-karl-1-january-2020/>.
- Kelion, Leo. 2021. “Biden urged to back AI weapons to counter China and Russia threats.” BBC March 2, 2021. Accessed 3/2/21.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56240785>.
- Keucheyan, Razmig. 2014. *Left Hemisphere: Mapping Critical Theory Toda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Kivotidis, Dimitrios. 2019. “Marxist Legal Theory :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Critical Legal Thinking* 11 December 2019. <https://criticallegalthinking.com/2019/12/11/marxist-legal-theory-dictatorship-of-the-proletariat/>. Accessed 10/30/20.
- , 2021. “Dictatorship and the Supersession of the Bourgeois State.” Dimitrios Kovitidis. *Dictatorship: New Trajectories in Law*.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Klebnikov, Paul. 2000. *Godfather of the Kremlin: Boris Berezovsky and the Looting of Russia*. New York: Harcourt.
- Klein, Naomi. 2007.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Toronto: Knopf Canada. 娜歐密·克萊恩著，吳國卿、王柏鴻譯，《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崛起》，

- 台北：時報出版社，2009年。
- Kroll, Andy. 2013. "Exposed: The Dark-Money ATM of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Mother Jones* February 5, 2013. <https://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13/02/donors-trust-donor-capital-fund-dark-money-koch-bradley-devos/>. Accessed 10/30/20.
- Kuenssberg, Laura. 2014. "Oslo Forum Foundation : Activists gather to share secrets of successful protest." *BBC News* 21 October 2014. Accessed 3/5/20.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9708917>. Original unedited version :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022050950/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9708917>.
- Lacoue-Labarthe, Philippe & Jean-Luc Nancy. 1990. Tr. Brian Holmes. "The Nazi Myth." *Critical Inquiry* 16:2. 291 – 312.
- Lausan & Critical China Scholars. 2021. "A Dialogue Between Lausan and Critical China Scholars." *Spectre* March 10, 2021. Accessed 3/10/21. <https://spectrejournal.com/roundtable-on-china/>.
- Law, Wing Sang (Luo, Yongsheng). 2009.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awrence, Bonita and Anakshi Dua. 2005. "Decolonizing Antiracism." *Social Justice* 32:4. 120 – 143.
- Lazzarato, Maurizio. 2011. Tr. Joshua David Jordan. *The Making of Indebted Man: An Essay on the Neoliberal Condition*. Cambridge & London: MIT Press.
- Le Cour Grandmaison, Olivier. 2005. *Coloniser, Exterminer. Sur la guerre et l'État colonial*. Paris: Fayard.
- Lee, Peter. 2019. "Hong Kong: The Reckoning." *The China Threat* blog 12/23/19. Accessed 8/10/20. <https://www.patreon.com/posts/unlocked-hong-32559078>.
- Levine, Yasha. 2020. "Weaponized Immigrants and the History of America's Imperial Propaganda Machine." *Immigrants as a Weapon* Blog May 5, 2020. <https://yasha.substack.com/p/weaponized-immigrants-and-the-history>. Accessed 11/03/20.
- Li, Promise. 2020. "It's time for Hong Kong to reckon with its far right." *Lausan* November 29, 2020. <https://lausan.hk/2020/hong-kong-reckon-with-far-right/>. Accessed 12/2/20. 陳怡譯，〈『無天台』與香港極右翼的崛起〉，《流傘》2021年1月19日，<https://lausan.hk/2021/hong-kong-reckon-with-far-right-chinese/>，1/25/21 瀏覽。
- , 2021. "Facing the Right in the Hong Kong Movement." *Naoqingchu*. <https://nqch.org/2021/03/06/podcast-facing-the-right-in-the-hong-kong-movement/>.
- Little, Archibald John. 1901. *Mount Omi and Beyond: A Record of Travel on the Thibetan*

- Border*.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 London, Frédéric. 2019. *Vivre sans ? Institutions, police, travail, argent...*. Paris : La fabrique.
- Luxemburg, Rosa. 2006. Ed. Paul Buhle. *Reform or Revolution and Other Writings*. Mineola: Dover Publications.
- Ma, Shuling. 2017. "To Compare Otherwise: Immanence, Totalit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 *Meditations* 31:1. 27 – 46.
- Marx, Karl. 1973. Tr. Martin Nicolau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gh Draft)*. London: Pelican Books.
- Marcetic, Branko. 2020. "The CIA's Secret Global War Against the Left." *Jacobin* November 2020. <https://jacobinmag.com/2020/11/operation-condor-cia-latin-america-repression-torture>. Accessed 11/20/20.
- Memmi, Albert. 1965.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Boston: Beacon Press.
- Mezzadra, Sandro. 2007. "Living in Transition: Toward a Heterolingual Theory of the Multitude." *Transversal* June 2007. Accessed 01/25/2020. <https://transversal.at/transversal/1107/mezzadra/en?hl=Living%20in%20Transition>.
- , 2011. "The Topicality of Prehistory: A New Reading of Marx's Analysis of 'So-calle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Rethinking Marxism* 23:3. 302 – 321.
- Morefield, Jeanne. 2019. "Challenging Liberal Belief: Edward Said and the Critical Practice of History." In Duncan Bell, ed. *Empire, Race and Global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4 – 210.
- Moreiras, Alberto. 2005. "Beyond the Line: On Infinite Decolonizatio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17:3. 575 – 594.
- Morjé Howard, Lise. 2012. "The Ethnocracy Trap." *Journal of Democracy* 23:4. 155 – 169.
- Moten, Fred and Stefano Harney. 2013. *The Undercommons: Fugitive Planning and Black Study*. Minor Compositions Press.
- Moulier Boutang, Yann. Tr. Bernard G. Prusak. 2001. "Between the Hatred of All Walls and the Walls of Hate: The Minoritarian Diagonal of Mobility." *Traces* 2.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05 – 127.
- Naureckas, Jim. 2017. "No, US Didn't 'Stand By' Indonesian Genocide—It Actively Participated." *FAIR* October 18, 2017. <https://fair.org/home/no-us-didnt-stand-by-indonesian-genocide-it-actively-participated/>. Accessed 10/26/20.
- Negri, Antonio. 2013. Tr. Matteo Madarini. *Time for Revolution*. London & New York:

- Bloomsbury Academic.
- , 2017. "La défaite de 77." Eds. Nanni Balestrini et Primo Moroni. Tr. Jeanne Revel et. al. *La horde d' or*. <http://ordadoro.info/?q=content/toni-negri-la-d%C3%A9faite-de-77>. Accessed 01/25/20.
- Neilson, Brett and Sandro Mezzadra. 2013. *Border as Method, or, the Multiplication of Labo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 2020. "Foreword." Eds. Anthony Cooper and Søren Tinning. *Debating and Defining Borders: Philosoph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 New York: Routledge. xvii - xxv.
- Nguyen, Duy Iap. 2013. "The Universal Province of Modernity."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1 - 18.
- Oliva, Antonio, Ángel Oliva & Iván Navara. 2020. *Marx and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The Philosophy of Real Abstraction*.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 Ong, Jonathan Corpus and Tony Zhiyang Lin. 2017. "Plague in the City: Digital Media as Shaming Apparatus toward Mainland Chinese 'Locusts' in Hong Kong." In *Communicating the City: Meanings Practices, Interactions*. Giorgia Aiello, Matteo Tarantino and Kate Oakley, eds. New York: Peter Lang. 149 - 165.
- Ortmann, Stephen. 2016. "The lack of sovereignty, the Umbrella Movement, and democratisation in Hong Kong." *Asia Pacific Law Review* 24:2. 108 - 122.
- Pang, Laikwan. 2020. *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Perrigo, Billy. 2020. "Trump Administration Freezes Funds Intended to Benefit Hong Kong Protesters." *TIME* June 26, 2020. <https://time.com/5860163/trump-hong-kong-funding-freeze/>. Accessed 10/31/20.
- Phung, Malissa. 2011. "Are People of Colour Settlers Too?" Eds. A. Mathur, J. Dewar, M. DeGagné. *Cultivating Canada : Reconcili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Cultural Diversity*. Ottawa: Aboriginal Healing Foundation. 289 - 96.
- Poulantzas, Nicos. 2014.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Verso.
- Rana, Aziz. 2010. *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 Cambridge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2015. "Colonialism and Constitutional Mem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Law Review* 5:2. 263 - 288. <https://scholarship.law.uci.edu/ucilr/vol5/iss2/4>. Accessed 10/31/20.

- Rana, Aziz and Jedediah Britton-Purdy. 2020. "We Need an Insurgent Mass Movement." *Dissent* Winter 2020. <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we-need-an-insurgent-mass-movement>. Accessed 10/22/20.
- Read, Jason. 2002. "Primitive Accumulation: The Aleatory Foundation of Capitalism." *Rethinking Marxism* 14:2. 24 - 48.
- , 2003. *The Micro-politics of Capital: Marx and the Prehistory of the Present*. Buffalo: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 2017. "Immanent Cause: Between Reproduction and Nonreproduction." *Unemployed Negativity* No. 17, 2017. <http://www.unemployednegativity.com/2017/11/immanent-cause-between-reproduction-and.html>. Accessed 11/20/20.
- Roberts, Neil. 2015. *Freedom as Marronage*.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uggeri, Laura. 2020. "Agents of Chaos - How the US Seeded a Colour Revolution in Hong Kong." *Medium* May 25, 2020. <https://medium.com/@italian4hk/agents-of-chaos-how-the-u-s-seeded-a-colour-revolution-in-hong-kong-2b5050b5ba0f>. Accessed 10/26/20.
- Sabbagh, Dan. 2021. "Five areas of interest from UK defense policy review." *The Guardian* 3/15/21. Accessed 3/15/21.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21/mar/15/five-areas-of-interest-from-uk-defence-and-foreign-policy-review>.
- Sakai, Naoki. 1997.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On Cultural Nationalism and "Jap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 2005a. "Introduction: Nationa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Mother Tongue.'" In Naoki Sakai, Brett de Bary, and Iyotani Toshio, eds. *Deconstructing National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 2005b. "The West—a Dialogic Prescription or Proscription?" *Social Identitie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ace, Nation and Culture* 11.3: 177 - 195.
- , 2009. "How do we count a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Discontinuity." *Translation Studies* 2:1. 71 - 88.
- , 2010. "Translation and the Figure of Border: Toward the Apprehension of Translation as a Social Action." *Profession* (2010). 25 - 34.
- , 2013. "The Microphysics of Comparison and the Dislocation of the West." *Transversal*. Accessed 1/22/2019. <http://eipcp.net/transversal/0613/sakai/en>.
- , 2017a. "The Modern Regime of Transl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Natio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58:1. 105 - 108.

- , 2017b. "The Loss of Empire and the Nationalism of Hikikomori (Reclusive Withdrawal)." Conference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ctober 14, 2014. Manuscript. Japanese version: 酒井直樹, 2017, 《ひきこもりの国民主義》, 東京: 岩波書店。第5章“バックスアメリカーナの終焉とひきこもりの国民主義”, 176 – 254。
- , 2018. "The Modern Regime of Translation and Its Politics." Eds. Lieven D'hulst and Yves Gambier. *A History of Modern Translation Knowledge: Sources, concepts, effect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61 – 74.
- Saleh, Yassin al-Haj. 2018. Tr. Alex Rowell. "A Critique of Solidarity." *Al-Jumhuriya* July 16, 2018. <https://www.aljumhuriya.net/en/content/critique-solidarity>. Accessed 07/29/18.
- Sanín Restrepo, Ricardo. 2017. "The Razor's Edge of Politics: Notes on the Meaning of the Encryption of Power." *Critical Legal Thinking* August 3, 2017. Accessed 01/25/2020. <http://criticallegalthinking.com/2017/08/03/razors-edge-politics-notes-meaning-encryption-power/>.
- Sanyal, Kalyan. 2007. *Rethinking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rimitive Accumulation, Governmentality, and Post-Colonial Capital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Sautman, Barry and Yan, Hairong. 2015. "Localists and 'Locusts.'" *Maryland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Vol. 2015: No. 2 (Hong Kong: Creating a Yellow-Red Peril Discourse). Article 1.
Available at: <https://digitalcommons.law.umaryland.edu/mscas/vol2015/iss2/1>.
- Scipes, Kim. 2010. *AFL-CIO's Secret War Against Developing Country Workers: Solidarity or Sabotage?*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 Shen, Simon. 2011. "Hong Kong's external space: Defining a grey area." *Hong Kong Journal*, 21. Accessed 10/25/20.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hkjournal/PDF/2011_summer/4.pdf.
- Singh, Ajit. 2019. "Hong Kong's opposition unites with Washington hardliners to 'preserve the US's ow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The Grayzone* November 22, 2019. <https://thegrayzone.com/2019/11/22/hong-kong-opposition-unites-washington-hardliners/>. Accessed 10/26/20.
- Singh, Nikhil Pal. 2016. "On Race, Violence, and So-Calle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Social Text* 34:3. 27 – 50.
- Solomon, Jon. "Another European Crisis? Myth, translation and the apparatus of area." 2012. In German, French, and Spanish translations with English original text. *Transversal* July 2012. <https://transversal.at/transversal/0613/solomon/en?hl=SOLOMON>
- , 2019. "From '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 to 'Chip Foundry for the Borg': Reflections on the U.S. – P.R.C. War and Taiwan's Role in Technological Tot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 13*. http://iccs.nctu.edu.tw/en/wps_one.php?USN=16.
- , 2020. "Crash Test Dummies, Autonomous Weapons, and Capital's Native Language: Towards Rebellious Translation." *The Contemporary Journal* 1 (February 2020). <https://thecontemporaryjournal.org/issues/on-translations/crash-test-dummies-autonomous-weapons-and-capitals-native-language-towards-rebellious-translation>. Accessed 11/21/20.
- , Forthcoming. "Lucian Pye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rea Studies in White Settler Colonialism." Eds. Naoki Sakai, Joyce Liu & Jon Solomon. *Epistemic Decolonization and the End of Pax American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Sorace, Christian. 2020. "Undoing Lenin: On the Recent Changes to China's Ethnic Policy." *Made in China* September 25, 2020. Accessed 10/15/20. <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20/09/25/undoing-lenin-on-the-recent-changes-to-chinas-ethnic-policy/>.
- Sparks, Colin. 1996.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marxism." Eds. Kuan-hsing Chen and David Morley.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71 – 102.
- Spivak, Gayatri. 1985.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71 – 313.
- Stalin, Josef. 1953. "The Policy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Russia." Josef Stalin. *Works* vol. 4.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Accessed 12/17/20.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stalin/works/1920/10/10.htm>.
- Telesur. 2019.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stabilization? CIA Funds for Latin America in 2018." *Telesur* April 4, 2019. <https://www.telesurenglish.net/analysis/National-Endowment-for-Destabilization-CIA-Funds-for-Latin-America-in-2018-20190403-0042.html>. Accessed 10/26/20.
-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1. *Final Report 3/2/21*. <https://www.nsc.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Full-Report-Digital-1.pdf>.
- Tilly, Charles. 2005. *Identities, Boundaries, and Social Ties*. Boulder and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 Tilly, Charles. 2006. *Regimes and Repertoire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ong, Kan Hon. 1970. "Campaign Black Armband." 《70年代雙週刊》The 70's Biweekly No. 14 (10/6/70), 14 – 15.
- Toscano, Alberto. 2016. "After October, Before February." Ed. Slavoj Žižek, *An American Utopia: Dual Power and the Universal Arm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11 – 242.
- , 2020. "The Long Shadow of Racial Fascism." *Boston Review* October 28, 2020. <http://bostonreview.net/race-politics/alberto-toscano-long-shadow-racial-fascism?fbclid=IwAR3pcwXSPmq3r1dlf4weu3ZTDcJrilavMmGFJUtkCn0P5gGtg6DRGjj8hPI>. Accessed 11/11/20.
- Tyler, Imogen. 2010. "Designed to fail: a biopolitics of British citizenship." *Citizenship Studies* 14:1. 61 – 74.
- Van Wolferen, Karel. 2014. "The Havoc and Fantasy of 'Full-Spectrum' Dominance." <https://www.karelvanwolferen.com/46-havoc-fantasy-full-spectrum-dominance-26-sept-2014/>. Accessed 9/10/15.
- Veg, Sebastian. 2013. "Putting Hong Kong's New Cultural Activism on the Literary Map: Review Essay." *MCLC Resource Center* May 2013. <https://u.osu.edu/mclc/book-reviews/hong-kong-new-culture/>. Accessed 10/15/20.
- Vittachi, Nury. 2020.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A Secret War in Hong Kong*. Hong Kong: YLF Hong Kong.
- Vukovich, Daniel. 2019. "A city and a SAR on fire: as if everything and nothing change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52:1.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4672715.2020.1703296>. Accessed 12/20/19.
- , 2020. "A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Mediatisation: On the Hong Kong Protests, 2019." *Javnost – The Public* 27:2. 200 – 209.
- Wallace, Rob. 2016. *Big Farms Make Big Flu: Dispatches on Influenza, Agribusiness,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 2020. *Dead Epidemiologists: On the Origins of COVID-1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Wallace, Rob, et. al. 2020. "COVID 19 and Circuits of Capital." *Month Review* May 01, 2020. Accessed 10/11/20. <https://monthlyreview.org/2020/05/01/covid-19-and-circuits-of-capital/>.
- Walker, Gavin. 2011.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Difference: On Marx and Schmitt." *Rethinking Marxism* 23:3. 384 – 404.
- , 2016. *The Sublime Perversion of Capital: Marxist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in Modern Japan*.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 2018. "The Schema of the West and the Apparatus of Capture: Variations on Deleuze and Guattari." *Deleuze Studies* 12.2: 210 – 235.
- , 2019a. "The Postcolonial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Outside: Return(s)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 Theory." *Viewpoint Magazine* Feb 1, 2018. <https://viewpointmag.com/2018/02/01/postcolonial-politics-outside-returns-national-question-marxist-theory/>. Accessed 2/24/18.
- , 2019b. "The Accumulation of Difference and the Logic of Area."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27:1. 67 – 98.
- Walker, R.B.J. 2009. *After the Globe, Before the Worl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Wall, Illan rua. 2013. *Human Rights and Constituent Power: Without Model or Warrant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Warren, Calvin. 2018. *Ontological Terror: Blackness, Nihilism, and Emancipation*.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Water is coming." 2020. "Water is coming." *Lundimatin* #224 January 10, 2020. Accessed 01/25/20. <https://lundi.am/Water-is-coming>.
- Wedel, Jeanine. 1998. "The Harvard Boys Do Russia: After seven years of economic 'reform' financed by billions of dollars in U.S." *The Nation* May 14, 1998.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archive/harvard-boys-do-russia/>. Accessed 09/05/20.
- Wilderson, Frank. 2003. "Gramsci's Black Marx: Whither the Slave in Civil Society?" *Social Identities* 9:2. 225 – 240.
- Wood, Tony. 2018. *Russia without Putin: Money, Power, and the Myths of the New Cold Wa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Yan, Ming. 2014. "Internal Documents Embarrass Lee Cheuk-yan." *China Daily* October 17, 2014. http://www.chinadaily.com.cn/hkedition/2014-10/17/content_18757549.htm. Accessed 10/26/20.